

憤怒之愛

南方朔 著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

上海圖書館藏書



- 二十五萬人參加的華府反越戰大遊行。
- 以金恩為首的抗議種族歧視遊行，往林肯紀念堂方向前進。



憤怒之愛

南方朔 著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

憤怒之愛

作 者◎南方朔
發 行／張英華
印 行／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392號9F之5
 (02)7763141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717號
總 經 銷／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392號9F之5
 (02)7763141 · 7762311
郵政劃撥／1492020～3林維青帳戶
訂書專線／(02)3567211
傳 真 機／3979065
排 版／上統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初 版／1991年8月
定 價／250元
ISBN／957-41-0149-5

目 錄

原序	i
再版前言	v
導 論	1
第1章：結束就是開始	7
第2章：學生運動起因的不同解釋	13
第3章：五〇年代校園景象	31
第4章：學生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	37
第5章：從民權到黑權的過渡	43
第6章：「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崛起和成長」	59
第7章：「學生民主社會同盟」	69
第8章： <u>自由言論運動</u> 和反戰運動	85
第9章：反抗！反抗！反抗！	107
第10章：革命	151
第11章：反叛的極限	179
附錄：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相關文獻	187

2 憤怒之愛

1. 給越南戰場黑人兄弟的一封信	191
2. 從審判黑豹黨談黑白問題的前途	195
3. 公園屬於誰？	207
4. 各部落全體印第安人聲明	209
5. 中毒的麥子	213
6. 提摩太·賴瑞之越獄聲明	227
7. 「氣象人黨」宣戰書	231
8. 白豹黨之立場	237
9. 紅襪黨宣言	241
10. 聖誕老人謀殺案	245
✓ 11. 保守派學生對學運的看法	251
✓ 12. 學生需要什麼？	259
主要參考書目	267

原 序

雖然有點武斷，但並不太離譜；今天整個世界，各國的內政受到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影響非常的巨大，由之，整個國際社會，世界思潮也都受到深遠的影響。

一九五〇年代是國際僵持的冷戰年代，由於局勢的懸滯，世界各國的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便都把眼光集中到自己切身有關的社會事務上，於是「經驗批評」便開始了，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便被激發，不滿產生。它獲得了適當的事件「板機」，於是知識份子前衛的學生運動便開始了它波瀾壯闊的局面。

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以學生為基幹的知識份子運動，是個世界性的運動，它不但在自由世界普遍的展開，也同時在共產世界綿延不絕。全世界除了極其落後的地區外，沒有不受波及的。

六〇年代世界性的學生運動，它所代表的意義是多重的，從最廣泛的觀點而言，它是世界兩大勢力繼續分化的先兆，由自由世界開發中國家學生運動裡的民族主義，以及共產國家學生運動

中的反蘇主義，可以明顯的看出這種趨勢。從各國內部的觀點而言，則學生運動便是一種尋求更多自由民主與平等的運動之先兆，這可以由各國學生運動普遍要求「更合理社會」的呼聲中明顯的看出。而這兩者之間又是相互滲透，相生相長的。各國知識青年，普遍的都是先從對國內事務的抗議開始，然後逐漸加大它抗議對象的廣度與深度，於是世界的問題、國家的問題、人民的問題，便都一一受到反省。（美國的學生運動是受民權問題的激發，德國的學生運動受法西斯復辟的激發，捷克的學生運動始於反秘密警察，第三世界國家學生運動大多是為了更多的民主，都可以作為印證。

世界性的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是個從事近代政經以及社會人文思潮研究者必須關切的對象，因為這項運動已經為這些方面灌注了許多新的變動因素。而無疑的，其中以美國的學生運動最有研究的價值，一方面是因為它的資料最多，而更重要的是，綿延垂十年的美國學生運動，由初起而盛、而衰，順利的演完了一個廣泛性社會運動的全程，同時它所遺留下來的長期效果也最顯著。因此，對它作比較集中的觀察，便具有由一見多，統觀全局的方便。

有關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它的史實，它的意義，學生的學運策略，美國政府因應的態度和作法，學生的意識型態，以及著名事件的個案分析，專著已多。美國白宮，國會，民間團體等對此所作的調查分析和研究也汗牛充棟。所有這些資料固然立場極為紛歧，對學生運動有褒有貶，但無一不承認學生運動客觀的意義：亦即，美國確實有病。也正因此，學生運動之後，深入到每一個領域的批判工作自七〇年代起就已展開。許多在六〇年代

尚被認為是「激進」(radical)的見解，到了七〇年代，尤其是七〇年代後期，幾已成為很平常的見解，進步就這樣開始了，我們可以預期，八〇年代開始，將會是昔日的「激進」與「保守」相融合而創新的年代。

由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發展的全程，我們對它最激進的革命派學生，是抱著一種惋惜的態度的。他們之中的許多優秀份子，在被群眾歡呼，被新聞不斷報導的狂喜中，不斷的昇高衝突，沒有在該停的時候停下來從事更長遠眼光的工作，終而走上暴力虛無主義的路途，這段史實，本書有很詳細的及自認公正的分析，這或許有著可以供我們自己反省的東西存在其中。

對於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本書所注重的僅限於政治的層面，另外與此相關的許多問題都值得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其中包括六〇年代黑人運動的全程發展，勞工運動，保守主義知識份子運動，女權運動，青年次文化的嬉痞和野痞，心理玄轉革命等。在這裏由於篇幅限制，不得不俟諸後日。

本書特地作了一個附錄，一共選了十二篇，並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已可概括當時許多青年學生的想法，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件，例如〈休倫港文件〉、〈野痞宣言〉、〈氣象人黨宣言〉、〈黑豹黨宣言〉，或因太長，或因其他考慮，都不予列入。

本書的著作，受到許多朋友的關切與鼓勵，不能一一列名致謝，希望這本書能讓大家的人生道上都能走得更穩健。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高峰時刻，耶魯大學校長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是個很值得尊敬的人，他用愛心與耐心，化解了很大的衝突事件，當時，安格紐副總統曾公然指斥他是「投機主義者」，可是歷史證明他才是對的。他在一次演講中，曾有過

下述警句，願以這幾個警句，作為自勉與勉人的序文終結：

假如他們失去對法治的信心，對求真及正直的信心，對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的信心，那麼我們勢必失去他們。假使他們無法保持這種信仰，那麼，到他們的時代，他們可能就失去了美國一向所維護的原則。

從經驗加希望，我相信只要我們不讓年青人失望，他們也不會讓我們失望。

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卅一日

再版前言

再看《憤怒之愛》

《憤怒之愛》是一九八〇年的舊作，而它敘述的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更已成了歷史的陳跡。由於所有的歷史事件在發生當時都不能被完全定義，它的真實定義決定在後續的發展上。因此，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它的意義或許要到廿多年後的今天來看，才可能比較明朗——它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但它儘管「未完成」，而實質上它卻已改變了整個人類的歷史，許多政治及文化的新風格，都是學生運動那個「創造的年代」的產物。

一九六八年乃是六〇年代全球學生運動的巔峰年份，同時也是戰後的劇變年代。這一年，美國詹森總統的越南政策受到學生反戰運動的強烈反對，他黯然宣佈不再競選連任；這一年，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被暗殺，悲憤的黑人展開更大規模的暴動；這一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佔領了校園建築物，學生及青年在芝加哥的「民主黨大會」時展開了暴動；而同時，則是甘迺迪家族第二名可能成為總統的羅伯甘迺迪也再度被刺。這是個充滿了暴力與血腥的年代，而同時也是充滿了希望的年代。

一九六八年，除了美國的學潮之外，法國巴黎更是學生運動聖地，全體學生以及八百萬工人進行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在捷克，學生運動與「布拉格之春」全民運動並進，卻招致了蘇聯的入侵事件。一九六八年是個世界劇變，一切希望與絕望的種籽同樣在萌芽的時刻。

因此，一九六八是個值得紀念，並應在紀念中重新賦予意義的年份。這個工作，美國學者及運動參與者，早在一九八八年——學運廿週年時就已展開，有關學運及那個時代的反省性著作在當年大量出現，所知的即有下述十冊：

- ✓ 1. *The Sixties*, by Todd Gitlin (Bantam)
- ✓ 2. *Nineteen Sixty Eight: The Year of Hope*, by Hans Koning (W.W.Norton)
3. *From Camelot to Kent State*, by Joan & Robert K. Morrison (Times)
- ✓ 4. *Democracy is in the Streets*, by James E. Miller (Simon & Schuster)
5. *Storming Heaven*, by Jay Stevens (Atlantic Monthly)
6. *Aquarius Revisited*, by Peter O. Whitmer & Bruce van Wyngarden (Macmillan)
7. *Flashing on the Sixties*, photographs by Lisa Law (Chronicle)
- △ 8. *If I Had a Hammer: The Death of the Old Left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Left*, by Maurice Isserman (Basic)
- ✓ 9. *The Year of the Barricade*, by David Cauter (Harper)

& Row)

10. *Reunion: A Memoir*, by Tom Hayden (Random House)

在上述十冊著作中，第一本普遍被認為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著者吉特林 (Todd Gitlin) 當年乃是學生領袖，曾當選過「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會長，學運之後專心向學，目前已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社會學教授，同時也是目前美國社會思想界裡最有原創力的學者之一。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就是在大眾媒體的時代，大眾傳播媒體如何使學生運動的主體性被消滅的過程。

吉特林在這本《六〇年代》的綜合性，反思的著作中指出，六〇年代儘管已經過去，而現在的美國又是個右翼復辟的時代，然而，進步畢竟已成了不可逆轉的事實，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以一整代年輕人的力量，固然沒有徹底激發美國，但卻留下了許多進步的方向：

——黑人、婦女經過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洗禮，開始正式進入政治及職業的公共生活之中，這是六〇年代前不可思議之現象。

——經過六〇年代的學運，民主觀念在美國又被徹底的淨化了一次，各種型態的草根民主觀念蓬勃發展，一種高度積極的「公民意識」開始成為美國人民的生活方式之一。

——各種新的抗爭領域開始出現，並被固定化，反戰、和平、環境、都市，這些新的抗爭領域已使人與社會的意義有了更多的選擇，也為「團結在分歧之下」的民主社會得以呈現。

——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本質上乃是一個「反冷戰意識型態」的思想及實踐。六〇年代之後，「冷戰」時代事實上已不

能繼續維繫下去，學生的反戰，已使美國不再能肆無忌憚的干預他國內政，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乃是冷戰時代結束的前奏。

——而真正重要的是，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乃是一種新的文化運動，戰後的一代以一種新的人生態度與價值標準來看待世界，他們打抱不平，比較有容忍的心胸與氣質，反對侵略，主張「生活世界」的更加解放。六〇年代的學運，乃是一個「生活世界」的解放運動。

吉特林在書中指出，六〇年代學運之後，馬庫色曾至加州大學演講，指控學運「乃是被特務壓制下去的！」，吉特林不以為然，他認為任何運動均旨在改變世界，完全或部份的顛覆既有秩序，因此，它是個艱苦的挑戰，壓制是必然的，但壓制並不能做為運動失敗後的唯一藉口，運動是一種創造——一種勇氣與智慧的結晶。

六〇年代的美國學運乃是個「未完成的革命」，而根據許多美國學者的分析，九〇年代有可能再次出現運動的高峰。

舉例而言，美國「自由派教父」小史萊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 即指出：「目前這個時刻，與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五八年極為類似，整個社會充滿了日益升高的理想主義，這種趨勢將會增強，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將會達到一個新的階段，如同三〇年代和六〇年代，而成為社會運動的金色年代！」另外，美國「消費者運動之父」雷夫耐德 (Ralph Nader) 也認為：「現在，一個新的基地已經被建造完成，它是為九〇年代更大的事情做準備。我們可以說，一個巨大的公民行動主義現在已告復甦！」

激情狂飆逐被否定

愈來愈多的跡象顯出，一九九〇年代極可能是美國的另一個學運——或者可以說是更廣泛的公民運動的時代。經過激情狂飆的六〇年代學運，現在的美國報紙電視對人民的不滿運動已很少再報導，不久前，千餘名學生至一位眾議員辦公室門口抗議他支持尼加拉瓜反抗軍，結果一百八十多名學生被捕，類似於這種新聞事件都再也上不了報紙，只能在美國的體制外刊物上讀到；除了大眾傳播媒體被馴化之外，另外一點則是經過動輒數十萬人的示威的六〇年代，數千人的示威也幾乎都不再有「新聞價值」。不過，大眾傳媒少報導，對運動倒未嘗不是件好事——運動反而不容易由於媒體的炒作而迷失了方向。

有許多數據或事實可以證明這種沈潛下去的力量：

——一九八七年底，全美二十多所著名大專院校代表在麻省理工學院召開「全美學聯籌備會」。八八年二月，在羅吉斯大學召開正式成立大會。六〇年代美國學運時有過「民主社會學生同盟」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這個反體制全美學運組織，學運之後這個組織即告瓦解，「全美學聯」乃是六〇年代之後第一個美國全國性的反體制學生組織。它在世界和平、反核、反對美國的南非及中美洲政策上頗有建樹。

——各種草根社區運動團體，以迄於此類團體的全國性組織「公民行動組織」(Citizen Action)，單單「公民行動組織」會員即逾一百五十萬人。這些組織的主要工作乃是社區生態運動。一九八九年六月，全美環保團體更決定組織綠色政黨。

——一九八九年美國爲了墮胎合法問題而爭執不已，數十萬

婦女走上街頭，充分顯示婦女的意識逐漸增高，有許多數據可資證明：一九七一年美國婦女成立「全國婦女政治委員會」(National Women's Political Caucus) 之時，在州議員這一級，婦女僅三六二人，佔四·七%，目前已增至一二六一人，佔十六·九%；在各地方的市長級之中，一九七一年女性只有七人，目前已增至一二二人，佔十二·七%；在國會參、眾議員這一級，七一年女性僅十五人，佔二·八%，現已增至二十八人，佔五·二%。

女性意識日益抬頭

——戰後以來的美國進步運動動力都是學生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農民幾乎毫無影響力，但八〇年代以來，由於美國農業日益凋蔽，「農村激進主義」(Rural Radicalism) 開始興起，「美國農村運動組織」(AAM)、「農村選民聯盟」(LRV)、「拯救家庭農場同盟」(SFFC) 均先後成立，它們的主要訴求乃是抵制商業化農產公司對農村的經濟侵略，建造自足且無公害的農業經濟等。

——在抗爭的手段上，八〇年代的運動也和以往有所不同。由於整個社會的覺悟程度提高，在諸如反核、環保等運動上，都有極多軍事科學專家，以及衛生工程、生態專家等介入。

——運動水平提高：除了水準提高、更具說服力外，各種運動的橫向聯繫與整合也日趨完整。例如反核運動有「反核者」(The Nuclear Resister) 雜誌；各項激烈的抗爭則有「全國抵制運動新聞」(National Boycott Newsletter) 等來聯繫支援，不易被各個擊破。由於橫向聯繫完善，大型動員遂告可能，稍早前，各種團體聯合反對美國的干涉尼加拉瓜，展開長達四十七天的運

動，即以「陸軍退伍軍人協會」為骨幹。

——在抗爭的資源上也有了新的開發，善用財經資源已成了新的手段——例如反核團體為了獎勵紐西蘭的非核政策，即透過各種組織向紐西蘭增加進口；在抵制美國的南非政策時，即發動股市杯葛與南非來往的大型公司；環保運動團體則發動民衆支援從事無污染工業的廠商……等。

橫向整合動員擴大

根據美國蓋洛甫民意測驗，一九八六年時，美國人參與各類團體者僅十三%，但到了一九八八年，則已增至四十九%。兩年不到即發生如此大幅度的改變，這其實已顯示出美國人民的一些心靈及社會變化——這是一個有話就要說出來、有不滿就要表現出來的時代，易言之，新的時代已有了新的標準：「不表示不滿」就是「滿意」！

和平文化征服全美

吉特林一九八九年曾發表論文稱：六〇年代的美國學運，它唯一真切的意義是，經過那次學運，一種新的青年文化已被灌注到整體美國文化之中，使得美國已出現一種「永恆的內戰」——一種新的文化（和平、友愛、尊重自然等）逐漸取代老的文化的爭戰過程。對此，美國西海岸的「理論教父」奧康諾教授（James O'connor）最近在他的鉅著《累積危機》（*Accumulation Crisis*）也提到，目前的美國，已進入一種新的、更「積極的個人主義」的時代。也正因此，九〇年代將會成為一個各種運動更加蓬勃的一個時代！

由於一種新的政治及社會行動主義浪潮已逐漸開始升高，最近這段期間，這個問題也日漸受到理論界的重視與探索，若干新興的理論家，例如前述的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校區教授奧康諾、明尼蘇達大學教授蘇格涅 (Charlie Sugnet)、生態政治問題理論家金伯瑞 (Andrew Kimbrell) ……等均普遍認為，未來的運動乃是持續六〇年代學運及民運而來，它是一種以民間為本位，一種「內向式」的運動，由於「內向」，因此，以往那種「外向」的標準——諸如以國家機器為本位的侵略與擴張、破壞環境、貪得無厭等，自然會受到揚棄與批判。以比較哲學的概念來說，那就是，從六〇年代以來，西方的運動主流一直都是人民本位的、以「日常生活世界」為中心的一種防衛運動。

也正因此，從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人民前去征服他國被視為天經地義，而現在要美國人前往外國作戰，普遍都被視為荒謬不可思議——而這就是人類的進步。

學運延續去蕪存菁

其實，自六〇年代以來，這種趨勢就已出現，當時的進步學生們產生了許多新主張與新現象，在那個時候，許多新主張與新現象——例如崇拜「文化大革命」、崇拜卡斯楚、生活嬉痞化等，由於都是含混的新生符號，因此，各種內容都被摻雜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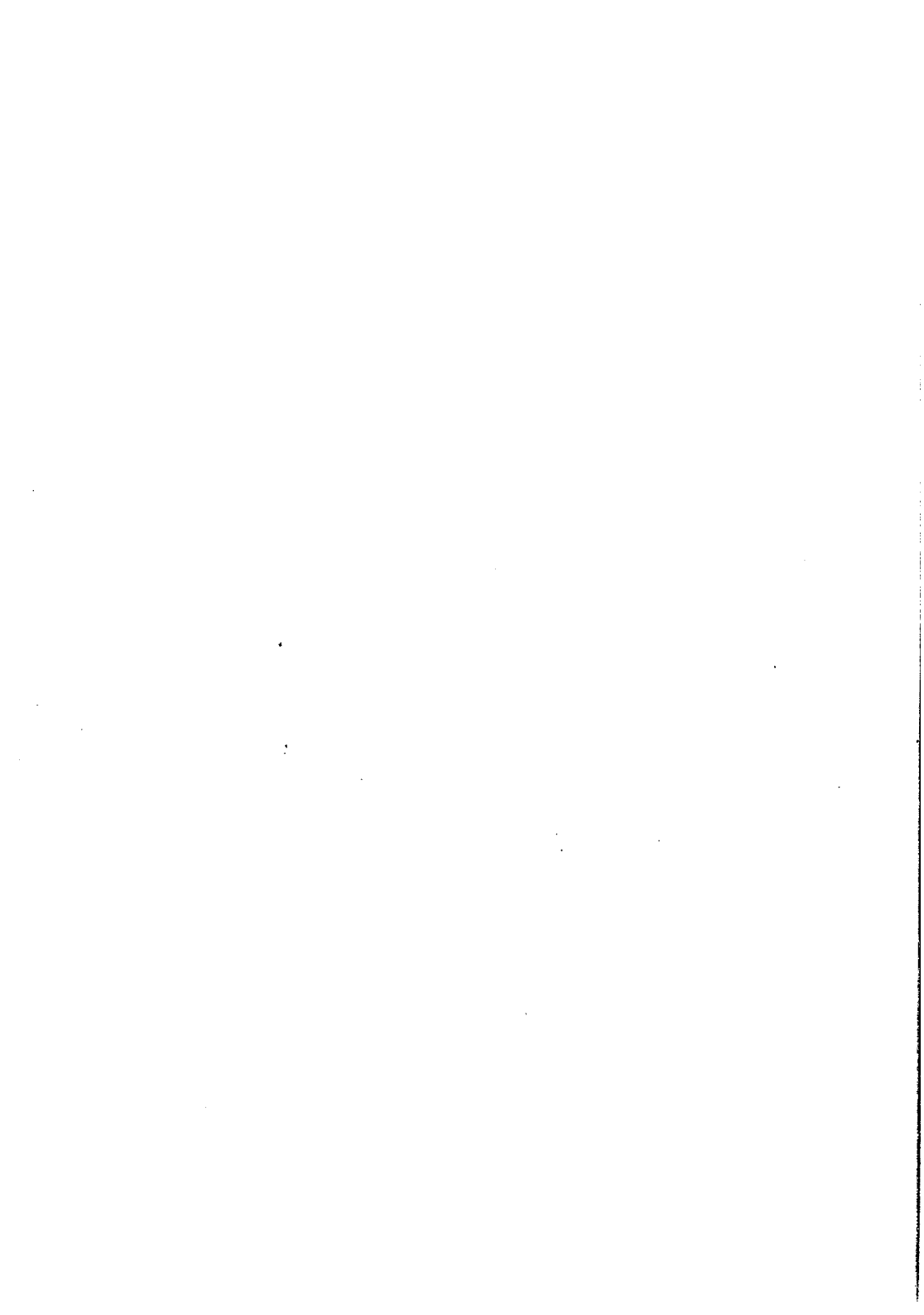
以「文革」為例，對中國而言乃是災難，但當時的「文革」中卻也標榜許多諸如平等、博愛的東西（例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美國青年當時崇拜「文革」，其實所崇拜的乃是它在這方面的符號意義。這正如同當時青年多嬉痞化，追求的乃是那些理想的生活放任及社區互助等。

任何新的符號產生，初期必然內容混雜，老舊的內容會被摻入，但新的內容也會逐漸出現。經過二十年的洗鍊，六〇年代青年所追求的符號，裏面的老舊內容由於經不起考驗而被淘汰，而具有「可以實現的理想」意義的，自然會被留存下來——追求和平、社區互助、尊重自然、草根民主，這些標準在此刻留存下來，並可望成為九〇年代整體社會運動的新標準，一方面顯示出它本質上是六〇年代學運的延長，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人類文明進步的遲緩過程。

金伯瑞指出，從六〇年代學運開始，「新左派」出現，與此同時，另一些新的東西也出現，可稱之為「新年代」(New Age)——他指的是當時那些討論尊重自然，注意到「嫡」問題的生態思想趨勢，以及對「資本邏輯」可能造成禍害的觀念等。九〇年代開始的行動主義，將會是「新左派與新年代交會」的年代！有些人則稱之為「新新左派」，不過就事理而論，它其實已和「左」不再有關。現在這個時代，早已超過了以往那種「左」「右」的分析範疇，就時代的氣氛而言，它所意圖創造的，也就是一個以人們日常生活為中心的草根民主世代。

最近，「另一種新聞」雜誌為九〇年代的社會運動前景作了詳盡的探討，一位運動組織者說：「現在，有許許多多普通人起來，他們從日常生活世界的自然軌跡而行，卻能對世界問題起了重大的影響。現在，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多一些創造力，對溫和行動的力量多所了解，當愈來愈多人介入，它所造成的將會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深刻且長久的改變，這是六〇年代的人所期望但卻沒有完成的目標！」

九〇年代是值得獻身的時代！



導 論

學生們對既存秩序及上一代感到絕望以後，往往與農夫及其他貧苦大眾站在一起，這種心理衝動更給民族主義的精神增強了，而後者又凝結成一種向民眾認同心對抗邪惡的領導者及元老的意念。……即使非常極權的政體也不會不保護大學，學生們是優越階層的子孫，故屠殺式的壓制很難用在他們身上——屠殺優越階層的學生，比屠殺農夫或都市中的暴民對現有政權有更大的害處。

——李察·弗來克斯

(Richard Flacks，運動初期領袖之一)

一九六〇年代是全世界學生運動浪潮高漲的時代。這股由憤怒之愛所滋育、所培養的狂潮，席捲了歐、美、亞、非、拉丁美洲等各大洲，並且在鐵幕國家如捷克、波蘭等國怒放自由民主與人權之花。學生運動在不同政體、不同社會形態的國家，以沛然莫之能禦的聲勢，以尋求社會正義的狂熱；以積極參與社會改造

的行動，為更公平，更合理的理想社會，點燃了一支明辨是非的火炬，也預舖了一條寬廣的大道。

在前後綿亙達十年之久的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中，有無數的青年改革者被槍殺、被逮捕、被侮辱。但他們前仆後繼的奮勇前進，終於為他們自己熱愛的社會，作出了有極大歷史性價值的貢獻：

——西德的青年們踏著被槍擊了的學生領袖Rudi Dutschke的血跡前進，有效的遏制了法西斯黨徒餘孽的復辟運動，而將德意志的民主向前大大的推出了一步。Rudi Dutschke並在癱瘓於病牀上的時刻，與他的同志們規劃出後來的「綠黨」。

——法國的青年學生們，無懼於戴高樂特遣的黑帽警察的鎮壓，推展他們的學生救國運動。風潮所及，自信滿滿企圖放棄傳統民主而建立教父式「戴高樂王朝」的戴高樂總統，終於在一九六九年四月，被法國人民所鄙棄，因而挽救了法蘭西第五共和。

——美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學生，在「學生民主社會同盟」(SDS)的凝聚下，結合了黑人民權運動，反侵略運動、和反貧窮運動，使「戰犯」詹森在痛悔的淚水中黯然去職，將美國從帝國主義的深淵邊及時的拉了回頭；同時，也使得美國在走向合乎正義、和平的新社會的路途上，向前跨出了有深遠影響的一大步。

——鐵幕內，如東歐的捷克和波蘭等國的學生運動，使得東歐國家在意識型態上擺脫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籠罩，並且將自由民主的種子種入社會主義的土壤之中，使得庸俗化了，教條化了的僵硬馬列主義中，加入了濃重的人道主義的思想。

——在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等脫離殖民地地位不久，但仍被新殖民主義所籠罩的國家，青年學生的運動，使得他們從新殖民主義意識型態所籠罩下，因而產生的所謂「發展主義」(develop-

mentalism) 中清醒了過來。他們轉而投身到能適合自己民族需要，又合乎人道要求的發展道路。

現在，不但六〇年代早已被歷史的脚步遠遠的拋向後頭，甚至於緊接著六〇年代而來的七〇年代也很快的就成為過去，更前面的是等待著的八〇年代、九〇年代……。但我們細心的檢索便可發現，六〇年代狂飆般蔚起的學生運動，它的影響並未隨著六〇年代的過去而消逝。相反的是，集結了全世界戰後青年學生智慧和熱情的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對變動中的世界已提供了有效的加速變動的觸媒。回顧整個已走完的七〇年代底軌跡，可以發現七〇年代最大的特徵，就是「鐘擺的向反方向擺動」——被新舊帝國主義所籠罩的國家擺向民族獨立的新位置，民權被剝奪的人民擺向爭取民權的新行列，資本主義業已腐熟的國家開始擺向有更大社會平等與安全的新地位……。六〇年代的世界學生運動是促成這個鐘擺向反方向擺動的最重要關鍵。無論從個別地區的國際或國內政治、社會、經濟觀點而言，都可以說，這種向反方向的擺動是一個「朝向合理社會」的擺動。

除了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實質上在運動過程中給予全世界以及其個別國家社會留下明顯的和非明顯的影響外，另外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中成長的青年學生，已經從運動的參與和行動經驗中獲得了一種參與後的反省能力；這種反省能力使得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結束了它表面上波瀾壯闊的活動之後，那些參與者因而走向對各種問題作更深層思考的新階段。現在，許多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領導者已成為世界及個別國家中的主要批判者——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作全面的批判與再思考。他們的光芒不因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終止而消逝，他們將自己的光

芒移植到更年輕的靈魂中，且將種子埋入更深的土壤中，等它開花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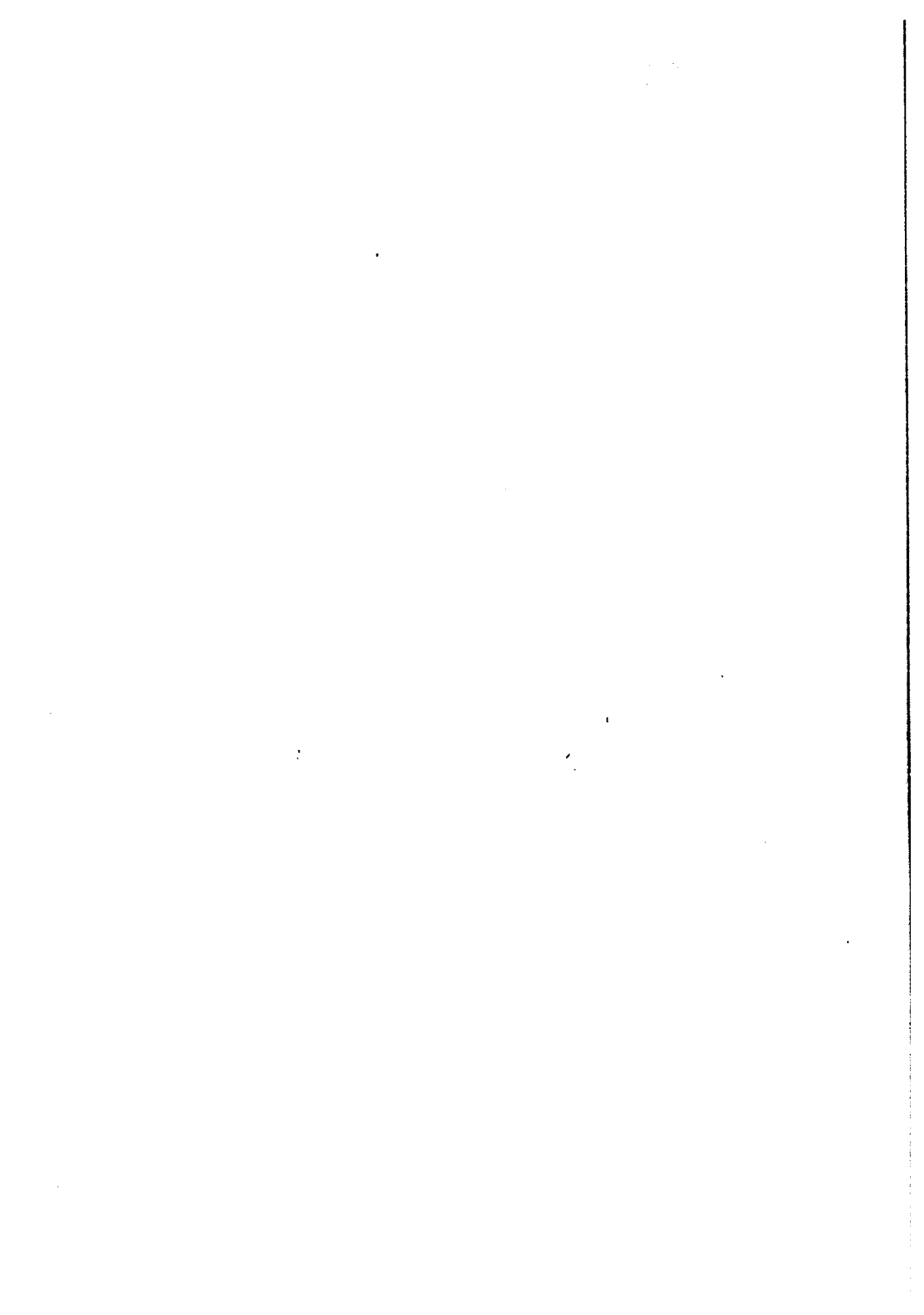
總結六〇年代的世界學生運動，雖然各國家或地區，由於其地域的特殊性，因而學生運動也展現出各自的殊異性和複雜性。但總的來說，在這些複雜的表面現象中仍存在著一種共同性：除了德國的學生運動外，所有的學生運動都是「非目的導向的」(nonpurpose-directive)，每一學生運動都是個別社會情況下自發的產物。其所以更值得珍貴的是，青年學生們都能從「非目的導向的」運動中，經由參與的行動經驗，迅速的掌握了正確的對人生，對社會、對世界的看法，然後再匯成「目的導向的」(purpose-directive) 更深入的社會批判和改革運動。這樣的過程是沒有被污染的、理想主義揉合了人道主義的。因此，它不懼出賣，亦無可能出賣。一個沒有被現世主義滲透的運動是最能發揮影響力的運動。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正是人類抗議史上少見的大規模的抗議運動，而無疑的，它也是迄今為止，可能是最有深遠影響力的運動。青年創造時代，六〇年代的青年學生無負於時代的使命，正推挽著時代的巨輪，向前大步的走去。

綜觀六〇年代世界的學生運動狂潮，從任何面相而言，無疑的，仍是以美國的學生運動最為激越。他們無論從行動的方式、接觸問題的範圍、思考的水平等任何角度來說，都是有最普遍的代表性，也是最具有在行動中迅速成長特質的運動。其次，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也是同時代世界學生運動中留下最多研究文獻的學生運動，數百萬字以上卷帙浩繁，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的種種立場的報導和分析，使得我們有了最充足的資料據以評斷那個時代，那個充滿憤怒之愛的學生運動潮流底特徵及其展望。

基本上，沒有一種自發性的群眾運動是可以被否認的，對抗議者和被抗議者，從群眾運動中獲得反省，並據以透視它的本質——一種生長的過程——是最有效的學習方式。對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我們應作如是地了解，否則便會在繼起的運動中被淹沒。學生的抗議運動，本質上與所有的群眾運動並無不同，它們都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作為要求改革的抗議行動。不同的是，其他團體或人們的抗議行動是現世主義的，而學生運動不是。學生在既有的社會層級結構中無所釘著、無所歸屬。因此，他們不被任何現世主義所矇蔽，這是學生運動改革澈底性的主要源起。有史以來，每當立志於改革的人與屬意於維護現狀的人相對峙的時候，抗議就發生了。抗議的絕望，會變成騷亂以及安那其的被人嚮往，這已是革命的臨界線，再往上走，就是武裝的革命。任何既存的權力結構，對於這種跳躍的三階段，都必須付出最大的關注與了解，並要從其中獲取經驗——彈性的對既存秩序作安排，然後，這個跳躍的三階段便會因客觀社會情況的改變而中止。監獄只會換來暴亂，子彈只會換來炸彈。

① “非目的導向的”，非現世主義的。

② 在運動中是動態的。



第 1 章

結束就是開始

研究一下美國歷史，便知許多今日被視為當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成就，是經由改革者的政治抗議才產生的。

——〈美國的學生異議〉：一項美國官方報告

六〇年代波濤萬丈的美國學生運動，一進入七〇年代便戛然而止。直到如今，它的突然消失，仍是當前社會及政治學家研究探討的對象。保守派說，它們被廣大的社會吸收了。樂觀主義者說，激進的學生運動支派採取了過激的行動方式，已被大眾厭棄。然而激進主義說，這是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的功勞。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最後一幕是這樣的。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日左右，紐約格林威治村裏一個靜謐優雅的角落矗立著的西十一街十八號建築物，有七至八個青年男女進入。這棟房子是四層樓，有一百廿五年歷史的古老建築，市價約值廿五萬五千美元，屋主是富裕的廣播公司老闆威爾克遜 (James

Platt Wilkerson)。他正出外渡長假，他的女兒——廿五歲的凱薩琳 (Cathlyn Wilkerson)，Swarthmore學院一九六六年的畢業生——把她的男女同志們帶到家裏，他們都是激進派學生運動組織「氣象人」(Weathermen) 的同志，這個組織的名字取材自名歌手鮑比狄倫的歌詞：「你不需氣象人來測知風的方向」。和凱薩琳在一起的有：

——凱茜 (Kathy Boudin)，廿六歲，一九六五年畢業於 Bryn Mawr學院。

——泰德 (Ted Gold)，廿三歲，一九六九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

——泰瑞 (Terry Robbins)，廿一歲，Kenyon學院的退學生。

——戴安娜 (Diana Oughton)，廿八歲，Bryn Mawr的一九六三年畢業生，和平工作團的資深團員。

三月六日上午，天氣陰霾，一輛白色貨卡開來，卸下幾個沈重的紙箱，裏面裝滿了無數的廉價鬧鐘，電池，電線，以及數以百計的炸藥包。他們把紙箱搬到地下室，放在整修傢俱專用的工作檯上。稍後，其中數人開始裝置炸彈，快中午十二點的時候，有人一不小心，誤觸炸藥，於是，引發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爆炸。這場大爆炸前後計三次，整棟房子被摧毀，聲聞數里，凱薩琳和凱茜正在睡眠，及時逃出，然後消逝無蹤，不見下落，泰德、泰瑞、戴安娜等三人，因為正在地下室工作，當場慘死，甚至於屍骸亦殘損到難以辨認的地步。

西十一街十八號的大爆炸，是個象徵了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愈演愈激烈的過程的中止。此後，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便逐漸趨

向平靜。到了七〇年代中期，表面上已似乎不再有學生運動的殘存景象。

然而，這就是結果嗎？不！

美國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並未終止。賽爾（Kirkpatrick Sale）說：「西十一街十八號的大爆炸顯示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但它同時也可能就是一種開始。」

因為，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已給予了當代美國青年一次最深入的參與和反省。不但學生如此，非青年的知識份子也是如此，學生運動的反省，同時也促使了一批新的思想工作者的誕生，他們可能是當代最優秀的一些知識份子中的成員。他(她)們正在對社會作更深遠影響的工作。

事實上，在變遷的社會中，學生已愈來愈成為愈有決定性作用的一類人，一九四〇年時，美國大學生只一百五十萬人，而到六〇年代中期，增至七百萬，和學生交互影響最深的教授群人數亦增至六十萬人。一九七八年時，耶魯法學院教授柏克（Robert H. Borik）說：「教授和學生如此增加，他們已成為『批判性的群眾』，他們把他的態度反映給社會，並認為如果社會不接受他們的觀察，就是一種道德的欠缺。」另外，哈佛大學的李普賽教授（Seymour M. Lipset）及拉德（Everett C. Ladd）在《分裂的學園》（*Divided Academy*）中也指出了一個趨勢。那就是：大學裏，尤其是有高知名度的大學裏，知識份子們已有了偏左自由主義的傾向，大家愈來愈關切政府對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干預和調整，愈來愈反對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侵略行爲，愈來愈不願意替美國人在國際上的侵略行爲辯護。

這些七〇年代美國大學的演變，其所關切的課題，無疑的，

都是踵繼了六〇年代學生運動遺緒而延伸發展的。如果說六〇年代是「反抗的年代」(a decade of defiance)，那麼，七〇年代則是「批判的年代」(a decade of critical)，它們都是爲八〇年代的新底發展而鋪路。

弗來克斯 (Richard Flacks) 說：「對於社會秩序來說，青年的想法是很危險的，但也是充滿希望的。青年的反抗，表示在歷史的洪流中，新文化及新社會秩序將要隆重出場了。然而要青年們所承諾的得以達成，青年們必須超越——對新社會秩序有共同興趣的青年們與非青年們必須結合一起，在歷史上印下集體的足跡，互相以實現共同的美夢。」細心檢索七〇年代，這個批判的年代裏，它最大的特色是展開了深入而普及的各種層面上底批判和反省工作：

——在哲學和方法論上，它嚴格而徹底的批判了經驗中心主義的貧乏，而將長期被故意忽略了的人的主觀行動意願提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使得保守主義者據之爲理論基礎的意識型態遭到嚴重的挫折。

——在人生觀上，它批判了保守而實利的個人主義思想，更多的照顧到群體的相互實踐與相互完成，使得十八、十九世紀以來豐潤了帝國主義的吃人底自由主義思想，有了重新估量的機會。

——在國際關係上，它對新舊帝國主義有了徹底的分析與反省，使得十八、十九世紀以降的「白人的負擔與責任」的帝國主義騎士精神有了深一層的覺悟，並因而能更加的尊重發展中和未發展國家獨立自主的民族意願。

——在對美國內部事務上，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膚色

移民者的權益和尊嚴已被再次估量，貧窮文化的長期被忽略也開始重作反省，社會正義已被視為國家目標中重要的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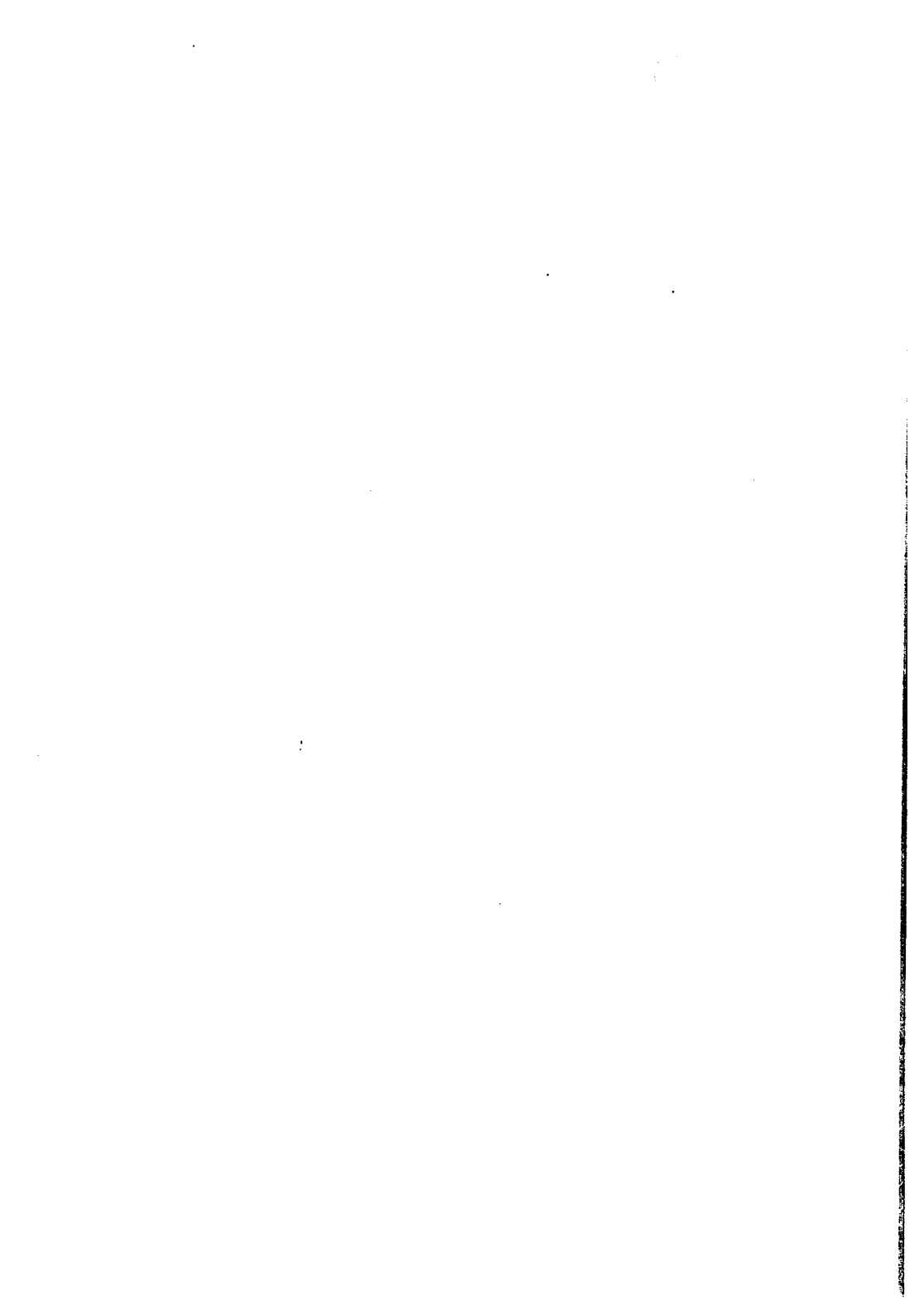
——在對政治、社會、經濟等個別學術領域中，所謂的「改革者」學者已自青年群中誕生，他們各自的在每個領域中檢討以往的缺陷，諸如學術的被官方收買和操縱，個別學術圈的「學術托辣斯」現象，……等都被糾檢出來，蔚成學術界新「掘糞派」的氣象。

——在大眾文明上，它提出了新的道德批判標準，對個別的文化現象開始作透明的分析與觀照。

.....

所有的這些批判，都可以歸納在憤怒之愛的積極行動後所轉化成的清明底，透澈底對人類之愛中。因此，連著名的保守派，曾任舊金山州立大學教授，現為參議員的日裔美人早川博士也說：「這一階段的人們替我們未來走向的世界畫下了一張很美麗的圖畫，只要我們在我們的社會規劃之中有烏托邦的要素——社會規劃中本來就含有烏托邦主義的精神——我們就應在自由的國土上放下這張藍圖，使我們的國土適合它，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顯然的，西十一街十八號的大爆炸並不是結束，而是光明的開始。



第 2 章

學生運動起因的不同解釋

在經過我四、五年的觀察之後，我對青年運動的基本看法是極其肯定的。我覺得它大體向善，顯示了極大的生氣與潛力。我相信，社會上有富於理想、關懷世事的青年人，遠比態度漠然，唯長者之命是從的青年人為強。

——約翰·洛克斐勒 (JDR 3rd)

六〇年代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它的起源，發展，以及戛然中止，在美國的社會科學界裏，是一個迄今仍無定論的問題。甚至於我們還可以說，在卷帙浩繁的解釋文獻中，有許多對這個問題完全無能為力，這使得我們意圖了解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發展本質時，便無可避免的需要作精密的選擇與思考。

因此，我們有必要首先回溯美國五〇年代的學術思想大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延續的韓戰，促成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黃金時代。這一階段，美國的超強軍力，在杜勒斯「巨棒政策」的導引下，有效的控制住世界大

半區域，並經由「經濟合作」，使美國的經濟末梢延伸到軍力所及的區域，使資本主義的發展走向最成熟的「多國公司」和「軍產複合體」的時代。「美國化」(Americanization) 成為非美國家判斷一切事務的終極標準。

① 而在美國內部，由於集資本主義以來的繁華於一身，因而樂觀主義大行。與此同時，「麥卡錫主義」及其延伸的一九四八年美共大檢肅案，加上史達林主義的粗暴，使得美國知識界對不同的思想廣泛的採取漠然的態度。

在這樣的氣候下，美國的主流社會科學家們產生了下面的主流心態。

——世界已非常美好，而且將變得更為美好，現在是「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 或「後工業化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因此，是「意識型態終止」(the end of ideology) 的社會。

——美國已成為一個「中產階級社會」或「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或「大富社會」(opulent society)。

——由於人人富裕，因此社會已無問題，貧窮業已消逝，階級業已不再，至多只有「階層」(strata) 的問題。

——由於社會已走向後工業化，因此，以往的舊問題已不再存在，現在的新問題只不過是：如何改善人們的緊張與焦慮，如何避免文明的放縱，如何使人不致成為「組織人」(organization man)，……等等之類。

——因此，在政治科學上，「現代化」和「政治社會化」成了最流行的課題；這種課題的研究是假設了「美國化」的優越地位，同時暗示了既存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優位，因而推出的。

——因此，在社會科學方面，都市的混亂問題，青少年的行為偏差問題，宗教功能的萎縮問題，……等等之類成爲主要課題。

但事實上，上述的種種主流心態是不完全正確的。因爲，這種心態明顯的疏忽了各種問題的「歷史性」和「社會現實性」兩大條件。因而使得這一期間甚多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具實質的意義。而其所以如此，則肇因於下面三大因素：

一、社會科學家對右傾法西斯主義和左傾社會主義的恐懼。這種植基於麥卡錫主義的「恐右病」和「恐左病」，使得他們認爲多談歷史因素，就有歷史中心主義的嫌疑，多談社會現實的本質問題，就有「左傾極端分子」的嫌疑。

二、縱使我們不能肯定的說，在一個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必然的惡意地掩蓋醜惡心酸的社會黑暗面；但至少可以說，在那樣的社會中，另一個黑暗陰鬱的社會是被「善意地忽略了」(kindly neglect)，貧富不均的現象淹沒在數目龐大而真假難分的統計數字中，貧窮的特殊區域化和集中化，使得它在大眾傳播媒介和人們的印象中消失無存。附庸於上層社會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因而無法了解社會現實的本質。

三、特殊的學術市場機能以及各學科的協會，使得學者們的研究工作完全附庸於既有政權和參與政權的「政經集合體」的資本家們。因此，凡替當權者作合理化解釋者始可獲得研究經費和聲譽，異端之教授有時甚至會被「開除」。凡此種種，使得絕大多數的社會科學學者均被學術市場後面隱藏的大黑手所控制。

著名的社會科學家艾森斯塔 (S. N. Eisenstadt) 說過：「既有政權需要知識份子，以及宗教和世俗精英份子的合理化和支持。知識份子和知識份子的組織也需要既有政權的保護和幫助，

以建立並維持他們的組織和地位。」

因此，（五〇年代美國社會科學家們，在樂觀、無知、被控制等因素導引下所造成的心態，使得他們完全無法預料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發生）。甚至於，已到了一九六一年，耶魯大學醫學院的心理學教授肯尼斯頓 (Kenneth Keniston) 仍認為當時的青年精英份子有下面幾大特性：「對成人價值和角色缺乏深深的認同」、「缺乏反叛感」、「在社會、政治和個人生活上，普遍的有無力感」、「由於無助感，因而產生『私人主義』(privatism)」，「捲入政治的興趣降低」，「美國社會的懷疑主義」，「對史達林主義社會控制變遷的厭惡與恐懼」。因此，他認為，青年精英份子不可能極端化和意識型態化，而只會被動的參與到社會中。

由於社會科學家的「非歷史性」，因而其視界變得「平面化」；由於社會科學家的不了解社會現實，因而造成視界的「抽象化」，復由於其為外力控制，因而造成觀點的「附庸化」。這些因素，使得到了六〇年代尾聲或七〇年代初期時，他們對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解釋觀點仍多顯得狹隘且片面。

迄至目前，對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解釋已有甚多種。大致而言，這些解釋觀點可分四類：右派的、自由主義派的、人文主義派的、左派的。

首先論右派的解釋觀點，其中以「陰謀理論」(conspiracy theory) 及「反革命理論」(counterrevolutionary theory) 最為重要。

「陰謀理論」由「非美國人活動協會」(HUAC) 等團體所主張，他們認為美國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是「共產黨的陰謀」，由後期的一些學生支派閱讀毛澤東、卡斯楚、蓋瓦那 (Che Guevara)

的著作可資證明。蓋瓦拉為卡斯楚派去中南美洲煽動革命的職業革命家，後來在玻里維亞被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捕殺，卡斯楚願意以一百個政治犯來換回他的屍體。

主張「陰謀理論」者在以投資為主的雜誌*Barron's*週刊會充分表達他們觀點，尤其集中於指控「學生民主社會同盟」(SDS)。例如，它曾在馬里蘭大學集會準備進一步武裝行動，它擁有良好優秀的校際聯絡網。某些人對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期間的一些不明事故，例如有些校園暴動似有非學生參加等，也都歸因於「可能有陰謀份子參與」。

對於這種觀點，美國學者和官方及企業家們大多不表同意。羅吉斯州立大學的霍羅維茲 (I. L. Horowitz) 及加州大學的富利德蘭 (W. H. Friedland) 兩位教授指出：這種觀點經不起仔細的查驗，青年輩的激進份子與「老左派」並無關聯，而激進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並非一個陰謀組織，其成員成份不一，缺乏意識型態之相似性；同時組織性格不強，無拘束力。他們因而說：「所有的陰謀理論都是過份簡單的解釋觀點，這種認為並非社會因素而是一小群陰謀份子造成學生運動的看法，是一種對陰謀的恐懼」。

顯然的，「陰謀理論」是不可能的，這是美國極端右派人士的一種看法，是典型麥卡錫主義的延伸，並無事實基礎，亦遠離常識。

至於「反革命理論」則主要由Zbigniew Brzezinski, Lewis Feuer, Bruno Bettelhem, Herman Kahn, Raymond Aron, Daniel Bell, Alvin Toffler等著名的社會科學家和哲學家所主張。其中，Alvin Toffler, Herman Kahn兩人為未來學之開山

人物，在台灣亦極具知名度。

「反革命理論」的支持者均為泛稱的「現代主義者」(modernist)。因此，他們乃認為，青年學生反體制的運動，甚至於青年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 都是「反革命」的。

對主張「反革命理論」者，他們認為美國已走向「後現代社會」(post-modern society) 或「技藝社會」(technetronic society)，這種社會的新走向是「反烏托邦」(anti-utopian)的。它高度的理性化和自動化，並有超級的生產力。但這樣的社會要付出代價，人們在社會中要有更多的理性和更少的幻想，對青年學生而言，需要更長期的在學時間以獲取技藝之知識，大學成為新時代的「知識工場」(knowledge factory)。而所以會產生學生運動，則是由於學生適應不良，因此，「反革命理論」者認為，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與十九世紀初期的「路代特運動」(luddite movement) 相仿——農場工人被機械取代後所產生的大規模抗議行動，都是退步的、頑固的、反動的。因此，現代的學生是「新路代特」(neo-luddites)。Bruno Bettelheim認為，學生運動的參加者是「被淘汰的青年」(obsolete youth)，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認為青年人的憤怒是「死亡的咆哮」(death rattle)，他並且說：「路代特們由於被經濟的淘汰所威脅，因而開始反動。學生運動的領袖們及他們的所學，是對社會淘汰最敏感的，因此他們的政治行動主義不過反映了他們對時代的恐懼——一個新的世界已在形成，他們不能幫助，亦不能領導。」

很明顯的，「反革命理論」的心態是標準五〇年代式的，成人中心的，說教式的觀點。這種解釋由於缺乏對青年的思想和行動，以及成人世界作深入的觀察與了解，使得它口說青年是「反革命

的」，實質上卻是：自己才是反革命的。)

對於主張「反革命理論」的學者們，基本上，他們關心抽象的，既有秩序的維護，並據此討論未來的問題。因此，他們無法容納反體制的任何文化事務，同時，他們由於對未來過份著重，因而遺忘了現在，並將一切社會的問題歸為技術性的問題。相當程度上，他們並根據「政治社會化」的觀點來看問題——「政治社會化」是一種統治階級附屬政治學裏的概念，它趨向於主張：在政治體制上，離經叛道者都是適應不良的。因而認為：在政治文化出現問題時，有問題的不是政治的體制，而是該體制中的個人。

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烏德華 (C. Vann Woodward) 說得很誠懇並有愛心：「對於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我們犯了许多錯誤，我不談父母、學生、社會或政府。我只談思想工作者、解釋者和作家們。他們不能體會、了解和解釋這件當代重要事件，這種失敗我們大家都有責任。爲什麼會有六〇年代學生運動？這個問題似乎還沒有答案。不過我要強調，今後如果我們談這個問題，希望大家記住：我們所談的是我們自己的孩子」。與這句話相比，反革命理論確實是太沒有愛心，太簡單且專斷的一種解釋。

在上述兩種理論中（「陰謀理論」是歇斯底里式的極右派觀點；而「反革命理論」則是右派學者綜合了實證的，自由主義學者的研究後，根據右派的意識型態而得到的終局理論。它基本上強烈的仇視青年，並頑固的全盤肯定既存社會秩序，因此，它們被人接納並認可的可能性均甚爲渺小。畢竟，「陰謀理論」和「反革命理論」都是過度的保守主義心態，而在加速變動的社會中，這樣的心態，由於喪失了它因應變動的彈性，遂使得它難以令人信服。

除了上述的右派觀點外，在當今對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所作的研究中，獲得最多實證資料的，以自由主義學者所作的為主。

「自由主義」本身是一個具有相當程度內移變性的思想方式。一般概念下的自由主義底社會科學即現稱之「經驗主義」之社會科學。它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是相應的，但它與強固的右派只有少許程度上之差別。比較簡單的說，現稱之美國的主流社會科學即自由主義派的社會科學。它以人性的可塑性為起點，在心理學上主要關心人格的形成，人的行為與反應；在社會理論上則潛心於社會系統的動態平衡；在政治理論上則著重政治社會化、利益團體、社會合法性等。由於自由主義是一種樂觀主義導引下的心態，因此它的社會科學研究，明示或暗示的傾向於認同既有的社會秩序，厭惡劇烈的變化。因此，五〇年代時Daniel Bell，Seymour Martin Lipset，Edward Shils，……等自由主義的社會科學家們，都踵繼了卡爾·巴柏（Karl Prpper）之後，認為意識型態的時代業已終結，西方文明所剩下的問題只不過是些技術性的問題——不再是「為何」（what）的問題，只不過是「如何」（how）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可訴諸科學的知識、專家、和技術顧問。

對於這樣的社會科學，由於其強調了既有社會秩序的優位，同時排斥了歷史斷面和社會現實，因而當發生既有系統內的小問題時，它易於獲致答案；但對反體制現象，由於其方法上和視界上的狹隘，便經常顯得無能為力。絕大多數的情況是，他們在解釋時，乃意識或非意識的視這種反體制行為為「異端」或「適應不良」，或其他個人的因素；而不傾向於回頭檢討既存社會是否發生問題。對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許多研究和解釋，我們可以發

覺出這種現象，有相當多的文獻，認為六〇年代美國學生的反叛運動是學生、或學生家長、或學校教職員有問題，至多，不過是社會的某個狹小部門有問題，卻不承認是整個社會或政府有問題。其中比較經常受到引用的是下面的一些解釋觀點：

——認為從一八四八年西歐的一連串革命中，青年學生佔了極重要的份量起，學生革命已成爲一種風氣。其後尚有一九〇五年代及稍前的俄國學生革命，本世紀前半葉中國學生的革命，以及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學生運動，以及一九五六年以後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以及共產國家中的學生運動。這些學生參與革命的先例影響了美國六〇年代的青年學生。

——認為學生在求學時代是有邊際性格。在此期間，學生處於依賴家庭和獨立自主的過渡階段，因此，這個期間是「緊張時期」(tension-creating period)。同時，由於大學迅速膨脹，一九四〇年學生僅一百五十萬人，現在已達七百萬人。學生的成員已由有特權的階級擴大到特權較少的階級，使得富裕家庭的後代面臨就業競爭的壓力，因此他們開始反叛。

——在許許多多的國家裏，都有這樣的名言：「二十歲而不激進的人沒有心，四十歲還激進的則是沒有腦。」受到這種名言的鼓勵，學生視激進爲時髦。而成人社會亦多認為青年是人類進步之所繫。這兩種因素，使學生的反叛獲得助長。

——認為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受到學校裏不滿教授的相當激勵，戰後美國學術市場競爭激烈，研究有成的教授們立刻被納入「國家特權系統」(national prestige system)，且易於獲得公共的聲譽，但絕大多數的學者卻在這樣的競爭中失敗，他們心懷不滿並且焦慮，因此，他們乃藉著青年學生發洩悶氣，鼓動學生不

滿情緒。

——戰後的大學，愈來愈成為政治的中心，教授們成為政府官員、顧問、政策制定者、批評者、政黨活動份子等的情況增加。學生處於這種情境下，大大提高了學生的政治興趣，但他們卻無力參加，因此遂乃反叛。

——學生中的極端行動份子大多來自中上階級的家庭，而學生中的保守份子則多來自中下階級的家庭；中上階級家庭的子女，由於罪惡感的驅迫，始進行反叛。

——根據對學生激進組織「學生民主社會同盟」(SDS)和保守派學生組織「美國自由青年同盟」(YAF)的研究，前者成員多來自左派或自由派家庭，後者多來自右派家庭。同時，激進派學生又多以非技術性的科系生，如人文社會學系，政治系等為主，這些科系就業困難。這顯示出激進派的學生一方面受家庭影響，一方面受到未來出路短狹所產生的焦慮感之影響。

——學校的傳統對學生行動主義有明顯的影響。人文主義傳統的學校如 Reed College，Swarthmore College，Antioch College，以及加大、密大、威大等學校學潮均極猛烈。另外，曾有過學潮經驗的學校也易於發生學潮。例如：威大麥迪森校區，加大柏克萊校區等在半世紀初期就都發生過大規模的學潮。

——學生運動中的行動主義份子，多數來自「放任家庭」(permissive families)，在這種家庭中，父親很少表現其角色，母親的角色佔了很大的比重。因此，他們對這種微弱而無效(weak and ineffectual)的父親意象反叛，並且將此反叛移轉到任何具有權力的對象，如學校和政府等。這種「伊底帕斯的反叛」(oedipal rebellion)是學生反叛運動的起源。

——學生行動主義份子，多數來自左派家庭。在家庭中兒童與父親關係密切，表現出「前佛洛伊德的親子關係」(pre-freudia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子女認同於父親的激進政治立場，他們是「紅尿布貝貝」(red-diaper baby)。

——由於社會分工細密，學生在學時間增長，使得青年學生有了一段長期的心理社會延滯期」(psychosocial moratorium)，因而使他們認同於激進的思想。

上述的種種解釋觀點，事實上絕大多數都是很有問題的。這些解釋觀點相當程度的將一切造成學生運動的原因歸於青年自己、家庭等等因素，卻未從激進青年本身的言論和主張中來考慮問題。因此，這種觀點都是成人世界片面的，不真確的解釋。

以前面所說的幾種觀點來說，甚至於保守的肯尼斯頓 (Kenneth Keniston) 者都認為「不值得嚴肅的考慮」(not worthy of serious Consideration)，例如以「伊底帕斯情結」來作解釋，「由於它普遍存在於各地各種社會中，這種解釋等於沒有解釋」。

例如從革命的傳染性來解釋，認為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是受到世界性學生革命的影響所致。這種看法除了暗示學生運動是無聊的模仿，並沒有解釋什麼。從美國建國以來，美國大學學生即不斷發生「校園騷動」(campus unrest)，為何六〇年代的校園騷動竟會演變成全國性的學生運動？這種解釋完全無法說明。

例如，認為學生運動是因緊張所致，這種說法亦不能對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作任何實質說明。因為，難道五〇年代的大學生就不緊張，就不受就業壓力的威脅嗎？至於將責任推給大學內不滿的教授，則尤屬無稽。因為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支持教授，有些

甚至是諾貝爾獎的得主。又如，認為學生行動主義份子出自中上家庭，他們的反叛是罪惡感所驅迫。這種觀點也是在暗示學生運動的非「合法性」，並企圖用罪惡感的觀念來掩飾青年學生的「正義感」。而事實上所有的革命歷史，絕大多數都是由出身自中上階級家庭的知識份子所領導，難道所有的革命都是「罪惡感的革命」？

例如，認為青年行動主義多數是人文學科或理論科學學系的學生，顯然他們的反叛是對未來就業的恐懼。這種說法實質上亦無重大意義。因為固然無確實資料可支持這種觀點，何況這種觀點亦只不過是在暗示：學生運動不過是學生的自私運動。

在右派以及自由主義派學者的眼光下，六〇年代的學生運動是青年學生對科技社會適應不良，個人受到挫折後的反應。自由主義派學者們的觀點支持了右派人士的「反革命理論」，兩者之間，僅有程度上的差別，實質上則並無不同。其所以如此，乃是他們的社會和政治思想肯定了既存社會的秩序，因而乃視破壞或批判該既存體系者為異端、為反動，在他們的解釋觀點下，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乃被醜化和矮化。

相對於右派和自由主義派的否定，人文主義派和左派對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所採取的態度是肯定的。

人文主義者的原始和語源的涵意，是指具有「仁慈的善意」底心靈，是指崇尚「道德積極性」底人們。因此，他們的視野較為開闊。因此，具有人文主義心態底人們，對於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便比較能從正面加以肯定——肯定它對人類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影響。其中，比較重要的，包括了Charles Reich，Tom Hayden，Theodore Roszak，Peter Berger，Philip Slater

以及一些知名的企業領袖如John D. Rockefeller, Louis B. Lunborg等。

加州大學的歷史教授羅沙克 (Theodore Roszak) 在《反文化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和《荒原何所止》(*Where The Wasteland Ends*) 兩書中，大致的表示了他的基本見解。在觀念上，他承續了六〇年代「新左派」(New Left) 的「文化批判論」(critical theory)，以及青年次文化中Allan Watts及Timothy Leary等人之「神秘主義」(occultism) 等。認為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主張是一種全然不同於現時文化的新文化，這種新文化必將拯救我們。羅沙克在檢討了科技文明對人類所作的摧殘之後，認為科技的層級結構精緻而有威權的壓制了人的精神世界。科技所據以為基本準則的「客觀意識」(objective consciousness) 使得人的知識與經濟世界割離，是疏離的源起，社會建構化了的韁繩使人失去自由。為此，他傾向於青年次文化中所主張的神秘主義，主張經由視覺幻想來超克社會所給予人們的壓抑，羅沙克因之認為，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文化主張是一種形而上的和文化上的革命。最後，他主張藉著神秘詩人布萊克 (William Blake) 的四度靈視的超越觀念，來創造一種新的政治文化體系。

與羅沙克相仿，瑞克 (Charles Reich) ——耶魯大學的法學教授則以「意識的革命」來作解釋。在《美國的新生》(*The Greening of America*) 中，他將意識分為三種：第一種意識是自利的意識，第二種意識是公利的意識，第三種意識則是解放的意識。

「這種意識始於自我，但始於自我並非自私，而是始自那些以人類生命和自然之其他部份為基礎之前提，而非諸如權力和地位那

些大財團控制之下之人為產品為前提。第三種意識堅持每個人，每個自我有其絕對的價值，它不相信生命之中敵對和競爭的信條，「我們全都知道當前彌漫美國的孤獨、呆滯和空虛感。……目前美國出現一種新的生機。此一新意識最為特殊之處是：它從大財團社會的荒地上萌芽，就像花朵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成長」。最後他認為：「這種意識革命將從個人和文化中產生，最後終將改變政治結構。它的成功不需要暴力，它也不會被暴力所阻擋，它現在正以驚人的速度推展。……它是必然的，無可逃避的，並將很快的不僅將所有的青年納入，也將所有美國人納入。」

類似的觀點，史拉特 (Philip Slater) 在《孤獨的追蹤》(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中以「老文化和新文化的過渡」觀點來作解釋。他認為老文化是個人主義的產物，其特色是：財產權重於人格權、技術需要重於人的需要、競爭重於合作、暴力重於性別、集中重於分配、生產超過消費、方法強過目的、隱私重於開放、社會形式重於人格表現、伊底帕斯之愛重於社群之愛等。而「新文化」卻正是反其道而行。而「老文化」之所以有上述特性，則在於其以稀少為基本假設，因而有了競爭等行為規範，而「新文化」則以人的易於滿足的假設，因此向反方向發展。新舊文化的對立是沒有妥協點的，舊文化因為它的內藏疾病正加速崩解中，新的文化已加速登場。六○年代的學生運動及青年反文化正是這樣的兩種文化碰撞的結果，而新文化必取代舊文化。

人文主義者對六○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思考主要的是在發掘出其標示出來或隱藏在其中的文化意義，因此，縱使保守如柏格 (Peter Berger) 等人在《無家的心靈》(The Homeless Mind) 中，也都相當程度的認可了其意義。整個人文主義者的這種觀點，

一般被認為乃是正面肯定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價值，認為它是一種觀念或意識甚或文化上的革命之「革命理論」(revolutionary theory)，儘管此地所謂之「革命」不同於政治或社會學中所謂之「革命」。

然而，從文化層次來考慮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由於文化學本身即有相當程度之含混，因此經常或必不可免的，在解釋上乃發生了一些困難。以羅沙克和史拉特二人而言，在他們的觀點中，由於過份的肯定了「新文化」，因而乃不自覺的，籠統地對六〇年代青年次文化中一些具有自棄色彩的「神秘主義」(occultism) 和「原始主義」(primitivism) 質素亦作了同樣的認定。以羅沙克為例，他的強調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和原始部族巫師的經驗。如史拉特，他在痛詆了「老文化」的「技術極端主義」和「社會保守主義」，並開列出新文化的行為規範時，仍不自覺的否定了一些科技的價值，認為它作的是「廉價的快樂」。因此，從抽象層次如文化上來評斷六十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人文主義者誠然對舊文化作了很成功的批判，但因他們的批判觀點未曾充份落實，這使得他們的一些觀點乃脫離了進步主義的路向，而跌進形而上的、倒退本質的陷阱中。

除了上述人文主義學者的解釋觀點外，對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所作的解釋和評估中，最有人文主義精神的美國企業家，留下的可能是最值得世人學習的重要文獻之一。洛克斐勒 (JDR) 所著的《第二次美國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和藍德堡 (Louis B. Lundborg) 所著的《未來無衝擊》(*Future Without Shock*) 是兩本重要著作，兩人皆美國之大亨，極幸運的，上述兩書均已有了中文譯本。

洛克斐勒與藍德堡共同的對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和青年之反文化表示了解與同意，尤其對學生中之激進左派，如「氣象人」，「瘋狂黨」和「奇卡諾組織」表示關切。他們均解釋：美國的病態社會是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之源起，左派是右派壓迫所產生的。

他們均能從學生運動正面攻擊的事務中作直接的反省，並且能不加猜忌的，將青年學生的主張視為學生運動產生的原因，然後坦率的接受抗議，謀求積極的改革。

以洛克斐勒而言，他承認了美國病態社會的下述病態：新帝國主義，種族壓迫，奴隸制的現代版，軍產複合體的寡頭獨佔，公共暴力的滋長，城市的敗壞，廣泛的社會不平等，……等。他認為學生運動中的青年學生扮演的是「拯救者」的角色，他們對既存的體制注入了「新倫理」——人道主義。對此，政府和社會的掌握者應該學習。

對於一種自發性的群眾運動，迄今為止，最佳的解決方式仍是最古老而最直接的金言——「坦誠」，坦誠意味著對抗議者的尊重，坦誠使得對該群眾運動的解釋得以最為真切，然後可將運動中的衝突納入既存體制中，促使既存體制的溫良改變，以迄衝突因素的因為對象消除而改變；而不是將衝突因猜忌而排斥於既存體制之外，使衝突的壓力在外面增長，最後將既存體制壓擠成碎塊。在這一點上，洛克斐勒和藍德堡的解釋觀點和對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評估，其成就大於前述各派學者之總合。

除了上述種種解釋觀點外，另外一種最廣泛被討論，而且引起最多爭論的，應屬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期中迅速成長的新左派，以及對新左派極端軍事行動主義作合法化解釋的「行動革命理論」。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初期的新左派陣線，在六八至七〇年間，隨著馬丁路德和甘迺迪的被刺，民主黨大會的排除青年理想，軍警特務的加強壓迫和學生被害，青年改革幻想的破滅，因而急速升高並獲得成長。學生的激進行動主義者由抗議而衝突，由衝突而進入武力對抗的階段，校園游擊隊逐個成立，思想的安那其主義轉變為行動的安那其主義。於此同時，德法之學生運動也發展到了流血革命的高潮邊緣。一些理論思考者開始放棄歐洲（西歐）和美國為「非革命區域」（non-revolutionary area）的傳統觀點，傾向於主張這個區域將成為「人類最後一次革命的區域」。在美國、「氣象人」（Weathermen），「瘋狂黨」（Crazies），「奇卡諾組織」（Chicano），「黑豹黨」（Black Panther）等武裝團體大增，並以毛澤東、胡志明、蓋瓦那、雷格斯底巴瑞（Regis Debray）（一個法國哲學青年，追隨蓋瓦那前往中南美洲從事革命，被捕判刑三十年，著有「革命中之革命」，認為對既存體制，理論與批判均屬無益，只有將個人置於革命的情境下才能獲得成長，是美國學生心目中的新左派七大英雄之一）等人為崇拜之偶像。

根據新左派中行動主義理論家的看法，他們延長了文化革命的觀點，認為既存的社會是一個「壓迫的社會」（repressive society），它的每一個內部的精緻結構都在壓迫著人們，因而形成「偽善的體系化」（institutionization of hypocrisy）體系內的改變是沒有希望的，有希望的唯一辦法是對既存社會的完全離棄，以建立一個非史達林主義的人道主義底社會主義國家，而青年便是革命的先鋒。

不過，對於這種實質上是人文主義學者的解釋加以變型而延長產生的行動上的革命論，實質上仍然有著許多目前尚有爭論之

缺頁

缺頁

五〇年代的社會是完美的社會；只是，所有有助於社會覺醒的因素都懸浮著，未到它的臨界條件；因此，五〇年代學生被稱為「沈默的一代」(silent generation)，校園景象是：以希臘字母命名的兄弟會 (Fraternities) 及姐妹會 (Sororities) 活動佔了校園活動的最大部份。校園文化與成人文化間有著高度的契合關係，校園被當做是進入成人社會的預習場所、兄弟會與姐妹會著重於門第的炫耀，男女社交的儀式，體育活動，如校際運動會和啦啦隊等男女學生典型的象徵。

五〇年代典型的大學生，在男生而言，穿著主要是乾淨的白鞋與深灰色外衣。除了讀書以外，社會贊許他們表現男性的陽剛性格、好動活潑，運動會的競技和兄弟會的門第相配者間的舞會佔了他們課外活動最大的部份。他們認可於成人所投影的社會價值。在女生而言，則是捲髮、毛衣外套、齊膝短裙。除了讀書之外，校園活動方面，他們安於成為男學生的附庸，他們藉著姐妹會來建立她們小婦人式的淑女特質，有浪漫式、幻想式的婚姻傾向，運動會時的啦啦隊活動使她們著迷並表現自己。大抵說來，五〇年代的校園，從倫理上，雖然男生仍保有一部份基督教倫理，但女生則已是充分消費式大眾文明的產物。美國校園中的兄弟會與姐妹會原來是成人階段社會的投影。當二〇年代左右，大學教育猶未普及時，兄弟姐妹會有著典型的、貴族式的上流社會特徵。它的虛張虛致、功利式的標準和物質傾向，曾經使得後來成為名人類學家的米德女士深覺虛偽。功利、保守，五〇年代的這些團體，大致上仍保存著它中上階級文化特徵的質素。在校園文化中，這種團體的文化水準是被所有學生廣泛欣羨著，並以能被這些團體青睞、吸收成為會員為傲。

由於這樣的校園價值，五〇年代的大學是對社會實體關閉的。它是中上階級成人社會導向的青年預習地點，男女學生盡力使自己成為社會支配標準下的「有希望的青年」。他們順從、謙卑、保守、無主見。雖然若干地區的知識型青年有輕微的文化叛離現象，但它都無關於整個校園景象的改變。如果將校園視為世界的縮影，那時的世界正是「美國主義」的黃金時代；「洋基佬」被視為一種現代的、歡樂的、進取的族類。他們物質條件優異，一切都在「後現代化」的軌道上奔馳，「美國是不會失敗的」。

在這樣一種懸滯、愚駭的樂觀氣候下，所有世界性的或美國國內性的問題都被中產階級自我認定的大多數美國人所忽略。校園高級知識份子均認為美國是個富裕的社會，沒有貧窮，沒有歧視，自由與民主的烏托邦已在世界上建立了起來。一切都沒有問題，只有消費。

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對中產階級自我認定的人們，以及反映當時中產階級社會價值觀的校園，無疑的，是不存在的，不關切的。這種智性的虛妄，並非肇因於他們的短視與無知，而是一種客觀條件所模塑成的觀點。

對他們，社會問題是不存在的。它之不存在並非指社會問題已自現實社會中消除，而是從人們的觀念中消除。其所以如此，乃是都市文明的一種必然，都市計劃和發展，使得貧窮和絕望集中化。它們在城市和山區的角落中，不被人注意，縱使偶爾步行經過這些地區，也不會有人特別對此留下印象。大眾傳播媒介每天有著無數突發性的，宣傳性的，消費性的資訊要加以報導，不會有人特別對這種靜止的、持續性的落後地區關心在意。貧窮和絕望，不知不覺的被驅逐出人們的世界和視野。縱或人們敏感的

覺出貧窮和絕望的存在，但貧窮和絕望的集中化而非像以往的分散化，使得他們至多認為這種問題雖然存在，但並不嚴重。何況在形式上，人生而平等自由已訂在許多法律中，如果有貧窮和絕望存在，那一定是他自甘墮落，而非社會沒有給他機會。以黑人問題而言，繼承了布克·華盛頓 (Booker. T. Washington) 以來的努力，黑白問題在形式上已經到了「分離但卻平等」(separate but equal) 的階段，許多黑人與白人因而認為問題已經解決，大家都尚未累積到足夠的經驗，尚無法了解分離即不能平等，平等即不能分離，只是被「平等」這兩個字暫時的矇騙了過去。

上述的這種心態，對校園內或校園外，都是主流心態。除此之外，^{〔美共大檢肅和麥卡錫主義的恐懼餘悸仍影響著校園內外的知識份子〕}。本世紀初期，美國大學自首次出現了激進的政治組織「校際社會主義者協會」(Intercollegiate Socialist Society) 起，激進思想大行，它與成人社會共生共長。三〇年代大蕭條時期益發上漲；大戰爆發前，全美大學生有四分之一同情激進主義。由作家辛克萊 (Upton Sinclair)、傑克倫敦 (Jack London)、賴德勒 (Harry Laidler) 等人所創的「校際社會主義者協會」已不斷誘發更激進的學生組織。但這些組織隨著戰爭而漸趨沈寂。戰後的美國「清共」，校園曾被視為重要的對象，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 (J. R. Oppenheimer) 亦遭株連。加以史達林主義反覆無常，且又多次入侵和併吞東歐，發動韓戰，這種對立使得思想壁壘色彩非常清晰，尼克森和麥卡錫等右派得勢的結果，使得「異議」(dissent) 成了「顛覆陰謀」(conspiracy) 的同義辭。所有的學術、言論、通俗觀念、或者被收買，或者因立法和意識型態的禁制，或者因不自覺的缺乏反省，都成了為既存體制作裝

飾的合法化工具。校園爲此，增加了它的沈寂。

其次，一九四五年代至五〇年代，爲戰後復員階段。根據「軍士條列」(GI Bill)，相當龐大數量的退除役青年進入了校園，這些青年爲了彌補他們在戰爭中所失去的求學歲月，以及因爲年歲較其他大學生爲高的實利傾向，因此，他們是「生涯導向的」(career orientation)，「政治不參與的」(political uninvolved)。這些大兵學生在四五至五〇年期間，使得由於尼克森與麥卡錫勢力抬頭而使左翼學生大批離開的校園產生了高度的政治冷漠症。許多方面，一九五〇年代入學的新生代青年視大兵學生爲典型的角色，他們效法大兵學生的生涯導向，亦受到由於成人社會政治冷漠而造成的校園政治冷漠的影響。在這樣的校園景觀下，霍羅維茲 (I. L. Horowitz) 及富利德蘭 (W. H. Friedland) 說：「雖然有某些學院教授仍致力於維護學術自由，但校園激進主義幾近全部消逝，極少數的激進者團體只不過是對既有系統的離心者。但即使如此，這種少的團體也爲聯邦調查局等特務機構人員所滲透——它們難以發展任何有效的政治活動。」

政治社會運動的被禁制，懸滯愚駘的國際冷戰局面，齊一化的消費大眾文明，成人影像無所不在的壓力，凡此種種，五〇年代即將結束之前，由極端個人主義傾向，中產階級人道色彩並具有右翼虛無主義風味者在文化上作出了極大的反動。這種文化上的反動形成了「青年反文化」(youth counterculture) 的第一個脚步。他們就是以卡洛克 (Jack Kerouac)、金斯堡 (Allen Ginsberg)、柯梭 (Gregory Corso) 等人爲首的所謂的「敲打的一代」(beat generation)。這種右翼、中產式、人道式的反文化，由於在形式上與左翼的普羅式生活形態有相當多的酷肖性，因此

對於反文化的參與者，我們如果不細心檢查他們理論型態，便難以認定其基本的主張。

在整個六〇年代青年反文化的體系內，無疑的，左右兩翼的質素經常是相互混疊的。它可以從離群索居，藉藥物創造個體的超越性經驗，經由雜交體會人的自我完成，一直排到生活力求簡單和公社式的生活等。也正因為反文化體系內前進與倒退的質素如此混疊，乃使得許多人在評估青年反文化時無法將其正確區分，從而無法對其作正確的評估，前引的羅沙克 (T. Roszak) 即是一個例子。

根據動態的社會分析的觀點，或許我們可以作這樣的解釋：知識份子運動普遍確具有愈發展愈往下層的傾向，阻力愈大愈促成它的偏激化，通常一個變動社會中的知識份子運動初由文學等文化層面開始，從這裏，他們經由公開表示出對既有秩序的「異議」和「離心」而培養同道者的廣泛支持，然後經由具體事務而團體化，並使整個運動深入化，壓力促使它的發展由和平解決到武力解決。由整個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發展，這樣的軌跡異常清晰，而「敲打的一代」則是它的「板機」(trigger)。「敲打的一代」公開了知識份子對既有社會體制的不滿：它的虛偽、瑣屑、不人道、無秩序、以及文明的墮落。雖然「敲打的一代」並非一項政治社會運動，但它卻已使得校園價值有了新的選擇項目，並且對舊的價值也作了批判，它培育出了新的轉變契機，雖然「敲打的一代」中許多知名者本質上不過是神秘主義或右翼虛無主義傾向者，但就一個長期的知識份子運動而言，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扮演了「板機角色」。

第 4 章

學生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學運第一步

當校園行動主義重現時，大多數美國人都感到震驚。目前學生行動主義的浪潮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與改革主義者與非暴力民權運動一同開始。

——一項美國官方報告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確切的起源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有人將其遠溯五〇年代中期學生介入政黨選舉，有人認為甘迺迪 (J. K. Kennedy) 的態度鼓舞了學生介入政治，有人認為是黑人民權運動鼓動了整個浪潮。或許學生在五〇年代介入政黨活動的確使學生的政治意識提高，或許甘迺迪主張青年學生應多關心政治的一貫態度，也的確使學生拋棄了政治冷漠症，但就事件而論，無疑的仍以六〇年代一來臨時就發生並急速升高，而且徹底顯示美國黑暗面的民權運動最適宜當做是「事件性的源起」。黑人民權運動除了具有可以作為歷史分期的便利外，由六〇年代整個學生運動的發展而觀，它也與學生運動具有同步生長發展的特性。

這個事件是一九六〇年二月一日的北卡羅來納事件：四個北卡羅來納州農工學院的學生，他們不能忍受白人的凌遲，於是他們走進了一家只准黑人購買鉛筆，但卻不能坐下來吃飯的商店（店名 Woolworth），在這裏，這四個學生在只准白人坐的餐桌前坐了下來，一直到被捕為止。

他們的「靜坐抗議」（sit-in）很快的傳佈開來，同月，南卡羅來納州的橘堡（Orangeburg）有一千名學生在城裏遊行抗議，超過三百五十人被捕，露天拘禁並被大雨所淋，在大雨中，他們高唱美國國歌，舉行祈禱會。同年四月、「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成立（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這個委員會由南方十二個抗議地區的代表組成，類似的組織很快的在北方許多大學中也相繼設立。

六〇年代初期非暴力之黑人民權運動急速展開，委員會曾於成立之初即發佈過這樣的呼籲性文件：

我們深信哲學或宗教的非暴力理念，並以此為我們的目標基礎，我們的信仰假設，以及我們的行動方式。非暴力源自猶太基督教的傳統，以期尋求一個充滿仁愛的社會正義秩序。人類行為的完整性代表了向那樣的理想社會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經由非暴力，勇氣可以取代恐懼，愛可使恨消融、平等可取消偏見、希望將使絕望消失、和平將勝過戰爭、互信將戰勝互疑、彼此關懷將使敵意去除、完完全全的正義將泯滅不正義、救贖將戰勝墮落。

愛是非暴力的中心觀念，愛是上帝賜予人自己和人們彼

此之間的力量，這種愛推至極限，將使人縱使身在敵意的境域中亦將堅持愛，將使人們縱使受到邪惡的折磨亦能容忍，無時無刻不堅持愛。

我們向人們的良知和人的道德本性呼籲，期望非暴力使人類的忍讓與正義獲得實現。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四日，由勞森 (Rev. James Lawson) 所起草的這項文件，充份說明了「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的宗旨，但不幸的是，勞森本人因為參加民權運動，很快的就被他任教的Vanderbilt大學解聘。很明顯的，非暴力民權運動從它的第一步起就遭到嚴重的挫折與壓迫。

六〇年代再度興起的黑人新民權運動自北卡羅來納事件之後，黑人學生及成人以「我們現在就要一個開端，我們已經等了一百年」的精神積極展開他們的活動，無疑的，北方的學校為此受到很大的感動，除了成立團體，南下支援外，最重要的是，由此事件使得象牙塔內的學生們了解到原來美國竟然還存在著這種應該是當然而卻沒有實現的事，竟然美國的民主制度中有如此不民主的事情。這種悚然而驚的了悟與自覺，使得青年學生們整個價值觀念作了扭轉，因而獻身於社會與政治的改革。)

這種反省原來是個別式的，而其所以能經由凝聚的作用而成爲校際間的聯合行動，最主要的，乃是「學生民主社會同盟」(SDS) 的在民權運動洗禮下成立。)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前身是「學生工業民主同盟」(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簡稱SLID)，根據「學生工業民主同盟」的章程，它「是一個非黨派性的教育機構，目

的在促使美國學生經由主動的參與來解決當前的問題」，在本世紀初期即已成立，但它並非獨立的組織，其上層尚有一個由工會人士組成的「工業民主同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簡稱LID)，因此，前者是後者的青年部門，在六〇年代開始時，它只不過在哥倫比亞、耶魯、密西根三所大學設有支部，總共不過一兩百人參加他們的活動而已，勢力微小。

一九五九年時，「學生工業民主同盟」的領導者們鑒於「工業民主」這四個字難以獲得學生支持，因而決定改名，幾經研究，該年年底將其改爲「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民權運動發生後，不到幾個月，北部已幾乎有一百所學校的學生予以支援，當年五月，「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首次在安娜堡集會，決定支援民權運動，會後不久，「底特律聯合汽車工人工會」對該組織補助，他們乃決定聘請哈伯(Robeit Alan Haber)爲專業組織負責人，事後證明哈伯爲一極優秀的青年運動家，很短的期間，即使「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獲得驚人的發展，他的人權運動新聞報導雜誌有甚高的傳閱率，很快的就使「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校園內享有聲譽；稍後，哈伯並被選爲首任「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會長。

根據「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章程，其宗旨爲：

本同盟爲左翼青年同胞的組織，目的在創造一個對教育和政治持續關心的社團，將自由主義者、激進主義者、行動主義者、學者、學生、職員等聯結在一起。

本同盟相信一個民主社會的影像，在這樣的社會中，每一階層的人們都能控制對他們自己有影響的決定，以及他們所依賴生存的資源。本同盟尋求一種持續對社會實體關切，

進而促使經濟、政治、社會機構最基層層面改變的關係。我們認為現在已經到了要發起一項激進的、民主的計劃之緊急時刻，以克制共產主義和國內右派勢力的抬頭。

根據「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章程，明顯的，這個組織的左翼傾向並非傾向於共產主義，相反的，它是反對共產主義的，它期望的是經由民主的參與，基本上毋寧是英國費邊社思想的社會民主概念導引，來締造一個更民主、更合理的社會，這個組織的結構甚為鬆散，成員亦甚為複雜，完全沒有一個職業革命團體的嚴格紀律和權力集中。因此，它雖然是激進團體，卻是一個「在既有民主觀念下的激進團體」，而非革命團體之激進團體。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母體「工業民主同盟」，前面業已述及，是一個主張工會民主的團體，而在美國，本世紀初以降，由於共產主義曾相當成功的煽動工會，使得特務人員一直極其注意工會的活動，因而造成工會領導人的非激進主義作風，當「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成立時，它的母組織「工業民主同盟」領導人便明顯的具有非激進主義的特質，其中包括主席閔可夫（N.M. Min-koff）——國際女裝製造工人聯合會的重要負責人，崔格（Frank Trager）——保守的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其他人士另有Daniel Bell，George S. Counts，Louis Fischer，Victor Reuther，John Roche，Clarence Senior等；另外一些當時的名流是其顧問，其中包括了Arnold Beichman，James B. Carey，the Reverend donald Harrington，Sidney Hook，Alfred Baker Lew，Harry A. Overstreet等，在這些人士中，例如Frank Trager，Daniel Bell，Sidney Hook等均為著名的保守型學者，

在後來學生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都備受青年學生醜詆謾罵。

而反觀「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一九六〇年五月它首次在安娜堡集會，參加者便絕大多數為激進份子，其中包括當時民權運動的領導者Bayard Rustin，James Farmer，Marvin Rich，James McCain，Herbert Hill，Michael Harington等，而新崛起的校園激進領袖如Bob Ross，Tom Hayden等也都參加。由這兩個母子組織如此巨大的不同，可以說明為何到了後期，兩者正式分離。

黑人民權運動發生後，加上其他的客觀因素，整個校園裏，學生的政治團體突然大增，其中比較重要的包括了由Tom Hayden在密西根大學領導的VOICE。由Rennie Davis及Paul Potter在奧伯林大學領導的「進步學生同盟」，由Clark Kissinger在芝加哥領導的POLIT，由Todd Gitlin領導的哈佛之TOC-SIN，由Paul Booth在Swarthmore大學領導的「政治行動俱樂部」，……等，這些領導者中，相當多數後來都成了「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主要人物。

黑人民權運動自一九六〇年二月開始後，迅速成長。民權運動揭露了醜惡的現實，教育了新一代的黑白青年，也使得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有了一個最莊嚴的開始。

第 5 章

從民權到黑權的過渡

在我們的國家，來談什麼文明，這是極很諷刺的事。我們的國家事實上是不文明的，它需要文明化。我們必須提出種種有關文明的問題，並且去促使它實現。因此，我們希望你們現在就開始戰鬥，去做今天的領袖，而不是明天的領袖。這個國家是盜竊弱小橫行的國家，它已經到了快變成謀殺者的國家之邊緣，我們要停止它，我們必須停止它！現在，就一個更大的意義而言，它是黑人的問題，我們正在為我們的解救而前進，我們已經厭倦於嘗試著向白人去證明，去解釋，說我們不會傷害他們。我們關切我們需要的事。問題只在於，白人能讓它在這個國家存在嗎？白人能克服他們的種族偏見嗎？如果不能；那麼，兄弟姊妹們！我們就再也沒有選擇。講得更清楚，你們要勇往前進，否則我們就要超過你們。

——卡米加爾

〔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主席)

從一五二六年，一百個黑色奴隸在現今維琴尼亞州的詹姆斯鎮或南卡羅來納的派地河河口發生集體暴動以來，四百多年期間，美國的黑人民運動或抗議行動，便無休無止的以一種揉合了陰鬱、低沈、悲哀、憤怒和咆哮的聲音，漸次推展開來。黑人的運動是整個美國激進運動的一部份，而且是最主要的部份。然而，四百多年期間，美國的黑人運動正如同激進運動，由於種種錯綜複雜的因素，一直沒有匯合成足以改變美國社會的整體運動。它一直要到六〇年代黑人民權運動結合了學生運動，才顯露出新的曙光。這個曙光是經由整體的歷史了解，以及對美國社會經濟與政治作深入的反省，黑人及白人的青年思想家和行動家尋找了更具體果敢的方向，聲氣相求的匯合了民權運動、平等運動、社會運動、反戰運動，以及其他激進運動的共同方向，開始大步的向前走去。

黑人民權和平等運動數百年來未曾徹底的推展，它的原因是近年來頗讓學術思想界關切並討論的問題。布爾（Paul Buhle）以及貝侖（Paul A. Baran）曾對此作過整體性觀照的分析；布爾著重於為何黑人運動未曾結合其他激進運動的原因之討論，貝侖則從美國社會經濟的觀點嘗試提出分析。

布爾指出，近數百年來，美國社會之中，不同類型的社會運動，其成員之結構殊為不同。以歐洲移民為基幹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北方低下級工人為基幹的工人運動，以及黑人的民權平等運動，彼此之間互不通聞。舉例而言，黑人遷移北方，與北方之低下級工人間發生就業競爭，乃無法使民權運動結合工人運動而推展；另外，十九與廿世紀交接之際的社會奢侈現象，兩次世界大戰，實用主義的社會通俗思想，戰後的新興「工作研究」，以及新

帝國主義的膨漲，黑色布爾喬亞的軟化，……等等因素，都使得個別之間的社會運動常在關鍵的時刻即被撲滅或分化、軟化，這些因素使得整個社會運動無法匯集到單一的、全體性的、有力的方向上。亦正因為如此，雖然不斷的有前仆後繼的黑人運動——而且許多次發生百人以上黑人被屠殺，千人以上被傷害的事件，黑人運動在質與量上都沒有進展到與其犧牲代價相等水準的地步。

比較布爾更為徹底的，是貝侖所作的社會經濟分析。

美國名歷史學家霍夫斯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 曾經指出，被認為是釋奴之戰的美國南北戰爭，實質上並不是釋奴之戰，他說：

釋奴令終於在一八六三年發表，文件上並未控訴奴隸制度本身，稱釋奴只是為了「軍事上的必要」，這法令將忠於聯邦的四邊界州的釋奴條件也省略。事實上，這法令並未釋放任何奴隸，在聯邦軍佔領下的各地區已有實權釋放，這不過只是理論上的正名，對於實力不及之處，則無影響。法令中也未提到具體的釋奴辦法，有的只是宣傳作用而已。國務卿綏阿德 (Seward) 解釋這文告說：「表示我們對實力不及之處奴隸的同情，告訴他們在不久後便可被釋自由。」英國《觀察報》諷刺這法令說：「並非說人類不能理直氣壯的奴役他一人，只是說如果他不忠於美國聯邦政府的人，便不能奴役他一人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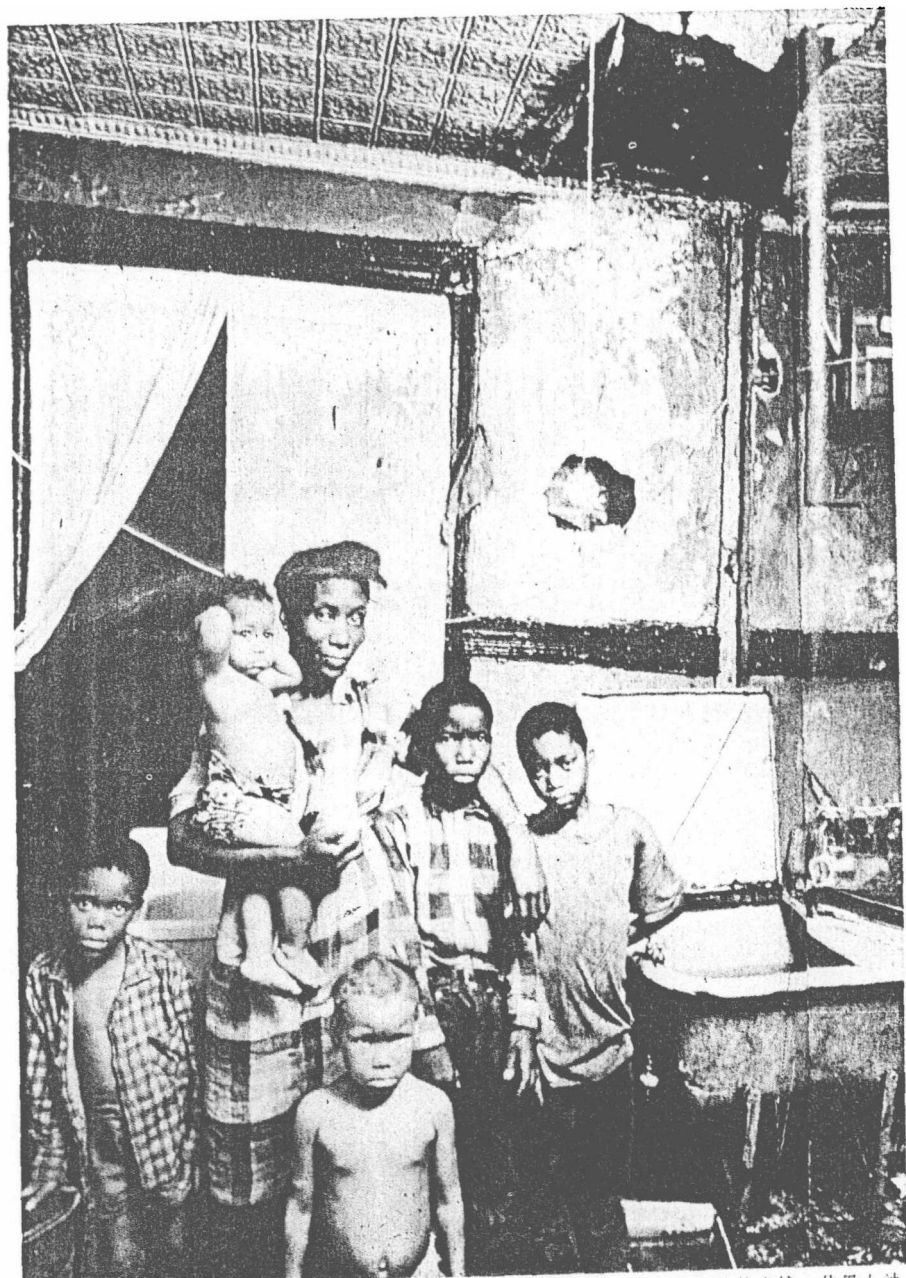
霍夫斯塔特鞭辟入裏的觀點，我們從南北戰爭前的南方與北方資本關係便可以得到更多的了解。可以說，南北戰爭乃是因為

當時北方逐漸經濟成長，相對於棉業的南方，北方的資本向南方強制輸入而引爆的。因此，北方的工業資本家支持了北方政權，和南方地主集團對抗，當時南方最激進的南方主義論者卡爾洪（John C. Calhoun）便代表著南方的地主集團向北方攻擊。對此，貝倫作了下面的針砭：

南北戰爭並不像許多人所誤認的，是北方統治階級為了釋放黑奴而發動的戰爭。南北戰爭只不過是北方為了鉗制南方擁有奴隸的地主貴族意圖逃避北方資本控制的戰爭而已，奴隸的釋放只不過這場戰爭的副產物，並非它的目的，北方資本主義根本無意在任何有意義的作法上釋放奴隸。在征服了南方地主後，他們樂於見到南方地主重新成為黑人勞工的剝削者。一八七〇年代的著名妥協，即默許了南方的新殖民地地位，南方的地主寡頭剝削黑人，而向北方的資本臣服。

自南北戰爭以降，事實上，黑人的地位改善得很少，「白人優越」「黑人低劣」的種族歧視非常深刻的藉著種種「社會壓迫」（social repression）的系統凌遲著黑人。黑人不時掀起的民權運動都遭到強烈暴力的打擊和隔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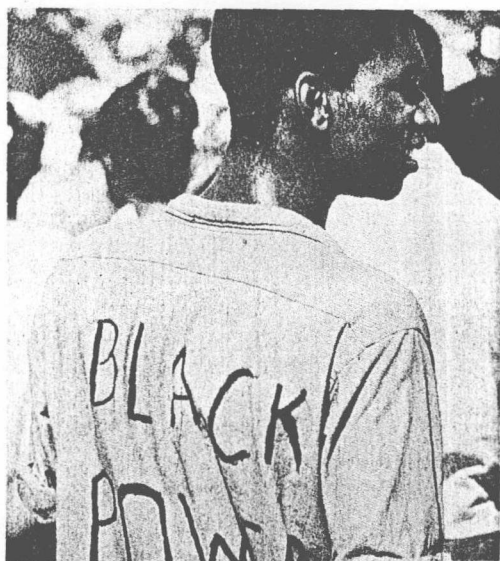
從十九世紀末期起，由於填補都市非技術性勞工的職位和意圖改善生活環境，黑人自老的南方州大量逐年移向西部和北部的城市。截至目前，黑人都市化的結果是四分之三的黑人都在都市之中。在通俗的觀念中，一般均認為即使都市中的最下等人，生活水準也比農村中的最上等人好。因此，從十九世紀以來逐漸增强的黑人都市化，必然顯示出，黑人的待遇，長期以來有了改善。



●直到六〇年代，美國黑人的生活狀況並無具體改善，其被隔離、歧視、壓迫的處境，使黑人被逼向革命的邊緣。



- 1966年由Newton及Bobby Seale發起的黑豹黨，其成員以戴扁帽、墨鏡、穿著皮夾克為標誌。
- (左下圖)自我放逐的黑豹黨情報部長及其妻。其後為黑豹黨發起人Newton的照片。
- 黑人民權運動代表了黑人的自覺與覺醒。



然而，這種觀點是正確的嗎？

對此，聯邦戶政局局長的特別助理彌勒 (Herman P. Miller) 便表示過：「當我們了解北部州和中部州的統計資料後，我們發現，從一九四〇年以來，黑人的職業狀況並無什麼改善。……白人和非白人的收入距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確實有了縮小，然而其後的廿年卻沒有什麼改變。一九四七年，平均非白人薪資所得為白人的百分之五十四，而一九六二年，其比例仍為百分之五十五。」

彌勒同時指出白人與非白人之間就業起步點的不平等情況：

「一個不是白人的的人，如果唸書不超過八年級，幾乎只有註定做黑手的份，而唸過八年級的非白人有十分之八如此命運。而白人呢？只有一半。非白人唸到高中畢業，其做工和作業員，目前比例是十分之六，而白人才十分之三。至於唸到大專，雖然表面上白人和非白人就業情況相差不遠，均有四分之三可以做專門技術以及管理者的工作，然而在質的方面卻存很大的差別，非白人大

	總 計	白 人	非白人	非白人
				白 人
1940	13.3	13.0	14.5	112
1950	4.6	4.1	7.9	176
1960	5.4	4.9	8.5	157
1962	5.6	4.9	11.0	225

說明：白人與白人之失業率均依所佔勞動力之百分比為計算單位。

多是低薪階級。……白人和非白人，雖然教育程度相同，然而非白人的待遇卻比白人差很多，其理由為：(一)他們都做低等工作。(二)縱使他們和白人做相同的工作，他們的待遇也比較差。」

另外，根據美國官方的資料，在六〇年代期間，非白人的失業率創下了戰後的最高紀錄，顯示了非白人（非白人中黑人佔百分之九十，因此非白人通常均等於黑人）的就業狀況從一九四〇年代以來是愈來愈壞的在走下坡。（如前表）

對此，漢寧（John F. Henning）說：「截至一九六三年五月，非白人的失業率為白人的兩倍餘——非白人為十點三，白人為五；如果算已婚者以及他們的家庭負擔，則兩者差得更大，為八與三之比。在待遇較好的工作上，黑人的不利更明顯，例如，黑人的勞工失業率比白人多三分之一，而專技行業的黑人失業率則為白人的兩倍多。失業對青年勞工打擊最大，對二十歲以下的黑人男性工人，其比例為百分之廿五，而白人青年工人則為百分之十七；至於對女性，則其黑人失業率之比為百分之卅三比百分之十八。……非白人佔全部勞動力的百分之十一，然而其四分之一卻失業達六個月或六個月以上。」

六〇年代一開始，美國黑人的失業就顯現出最惡劣的倒退與惡化。至於黑白之間的隔離問題，許多調查也顯示出，在一九六〇年代一開始時，它的景況也是只壞不好。「種族與居住委員會」（C.R.H.）的報告中說：「在一九五〇年，種族隔離的藩籬，在絕大多數城市，比起四〇年代只有增強而沒有鬆弛。」另外，塔烏依伯（K. ESA, F. Taeuber）在比較了一九四〇、五〇、六〇三個世代的資料後，也得到了下面的結論：「除了少數例外，種族隔離在美國不但沒有消逝，相反的更為增強。」

黑人問題在經過數百年之後，不但未獲解決，反而更為惡化，六〇年代許多資料顯示出其惡化的程度到了另一個高峰。下面依序有幾個表可供說明：

年代	白 人	非白人	差 額
1949	1.90	1.00	0.90
1959	3.20	1.75	1.45

男性每小時比較表

年代	白 人	非白人	非白人
			白 人
1954	4201	2357	0.56
1955	4250	2333	0.56
1956	5331	2418	0.56
1957	4685	2429	0.52
1958	4831	2536	0.52
1959	4882	2437	0.59
1960	5252	2672	0.51
1961	5424	3058	0.56
1962	5570	2908	0.52
1963	5808	3088	0.53

初級家庭和個人年所得的平均比較表

雖然數百年來黑人抗議運動不斷，而其所生之效果卻如此稀少，以至於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仍然看不到黑人生活的具體改善，對此，學者們提出了三點原因解釋：

(一)由非白人的被分離而且「次無產化」中，許多人可以獲得鉅大的利益，因而回饋的結果是加深了非白人的被隔離和無產化。舉例而言，由非白人的次無產化情況下，雇主們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和優勢，房東也可以用過份擁擠和過高的房租來獲得利潤，中上階層也可較易獲得廉價的家務雜工的傭僕。另外，許多小型的邊際產業也能藉著非常低廉的工資來維持其苟延殘喘的生命，而對白種勞工而言，黑色勞工的存在亦將有助於其地位的穩固。

(二)種族偏見形成了一種「劣等／偏見／歧視模式」(inferiority—prejudice—discrimination pattern)。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經由「優越性」的競爭，「優越性」等已成了「人性」的基本要素，任一階層的人們都尋求精神的寄託——嫉妒階層比他高的人，輕賤階層比他低的人。在這種心理下，最低階層的黑人們，由於長久被壓迫的地位，非常弔詭的，它反而成了安定社會心理的極大力量。黑人的存在，可以使所有其他的人，精神的不安與恐懼有了補償的對象，黑人的惡劣生活情境，可以軟化他們的鬥志而比較安於現狀。因此，黑人要求民權和平等的抗議運動便變得更加難以令人忍受，黑人的要求平等，等於黑人的向上移動，黑人的向上移動又等於其他低下等白人的向下移動。這在白人的意識中是整個人格結構中無法調整並予容納的。這也就是在所存壓迫黑人的白人，以低下等白人所施的手段最為凶狠惡毒的原因，也就是白種法西斯主義的源起。這樣的社會經濟和社會心理結構，加重了「劣等／偏見／歧視模式」的實踐，而且不容這個模式有翻轉過來的一天。

(三)獨佔資本主義的初步在美國成熟，使得大戰期間一度稍有

昇高的黑人就業率再度下降，獨佔資本主義的逐漸成熟「非技術工人受到最先的打擊，而第一個挨到棍棒的是黑人」，它使得六〇年代黑人失業率創下了紀錄。

綜合而言，黑人的處境是愈來愈被逼迫著走向革命邊緣的，官方為緩和這種革命可能性所設計的策略——「分潤主義」(tokenism) 僅發生很有限度的作用。所謂「分潤主義」乃是為了黑人的都市化，因而擴大了沒有白人願意或可能從事之服務事業的黑人僱用人員，使得黑色布爾喬亞增加，他們數量增加的結果是形成了黑人菁英份子與非菁英份子間的對立與不平等，以及黑人菁英份子認同的混淆，使得黑人抗議行動為之軟化。

但是，客觀的事實畢竟是無法掩飾的，六〇年代黑人遭到了被隔離、歧視、壓迫的高峰。因此，一九六〇年二月一日起，北卡羅來納事件便點燃了黑人爭取民權的火炬。

二月一日以後，幾個星期內，靜坐示威立即在南部各城市中的黑人院校中展開，學生們開始行動。其後的兩年，靜坐示威的技巧日益革新，幾成了游擊戰的策略。一九六〇年二月，南卡羅來納的橘堡事件，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學生被捕，他們在大雨中高唱美國國歌並作祈禱。兩年後，在亞特蘭大、喬治亞，來自亞特蘭大大學各校區的學生，策動了一系列的靜坐示威，他們在城裏每個連鎖商店和雜貨店前靜坐抗議，這場抗議中他們用無線電對講機互相連絡，顯示了抗議運動的新型式和技巧。

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三年之間，在南部約有二萬人因遊行示威或靜坐抗議而被捕。大規模的被捕，激起了北方的支持，他們甚至籌款以保釋被捕的人。一九六〇年四月，「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成立，由南方抗議地區的代表們組成，它是北方學生團體

和抗議行動的先驅。民權運動的行動家拉斯丁 (Bayard Rustin) 對於南方的靜坐示威運動作了這樣的評論：「它揚棄了美國大學校園中醜惡的麥卡錫主義，又激起了熱烈的政治辯論。」

南方抗議行動的目標迅速擴大，它不只開始對餐廳有興趣，他們的抗議運動走向海灘區、教堂、戲院。在許多地方有了城市委員會。舉例而言，那須維爾 (Nashville) 在一九六三年春，即多次舉行示威，要求一個開放的城市，所有的公共設施不應有種族歧視。

參與示威抗議的學生們，雖然在靜坐示威中被捕、被毆打、被凌辱，他們還是勇敢的前進，使得成人們也開始支持，例如，在亞特蘭大的行動中，黑人商人們烹製熱咖啡給示威的學生們，黑人計程車司機也免費讓學生們搭車。

成人們的支持，不但來自小市民階級，也來自金恩博士的「南方基督教領導會議」(SCLC)。一九六〇年靜坐示威開始後，金恩博士便作學生們的顧問，在當年四月「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成立時，他也曾向學生的抗議領袖們講過話。

然而，六〇年代初期的學生非暴力示威行動卻未能免除暴力的威嚇。例如，在丹維爾 (Danville) 的一個血腥的夜晚，六十五名示威者被警察痛毆，其中四十七人送急診救治；在伯明罕 (Birmingham)，警察用強力的消防水管狂沖示威人群，軍隊也出動來趕黑人參觀者。一九六三年夏天，示威走向高峰，當局對警察暴力合法化，許多南方黑人集會的教堂被焚毀，許多黑人家庭被丟炸彈和遭冷槍射擊；五月十日，伯明罕的示威者總部——加斯頓旅舍 (A.D.Gaston Hotel) 以及示威領袖金氏 (Rev. A. D. King) 的家都被炸毀，第二晚，超過二千五百人的黑人向消防隊

和警察丟磚頭，推翻計程車和警車並縱火，以示報復。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 的秘書依華斯 (Medgar Evers) 被刺，州長去牢裏看凶手貝克維斯 (Ryron de la Beckwith)，他們惡言將向密州的民權運動者威迫。另外，位於伯明罕十六街的浸信會教堂也被人從窗戶外丟進炸彈，四個上主日學的黑人小女孩慘死。對於種種暴力，有些是警察所為，有些則是警察眼睜睜的看著白人暴徒施暴而不理會。然而儘管面對暴力，黑人們發現自己的恐懼滋長了白色暴民的暴力後，便變得勇敢起來。

示威立即轉向政治之參與和要求改革，開始了規模龐大的選舉人登記工作，幾乎所有民權團體都來參加，「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種族平等會議」(CORE)、「南方基督教領導會議」、「有色人種促進會議」等，年青人四處勸說恐懼的黑人們去登記投票權，成人們則舉辦投票人訓練和選民學校，並籌募基金。

然而事情並不那麼容易。投票人登記在城市固然順利，可是在鄉下卻有許多危險，黑色鄉民為此要受到諸種威脅恐嚇。密西西比亞麥未特郡，一個黑人小老頭史蒂布杜 (E. W. Steptoe)，當他準備去登記投票權時，家裏被人投擲炸彈，他立即拔槍射擊逃跑的投彈人，他成了民權運動的英雄。這顯示出黑人已知道了自衛。黑人們在家中、在集會所都保持自衛狀態，一被狙擊，立刻還擊。另外，他們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安全措施，例如，在黑人區，他們會檢查所有進入的車輛，他們也配備無線電，作安全上的聯絡。黑人的青年與成年們良好的合作，使得民權運動迅速的成長。

整個一九六三年，民權運動空前高漲，巨大的衝突不斷發生。

被刺的依華斯，他的葬禮上，黑人學生與警察嚴重衝突。而在馬里蘭州劍橋，由於示威不斷，被捕者數百人，結果國防軍駐佔，實施戒嚴法達一年之久。五月間，北卡羅來納州的綠堡（Greensboro）有一千人被捕，杜漢（Durham）有一千四百人被捕，九月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橘堡則有一千四百人被捕。

不但一般黑人民衆的示威受到壓制、逮捕、暴力的威脅，黑人民權運動最具合法特性的上訪（向華盛頓抗議）運動也受到嚴重的威脅與阻撓。

一九六三年八月，由民權行動家拉斯丁聯繫，全國各大民權運動團體、宗教團體、勞工團體等共組的廿萬人往華盛頓遊行示威也受到當局的阻撓與敵意。整個民權運動似乎已走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萬人上訪的大遊行中，後來擔任「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主席的路易斯（John Lewis）作了重要的演講：

我們今天為了工作和自由來遊行示威，我們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因為千千萬萬我們的兄弟們不在這裏，他們沒有錢坐車來華盛頓，因為他們只得到饑餓邊緣的待遇，或者沒有待遇。

基於良知，我們不能支持官方的民權法案，因為它太少，也來得太遲，它不能保障我們的人民免受警察的屠戮和暴力。

民權法案的選舉條款也對千千萬萬要投票的人沒有幫助，它不能幫助密西西比、阿拉巴馬、喬治亞的公民們，他

們有資格投票，可是他們沒有進過六年學校，「一人一票」是非洲人的吶喊，也是我們的。

人們被要求去登記投票，但這項人權法案要怎麼樣保護我們那些沒有家的、饑餓的人？這個法案要怎麼保障一個在收入十萬美元之家中作傭人，而一週所得只有五塊錢的婦人？

這個法案也不能保護我們的小孩和老婦免受警犬和警察水龍頭的暴力，它也不能保護丹維爾那些生活在警察統治長期恐懼中的人們。它也不能保護那些隨便被捕入獄而被判刑的人，喬治亞的亞美利可斯就有四個年青人因為和平抗議而被捕，並面臨了死刑。

一百年來，這個國家首次覺醒了，隔離是罪惡，它的所有形式都必須摧毀。我們今天在這裏，證明了我們已奮起，並採取行動。

我們現在已進入了一場嚴肅的革命中。我們的國家仍舊是一個廉價的政治領導者結合種種政治、經濟、社會剝削形式的地方。

在南方的許多地方，我們在田裏工作，從早到晚，一週只收入十二元。在喬治亞的阿爾班尼，我們看到我們的同胞被聯邦政府因和平抗議而判罪，而副警長把律師 C. B. King 毆打到幾乎死亡；地方的警察踢打 Slater King 懷孕的妻子，她失去了她的小孩。

對我，阿爾班尼的判決是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客的政治陰謀。我想知道，聯邦政府究竟站在那一邊？

革命已快到了，我們必須讓自己擺脫政治和經濟的奴隸

鎖鏈。非暴力的革命是：「我們不要等到法院判決，因為我們已等了幾百年。我們不等總統、不等司法部、不等國會、我們將用自己的手，創造一個龐大的力量來源，在能夠保證我們勝利的任何國家結構之外。」對那些說：「忍耐，等待」的人，我們要說：「忍耐是骯髒的屁話」。我們不能忍耐，我們也不要漸漸的自由，我們只是要自由，而且是在現在。我們不能依靠任何政黨，因為無論共和黨或民主黨，都已經背叛了獨立宣言！

我們承認，任何激進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改變即將發生，民眾和群眾必須催生，在奮鬥的過程中，我們不只追求民權，我們必須用愛、和平、和真正的兄弟之情來工作。我們的心，我們的靈魂不會停止，直到自由和正義降臨到所有人民的身上。

這個革命是嚴肅的，甘迺迪想把這個革命從街上帶到法院。聽著！甘迺迪！聽著！國會議員們！聽著！同胞們！黑色的群眾為了工作和自由而遊行，我們要對所有的政客們說，我們不要什麼冷靜的時刻！

我們現在將不停止，所有Eaetlind，Barnett，Wallace的力量都不會停止它。下次我們遊行，我們不會在華盛頓，我們會穿過南方的州郡，我們將使過去我們所作的作為變得渺小。站起來吧！美國。

所有的我們都將從事這項工作，我們將停留在每個城市的街道上，停留在每個村莊，直到真正的自由到來，直到革命完成。

大致而言，路易斯的著名演講並不是黑色極端主義的論調，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一九六〇年民權運動興起後，由於它一再的遭受到打擊，一九六二年起，就已有許多黑人知識份子因憤怒與絕望而主張「黑人！拿起你的槍來！」和「與自由主義說再見！」這種憤怒與絕望，從一九六三年起迅速的開展，由路易斯這種典型的主流民權運動者的言辭中，已可看到透露出來的焦灼、憤怒與絕望氣息。這種焦灼、絕望、憤怒，到了一九六四年，便完全分開的爆發了。

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間，民權運動鼓舞了學生積極參加改革的行列，帶起了所謂的美國的知識青年「下鄉運動」(V-narod)，無數的學生進入北部都市貧民區，阿帕拉契山區，並前往南部協助黑人建立政治力量。青年知識份子的下鄉運動，在一九六四年間的「密西西比夏令計劃」(Mississippi Summer Project) 達到最高潮，至少有一千名白人學生參加南部壓迫最厲害地區的選民投票權登記。建立民衆活動中心，幫助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

「密西西比夏令計劃」是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主要事件，這項計劃主要有幾點特殊的意義：

一、密西西比夏令計劃使得北部知識青年，經由下鄉的經驗，深刻的了解到美國社會醜惡的現實，因而增加了他們反省的能力，因而開展了六四年後的學生激進運動。南部群眾運動的戰術也開始大量帶進了北方的校園，使校園運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二、白人和黑人知識青年，經由密西西比經驗，開始走向了各自發展，殊途同歸的運動方向。在白人方面，是因此走向了「新

左派」的方向，而對黑人知識青年而言，彌勒（Loren Miller）的「自由主義再見」的口號開始成爲主流，「黑權」（black power）成爲黑人知識青年的運動方向，在這個方向上，衍生出了種種從「民主自治派」，一直排到「分離主義革命派」等不同路線的團體。

三、密西西比經驗，使得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由單純的「同情」觀念，而走向「批判」的觀念。一九六四年夏季一開始，三個南下學生James Chaney， Andrew Goodman， Milchael Schwerner的被刺殺，喚醒了整個美國青年的覺醒，和平改革的階段開始走向對抗與衝突的階段。

第 6 章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 的崛起和成長 (1960～1962)

我們必須嘗試將我們的社會恢復人性的控制。我們的社會現在控制在無休止的機械和幾百家大公司之下，它們控制著我們的經濟，比封建社會還嚴苛。軍事的支配地位使我們短暫的一生被普遍的軍事訓練佔據，不負責任的政客為其作傳聲筒，我們的專家系統，不公正的政治結構，官僚體制，使得人們都感到自己是一個被壓迫的受害者。可悲的是，大學成了這種權力結構中的一部份，它不再是使人們獲得自由的處所。

——Tom Hayden，「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主席

目的在創造一個對教育和政治持續關心的社團，將自由主義者、激進主義者、行動主義者、學者、學生、職員等聯結在一起，「尋求一種持續對社會實體關切，進而促使經濟、政治、社會機構最基層層面改變」的美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SDS)，在整個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具有極重要的主導力量。

它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之間完成改名及重組之後，便隨著民權運動的節節升高而開始擴展其組織，推動其行動。一九六〇年底，「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只在八所校園有分支機構，會員不過二百五十人；然而由於它的正確領導，其組織與成員不斷擴張，到了一九六八年，它已有了三百五十個分支機構，會員也增至十萬人，成爲推動六〇年代學生激進運動的核心。

一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〇年初之間，「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由原來的「學生工業民主同盟」(SLID) 改組之後，其首任主席爲AI Haber，副主席爲Jonathan Weiss，AI Haber並與後來接他主席爲主席職務的Tom Hayden自任主要的「田間秘書」工作。在他們兩人的熱情推動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一開始就承接了當時南方的黑人民權運動，他們選對了發展的方向。

被他的朋友稱爲「在複印機下面睡覺」的Haber是一個有極高創造力的天才，Hayden則爲愛爾蘭後裔畢業於密西根大學的好手。他們密切合作，從六〇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一開始，就決定加入這個運動的潮流。Hayden親自南下，和「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SNCC) 的工作者一起工作，分發「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文件，並報導他們在工作過程中被毆辱、被逮捕、被監禁的事件；學新聞而有意從事新聞工作的Hayden，在他的工作過程中即數度被毆打和監禁。他的報導是當時有關的報導中最有震撼力的，他的報導經由「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宣傳品和其他學生刊物如《行動者》(Activist) 等，而散佈進入各大學校園。「黑人民權運動」是一個具有強烈道德驅迫力的題目，「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強烈支持並聲援黑人民權運動，使它取得了學生的發言和領導地位，也使得後來「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反對核子試爆、

主張校園改革、學術自由、反對貧窮等更基本的問題上取得了領導地位。

雖然民權運動是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導火線，然而若無更廣泛存在的其他問題所構成的社會條件或校園條件，單純的民權運動必難持續的昇高。當時的美國，由於麥卡錫主義已自全盛時期退潮，許多高漲一時的保守主義缺點一一暴露——例如保守的國會，特務軍警的進入校園，保守主義意識型態所蓄意製造的富裕假相，……等。這些社會、經濟、政治條件，提供了「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除民權運動外進一步發展的契機，而這些條件在當時的校園中早已存在了若干背叛的種子。

一九六一年冬，Hayden在「行動者」學生刊物上發表了一篇論文「給新左派的一封信」，這封信相當程度的打動了當時許多的校園心靈。信中他攻擊保守主義心態，攻擊核試，攻擊國會的保守以及社會立法的不足。他抨擊自由主義的已告崩潰，主張一種新的「激進主義」——對現時的社會作本質原因的觀察和具體的實踐。雖然其所謂之「激進主義」實質上並非真正的激進主義，但大致上他已掌握了「激進主義」的原則——「激進即抓住事務的根本」(to be radical is to grasp the roots) 的精神。Tom Hayden這種精神即所謂的「反意識」(counter-consciousness) 的源起，也就是「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基本態度，它在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過程中逐步的獲得成長和體現。

由於一九六一年秋天之前「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已大大的打開了知名度，並逐步取得了代言和領導地位，兩位領導人爲了型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一九六二年的新角色，決定在當年聖誕節時，於密西根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舉行一項「過

去、現在和未來——我們努力目標的反省」討論會。在這個討論會中，「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各大學領導人決定了他們今後努力的方針，其中有許多極具先見之明的看法——例如來自賓夕凡尼亞州的Robert Walters提議以美國的貧窮問題作為會後的努力核心（他的創見比哈靈頓的「美國的另一面」早了整整一年），Bob Ross及Mark Chesler則希望以校園改革為努力方向（他們的創見比一九六四年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自由言論運動」整整早了三年）。這次會議對各校的學生激進份子領袖是一次很好的交流場合，與會者之一的 Betty Garman 事後寫道：

我們談到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個新的世界，沒有一個人記下大家的這種感受，雖然我們大家都有這種感受。我們談到了冷戰以及冷戰的行將結束，我們也談到我們對冷戰的雙方都反對的態度；我們反對蘇俄這一方，也反對美國這一方。我們也談到美國的系統是如何的腐敗。這是多麼令人刺激而興奮的事！

安娜堡集會之後，Al Haber立即採取了行動，他將各校園志趣相投者結合起來，組成了「全國執行委員會」，自任主席，各地並設區域代表。安娜堡會另外還決定由Hayden等人負責起草一份今後努力方針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宣言——半年後的〈休倫港文件〉（The Port Huron Statement）即此而來。

安娜堡集會在新年前夕的晚會中結束。他們在日程表的最後一行寫道：「明天，一月一日，新左派出發了！」

進入了一九六二年，Tom Hayden 經過半年的讀書、訪問、

演講、論戰、完成了安娜堡集會所賦予他的使命——撰寫了「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宣言。六月在休倫港集會討論，通過了這項宣言式的「休倫港文件」，它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批判美國的現況，批判的對象包括政黨、大企業、工會、軍產複合體、軍備競賽、核子蓄積、種族歧視等。除了批判之外，這份文件中還作了許多改革的建議，他們的建議與一般通俗的自由主義者所作的並無特殊的不同，唯一特別的是，這些激進青年並不認為所有的上述是個別性的問題，而相信這些問題是緊密勾連在一起的。除了批判現況的五分之四篇幅外，另外更重要的五分之一篇幅則用來表明他們上述批判的基礎信念及對新的青年一代努力方向的召喚。

在批判中，他們譴責美國已非「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他們指出：「美國的政治系統已不再是民主的模式。」「它由於混亂了個別的公民，癱瘓了政策的討論，鞏固了軍界和產業界的利益，因而使民主遭到挫折。」「在一個軍火已不足維持的社會，爲了生活的品質而非爲了火箭的數量，民主必須復活的社會，美國已沒有了必要的內在衝力。」「美國人民已逐漸從公眾生活中撤離，從決定他們自己事務的集體努力中撤離。」

他們認爲：「人類的理性、自由和愛的力量有無限的潛能，對自我教育、自我指導、自我了解與創造有尚未實踐的潛力。」「人與社會的目標必須是人的獨立，我們主張的個人主義並非自我主義，而是使個人獨特品質鑲入到其他人，以及所有的人的活動中。」「人類的關係必須包括兄弟之愛與真誠，人的互相依靠是一種暫時性的事實；我們需爲人的兄弟之愛而努力，這才是人類在未來得以生存的條件，也是社會關係的最適當形式。」

他們強調「參與民主」。

我們尋求建立一個人們參與的民主。它有兩個中心目標，其一為人們對決定他們生活品質與方向的決策參與，其二為社會必須組織起來，鼓勵人的獨立，供應他們共同參與的媒介。在參與民主的體制下，政治生活有下列幾個基本原則：社會事務的決定需經由公眾團體，政治應被視為一種經由集體創造而產生的可接受的社會關係形式，政治應具有使人們擺脫孤離的功能並具有使人們發現生活的意義的功能，政治的秩序應提供人們表達其哀樂的管道。

〈休倫港文件〉最重要的部份是他們提出來的策略，他們期望學生、學術工作者和知識份子參加新左派，以大學作為根據地和媒介，來推動一個改變社會的運動。這個具有歷史性的策略是這樣的：

一、美國的任何新左派，在大方向上是一個具有真實知識技巧的左派，慎思、明辨、真誠、反省。大學容許附屬於學術的政治生活，大學容許基於理性的行動。

二、新左派必須在全國各地具有普遍而有效的社會角色功能，而大學在全國分佈的形式正相吻合。

三、新左派必須由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熟的青年所組成，並強化這些青年，大學明顯的是一個起點。

四、新左派必須包括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前者務實，後者進取。大學是個比政黨更敏銳的地方，在這裏，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兩大傳統可以開始討論它們的差別，並進而尋求政治

的綜合。

五、新左派必須開始在四處提出反對意見——如果國家的政策不當及人們對政治不關心則應當將其反轉過來。而大學正是一個自由論辯的社會。

六、新左派必須將現代的複雜問題轉變成人人皆懂並覺得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問題。新左派必須將人們的無助感塑造成型，則人們便會將自己遭遇到的困難在政治、社會和經濟的源頭尋找原因，然後才會組織起來改變社會。在一個被認為是經濟繁榮、道德滿意和政治操作良好的時代，新左派不能將胃痛視為社會改造的動力；新左派必須強調人們以往從未有過的不舒適。大學正是從事所有這些活動的最佳地點。

大致而言，世界各國的左翼運動，無論是共產主義運動，各個派別的社會主義運動，皆相當的具有世界性的基礎。美國從上個世紀以來，其左翼的運動便明顯的具有這種世界性的基礎。左翼運動的具有世界性的基礎，等於在它個別國家性的需要和理想主義的衝動之外，另外的也滲透了強烈的現實國際政治因素。固然此種現實政治因素的滲入，使它在起步時少了許多「起動摩擦」的力量；但從長遠的發展來看，卻也使得美國整個一世紀的左翼運動有教條化的傾向。它的教條化的傾向，隨國際左翼努力而搖擺的策略，對因理想主義衝動而投身入左翼運動的左派，是一種造成他們逐步離心離德的最重要因素。本世紀初葉以迄五〇年代，美國的老左派運動便明顯的具有這樣的特徵。這使得美國許多在卅年代及四十年代會一度極為活躍而知識份子理想主義精神旺盛的老左派受到很大的挫折。對於這一點，一九七〇年的十月間，格拉爾 (Bart Grahl) 等許多學者在安大略省滑鐵盧市的一

次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曾作過詳盡的分析。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新崛起時所標榜的「新左派」，由其整體的系絡意義來看，它的意識型態是完全不成熟的左派。它並未繼承二十或卅年代一度甚為狂熾的美國老左派的思想，亦未接受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Tom Hayden在起草〈休倫港文件〉時曾參考的思想，分別來自C.W Mills, Harold Taylor, Albert Camus, Eric Fromm, David Riesman, Robert Nisbet, Michael Harrington, Iris Murdoch, Sheldon Wolin, Norman O. Brown,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等學者，這些人士與其稱之為左派，毋寧稱之為人文主義者更為妥適。其中固有一、二人士曾參與過戰前的左翼思想運動，但主要的，他們均非典型的左派，而是在思想位列上應該正確歸於人文主義，至多不過是「左翼自由主義派」(Left Liberal) 這一支的成員。這些成員並未承受美國老左派的教條，因此，「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思想的起步上亦隨之而未接受美國老左派的主導，甚至於當他們在起草這份「休倫港文件」時，即曾與「老左派」們有過強烈的意見不合。這股自稱「新左派」而實非「左派」的勢力，正由於這樣，大大的增加了他們思想的活潑與非教條性。他們不強調意識型態的僵固不變，注重行動的有效性，甚至於他們還攻擊共產主義與其他的種種獨斷主義和權威主義。他們內部的彈性和自由化，使得「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具備了高度的成長潛力。因此便能在具體的行動實踐中很快的壯大，不旋踵間即會員大增，分支機構普遍設立。

除了思想型態上的彈性外，「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另一個很重要的成功因素是，他們並不強求一個全國學生統一起來運動標

的。

以下是該同盟幾個重要幹部對休倫港會議的評論：

Paul Booth說：

會議結束，我們都非常振奮。這真是個罕有的經驗，最後一次的討論通宵達旦，我們都疲憊不堪，但我們已完成了一項偉大的文獻。

Bob Ross說：

這種感覺，有點像開始旅行的出發感。

休倫港會議除了完成了〈休倫港文件〉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工作是確立了他們和其他學生組織相互依賴，建立起兄弟般聯繫的策略。「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開始和「全國學生協會」(NSA)以及「美國人民民主行動組織校園分會」(Campus ADA)兩個當時勢力龐大的學生組織結為兄弟組織。另外，「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對於自己的組織也重加調整，它成立了一個「全國委員會」，由十七位全國性的負責人加上各地分會的代表共同組成。其目的在保持該同盟的機動性，隨時對各種特殊的問題作成決定，以充分掌握全國各大學學生運動的脈搏。

不過，〈休倫港文件〉之後，由於其未經「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母組織「工業民主同盟」(LID)的批准或認可，因而發生了兩個母子組織間的巨大衝突。母組織一度要脅撤廢子組織，並切斷經濟支援，但幾經協商談判，最後是Al Haber的被迫離去。這次

事件對「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年輕激進者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他們了解到「工業民主同盟」只不過是在利用他們而卻不信任他們。但進一步的，他們也體會出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團結，新舊兩代之間的遙遠距離，這個經驗使得他們開始更加為推進屬於自己的學生運動而努力。一九六二年八月，「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進入它的兄弟組織「全國學生協會」年會會場，〈休倫港文件〉普遍散發，並被熱烈討論。這個文件贏得了許多「全國學生協會」會員的支持，他們加入了「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來自德州大學的女生Vivian Franklin於看到這個文件後大為振奮，因而加入「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並成為該同盟中傑出的民權運動組織家。一九六二年秋季開學，全國各地學生索閱這份長達六十六頁密密麻麻的〈休倫港文件〉的要求更為增加，支持者亦更增。一九六三至六六年的幾年之間，這份文件不斷影印和印刷成小冊子售賣，總數約在十萬份之譜，成為六〇年代傳閱和分散得最為廣泛的左派文件。這份文件在導論中自稱是一個「新的開始」「根據我們自己的討論和教育，根據我們自己和社會的對話」，「以建立一個新的組織，以創造一個新的意識型態，以發展一種新的學生運動，和創造一個新的左派」。多年之後，Harold Taylor對此曾經作過這樣的評論：

這是美國政治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學生運動的團結一致是可能的，激進的學生運動已被形成，它已為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作了註腳。

第 7 章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 ——起跑的準備 (1962~1964)

我們站在一個和當今大多數學生與教授完全不同的傳統之上。我們認為，我們不能接受他們的分析觀點。我們需要一種對人類問題更基本，更有系統，更人性化的分析角度。我們了解到，現在的大學和學院並非如此。它們由於和既存體系的歷史性互惠關係，由於受到國際冷戰的影響。大學走的是一個相反的方向。基於此，我們體認到，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站立於現有傳統之外，站立在我們獨特的知識、經濟、和政治資產更高的上方。

——Paul Potter

〈休倫港文件〉之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首任主席 Al Haber 到安娜堡繼續他的研究所課程，而現任主席 Hyden 則到各大學「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分部四處訪問。這時，在南方的黑人民權運動已如火如荼的展開，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卻繼〈休倫港文件〉提出一些基本看法後，一直保持沈寂的狀態。因此，

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機事件時，儘管在康奈爾、密西根、德克薩斯、紐約州等各大學均有過遊行示威運動，但留守在「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總部的人，卻對此一事件沒有什麼政策，這使得「古巴危機事件」在學運上本來有極大的可發展性，因而平淡的過去。同樣的，哈佛大學教授休斯（H. Stuart Hughs）的參議員選舉運動雖然也吸引了許多學生，但它也在平淡中過去。

造成「學生民主社會同盟」起步的不順利，有著許多原因。最主要的是經費問題，它的母組織「工業民主同盟」在經費上不定期和不固定的支持，使得子組織「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初期所擬的許多計劃；例如在柏克萊設立一個「大學改革研究中心」，在密西根和紐約召開地區性會議，成立一個「南方政治研究中心」（CRISP）等，均歸予無有。不但如此，由於經費的不足，「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手冊也拖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才出來，但它一九六三年春天的手冊厚達七十餘頁，倒可能是有史以來學生運動刊物中最厚的一本。由於工作的未能開展，當時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秘書長Jim Monsonis，他曾是「全國基督教學生協會」（NSCF）以及「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的一員，乃被迫要到每一個設有分部的大學去聯絡，讓設有分部的九所大學的學生領袖們了解「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工作並未停頓下來。而這種工作異常艱難，既受制於金錢，也受制於時間，而且對幾個只有極少數會員的學校便難免疏忽，造成極大的抱怨。這時期的會員也沒有什麼特殊的開展，一九六三年一月只有四四七個繳會費的會員，春假前繳會費的會員只增至六百人。

除了金錢的因素外，根據「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報告，他們工作的推展也受到某些客觀因素的限制，舉例而言，許多大學

對它們的組織採取一種懷疑的態度，認為其中必有陰謀，因此，在波士頓大學、亨特大學，北德州州立大學，喬治亞州立大學等學校，它的會員都遭遇到麻煩。喬治亞州立大學「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會員Dayton Pruitt即說過他被校務人員約談，「校務人員警告說，共產黨不容許到我們學校來演講，如果我們要用我們的組織來掩護，他們就要採取適當的行動。」由此可見當時校園的管理習氣。

一九六二年聖誕節，在一片慘淡之氣中，「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安娜堡開會，卅五人參加，首任主席哈伯及他的未婚妻芭芭拉寫信給他們，譴責「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幾乎什麼事也沒做。」。在四天的會期中，變成討論這封信的專題會議。會後大家有了一種共同認識：「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必須重新出發。

一九六三年開學後，會務仍沒特殊開展，它們只由研究生Dick Flacks作了一項「和平研究及教育計劃」，這項和平研究所提的結論只不過是篇學術報告而已，反對核子試爆，反對軍備競賽等。在當時的氣候下，並不能吸引其他廣大的學生。尤其，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已使學生了解到國家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可能產生的危機，亟待重新檢討，而主張和平的候選人在選舉中全軍覆沒，也使他們對和平失去了信心。由於信心的失去，在一九六二年秋天曾盛極一時，約有四千到六千會員的「學生和平聯盟」(SPU)到了年底就已完全瓦解。在於這種情形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努力，即無法吸引學生，也產生不了作用。

在此時，南方的黑人民權運動正在開展中，北方大學的人力和財務支援正在南下，選民登記運動也在進行。北方大學成立了「北方學生運動協會」(NSM)來支持南方的民權運動組織「學

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經費，不過他們只募到三千美元左右，他們也為黑人區黑人進行教育工作。一九六三年，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在伯明罕的和平示威遊行曾使學生受到鼓舞，南方許多所大學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整個一九六三年，約有二萬名示威者被捕。

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會員在這一方面亦頗有可觀之處。Betty Garman Casey Hayden，Bob Zellner等人都是以個人身份參加了「學生非暴力委員會」、「學生民主同盟」史瓦茲摩爾大學的分部則加入了「政治行動俱樂部」——這是個在劍橋和契斯特組織黑人的團體。

這一期間，「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中頗值得注意的布拉吉（Robb Burlage），他畢業於德州大學，後來進哈佛研究所念經濟，稍後又暫時犧牲學業跑回南方加入民權運動。在一九六二至六三年間，他是東北部學生運動界的重要人物。

布拉吉在一九六二年秋季到一九六三年春季的這一期間，當東北部學生和平運動組織之漸幻滅時，開展了他的工作，將東北部主要的自由份子吸收進了「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其中有幾個以後是「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重要人物：如Todd Gitlin他是哈佛大學學生，和平運動領導人，後來成為「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主席；Richard Rothstein，他是「自由份子聯盟」領袖。

布拉吉此一期間主辦了兩次以「大學改革」為主題的研討會，第一次討論「社會變遷中學生的角色」，時間是一九六二年十月底，地點在哈佛大學。第二次討論會是翌年三月在布蘭地斯大學舉行。這兩次以大學改革為主題的討論會比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自由言論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整整早了兩年。

這兩次會議都是非常成功的會議，演講者及其演講題目分別有：

- 哈根 (Roger Hagan) 講「學生革命意識的重要性」。
- 戴諾爾 (Noel Day) 講「種族歧視」。
- 海頓 (Tom Hayden) 講「後意識型態社會的操縱」。
- 古德曼 (Paul Goodman) 講「大學之現況批判」。
- 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 講「學生的無力感」。

持平而論，上述的演講及討論，對當時正對和平運動失望，對美國前途憂慮的苦悶大學青年實是非常動人的題目，而這些題目亦相當是有刺激性。可以由當時里德大學一個大一學生布里赫 (Jeremy Brecher) 的觀感作代表：「我第一次參加『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會議，我發現它是我已經找了三年的東西，他們說的我全相信，它不像我以前曾見過的。它有著巨大的動力性——一種膨脹的感覺，動力性是我所能用的唯一字眼。另外，則是你會有一種突破感，『學生民主社會同盟』變成了一種群眾運動，它和校園更廣泛的團體有了聯繫，就像在一群準備不服從的人當中所說的。」

由布里赫所說的，大致已可看出，「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基本著眼點在激發學生的反抗意識，而這點對當時的校園而言，實屬一重大的突破。另一學生紐費德 (Jack Newfield) 則認為「他們是我會遇到的最好的政治人！」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至十七日，「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紐約松山 (Pine Hill) 附近一個夏令營區「古里佛營區 (Camp Gulliver) 召開年會，兩百多人參加，這次年會繼〈休倫港文件〉之後，通過了一項稱為〈美國和新時代〉的文件，這項文件又稱為

「休倫港之子」。〈美國和新時代〉文件與〈休倫港文件〉範圍內容都不同，〈休倫港文件〉相當的哲學性和理論性，而且也討論到國際形勢問題，而〈美國和新時代〉文件則以美國的政治經濟為重心。

〈美國和新時代〉文件中指出，美國已到了一個危機點，以往簡單的，為應付冷戰而有的模式已不足肆應，「美國的世紀」也已動搖。在國際上，美國已不能稱霸。一種新殖民型態已發生，共產世界也不再一元化，西歐正向美國權力挑戰。而在內部，貧窮問題是個不能忽略的污點，種族衝突的危機已到高峰，政府和企業間的曖昧勾結要注意，勞工的新聲音已逐漸增大，這些都是新時代美國的問題。

文件中又指出，為因應這種新危機，「一種新的不滿運動」應該形成。文件中說：「似乎已產生了一群人，他們의思想和行動愈來愈由於新時代的經驗而激進化。復次，這些人的激進意識也相當程度代表著他們對自己社會不滿的急迫要求。北方和南方黑人的日趨激進，中產階級的擁護和平運動，產業工人日增的焦慮，大學生疏離的加重。這些不滿對激進思想的發展實不啻為新的刺激，從而領導向一種反叛政治的尋求。」

稍後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主席吉特林(Todd Gitlin)說：「這篇文件是個轉捩點。」「沈寂的結構開始被打破。民權運動以及其他個別反叛運動，已使得戰後迄今的社會產生了大學外的新的權力重心，對此，知識份子可以參與進去。美國社會共識的打破，也使得知識份子和學生有了批判和參與的機會，美國自由派教育機構的行政和意識型態結構也被這些滲透了進去。」

這次大會，通過了〈美國和新時代〉文件之後，為了貫徹新

使命，並實施「參與民主」，特地通過修改組織章程。這個章程修改後有下面兩大特色：一、各地分會有相當程度自由活動的權力。二、加速「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領導權的轉移，以讓更年輕的大學生參與領導事務。

就歷史以及策略的觀念而言，這次章程的修改，固然貫徹了「參與民主」的需求，但它也為爾後的學生運動造成了很大的危機。許多甫進入大學不久的學生，就以激越的表現進入這個全國性學生運動組織之中，他們少不更事，沒有穩健的一步步漸進的發展觀念，且又初生之犢不畏虎，任意妄行，老一代學生運動領導者的理想被他們「為行動而行動」的偏執態度而淹沒，這可能可以在最後說明，為何自此次大會以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會員數以非常快的速度增加，而六〇年代尾聲，整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會走向更激越的路線。

這次大會後，吉特林成為主席；布斯 (Paul Booth) 仍任副主席；韋布 (Lee Webb)，剛從波士頓大學畢業，成為秘書長。一個朝向反叛的陣容排了出來。

一八七〇年時，蘇俄基輔大學有一學生艾克薩羅 (Pavel Axelrod)，他在蘇俄民粹主義下鄉運動的高潮時期，曾經說過這樣的名言：「想要為人民工作的人，必須放棄大學，放棄他的特權條件、家庭，甚至不再理會科學與藝術。所有使他與上層階級社會聯繫的條件，都必須斬斷，所有的關係都需拋棄。易言之，他必須整個改變他的內在本質，如此，他才能感到自己是人民中最低階層的一份子，不僅是意識型態上的，而是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上。」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一開始的時候，天真而熱情，且懷抱

著理想的美國大學生，大量的向南方移動，在北方亦進行許多如募款，消除貧窮計劃。當黑人社區義務家教，……等。他們的精神和蘇俄一個世紀前的「大學生下鄉運動」並無任何本質的不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此種狂潮下，也盡了他們的任務。舉例而言，它的首任主席就親身到了南方，它的許多會員都是「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的成員。然而不僅如此，它們有著另外的目標。

第二任主席海頓，他不主張使「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只成爲一個「思想的中心」。他說過：「我們可能需要的，是一種新的方式，把各方面看不見的反叛轉變成以逐個逐個社區爲基礎的『負責任的反叛政治』，根據各社區實際的需要來爲基礎。」

大致而言，初創期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是朝這個方向去發展的。海頓從事校園活動，布拉吉在南方，哈伯在北方，布斯管選舉政治。不過，他們所做的成績隨著會員的漸增，便顯得不夠，因而蓄勢欲待的等著新的突破。一九六三年的〈美國和新時代〉文件開啓了一個新的、行動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時代。「新的反叛」(new insurgency) 開始形成。

這種「新的反叛」內容是：

新的反叛是街坊鄰居以及社區民眾不同政治活動的主動觸媒，在地方上，新的反叛包括群眾的直接行動，以及黑人的選民登記運動，政治改革運動，和平政治行動，協助低階層青年的家教運動，討論團體，分析和報導地方政經條件的期刊等，以開始在壓迫地區和都市貧民窟的有組織抗議，並將未加入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使改革的政治團體及候選人

集中討論與都市窮人有關的問題，使貧民窟的居住者直接從事政治活動。……這種政治反叛，是民粹主義者的自由派之復活。將會改變美國現況下的優先順序，將改寫美國的歷史。

有了這種反叛的觀念，一九六三年起，「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大學生們愈來愈對大學不滿，認為「大學是個囚籠」。他們由「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的經驗，全心的希望於民權運動的開展。「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的民權運動者到各黑人社區工作，很受歡迎，他們也對黑人的友誼、善良、寬恕等德性心儀，一切似乎都很樂觀。「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他們簡單的衣著式樣和他們的言談舉止，在各大學成為時髦的崇敬對象。

就在這時，學生們又學習到一種新的經濟分析方法。這種經濟分析方法最早是一九六三年六月紐約的一項討論會所提出的。他們因此而成立了一個「全國充分就業委員會」，由紐約的激進青年、後來成為美國著名思想家的阿隆羅維茨 (Stanley Aronowitz) 負責。根據他們的分析結果是到一九七〇年，美國將會有一千一百萬人失業，而窮人無疑的將是最大的受害者。這種觀念使得他們更加關切都市的窮人。

而與此同時，學生們眼看到美國右傾的種族歧視主義此時已有抬頭的傾向，最明顯的是高華德和「約翰布區社」(John Birch Society)的興起。他們認為，要防止右傾的種族歧視主義壯大，最有效的方法是喚醒都市的貧窮白人。

一九六三年夏天，組織窮人和失業者的構想成型。它以「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為基礎，各大學學生為基幹，同年八月，「聯合汽車工人工會」(UAW) 捐了五千美元。這時候，由於卡

米加爾等黑人領袖已提出「我們做我們自己的事，你們白人做白人的事」的口號。因此，這項組織貧窮白人和失業者的計劃乃以白人為主，計劃的名稱是「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ERAP)。不過，這項計劃推動得很糟糕。到了六三年十二月，錢已用了一半，在芝加哥和安娜堡的工作毫無進展，參與者的報告中說：「我們不能把我們的構想說清楚」，「我們沒有經驗」……等。

「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原預定工作地點是芝加哥和安娜堡，在那裏沒有成就。而非常意外的，在非計劃地區的契斯特 (Chester) 卻頗有成就。

契斯特是個沒落的地區，人口六萬多，百分之四十為黑人，離當地三哩處就是史瓦茲摩學院，這個學院有著「老輝格黨」的傳統，是一種自由主義左派的觀點。學院有三十至五十個激進的學生，分屬「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或該校的「政治行動社」。他們之中的多人曾參加一九六三年春天劍橋的黑人運動，他們願意作更多的投入，同年十一月四日至十四日，他們和地區人士舉行一連串示威遊行，被捕五十七個學生，這是北方首次最大事件，其後兩個月，當地社區成立了三個社區團體作為呼應。「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經濟研究與行動計劃」的構想在此地獲得意外的實現。這項經驗使他們認為，白人可以和黑人合作來動員一個社區，這種行動計劃可以不必限制在就業這一項，可以針對所有的黑白窮人。根據這個構想，「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研究了一項新的計劃——「窮人的種族間運動計劃」，這個計劃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大會上提了出來。這次大會在紐約召開，約七十人參加。這次會議確定了一個原則：民權運動、反貧窮運動、反軍備擴張運動等，都可以集中到以「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這一個以新的反叛為主

體的社區運動上。他們並開始把「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型構成一個政治團體。這時，時間已進入到一九六四年，這時它的會員已增至一千五百人。

「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繼續在芝加哥推動，它的焦點已從上次的青年轉移到所有失業者，且獲得若干地區工會的支持，但工作成果仍然不好。最後他們在此舉行了一次示威，只有廿五個人參加。

而在此時，對於此項計劃，「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內部有了意見，這項意見之爭一九六三年底就已發生。爭執的焦點是「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究竟有多重要。這項爭論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夏季大會中分成三派：

一派是「改革派」：包括Steve Max，Jim Williams等人，他們關切選舉行動和政治改革，最小派。

一派是「校園組織派」，以Dick Flacks，Clark Kissinger等人為主，第二大派。

一派是「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派」，它主要由史瓦茲摩學院的人為班底，是最大派。

這次夏季大會，每派都提出一篇文件，但都被否決，爲了向「改革派」妥協，除了「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外，另通過了一項「政治教育計劃」(PEP)，作爲補償。「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團體性在這次會議中完全沒有顯示出來。選舉主席等領導人時也一樣發生派系問題。最後由Paul Potter當選主席，他屬「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派」，但非核心份子。副主席則由德州大學學生Jeffrey Shero當選，計劃派的人被排斥。

由這次會議，已可看出「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有了分裂。「改

革派」已不再是它的重要份子，它們已不再關切這方面的事，是個組織傾向於支持最激進的社區「反叛政治」。

「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派」在一九六四年六月開始了六天的訓練，然後在巴鐵摩爾、波士頓、契斯特、芝加哥、克里夫蘭、肯塔基州的哈札、路錫維爾、紐瓦克、菲拉達菲亞、崔頓等十個地方推出了十個計劃。他們陸續募到二萬美元左右經費來推動這項「新的反叛政治」計劃，動員了一百廿五人左右。

就在這種以美國國內問題為焦點的派系爭奪中，美國六〇年代最重要的反越戰運動卻已開始了。

美國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中的首次反越戰示威運動是一九六三年九月在密西根舉行的，由密西根大學的VOICE政治團體主導，獲得了「學生和平聯盟」(Student Peace Union) 的支持，它要求美國的撤出越戰，並指責越戰的使用化學作戰武器，浪費美國人稅捐，以及越南政府的腐敗。

對於反戰示威，「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有兩派意見，一派贊成，一派反對，反對者的意見是國內問題比國際問題重要，兩派意見最後歸納為一——在一九六三年十月舉行了一次華盛頓反戰遊行，這次遊行示威有兩名會員被捕。接著，反戰遊行迅速蔓延，密西根遊行有四百人參加，威斯康辛也四百人參加，德州大學有一次要求退出越戰的一百七十人簽名請願運動，……等。

接著，一九六四年三月，耶魯大學學生開會，決定加入反越戰行列，會中他們決定五月進行一次大示威，並決定成立一個全國執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進步勞工運動」(Progressive Labor Movement) 的份子組成，他們的示威於五月二日開始，紐約的一千多個學生前往聯合國示威。接著，在波士頓、舊金山、

威斯康辛麥迪遜也都有了反戰抗議活動。這一連串反戰示威，使得「進步勞工運動組織」成立了一個「五月二日運動組織」(M2M)，專門從事反戰和反美國帝國主義運動，它的主席是哈弗佛特大學(Haverford)的學生史鐵特勒(Russell Stetler)。接著「進步勞工運動組織」於同時改組成立「進步勞工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他們並推動了一項「學生往古巴訪問的行動計劃」。同時，柏克萊加州大學也開始了他們的「自由言論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

而在這時，阿拉巴馬州伯明罕浸信會教堂發生四個黑人小女孩於一九六三年九月被炸死的事件，黑人民權運動逐漸走向更加積極的道路，黑人和警察，以及種族歧視份子的衝突增大，同年十一月甘迺迪被刺，美國派往越南的兵員漸增，到了一九六四年六月發生密西西比三個「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南下學生被殺。這已將黑人民權運動更推向高峰，反戰運動也漸至茁大的地步。而在此時，密西西比州受「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支持的「密西西比民主自由黨」(MFDP)在大西洋市的民主黨大會的妥協，使得民權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痛心疾首，這些事件都是歷史性的關鍵事件，它們的湊合於一九六三年底至一九六四年中的發生，都有著脈絡一貫的歷史與現實條件，由之，一個逐漸走向高峰的學生運動時代開始成型了。

在此，我們有必要將「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中「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派」(簡稱ERA Pers)從一九六四年夏天開始的十個計劃作一探討。

一九六四年夏天起在前述十個地方推動的十個計劃，一開始就不像他們在契斯特地方推行的那麼順利，他們因應各地實情，

機動變化它的作法，效果仍不理想。一九六五年春天，「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華盛頓舉行反戰遊行很成功，使得許多人對「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派」決定將他們的計劃復活。他們最先擬推行十三個計劃，後來減為九個，再減為七個，最後減成五個，分別是在巴鐵摩爾、克里夫蘭、芝加哥、紐瓦克、奧克蘭等地。但因以往的失敗，許多人失去信心，或者返回學校，或者從事反戰運動。一九六五年夏天，整個全盤計劃宣布失敗，他們才承認，他們的工作和一個世紀前蘇俄民粹主義者的「青年下鄉運動」一樣，都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因為，人民比他們設想的難以組織起來。他們認為有必要採取更激進的衝突性方法才能造成實質的社會改變。而分析起來，「計劃派」之所以失敗，原因有三：

一、「計劃派」的人永不能拋棄他們中產階級的信仰以及由於此種信仰所造成的心理時期。他們認為所有的窮人對他們的貧窮一家都是很憤怒的，因此他們應該可以很容易的組織起來，在任何題目上爭取他們的權益。然而，無論就人性或歷史之實證經驗，這種估計都是太樂觀的。復次，「計劃派」的學生均普遍有很強的贖罪感，但這種贖罪感太強，反而使他們不能正常而有效的開展工作，也不易受到窮人的信任。

二、「計劃派」不能從根本問題著眼，來考慮國家體制的改變問題，因此他們所注意的如社區、社會福利等，並非他們所謂的「改變體系」，不過是針對「寄生結構」所作的主張而已。由於如此，他們的計劃並不能使人民受到實際的益處。

三、「計劃派」永不能脫出這樣的事實！窮人只在找領導者，而不是要自己領導來成為改變美國社會的媒介，他們不易成為反叛者。這似乎已成了一種真理：在社會中愈貧窮的人反倒常常會

成爲壓迫者最堅強的依賴者和擁護者。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從民權運動開始，就有許許多多，超過千人以上的大學生，以「青年下鄉」的方式參與各種改革事務，南方的小鎮，阿帕拉契山區，北方逐漸凋萎的都市，城市的貧民窟，都有這些大學青年的足跡，他們的努力事實上並沒有產生很大的效果。在這種下鄉的潮流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目的在於組織社區的貧民和失業者，使他們能爲自己的權益而採取行動的作法，其命運和其他下鄉青年相同，最後只使他們對現況更加不滿，更加的認爲必須採取更有效、更直接的衝突行動才能改變社會。這種歷史軌跡，重覆了俄國民粹派青年的經驗——當青年下鄉運動失敗後，尾隨之後的一定是更激進青年核心組織，更冒險作法的產生。

一名鄉下學生Richie Rothstein說：

參與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的學生們，現在都成了資本主義福利國家觀念的敵人。我們不再對現行體制內自由勞工經由它們的合作與反對的聯合抱有任何希望。我們認爲自由勞工力量以及它們所擁護的政策，和國際政策的不干涉主義是不相容的。他們只不過是欺騙美國人民的人性和尊嚴的騙具而已。我們由四年的下鄉經驗，得到了這樣的結論。

許多參與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的學生，開始回到大學校園領導大學的改革和反越戰抗議運動。由於行動計劃的經驗，他們加強了激進的脈搏。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中所強調的民主和參與，使得它對新的運動產生有很大的貢獻。



第 8 章

自由言論運動和反戰運動——從和平到衝突

我們現在在這裏。我們的信仰和全世界所有國家，所有年齡，那些要把劍變成耕犁，要把戰爭終止的人民一樣。我們在這裏，是為了全世界數百萬哀號的男男女女。美國到底作了些什麼罪孽？我們在這裏，是為了沙特；也是為了八千哩外，那些復活節和逾越節對他們只是死亡而非生存的人民。我們在這裏，是為了那些像我們自己一樣，三度為他們國家獨立奮戰的英勇人民。我們在這裏，也是為了美國的士兵，他們不明瞭這個使他們死亡的戰爭的意義。另外，我們在這裏，是為了那些他們生存的土地已被我們變了烈焰飛騰的爐灶的婦孺，他們看著畫片和海報上的我們，喃喃的問著：為什麼？

——Staughton Lynd，耶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一九六五年春，白宮前反戰示威遊行總指揮

總結而言，六〇年代起源於民權運動的美國學生運動，它發

展的程序可以說是亦步亦趨的跟隨著黑人運動的。早在學生運動尚未與警察起衝突之前，南方就早已有了多次規模浩大的黑人和警察的衝突事件。這些衝突的經驗對從北方南下的學生是很好的洗禮。復次，黑人民權運動所採取的種種抗議策略，諸如靜坐示威、遊行示威、監察隊、社區動員、上訪運動等，對這些學生青年也是策略的實際訓練班。因此，當一九六四年起，黑人在南方的運動已發展到如火如荼，已經喊出「再見！自由主義」的時候，北方的情況也有了改變。

這個時候的北方大學青年，他們已遭遇到兩重挫折，一重挫折是南方黑人所給他們的。南方黑人民權運動由於不斷的遭到壓抑，激進的黑人青年已決定採取更激進的行動方式，他們已不再願意和白人學生結成聯盟；卡米加爾這位黑人運動領袖已要求白人學生自己去改變自己的社會，讓黑人作他們自己當做的。另一重挫折則是他們的南下運動以及北方下鄉運動，在這種運動中，不以由「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為代表，他們在貧民區、凋萎的城市、黑人社區的工作都非常的艱巨而困難，他們所構想的，有一點「社區式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新反叛政治，似乎在實際的推動上頗為社區民衆排拒。他們的失敗再次驗證了一世紀前民粹派在俄國的失敗。

這種失敗在群眾運動的理論上是很清楚的。任何不是組織與力量強大到可以席捲整個社區的外來組織家和行動家，他們想要動員一個社區，不但在實力上，在人際關係上也都是不可能的。一個有效的群眾運動的開展，必須整個社會中，每一單獨社團或社區中都有幹練熱情的行動家。在他們自己的生活範圍內去作努力，如此始克造成席捲整個社會，從而使它改造的力量。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自它的中期開始（便走向了這樣的方向，學生們終於回頭，他們找到了他們自己的生活社區——校園。於是一個以校園為中心，以各種不同運動為表現方式的校園運動便開始了。由於前一階段的運動經驗累積，校園運動一開始就頗為壯觀。）

就在「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由於「經濟研究和行動計劃」失敗，接著內部又有了意見紛爭的時候，另一個新的，校園為某地的新運動已經開始了。它的第一個戰場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的柏克萊加州大學禁止校內有校外式政治活動的命令。這個命令到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被廢止）。

在這兩項命令中間的這一段時間，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學生們和學校當局不斷對抗，他們曾包圍一部要抓走一個學生的警車達卅二小時之久，它們成功的將南方靜坐抗議的行動三次帶進校園，第一次二百人，第二次四百人，第三次一千人。在一連串的抗爭事件中，加州大學也是首次一所著名大學被警察進入的，警察亦逮捕了八百一十四名學生。參加校園運動的，有大學生，研究生和教職員，它開始了一個校園運動的時代。柏克萊加州大學校長克爾（Clark Kerr）說：「這種最壞的事情，我仍舊不知道我們將如何的處理。」

事實亦正如此，五〇至六〇年代這一期間的美國大學，尤其是著名的常春藤盟校，他們的整個學校體制已與整個統治美國的政客、財閥、軍事特務力量作了最強而有力的勾結，學校不但已成了飄浮在社會主流勢力的大海中成了小島，尤其重要的是它因為和既有勢力的緊密關係，使得它已不再成為促進進步的力量，反而成了向後退，替保守勢力張目的堡壘，這種情況使得學校當

局對學生出之以一種專橫的教諭式的態度，而且又不斷的犯錯誤。校園運動便利用了學校當局的這種錯誤而一再成長，一群有能力，熱情，以一種愉快心情來作弄學校，爭取權益的學運領袖便應運而生，他們一步步的走向政治性的衝突。柏克萊加州大學點起了第一盞燈，接著逐漸照亮了其他的學校。

柏克萊加州大學為校園運動的第一站，它的運動，由於自由言論而起，故稱為「自由言論運動」(FSM)。「自由言論運動」的開始，表面上乃是在於反對學校當局對政治活動所加的限制，但仔細分析則應非如此。學校當局對校內政治活動的限制，相對於當時大家關切的問題，實在是一個非常微小的問題，受到不便的學生也非常少，它不致於引起兩萬七千名學生的憤怒。亦有人認為，「自由言論運動」的爆發是因為加州大學這種「多元大學」太過龐大以致於有了非人性化的特徵，因而使得學生反對。但是，這種廣泛被大家認為的解釋並不一定正確。所謂的「多元大學」(multiversity)的觀念事實上乃是自由主義小知識份子意欲藉著體制上的解釋來掩蓋住問題真正癥結的心態的反應。同時它在當時也有一種策略上的意義，也就是說，其他學校的行政當局意圖用這種解釋來避免校園騷動在他們的學校發生。他們心裏想說的話是：「因為柏克萊加州大學太過龐大，是一個多元大學，因此他們的學生才會騷動，我們的學校並非如此，因此你們不要學加州大學。」

另外，據實證的研究也不支持所謂「多元大學」的解釋觀點。加州大學社會學家索瑪斯 (Robert Somers) 曾作過調查，學生對教育並沒有什麼不滿意。另外的研究亦顯示，參加「自由言論運動」的學生中，百分之四十九是轉校生，他們都是慕名而來的，

希望有更好的被教機會。

基於此，「自由言論運動」的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興起，真正的解釋應該是很簡單的：學生們有著想要講什麼的衝動，他們想要爲自己生活的社會做些甚麼，整個社會使他們感到無用，剝削、罪惡，父親式的專橫等。尤其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加州大學學生在灣區 (Bay Area) 從事民權運動的抗議遊行，有一千三百多人被捕，再加上此次事件後已造成當地右翼勢力的抬頭，這股勢力以諾蘭 (William Knowland) 和他的「奧克蘭論壇報」爲主，他們強壓學校當局要制止學生的政治活動。結果學校屈服，但學生不屈服，於是「自由言論運動」因而爆發。把「自由言論運動」期間，學生經由行動的理解，發現到大學當局只不過是個附庸，只對大學當局提出要求是沒有用的。他們也發現甚至警察，報紙等都不是能維持社會正義的力量，而這問題並不在這些個別的機構或人物上，而是在整個體系上。席利教授 (Prof. John R. Seeley) 從事件一開始就是同情者，他有過下列觀點：

現在他們所攻擊的並非柏克萊加州大學，甚至於也不是加州大學全部九個分校，他們根本不是針對美國的大學，而是針對美國的生活方式，是這種生活方式的核心而非它的外圍。當學生們舉著標語牌，上寫「不屈服，不放棄，不鬆懈，不中止！」「我們不是加州大學評議員的財產！」，雖然這時候他們自認是在對地區性的機構作戰，而他們事實則是對整個國家自己以及整個國家和世界提出種種問題、解答和行動。

對於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校園學生運動，賽爾（Kirkpatrick Sale）有過很中肯的評價。他指出，這次運動，從頭到尾沒有過份野性的手段，除了警察處理這事稍涉不當外，整個事件都是在和平下進行。它是一九三〇年以後，歷經了卅多年才有的一次最大規模的校園事件。這次事件對所謂的「美國之夢」——完美的後意識型態政府，私人企業，學術、電腦、管理技術、腦和金錢等，乃是一個幻滅。「新的一代不但不要這種美國之夢，他們甚至攻擊它，攻擊它的信仰和假設。因此，柏克萊的衝突事件是一個新的訊號，一個新的世代已經誕生。美國對它生養的後代並不喜歡。」

由於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自由言論運動」在整個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中有著啓發和示範性的意義，在此，特將加大世界著名政治社會學教授孔浩塞（William Kornhauser）對這一運動的探討附入，藉窺全豹。

一九六四年秋，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學生發動一系列群眾抗議。遊行示威在起初是反應新的管理限制學校政治活動，但是很快就變成一般要求大學當局給學生更多的自由。以古典的政治術語而言，學生認為這是自由對高壓權威的問題，管理人員認為這是混亂對秩序的問題。學生與管理人員相互敵對，一方面從事於和平抵抗，另一方面訴諸政策行動。在教職員堅持學生的政治自由與有規則的辦法之後才得到解決。

加州大學禁止使用大學設備支持或主張校外政治或社會措施，企圖保持一種政治中立的政策，已歷許多年代。甚至

不能邀請美國總統候選人到學校去發表政治演講，不准學生組織團體利用學校場地或其他設備支持全國性或地方性選舉當中對立的候選人或問題。

一九五八年克爾 (Clark Kerr) 擔任本校校長以後，放寬了上述禁令，建立一種「論壇開放」政策。在這種新規定之下有機會聽取所有的觀點，但是不准學生團體有所「主張」。

自從一九六一年以來，學生們利用柏克萊校園大門的一塊地方主張特殊問題，多半是擺幾張桌子展覽文學和收錢。該校把這個地區視為校外，因此准許學生向市政當局備案，准他們擺桌子。事實上財產權屬於該校。

一九六四年夏天，柏克萊分校當局決定為校園大門的活動負起責任，九月十六日學監通知各種學生組織不得再在該處從事政治主張，而且要把桌子搬走。第二天，十八個學生組織的代表，包括民權團體、馬克斯俱樂部、民主共和俱樂部在內，組織了一個聯合陣線。他們開始和學監談判，希望收回成命。

管理當局雖然作了若干讓步，但對主要問題堅不允其所請。談判破裂之時，學生們訴諸不合作與集體抗議，造成一個自由言論運動，宗旨為政治言論與行為的充分自由。不合作的形式包括：(一)違背校規，擺設政治桌子，舉行群眾大會，(二)在行政大樓裏面，同時圍著警車，作示威性的靜坐抗議，(三)學生罷課。

九月三十日，該校校規遭受違背，八名學生因此受到傳詢，五百個學生在晚上作靜坐抗議；半夜時分，該分校校長宣佈八名學生應予停學處分。十月一日有一個學生在大操場

上擺了一張民權桌子。在他拒絕離開那張桌子之時，一位警官由該校兩位行政管理人員代表陪同，把他逮捕，說他擾亂秩序。他像民權示威份子那樣無精打彩的走著，一輛警車開到大操場去準備把他載走。當時是中午十二點鐘左右，有一百多個來得比較早的學生，本來是想參加預定的群眾大會，此時目擊這種情形，便圍著警車坐下。自由言論運動的領袖沙悟 (Mario Savio) 站在警車上呼籲參加群眾大會的人參加示威。示威的學生把那輛車子圍得無法動彈長達三十二個小時之久，直到十月二日，本校校長最後才同意和學生領袖及教授團調解人談判。經過兩小時談判之後，雖然達成協議，但是已有七千多個學生與旁觀者圍住警車，還有五百名警察站在旁邊。

① 該項協議要求不處罰那個因擺民權桌子而被捕的學生 (在示威當中，他一直留在車內) ② 一個教授團委員會聽取八名學生停學報告，③ 一個教授團學生聯合委員會協商政治活動辦法。

十月及十一月仍然呈現僵持之局面，該校評議員放寬校規，聲明可以利用該校設備在社區內組織「合法的」而非「非法的」行動。可是學生實踐主義者不接受此種聲明，他們認為禁止主張行動是威脅民權運動的和平抵抗戰術。十一月二十八日該分校校長處分沙悟及自由言論運動的其他三位領袖，因其參與警車示威。因為協議結束示威，所以認為此種處分之措施欠當。

結果造成十二月二日的集體靜坐抗議，一千多個學生把行政大樓的四層樓都塞滿了。當晚州長出面干涉，六百多名

警察逮捕了八百多個學生，其中大半有氣無力，只得把他們抬出行政大樓。該校研究生與助教領導學生罷課，直到十二月八日教授團會議為止。此前一日，本校校長克爾與各系主任在希臘戲院召開全校性會議，致力於結束罷課，但未成功，因其所提解決辦法並未針對言論自由的主題，學生不願接受。此次會議因沙悟突然在講臺上出現而由警察把他趕走遂告結束。

在十月及十一月，教授團都有相當的活動；十月十三日，學術評議會以大多數通過一個建議，贊成「政治活動之最大自由」。十二月八日，柏克萊舉行空前最大的教授團會議，辯論三個小時，以八百二十四票對一百一十五票表決要求言論與主張之充分自由。該校並不是要管制言論之內容，而只管制言論之「時間、地點及態度」。自由言論運動向教授團之決議喝采，尤其喝采此種決議之反對禁止「非法」的主張而結束罷課。

十二月十八日該校評議員們說，他們的政策「並不企圖在憲法增訂第一條與第十四條範圍之外限制言論之主張與內容。」這種聲明被認為是接受教授團的見解，兩個星期以後，評議員們聘任一位新校長出掌柏克萊分校，他迅速的根據十二月八日教授團的決議，宣佈校園政治活動的新規定。

早在自由言論運動以前，校園政治活動規定就有衝突。例如一九六一年，一個學生政黨競選學生自治會主席，因違背校規而被勒令停止活動。一九六四年秋天的爭論何以造成一種衝突，超過該校也許美國任何大學以前的爭端，可以提出四個理由：（一）該校爭論的歷史業已形成學生實踐主義者

日積月累的牢騷。(二)變更校園政治活動的限制鼓勵學生追求更大的自由。(三)九月份該校新的限制，事先並無警告或協商，而且正值總統競選活動期中，又在一種日益好戰的民權運動已於是年春天作過兩次集體靜坐抗議的地區。(四)新的禁令同時打擊所有政治團體，為共同致力於反對該校政策鋪路。

柏克萊抗議的特性為其好戰的直探行動。以學校當局而言，為其使用警察行為對付學生抗戰。這種衝突自始就是一種對抗而非一種比較正常的政治爭端。言論自由運動的目標並不急進，學校當局並不反動，因此手段的性質並不遵循目的的性質。然而自由言論運動聲言學生抗議的正常途徑已遭封閉，除了和平抵抗之外別無選擇。學校當局否認這一點，辯護其警察行為與嚴格的學生紀律，其理由為面對直接的行動，通常的反應有所不足。

雙方都認為只有一方可操勝算，不得不攤牌。關於這一點，這種衝突類似一種古典的革命情況，社會力量的各走極端破壞了溫和主義者的規則與作風，因為這種人物想在一個共同的組織裏面尋求談判與容納衝突。在一種高度極化的情況當中，雙方都訴諸可以動用的一切力量資源。言論自由運動為了抵制學校當局的力量，起先企圖動員學生，然後博得教授團的支持，說服數以百計與以千計的學生和該運動的手段與目的聯合一致。學校當局的力量證明對於數以千計的學生一致的行動沒有作用。學校當局面對失去人心，只好出此下策，使用武力，這更破壞了學校當局的威信，助長了教授團堅定的立場：雖不贊成自由言論運動的手段，但是贊成其

目的。

自由言論運動是成功的，因為得到學生的廣泛支持。約有三千四百個學生參加下列一兩個插曲：十月警車事件或十二月校部大樓靜坐抗議。約有四千八百個學生在十二月的罷課期中主動擔任糾察工作，有五千六百個學生拒絕上課以支持罷課，約有三千五百個學生主動反對罷課，其餘的一萬二千個學生並不扮演主動的角色。

學生意見調查顯示根本不信賴學校當局影響學生權利與需要的事情。這種感覺並未伸展到疑惑教職員，亦非對於其教育的素質表示不滿。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及一九六六年的調查顯示五分之四以上的學生對於其課程與教授都表示滿意，自由言論運動的支持者與非支持者在這些方面都表示滿意。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學生表示不信賴學校當局，這些學生最可能支持自由言論運動。普遍認為學校當局對於和學生協商大學政策不感興趣，那些對於這一點最敏感的學生可能支持該運動。一九六〇與一九六一年的調查顯示在有該運動以前，學生們就有類似的態度。比較早的不信賴的氣氛為該運動鋪了路，並不只是言論自由爭端的結果。

不信賴學校當局與支持該運動的學生可能多於那些「六不」學生：(一)對於美國黑人民權之拒絕，感覺並不強烈。(二)並不反對美國對越南的政策。(三)並不自認為是自由的民主人士。(四)並不主修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五)學業成績並不在水準線以上。(六)並不出身於自由的家庭。

該運動的實踐主義者與支持者雖然擁護自由的價值，但是對於父母、政治家、大學行政人員及教授的自由主義都很

吹毛求疵。攻擊偽善形成學生批評大學當局的一大主題。認為學校不誠實與美國社會未能在其對待黑人的當中實踐其理想。

研究革命的一個主題是自然對陰謀。若干報紙、政治家、甚至該校若干人士都攻擊自由言論運動是一種陰謀。這種攻擊部份是致力於破壞該運動的主張，因其為學生說話，但是多少有點表示真正驚訝該運動的聲勢相當浩大。該校行政人員幾乎始終都低估了學生的反應，一直表現未能了解學生的情緒與決心。

民權運動是對於自由言論運動之領導與組織的主要影響。領袖人物以及許多實踐主義者在直接反對頑抗的當局期中，例如一九六四年春天舊金山的靜坐抗議與是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州，都已得到直接的經驗。而且該運動的許多鬥士代表「新左派」，對於問題比對於意識形態要感到興趣（其行動比較側重直接的目的而不太側重長期的戰略，）比較關切道德的呼籲而不太關切政治的組織。

雖然強調自然而不強調計劃，起先還是有該校各種政治團體代表的組織，後來這些政治團體加上其他學生的特別團體選出一個幹事會。該會在危機時期幾乎不斷開會，為自由言論運動作了許多重大的決定。群眾會議也作了或批准了許多決定，包括在該校大操場召開中午大會。但是作這些決定傾向於由口頭表決而未經過辯論與討論。該運動的許多實踐主義者雖然害怕領導與組織以及受到重視的個人參加與自然，但是他們發現領導與組織是不可缺少的東西。

自由言論運動是一種反動的運動而非一種戰略的組織。

學生們的每個重大措施都是針對學校當局的先發制人：原來的禁止、八個學生停學、處分四個領袖人物。

該運動的力量是基於團結而非基於組織，這種團結聯合了許多學生，因為他們認為學校當局「極欲抓到」該運動的少數領袖，學校當局並不認為該運動是一本正經的表現學生的情緒。學校當局因拒絕處理自由言論運動而激怒了學生。學校當局徵詢學生自治會的意見，該會有欠合法，因為普遍認為該會是學校當局的股肱，一九六六年調查發現只有百分之十八的學生認為該會有效。

該運動實際達到了初期的目的，把組織解散了。雖然仍有更多的學生示威，但是沒有表現該運動的團結。

學校當局有時不知道自由言論運動是否是一種自然的運動或一種陰謀，但是該運動攻擊學校當局是加里福尼亞州海灣地區「權力結構」陰謀的一部份，想打倒民權運動。不過該運動的信仰與學校當局的恐懼都沒有很多證據。（學校當局的作為出於懦弱者多，出於堅強者少；出於預料外界壓力者多，出於「權力結構」的要求者少；出於關心維護其權威者多，出於關心任何政治利益者少。）

學校當局和其他複雜的大組織一樣，是許多授權階層的一種制度。加里福尼亞大學特別複雜，因其是九個校園的一種全州性系統，柏克萊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全州性的該校當局由評議會、校長及其若干幕僚所組成。分校校長為每個校園的行政首長，他的下面有副校長及院長。

在柏克萊校園，發生這個問題，由院長報告分校校長轉呈本校校長及評議員，最後呈報州長。此外，報紙、電視臺、

州議員以及有組織的和非正式社區團體都涉及此種爭執。此種爭執超出大學的範圍，使該校牽涉到州的政治問題。蓋解聘本校校長克爾，係在一九六六年雷根當選州長之後，部份由於自由言論運動示威。結果柏克萊行政當局辦事都憂慮學校行政系統的影響，至少要呈報評議會。因此本校校長掌握主動，例如十月談判與獲致協議之簽署，以結束包圍警車之靜坐抗議。

行政管理人員被封鎖在一種權威階級之內，結果傾向於疏遠學生。實際上該分校校長石曲朗 (Strong) 直接對示威學生說話唯一的一次是十二月三日凌晨三時，他宣佈學生們如不離開校部大樓，就會被捕。本校校長克爾直接對學生說話唯一的一次是十二月七日在希臘戲院。

在一種大規模的官僚政治與一種群眾運動之間的對抗產生了思想與行為模式一種顯著的不調和。雙方彼此誤解，認為對方堅如磐石，其實雙方都很脆弱，往往混亂不堪。一般說來，因為一種全州性的制度迅速成長而產生的大學行政管理官僚化，減少其與學生之間的意見溝通，因而削弱其了解學生新的情緒與作風之能力。

教授團雖為該校之核心，但其組織與文化均未使其居於領導地位。所以這是一種變態：在對抗的初期，教授團沒有力量，只在最後解決危機之際才擔任一種決定性的角色。

該校教授團約有教授一千五百人，一方面透過擔任助教及講師的研究生與學生團體合併，另一方面透過擔任院長及其他職務的教授與學校當局合併，有它自己的立場，但因特殊化與專業化而變得模糊不清。尤其是在像柏克萊這種居於

領導地位的州立大學，許多教授發現自己主要是和自己致用的專長而非和大學提攜。比較著名的教授可能最少涉及教育機構或學生。由於教授團缺乏此種牽涉，故在學生與學校當局對抗之際，教授團並未顯著的參加其間。

教授們的小團體自始就扮演一種角色，有些是自由言論運動的支持者，有些是學校當局的顧問，少數是居於中立的斡旋者。然而調解逐漸變得困難與無效，而且衝突的極化迫使教授團尋求其本身的解決。尋求此種解決自始就是依照傳統的個人自由主義路線：學生最大的政治活動自由與大學的正常功能一致。教授團最困難的問題是在校園使用直接的行動。和平抵抗的不安傾向於為大量使用警力造成普遍的恐怖所抵消。結果教授團團結起來，形成學術評議會的一個正式團體，決定其立場，站在自由言論運動的目標那一邊，即對學生在校的政治活動盡量放寬限制。但也贊成井井有條的辦法，因此後來致力於支持學校當局以推行自由化的校規。

學生示威之結果

- (一)柏克萊衝突的具體結果為校園政治活動的自由化校規。在這種新校規之下，已有相當的政治活動，發生了更進一步的對抗、抵抗、停學和警察行為。
- (二)發展出擬訂學生政治活動規則的新方式，包括學生逐漸參與擬訂規則的制式辦法。
- (三)擬訂新辦法以處分違犯校園政治活動規則的學生，更注意到適當處理的原則。
- (四)柏克萊成立一個教授團委員會，調查大學教育所需之

改革，其報告導致許多革新以改進大學教育。

(五)柏克萊變成學生好戰的典型，其他大學的學生抗議證明了柏克萊事件的影響。

對於正處於低潮時期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自由言論運動」的發生，使得具有警覺性的秘書長季辛格 (Clark Kissinger) 立即有了反應。他在「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通訊裏加強報導這一運動，並和這一運動的領導者和策略家魏斯曼 (Steve Weissman) 接觸，邀請他到年會中報告。對「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領導者們，「自由言論運動」給了他們一個從「下鄉運動」以來的一個新方向，學生的能力所能影響的是校園，只有在這裏才能發揮學生的權力。這一體認使得「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有了新的方向，也使它能和這股新起的學生運動潮流立即搭上線，並進而加以領導。首先，他們領導的便是反越戰運動。

反越戰運動早在一九六三年就已開始，首次是一九六三年的十二月，前已談及。稍後，一九六四年四月在芝加哥發起了「五月二日運動」，這個由「進步勞工黨」領導的反戰運動一直進行了整個夏天，到了十一月七日，他們又發起了「我們不要去」運動 (We Won't Go)，他們找了許多大學及高中男生簽署「我們不要去」的陳情函件，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作法。可是，或許當時這種作法仍被認為太極端，或許因為「進步勞工黨」只有兩百多人，它的影響力還比不上一所學院，因此它的主張儘管比稍後的「焚燒徵兵令運動」早了將近一年，卻沒有什麼影響力。

對於反戰運動，由於「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當時正熱衷於社

區式的綜合性「新反叛政治」，因而對這種單一目標的國際性問題並不重視，但一九六四年底，「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主席吉特林，副主席布斯邀請了一個後來成爲美國著名評論家的採訪越戰新聞記者史東，(I.F. Stone) 參加當年十二月的大會作專題報告。在報告中，史東分析了美國捲入越戰的原因以及美國應退出的理由。他的演講使得本來根本不知道越南在何處的學生們立即增加了行動的興趣。在那次會中，他們澈夜討論和表決，最後決定在一九六五年春假的時候舉行一項華府反戰大示威遊行，然後開始籌備，他們邀請了記者史東，以及當時參議院唯一反戰的參議員摩斯 (Wayne Morse) 爲遊行的演講人，整個計劃已擬好，預計是個三千人的示威遊行。

就在這時情況有了變化。一九六五年的二月，「南越解放陣線」(NLFSV) 的游擊隊開始猛烈攻擊萊古市 (Plei Ku)，越戰昇高，詹森總統於二月七日開始跟著昇高反擊，美國兵員以往由後備兵和國防軍爲越戰主要兵源，一時之間增加了百分之八百，決定擴大徵兵。於是，第二天，校園便活動了起來，許多示威跟著發生，但一般而言仍屬百人級的小型示威。而在密西根、明尼蘇達、羅吉斯、巴鐵摩爾、波士頓、紐約等著名大學的反戰運動領導者均爲「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會員。「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總部則忙著收集越南資料通報各校園，並將一個小冊〈越南——世界之病〉的小冊給校園活躍份子。接著，他們決定原來擬想中的示威遊行訂在四月十七日，他們的這項決定散發出去之後，不但在校園，即使對老一代也激發起了重大的關切，一個全國矚目的華府大示威已在醞釀了。

爲了籌備這次大示威，「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增加了僱用的人

手，到了三月底，全日籌備的人員已有九人，他們設置了有五條線的電話通訊系統，印發了十五萬份遊行通知單。所有曾參加過下鄉運動、民權運動、自由言論運動的策略家和組織家都來參與這次示威遊行的籌備。到了四月初，情況更好，預計示威人數已可達一萬人，社會名流和著名教授紛紛來函表示支持，重要的政治團體如「非暴力行動委員會」(CNA)、「學生和平聯盟」(SPU)、「反戰同盟」(WRL)、「婦女和平工作團」(WSP)、「婦女國際和平與自由聯盟」(WILPF)亦表示支持，甚至自由派的團體如「紐約工會」(NYU)，地區性之「一一九區零售及醫院工人工會」(DHW)，「六十五區零售工人聯盟」(RWU)等等，亦表示願意加入。

至於財務方面，名歌星瓊貝絲 (Joan Baez) 捐了二千美元，其他大小捐款不等，到了三月，捐款達五千元，四月增至一萬二千八百美元。

這一具有絕大號召力的示威，亦吸引了更多的學生傾向於「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立即，它在十個學校有了新的分會。紐約時報也在三月十五日用了八段體的大篇幅來報導「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和他們策劃中的示威遊行。

三月十九日，週五的下午，他們顯然是預演式的在大通銀行前作了一次示威，抗議這個銀行的貸款給南非，六百人參加，四十三人被捕，這是他們首次正式的不服運動。

也就在這時，其他的校園也有了行動。三月十八日，密西根大學一群學生和教授經過討論，決定成立一個「專家團」，進行「強教」(teach-in)——這是民權運動時的主要策略，即舉行非正式的演講會，灌輸聽眾新的觀念。密西根大學的「強教」三月廿四

日晚間舉行，非常成功，約有三千人參加，這是個晚會，它並非全屬令人厭煩的演講，還有教授以一種對大人而非對學生的態度發表感想，有民謠歌手，有交相詰問，有當頭棒喝，有咖啡時間，最後則是火把遊行。

不到幾天，密西根大學「強教」的觀念傳遍了全美國，其後的兩個月，約有一百所大學和學院都採用了這種作法。接著華盛頓又舉行了一次全國性的，長達十二個小時的「強教」，有來自一百廿二個大學的學生參加，並向全國廣播。最大的一次則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舉行，三萬五千人參加，長達卅六小時。這些「強教」（或有人譯為「機會教育」等），主要以教授為主講人，但「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會員則為基幹。

至於四月十七日華盛頓的大示威情況又如何？

四月十七日，華盛頓是個好春的天氣，天空無雲，有輕微的東北風，華氏溫度八十度，上午九時，數千名抗議者即沿著賓夕凡尼亞大道集合，目標是白宮，陸續前來者又有數千人，據事後統計，來的學生分別代表了一百所以上的大學和學院。到了十點，估計人數已達八千人，他們在白宮四週閒步。（這天，詹森已跑回他德州的農場，但縱使在那裏，也有四百個抗議者在等候。）大家手持著不同內容的抗議牌，時間又延長，最後一共到了二萬五千人，締造了美國歷史上和平遊行抗議最大規模的紀錄，即僅以紐約一地而言，就開來了三列火車專車和五十輛特別巴士。

這天的遊行隊伍中，也有為數不少的成人同情者和黑人民權運動者。

遊行大會上，演講者的安排是個怪異的綜合體，有黑人民權運動支持者如歌星瓊貝絲等，有自由派記者如史東，參議員顧汝

林 (Senator Gruening) 等的攻擊中共，有激進分子如「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主席波特，以及歷史學教授林德 (Staughton Lynd) 等人，林德是遊行的總主席。

演講時大家席地而坐，演講後群眾從華盛頓紀念碑要走到國會投遞希望結束戰爭的請願書，一路上大家唱歌和呼口號，有點像郊遊野餐的味道。到了距國會大廈約一百多碼時，氣氛有點嚴肅了。這時隊伍停下，準備讓代表投遞請願書，這時隊伍中有人喊道：「讓我們都上去，讓我們都上去。」接著有人想往上衝，但被「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負責人們所阻。最後，直到下午六時，遊行圓滿成功。

這次遊行已可看出有許多人是頗為失望的，激進份子已在等待衝突的機會。對此，林德有過如下的回想：

當群眾走出林蔭大道而向政府所在地時，兩旁都停滿租來的巴士，因此隊伍無處可去，只有向前直進，走向等待著的警察。似乎是全體群眾都將隨著走進這座大理石建築物。我們向前的運動不可抗拒的強大，縱使其中有人被射殺或逮捕，都會無法阻擋而進佔這座建築物，佔據政府。可能下一次我們會一直前進，短時間佔領政府，從這裏向越南和多明尼加共和國的人民發出我們應發的道歉；或者在國會階梯上等待著，等著那些替我們作政策，和我們一樣陷入恐懼和驕傲的人出來，同意和我們以及全人類作對話。

四月十七日的遊行示威，接著又產生了许多副作用。舉例而言，「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母組織內部即有了許多問題，它的母組

織「工業民主聯盟」的顧問巴農 (Murray Baron) 宣布退出，以抗議學生的遊行。「工業民主聯盟」的成員有鑒於母子組織間有巨大代溝，通過決議「來加以探討，非正式但深入的，造成兩者間有所差異的各種問題」。另外，右派的知名人士麥克多威 (Arthur G. McDowell) ——他是「反共產主義侵略委員會」(CACA) 的一員，四處發傳單，指控「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後面有共產黨支持，以「反對總統和美國政府」。但聯邦調查局調查，那個兩萬五千人的大集會，只有七十個共產黨人參加，且非負責人或領導人。

但是，「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此次遊行後已建立起了它的形象，數週之內，它的分會已增至八十個，比半年前增加一倍。接著又是召開大會。會上大家對遊行的成功都雀躍無比，而對未來的工作，則有許多建議，其中重要的有：

- 建立內部教育系統——「自由大學」。
- 吸收黑人學生。
- 派人到各軍事基地及徵兵處，勸十八歲的人不要去報到，這雖然違反了〈一九一七間諜治罪條例〉，但他們認為基於〈紐倫堡條例〉，這不算有罪。
- 成立一個「研究、資訊、出版部」(RIP)，以加速溝通，縮短各校及各人間知識的差距。由新加入的奧克芮斯比 (Carl Oglesby) 負責，他稍後成為六〇年代學生運動中極重要的一人，也擔任了「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主席。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芝加哥的會員，接著又於五月廿一日在芝加哥圓環舉行靜坐反戰示威，這是「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領導者本身直接進行不滿運動，四十人被捕。

總結了從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的這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對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而言，實在是個關鍵性的時刻，「自由言論運動」和「反戰運動」已促使了學生們的全面激發，相對於此，學生在六〇年代一開始，直到六四年的這段時間乃變成了起跑的預備期。這個時期，⁽⁶⁴⁻⁶⁵⁾學生們由各種他們參與的經驗凝聚了反抗的意識和策略，它到了反戰運動之後逐漸成熟，於是，使得整個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從一九六五年起便大大增加了它的反叛程度。

在這個意義下，「自由言論運動」和「反越戰運動」都是使學生「激進化」(radicalization)的運動。它的逐步走向反叛和激進，又和美國政府的整個態度及作為互為消長。而這兩者表面上無關，但事實上則相連一致。反越戰是國際事務，而大學改革則根據反越戰的經驗和反省，認為這是整個美國體制有了問題的必然結果，要消除這些問題，最基本的是要讓社會作根本的改變，但根據民權運動的經驗，澈底的社會結構與權力改變，就一個學生而言，最好的途徑是從校園改革做起。在這樣的意理和反省下，所有相關的運動都是萬流歸宗，最後匯於一個最終定點的。由此種體認，六五年以後，各平行發展的學生運動便相互刺激，相互助長的走向了一個共同的反抗的方向。

第 9 章

反抗！反抗！反抗！ (1965～1968)

許多反戰運動，不管它的口號是什麼，都似乎先假設著既存權力是有合法性的，正常的政治反對管道足夠來結束戰爭。基於這個理由，它們便集中於證明現在存在著的、實質的、日漸增長的公眾反戰情緒（經由大型示威、請願、報紙意見廣告、公民投票等）而且做得非常有成效。它們的方法也集中在反戰宣傳，反戰教育，以及象徵的向權力當局訴求，……等方面。

而我們則深信，這個社會整個的權力都是沒有合法性的，而且將繼續不會對輿論以及正常的政治壓力負責。我們的這種信念催逼著我們有了反抗的觀念，致力於阻礙和擾亂地區性以及脆弱的軍政機器的功能。我們參加了反抗運動，但我們對這種反抗促使戰爭結束的能力並沒有太多的樂觀。確實的，我們把它叫做反抗，而不是革命，因為盤踞著的權力是太強了，無法加以打破。最好，一種反抗也不過只能延緩和阻礙、並強化內部的衝突，使戰爭昂貴，援助越南人，

以增加戰爭的昂貴。反抗也可以在國內各地播下種子，這些地方都被攻擊帝國主義和國內剝削的運動所涵蓋。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舊金山《運動》雜誌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七日華府大遊行之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於六月九至十三日召開了為數四五〇人的大會，這次的大會是個將整個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扭轉向反抗道路的關鍵。

四月大遊行顯示了「學生權力」(Student Power)，因而大大刺激了校園的青年。就政府觀點言，這次遊行是不應該核准的，因為它激發了「學生權力」的上昇。大遊行之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會員大增，六月的大會便顯示出了它的量及質的改變。

這次大會上已顯示出了青年無政府主義的傾向，會場上開始有人吸大麻，許多一心一意只要反抗的大學新青年大量投入會場，使得整個大會完全脫離了「學生民主社會同盟」老一代創始者的控制，「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傳統已經不見。秘書長韋布說：「所有事情向前走去，所有的傳統都已停止。這是個怪異的大會。」而副主席布斯則說：「這是個瘋狂的大會，每個人都瘋狂。」

由前進「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發展，這個組織由始創到它逐漸的發展，可以說是具有相當知識基礎的，在策略的選取上亦大致穩健，它雖已屬激進派，但嚴格而言尚屬有分寸的激進派。而一九六五年以後則情況已變，新秀份子都是從未有過政治經驗的，缺乏對傳統之了解，他們不知道和平運動的迪林傑，不知道民權運動的魯斯汀，不知道整個知識傳統上各種不同的主義。紐菲德 (Jack Newfield) 將新會員作了抽樣調查，發現這些老弟完

全不知道自由主義的杜威和約翰彌勒，不知道社會科學開山祖師韋伯，不知道左翼的盧森堡，不知道修正主義的伯恩斯坦。甚至只有很少人知道馬克斯，沒有人知道無政府主義的克魯泡特金。他們對政治似乎只有一個觀點，越戰違背道德，因此要誓死反抗。哈伯是「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首任主席，是這個組織中頗有知識基礎而且讓我們今天在評價那個時代都會尊敬的人。他當時就已表現出了對這種「道德行動主義者」(moral activists) 的憂慮。哈伯說：「他們要行動的熱情的力量，已經佔據了整個組織，已經沒有時間來教育他們。爲什麼？因爲自我教育是很困難的，它的效果很慢。因爲他們尚沒有確定他們的信仰，因爲他們急切的要直接作道德表現的欲望已超過了其他的考慮。」

新人之中，後來當選副主席的德州學生雪諾 (Jeff Shero) 可以作爲代表。他說：「我們的本能是更激進的，更願意去冒險，因爲變成『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一員，就等於巨大的突破。」

這些新秀的無政府主義式的、個人反叛主義式的心態，帶給「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是「離心主義」——組織內部不再中央集權，不再有領導重心，而傾向於各地區性人物的小團體主義。他們不要指導式、理想式的文件，認爲這是「文件主義」，連「休倫港文件」都被厭棄。老一輩在大會上想要確定外交政策的一般觀點也被否定。辯論時，新人們甚至提出一個真正的民主團體不應該有主席等職位的問題。另外，對反越戰運動也未訂下具體方向。

這次大會是個失敗的大會，由於新人大量增加且缺乏一般水準，而又將領導權由本會改變到各分會手中，長期而言，已大大削弱這個組織的力量，而在選舉上，爲了削弱本會之權力，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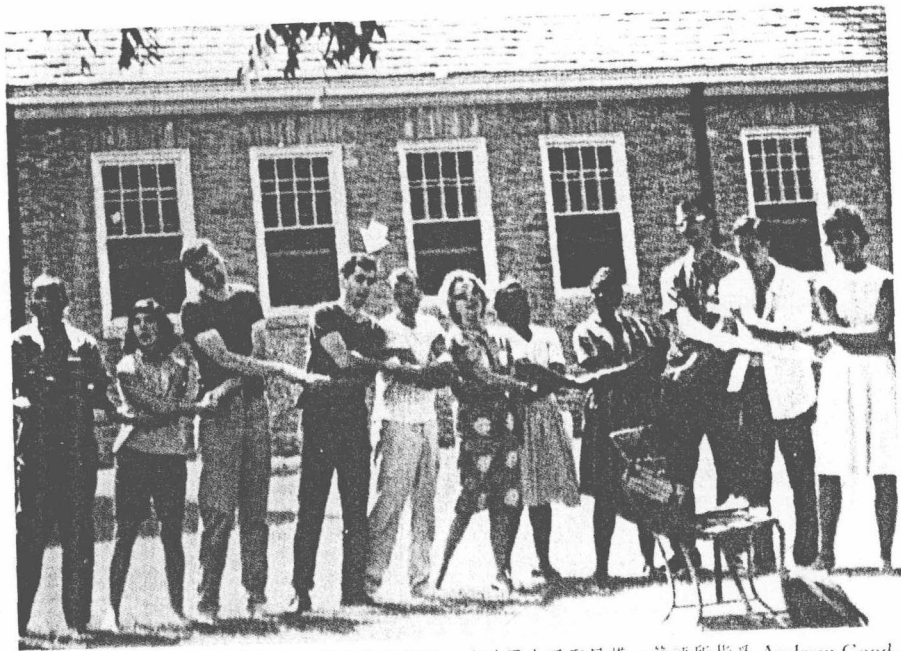
才十八歲，打打雜的西格（Jeff Segal）卻被選為秘書長。

然而就在這時候，反戰運動逐漸高漲，在一九六五年夏天，芝加哥、丹佛市、底特律、麥迪遜、米爾瓦基、紐約、奧克蘭、波特蘭等校都成立了「越戰結束促進委員會」（CEWV）。接著一群獨立的反戰人士成立了一個「全國停止越戰協調委員會」（NCCEWV），份子包括Staughton Lynd，David Dellinger，Robert Parris Moses，Stanely Aronowitz等人。這個組織成了反戰運動中最重要的協調領導中心。他們首度行動是一九六五年八月的華盛頓示威遊行，約五千人參加。這次遊行刺激起了一些徵兵的反抗者，開始公開焚燒徵兵令。對此，國會議員米爾斯、雷佛斯、塞蒙特等人提案立法懲罰，得判一萬罰金和五年有期徒刑。這項懲罰的規定，八月卅日詹森總統簽署，完成立法。

在反戰運動已達高峰的此際，「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卻因六月間大會的混亂和領導無人，整個無法因應，也在此時開始尋找新的努力方向。

一九六五年九月七日，「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印第安那的一個公園開大會。對於越戰的意見，分歧甚大，包括：

- * 主張成立促進和談的組織。
- * 主張立即撤軍。
- * 有人甚至希望越共勝利。
- * 有人主張強調越戰的道德恐怖，或不合法性。
- * 有人認為它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遺害。
- * 有人主張送人質到北越，使美國空軍不敢轟炸。
- * 有人主張成立廿五人至五十人的工作隊到越南，凡美



◎六〇年代初期，美國大學生大量向南方移動，協助黑人爭取民權。前頭所指為 Andrew Goodman，後被三K黨所殺。



◎民主學生同盟 (SDS) 1963 年在印第安納州舉行會議後留影。

- Yippie (年輕激進份子) 創始人 Hoffman 抱著 Yippie 推舉的總統被提名人遊行，對總統選舉進行嘲諷。
- 示威學生在白宮外嘲諷地表達他們對詹森總統的感謝，另有約兩萬封信函，賀電淹沒了總統辦公室，導致了美國史上最混亂的競選活動。



軍炸燬一所學校或醫院，立即予以復建。

*有人主張進行「國際學生罷課」。

*年青的新人則喜歡示威遊行。有個人說：「你們從一九五七年起就已到了華盛頓遊行示威，我們卻沒有，遊行示威太少了。」

*有人主張對運兵車加以阻擋。此議後來在十月間由「柏克萊越南日委員會」（BVDC）付諸實行。

*有人主張組織士兵。

*有人主張前往徵兵中心示威等。

討論時像上次大會一樣無缺席，最後決定支持「全國停止越戰協調委員會」預定在十月十五及十六日舉行的全國各地示威遊行。同時決定對徵兵進行反對，反對學校當局及教授將學生資料給徵兵處，對徵兵人員出現在學校時要引起人們注意並予挑戰和譴責，對學校的軍訓處（ROTC）亦作為反對的目標，對區域性的徵兵中心亦予示威。目的在於刺激並「加深服役年齡學生的反戰情緒」。

到了一九六五年十月，預計於十月十五及十六兩日舉行的反戰示威受到各方極大的注意，輿論已不再視這是孩子們的遊戲，大眾傳播媒介也對這個行將舉行的示威作詳盡報導，十月十三日，參議員多德（Thomas Dodd）提出了如下的報告：「反越戰運動已由溫和的人手中，把控制權交給了同情越共，敵對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和極端份子手中……，將於本月十五及十六日舉行的全國反越戰抗議可為證明。」同一天艾森豪也表示對反戰運動覺得「擔憂和警覺」，他並認為美國青年已「道德敗壞」。

翌日，「前鋒論壇報」和「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依萬斯 (Rowland Evans) 和魯瓦克 (Robert Novak) 分別撰文抨擊認為「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所從事的是「叛國」勾當，已脫出正常異議的權利範圍。接著，檢察署長卡森巴哈 (Nicholas Katzenbach) 也在芝加哥舉行記者會表示：反徵兵行動「已走向叛國的方向」，它正受到密切的注意，「這個運動有少數共產黨在內，我們將予調查，我們將會有所處置。」他又指出，司法部「已發現替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工作的人之中，有人有共產黨嫌疑」，「這個組織是幾個受密切注意的學生組織之一」。北伊利諾的檢察署長也作了同樣的表示。這些言論，已使得「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成了「叛亂組織」。

雖然在這種不利情況下，預定的全國示威卻非常驚人的成功。來自各地的參加者多達十萬人——約有九十個城市同時舉行，同時在紐約、舊金山、匹茲堡、新海文、克里夫蘭、底特律、西雅圖、洛杉磯等地有史以來最大的示威。示威地點包括北卡羅萊那州的生化戰中心，安娜堡的徵兵處等。參加的團體非常普遍，當時所有的活躍政治團體及學生團體均在各地參加。一個廿二歲的天主教和平主義青年密勒 (David Miller) 是第一個焚燬徵兵卡以抗議聯邦新法律的人。

這次十萬人全國大遊行震動了華盛頓，第二天，許多參議員就發表談話譴責，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雷斯頓 (James Reston) 也撰文抨擊，說這個示威「已損害了國家」，「不但不能加速和平，反而延緩了和平的來到」。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更加聲名大噪，一時之間，會員已增至四千人，有一萬名支持者。他們爲了澄清新聞界以及其他各界

的憂慮，發表了一項說明態度的文件，這項文件廣泛的被報紙雜誌刊載。在這項文件中指出：（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所認同的，以及我們這一代所代表的立場是非常清楚的。我們急於去建設村莊，我們拒絕去焚燬。我們急於去幫助和改變我們的社會，我們拒絕去摧毀任何人的家園。我們急於去促進民主的條件，我們不相信民主的促進需要災難和恐怖。）「除非等到總統同意我們的建議，我們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我們將做我們良心的事，完全的，一心一意的，對於這場戰爭。我們將鼓勵我們這一代的每個人來反對，根據我們法律許可的良知反對規定來做。」這項文件後來被稱為〈建設而非破壞文件〉（Build, Not Burn），不過這篇文件在「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卻引起了很大一片反對之聲，認為整個調子太軟弱。因此，後來有人唱出「不是建設而是破壞」（Build Not, Burn）的口號，一個標點，兩種意義。這項糾紛已顯示出「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早已存在的分會權力擴張，到了此時已爆發了出來。

就在此時，「五月二日運動組織」又宣佈了他們的反徵兵計劃。進行組織「反徵兵聯盟」（ADU），決定更深入的進行反越戰運動。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和它的母組織「工業民主同盟」之間的裂痕早已存在，隨著各方指控「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有共產黨嫌疑，兩者之間的裂痕更深了，最後，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兩者協議各分東西。「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成了一個獨立的團體。

對於各方指責學生運動為「有共產黨嫌疑」，許多大學為了表示不滿，決定作更進一步的抗議示威，「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自由派盟友「理性核子政策委員會」（SANE），也希望該同盟來參

加這種爭取「不滿權利」的示威遊行，時間定在感恩節。至於上次他們決定要擴大進行的反徵兵計劃，由於大家的恐懼，最後被撤廢。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七日，由「理性核子政策委員會」主辦的示威在華盛頓舉行，四千人參加。在這次遊行示威中，奧格列斯比（Carl Oglesby）作了一場精采的演講，他演講的主要內容是：

最初給越南承諾的是杜魯門總統，他是主流派的自由份子，其次則是艾森豪總統，他也是溫和的自由份子。然後甘迺迪總統更予加強，而甘迺迪更是鮮明的自由派。想想那些現在控制這場戰爭的人，他們研判地圖，下命令，按電鈕，計算屍體，包括龐蒂、麥克拉瑪、魯斯克、洛奇、哥德堡，以及總統自己。

他們都不是道德怪物。

他們都是高貴的人。

他們都是自由派。

因此，我，以及今天來此抗議的人，為了要了解這場戰爭，我們必須仔細的看看美國的自由主義。這樣，我們可能會大大的驚訝。

這個國家，有了三十多年自由主義，卻將廿萬年輕人送到越南去殺人和戰死，為了這場曖昧不明的戰爭；而它卻不讓一百個選舉登記人前往密西西比。

如果是你，你要怎麼辦？

這場戰爭的財務重擔已使我們削減了數百萬向貧窮作戰的經費。而我們的國會卻將一億四千萬給洛克希德和波音公司，讓它們作發展超音速飛機的競爭，而迪斯奈樂園又將花掉我們廿億美元。

如果是你，你要怎麼辦？

自由主義慣以反共來合法化他們的行為。這種反共的意識型態不過是要掩飾他們的現狀。因此，他們將我們進入其他國家，不說是威逼，而說是保護。他們甚至說丟在越南的燃燒彈都是人道愛的一種——這和中世紀的異教徒殺死病人如出一轍。

在這個演講中，奧格列斯比曾將美國不公平的干預各國政治，不人道的行為一一指出。最後，他要求所有的人，包括自由派，都來從事真正良心的事業。奧格列斯比的這篇演說稿，後來廣泛被青年學生流傳，成為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性文獻。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聲名愈來愈盛，一九六五年底，繳費會員已增至四千三百人，分會有一百廿四個，外界捐款不斷，他們已可擬訂出每年七萬至八萬的預算。

爲了檢討過去，策勵將來，這年聖誕假期，他們在伊利諾大學開了一次「回顧會議」（Rethinking Conference），六十六個分會三百六十人參加。

一九六六年二月，徵兵總監赫雪將軍（Lewis B. Hershey）宣布，大學生在班上成績較低的將不徵召入營，作法則是：一、

缺頁

缺頁

和戰爭機器間的關係。因為，就在當年的春天，已有「越南報導」等雜誌公開了一些事實，例如密西根大學和中央情報局合作，假借學術研究之名而行「反顛覆」之實，干涉越南內政。另外在許多其他大學也有幫助南非和拉丁美洲經濟剝削等方面的情事。這些情事刺激了學生的更加覺醒和憤怒。校園事件亦隨著這種對學校的不滿而日增。

伴隨著此種不滿，多年來即已醞釀著的所謂的「自由大學」的觀念也在此時成熟，開始了「自由大學運動」(FUM)。

「自由大學」的觀念早在〈休倫港文件〉中即已粗具，後來曾被列為學生校園運動的計劃之一。可是在「下鄉運動」那個民權運動的時代，單純的校園改革問題並未受到重視，一直到了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自由言論運動」後才被注意。「自由言論運動」中的「強教」或稱「機會教育」亦即「自由大學」的構想。有鑒於此，「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乃於一九六五年春，成立了「自由大學委員會」(FUC)，由霍瑞維茲 (Rhi Horovitz) 負責。同年底，許多大學已有了「自由大學」，到了一九六六年春天，由於對校園不滿增高，「自由大學」更為昌盛起來。

「自由大學」是一種學生和老師之間無距離的聯繫方式，誰高興都可以召集志同道合者相互研究學習一番，各大學的自由大學都有它的刊物，只有某人對某一問題有興趣，便可在刊物上登載短訊，招募朋友或老師，或者上課，或者動手做某些事。「自由大學」在這個意義上，除了有相互學習的意義外，還有作為溝通橋樑的意義。

不過，「自由大學」的上述形式是可以隨意加添各種不同內容的。六六年興起的「自由大學」，在它的實行上，由於它添加的內

容，使它成了青年次文化的培養場所和革命觀念的培育所。

在前一方面，我們可以從許多大學的自由大學刊物上看到有關嬉痞的短訊和似乎有主張吸食麻醉藥和性雜交嫌疑的廣告。舉例而言，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自由大學，就有許多這種短訊——「航向內太空——徵求六男六女，計劃震醒我們所擁有的全部肉體感官與精神感官，誰能提供我們一個聚會所，得優先加入。」

而在後一方面，自由大學的成為運動，乃是在學生運動不滿情緒的高峰時刻，於是，許多激進青年乃無知的將各國的革命家作為他們效法榜樣，「自由大學」討論馬克思、列寧、中共紅衛兵、卡斯楚等的課程無所不備，而在討論時他們似乎並不在了解這些革命家或哲學家的思想，而只是在學習他們革命的意識與方法。

（而最糟的是前述的兩者經常結合一致，一種虛無的，只有反叛形式而無內容的美國左派青年大量產生了）。這些青年學生稱之為左派事實都是高估了的，至多可算是虛無的革命派。但亦正因此，從一九六六年自由大學起，美國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相當大的一個部份，註定了它走向準革命的邊緣。

一九六六年的高潮迭起，「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成員已進至一萬五千人，有一百七十二個分會。據抽樣調查，它的會員，百分之二十五是研究生，百分之四十是大學生，百分之十高中生，百分之二十可能是剛離校的學生之類，另有百分之五未確定。這顯示出，「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力量已進入了高中。

不過，這時候他們的財務卻非常壞，其原因之一是因為和母組織「工業民主聯盟」脫離，財源不繼外；第二個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國政府對它的懷疑和偵察，這使得許多私人捐款遲疑不來。

聯邦調查局長胡佛指控說：「現在從事抗議美國外交政策活

動的最激進團體是一個叫做『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組織。共產黨很積極的促進並參與其間。」除此外，聯邦調查局並已開始約談其組織中的許多學生和以前在組織中做過事的人。另外，則還派遣過許多特務滲入，有紀錄可查的是派過三人：William Divale，Gerald Wayne Kirk，Tommy Taft。除了聯邦調查局外，美國陸軍情報單位「美國大陸情報局」等也派人前來工作。

在這個內憂外患的時刻，「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由卡米加爾負責，這位黑人民權運動領袖一向主張黑人管黑人，白人管白人。民權運動讓黑人自己去推展，白人學生則應該自己拯救自己的白人社會。此時，他宣布了「黑權」的策略，要把白人組織工作者從黑人社區排斥出來。對白人學生這是很大的刺激。尤其對「民主社會同盟」，因為他們曾主張過「種族間的正義」，且曾在黑人社區投注過很大的努力。但「黑權」的抬頭，已意味著黑白合流的學生運動時代已成過去。在這一九六六年的夏天，除了黑白合流的時代過去了之外，「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內部也全面改組，東岸知識份子所創辦的這個團體，由於已成「老人」，他們開始被中部的激進新生份子所替代，這些中部的新生激進份子由於個人主義的傳統，因此有了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對「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開始了另一階段。夏季在艾荷華州中北部清湖（Clear Lake）召開的大會，選出了新主席艾克利遜（Nick Egleson），副主席戴維森（Carl Davidson），秘書長卡佛特（Greg Calvert），他們都有美國中北部草原區個人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特性。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老一代，從這時開始，有很多人開始退出，或者唸書，或者就業。

在清湖召開的大會上決定，爲了推出一個該同盟中年長者以

及大城市非學生職業青年工人的行動計劃，形成了「民主社會運動」（MDS）的觀念和作法，它的目的是在建立一個「成人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但最後卻似乎沒有具體化。倒是清湖會議之後，老會員們推出了一個「激進教育計劃」（REP），由哈伯負責，一九六六年秋天在安那堡密西根大學開始，最後亦因人力和經費問題，沒什麼效果。

清湖會議所促成的，有延續力和發展力的，乃是所謂的「學生權力」（student power）。

「學生權力」的觀念早在六〇年代初期就已產生，校園民權運動、大學改革會議、柏克萊的一九六四年示威，以迄自由大學運動均屬於它的範疇。但所有的這些並未綜合到一個單一的概念和策略上。為此，清湖會議上，戴維森提出了他的觀點——「學生工團主義者運動」的構想，主張：

明顯的，我們需要組織起來，在校園建立一個以改變大學社區為主要目的之運動。我們遺忘這個目標已經太久了。對每一計劃，每一行動，每一立場，每一要求，我們都必須提出這樣的問題：它將如何改變校園每一學生的生活？基於此，我提出下述建議：每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分會都組織一個學生工團主義者運動。我使用工團主義這個名詞，因為勞工運動上，工團主義者的聯盟爭取的是工業的民主和工人的自我管理，而不僅是薪資和勞動條件。我不必重覆，我們所要的就是學生管理權。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學生聯盟，自己決定要或者不要某種角色。基於此，這種學生運動不主張團體內權力的集中化，讓每個學生都能直接參與影響他們每日

生活的決定。

當時美國大學的客觀條件有助於「學生權力」的形成。在一九六〇年，大學生僅三百七十八萬八千人，到了一九六六年已增至六百三十九萬人，增加幅度為百分之四十，其中，激進份子的比例在百分之五到十五之間，也就是約有卅二萬至九十六萬人。其次，整個青年次文化已完全形成，又經過了從民權運動以來學生「政治意識」的不斷提高，「自由大學運動」的成長，這一切的一切，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促成了「使整個學生世代激進化」的「學生權力」概念，於是「學生權力運動」便開展了。

「學生權力運動」的開展有許多例子。在內布拉斯卡大學，成立了一個學生黨，訂定了一項「學生權利清單」。在賓夕凡尼亞大學則進行過學校選舉的罷課。在舊金山州立大學，則有過爲了伙食不好、餐食不好和價錢太貴等作過的罷課。在紐約大學，因爲學校提高學費，也惹出一次千人示威。其他情況尙多。

以上的例子都限於校內問題。而「學生權力」所造成的最多抗議運動仍是以越戰爲主題。在安提阿大學、巴費羅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奧伯林大學、密西根大學、威斯康辛大學等都有過此種行動。他們不像以前那樣以徵兵測驗和學生分等級等問題爲重點，而是以大學在越戰中擔負的角色爲攻擊的目標。在安提阿大學，示威的結果是學校當局放棄了學生分等級的成績算法。在紐約大學，學生發現學校和幾家美國大公司勾結，參與對越南的剝削和越戰。而在賓州大學，學生們則揭發學校秘密的幫助五角大廈發展在越戰中使用的生化戰劑。而在許多其他大學，則以海軍，中央情報局，杜爾化學公司（專門發展生化戰劑的

公司)徵收學生之事為攻擊目標。一九六六年的秋季，共有布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肯塔基大學、馬里蘭大學、密西根大學、皇后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等校有過反徵兵示威。其中，以柏克萊加州大學最有規模。

柏克萊的事件是這樣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海軍徵兵人員到學校專門供學生社團辦公的地方設了一張桌子，學生知道了以後，就在旁邊增設了一個桌子，專門分發反戰文件。學校行政人員通知學生把那張桌子撤走，學生拒絕，於是學生們便圍著海軍徵兵人員的桌子靜坐示威，並不准任何人靠近，於是學校就請警察來處理，一百多個警察到了後包圍學生，這時，學生群中，一個反對者攻擊示威者，警察就衝了過去，逮捕示威者，抓走了十個人。當天晚上，全校學生決定在第二天進行更大示威，學校制止無效，於是第二天中午開始校園示威，百分之七十五的學生都參加，人數多至一萬五千人，抗議學校叫警察來到校園，這次示威一共進行了五天，於是學校乃妥協，決定成立一個由學生和教員組成的委員會來研究學校的管理問題。

另外，還有學生到附近軍營滋事之事件。

在反戰方面，最著名的事件是哈佛大學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哈大學校當局以及哈大「甘迺迪政治學中心」邀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來校演講，學校安排的是只選五十個學生聽講。但學生不同意，學生希望安排他和反戰者席爾(Robert Scheer)辯論，或者至少讓他面對學生的質問，對於這些要求，學校拒絕，學生乃訴諸公意，進行一項簽名運動，要求和他公開辯論，簽名者一千六百人。但學校仍然拒絕。於是學生

乃開始進行抗議示威。

這天下午四時，約一千名哈大學生和教員已等待著麥納瑪拉，學生使用對講機相互連絡指揮，對於現場也作過操練。當麥納瑪拉一到，學生們就包圍著詰問，場面尷尬而緊張，最後，學生領袖害怕暴力事件發生，將他羞辱得差不多了，就一聲令下，很快的就都撤退。這次事件轟動了全美國。此時，「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會員已增至兩萬五千人，付費會員六千人。

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總部提出了一個報告，在這個報告中，首次提出了「革命」的口號，秘書長卡佛特說：「我們不是自由的新生命，但這並非表示我們不能成爲這新生命誕生的力量。我們的自由並非在於成爲自由，而是在於我們是自由的力量。」副會長戴維森也說：「這個系統必須作完全的改變，我的選擇是革命。」這個概念既然一產生，便慢慢的到了後來走到這個方向。

前已述及，越戰昇高後，美國已訂了逃兵的懲罰標準，可判五年徒刑和一萬元罰款，接著便擴大徵兵，到了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每月徵兵已達四萬人，反徵兵愈來愈盛。而早在當年七、八月間，已有人提出過集體焚燬徵兵卡的意見，但未實行。到了十月以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有幾個重要負責人因逃兵而被判刑。十一月有幾個年輕人在正在審判一個逃避兵役者的波士頓法院門口，公然焚燬徵兵卡。許多類似情況會合的結果，年底，芝加哥大會集會，五百人簽名反對徵兵，這是首次最多人對徵兵的抗議，接著「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有會員建議舉行一個一萬人的集體焚燬徵兵卡的行動。於是，十二月廿七日在芝加哥開會，有如下之決議：

我們認為，所有的徵兵是強迫和反民主的，它是美國政府壓迫美國以及世界人民的工具。……

由於個人的抗議不足以發展出一種足以終止徵兵和作戰的運動。「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採取如下之計劃：我們的會員將組成一個反抗徵兵的聯盟，聯盟的成員將聯合起來，在任何條件下都不願被徵兵，我們的地方分會將通知所有服役年齡的高中、大學，以及社區青年。我們的行動將包括一、在體檢時即從事直接的行動。二、對適役青年及他的家人作反徵兵和反戰教育。三、集中對徵兵站作示威。四、鼓勵在服役期間的青年反對戰爭。五、傳播請願文件，拒不受徵。

這項文件已顯示學生對於越戰和徵兵，由「抗議」更進步為「反抗」的一個新階段。

一九六七年一月開始，反抗徵兵的團體在許多大學開始設立，最著名的是威斯康辛、柏克萊、康奈爾等大學。到了三月，在廿五所大學都有了此種團體。而同時，許多大學也有了「我不願去團體」（“we won't go”group），他們在校園刊物上聯名刊出請願廣告。其中包括新英格蘭區有三五〇人、史丹福大學三百人、康奈爾大學三九一人、威斯康辛大學一五〇人、米爾瓦基一二六人、波特蘭一一〇人、幾所醫學院二五七人，……等等。

在整個反越戰運動中，自概念上的和平與反戰，然後進展為抗議徵兵和將學生劃分等級，然後又發展成反抗式的拒服兵役和其他運動，其間，「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作用是很明顯的，這個同盟並不一定居於直接領導每個學校的角色，但它卻在全國領導

著每所學校。「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有八個「抗拒徵兵」的工作專人，也不斷出版有關的出版品。有一次抗拒徵兵的專刊即行銷一萬多份。這些領導，對所有的校園反抗運動都有很大的凝聚作用。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在康奈爾大學反抗徵兵團體的主導下，紐約舉行了一次集體焚燬徵兵卡的事件。

這項事件由丹錫斯 (Bruce Dancis) 倡導，他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即表示：「現在，我們需要有力的抗拒；激進而非法。」一九六七年三月他又徵求五百人集體焚燬徵兵卡，但應徵者卻只五、六十人。可是，事情已如上弦之箭不得不發。四月十五日，數百名學生擠往中央公園，他們公開焚燬徵兵卡，由於群情激憤，最後一共焚燬了約一百五十張徵兵卡。這次事件極具開創性的意義。對於這個事件，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威克 (Tom Wicker) 這樣敘述：

如果詹森政府為了維持它的權威而控告起訴十萬美國人，那麼，他為了要貫徹越戰以及其他政策的能力勢需打折扣或摧毀。它將面對不僅是不滿而已，而是接近反叛的大規模人民不服。

運動愈來愈熱烈，一九六七年六月，反徵兵團體已增至六十多個，簽署「我不願去」的學生已達至少二千人。這只是校園內的情況。校園外的全國性團體，如「南方學生組織委員會」(SSOC)，「學生動員委員會」(SMC)，以及地區性的團體如「波士頓徵兵抗拒團體」(BDRG)，「新英格蘭反抗團體」(NER)，「芝加哥區徵兵反抗組織」(CADR)等也都有了地區性或全國性

的示威等運動。據美國司法部宣布，有關拒服兵役的起訴案件於七月一日已增至一三三五件。

隨著抗拒徵兵運動的日趨壯大，學生們決定將整個反抗的水準更加昇高——他們認為「一個更廣泛的運動是可以發展的。……基於激進的反抗美國生活方式和抗拒社會的需要」，而事實上，由於學生不斷的因種種運動而與當局對立和衝突，他們的這種提昇衝突水準的構想已趨成熟。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康奈爾大學，地方檢察官意圖沒收一份學生雜誌，結果被兩千名憤怒的學生包圍，當五名學生被捕，他們更包圍警車，命令解放這五個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卅五名賓州大學學生在校長室靜坐，要求學校把留在安全部門的學生黑名單公布，這項靜坐一共三天。二月廿七日，十一個學生由於阻礙專門替越戰發展生化戰劑的杜爾化學公司之秘密徵兵，因而被捕。於是數百名學生靜坐抗議，最後是校長答應私人掏腰包出一千二百元的保釋金保釋學生，並且召開校務會議討論秘密徵兵之不當才解散。三月十三日，哥倫比亞大學舉行學生投票，反對學生成績的分等級，票數是一三三三對五六三，結果學校召開會議投票，二比一，聽從學生的意見。四月十三日，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進行反戰示威，一萬三千名學生有百分之六十五停課，當校長艾弗立特（John Everett）及參議員麥卡錫意圖前來勸止時被學生轟走。五月卅日，洛杉磯學院四百名學生反對學校的統治，反對學校對自由言論的限制，並有廿五名學生前往教務長辦公室示威。而在黑人院校，如三月廿一日霍華大學學生的反對徵兵總監赫西示威，五月間在德州州大，傑克森州大，費斯克大學等均有學生示威，警察並進入學校，德州州大事件中有一名警察

喪生。

大致而言，進入了一九六七年，學生運動已整個昇高。固然有些學校仍僅限於「學生權力」的問題，但整個而言，則已昇高至政治層面。大致而言，學生運動有下列幾項重點：

——反徵兵和反學生分等級：如哥大、康奈爾大學、紐約大學、霍華大學、艾荷華大學、史丹福大學、舊金山大學等。

——反對學校的秘密軍事研究以及大企業的干擾校務：如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賓州大學、史丹福大學。

——反對中情局等：如布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艾荷華大學、密蘇里大學、內布拉斯加大學、北伊利諾大學等。

這一期間，學生並廣泛發現學校有與聯邦調查局合作，定期將秘密報告送給聯邦調查局之情事。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學校承認曾在一九六七年初送過三至四個這種報告；在布里漢揚大學，校長承認他曾派學生偵探八名他認為「太自由派」的教授；杜克大學也承認將資料送給聯邦調查局；紐約州立大學承認學校「至少有五個人和聯邦調查局有聯絡」。其他如伊利諾、印第安那、堪薩斯、俄亥俄州大、密西根州大、德州等大學也都有此類情況。這些情況也都促使學運走向高峰。

這時，由於各學校間學生已有了一個很良好的聯繫網，相互通聞。他們並發現許多學校參與秘密軍事研究之例子。例如，一個叫做「塞密斯計劃」的計劃，使用兩千萬，有五十所大學牽涉到美國在外國的軍特任務；官方的「國防分析機構」，有卅八所大學牽涉到一個一千五百萬的生化戰劑計劃等。這些均屬帝國主義或不人道之計劃。

一九六七年春天學運之出現高潮尚受許多其他因素之刺激，例如，哈里斯、沙里斯布瑞的軍事報告指出，美軍在北越濫炸平民，美國國會拒絕哈林區選出之代表等。而相當重要的則是學生們發現「全國學生協會」原來是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

學生發現，「全國學生協會」是中情局所創辦的，自一九四八年成立起，即受中情局的支助和控制，經濟和人事均由中情局決定，「全國學生協會」的人常是中情局的特務，也是中情局國外政策的代言人之一。「全國學生協會」的建築物即每年耗去中情局五十萬美元預算……等。這些發現使學生將整個矛頭指向中央情報局。

一九六七年初，越戰再度昇高，反戰運動更趨熱烈。一個由「全國支援委員會」（NCC）蛻變而來的「全國春季終止越戰動員委員會」（SMCEWV）成立，在四月十五日，一共在紐約和舊金山兩地動員了卅萬人進行大遊行。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示威事件。

然而，現在已到了關鍵時刻，「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激進份子已覺得這種和平的反抗已無意義，他們已開始了革命的概念。他們認為縱使卅萬人的大遊行也不能改變什麼，最後只有革命一途。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激進學生雷德（Dotson Rader）說：「非暴力，民主的方法是無意義的，這已由一九六七年春天的情形很明顯看出。民權運動已經死亡。和平主義已經死亡。卡米加爾、布朗、海頓等激進領袖早已看出來，現在我們要的是叛變。」

在這種由各大學激進份子所提出的「反叛」（Revolt）的概念，這時已將「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推向新的角色，它必須成爲一個準革命的機構。

因此，乃有了在各校成立「教師和組織家訓練機構」(T-O Institute) 的構想，因為「革命不能從一無所有的一張空胃裏產生」，這個機構即在訓練教師和組織家，以為革命作準備工作。很快的，在芝加哥大學、波士頓大學、洛杉磯大學就有了這種組織，它是利用討論、小組集合等方式來散佈革命的有關概念和思想。

接著，真正有關激進思想討論的理論刊物，如《激進美國》(*Radical America*) 等開始出現了。這些理論刊物的出現才可以說，美國戰後的新左派開始出現。而一個很重要的「新工人階級」(new working class) 概念開始形成。

所謂「新工人階級」的概念是由三位學生 Bob Gottlieb, Gerry Tenney, Dave Gilbert 等人所提出。在這個概念中指出，現在的工人階級和以往那種出賣勞力的工人階級已不同，而是一種新的工人階級，由技術工人、技術人員、辦事人員等共同組成。這些人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主要的生產力量，因為新工人階級的存在，資本主義制度始得合法化，因此新工人階級乃是社會改變的最主要力量。而大學生乃是新工人階級的預備隊，只要能使新工人階級，尤其是大學生能產生革命意識，進而作為整個新工人階級的前衛，那麼便可推動美國的革命。這種概念經過他們的散佈與討論，到了後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作用。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局面。它是黃金時代，因此，林德 (Staughton Lynd) 說：「對於白人激進份子，這是信念政治的時刻而非罪惡感政治的時刻。」但它也是最壞的時刻，因此克普凱 (Andrew Kopkind) 說：「在美國，作為一個白人，而又是激進份子，這個夏天是個見到恐怖和充滿無力感的時刻。」它是個產生信念的時刻，因此肯尼斯頓 (Kenneth Keniston) 說：

「他們相信他們所做的，在政治上和倫理上是如何的重要。」但它也是混亂的時刻，因此巴達克 (Frank Bardacke) 說：「這是個艱苦的夏天，我們簡直不知道要怎麼做。」它是充滿希望的時刻，因此福洛迪格 (Larry Frevdiger) 說：「整個調子是勝利的調子，雖然有點太早，但是是勝利的調子沒錯。」但它也是個失望的時刻，因此茲威格 (Michael Zweig) 說：「我對改變的前途非常悲觀，縱使是有意義的改革亦然。在這個國家，我認為暴力是必須的，這點使我非常害怕。」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確實是個複雜的局面。它並非一種革命的開始，但有些情況它確實距革命已不遠了。整個青年確已有了沸騰的徵兆。首先，便是整個起自五〇年代末期的嬉痞，到了此時已匯成一股運動。整個席捲了美國。青年的新底次文化已成型——一種「反文化」(counterculture) 已完全的擊中了美國。「反文化」的意識成型，整個的也提昇了青年的反意識。

其次，在一九六七年夏季，有一次「越南夏季」示威遊行爲了越戰，數以兩萬計的人被推到街頭，這種街頭運動主要由自由派的羅伯甘迺迪支持，走的是金恩博士的路線。自由派的帶領群眾，尤其是中產階級群眾，使得激進青年產生了懷疑。

紐約的激進青年強森 (Lief Johnson) 便指出：「越南夏季是一個自由派的抗議運動。它是最高階層的自由派所推動的。它的目的是自由派要來爭奪和平以及民權運動的領導權。意圖削弱我們激進派的覺醒和削弱我們反自由派的認同。它的最終目的是要誘導我們走向一種結盟式的自由派進步主義的第三黨運動。」

而在黑人的暴動方面，這一期間在紐瓦克和底特律等至少五十七個北方黑人社區發生了抗議事件，這是一九六五年瓦茲暴動

後從未曾見過的局面。而警察及國防軍的處置也使人驚訝！在紐瓦克至少有廿四個黑人喪生，底特律則有四十三人死亡。在其他地方則至少有十人死亡。紐瓦克暴動事件的目擊者說：「現在並不是白人激進派幻想革命的時刻。白人進入黑人社區，已告訴了黑人，尤其是黑人青年，他們必須準備好反擊回去。現在的條件已慢慢的發展，逐漸創造出一種以貧民區為基地的美國游擊戰的條件。這個暴動代表了整個社會基本變革的訊號。」

這種事件已顯示出，「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以往工作的效果——他們對激進思想教育的工作。這一期間，激進思想的教育雖因嬉痞運動而打了折扣，但其總結效果仍極有效。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一九六七年夏季連續性的開過幾次會議，從六月到七月。各次的會議似乎頗為紛亂，有的積極、有的消極。

而就在這個時候，來自官方的壓力開始增強。六月廿日，在紐約有十六個黑人被認為是一個稱為「革命行動運動團體」

(RAM) 的成員，意圖「進行暗殺」，因而被捕。接著，六月廿三日，洛杉磯的一次反戰遊行隊伍被警察強力鎮壓，逮捕五十一人，四十人受傷進了醫院。六月廿六日，「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主席布朗 (Hrap Brown) 被捕，罪名是「暴動」。七月份，詹森總統通知所有官員，「不要去分析，而是要結束社會的無秩序」。另外：詹森和其他高級官員也通知軍部的「美國大陸情報局」

(CUSI) 加強不滿政治團體的監視，並將情報立即和聯邦調查局、地方警察局聯絡。因此，整個夏季，在諾曼、奧克拉荷馬、達拉斯、洛杉磯、紐約、芝加哥等地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辦公處都受到騷擾，尤其是芝加哥，更是全日監視，辦公人員至少

有十人因爲芝麻小事而被捕，保釋這些人一共花了一千美元。這種情況縱使在麥卡錫時代最黑暗的時刻也未見過。

然而，反徵兵運動、自由大學運動、反詹森運動均繼續不斷。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繼續進行大企業和帝國主義的研究與行動。在紐約，一種效法瓜地馬拉、哥倫比亞，以及委內瑞拉游擊隊的運動，這時已開始醞釀。在南方，「南方學生組織委員會」

(SSOC) 已開始推動瘋狂的青年運動並開始組織激進工人。柏克萊加州大學自由言論運動的領導者沙維歐 (Mario Savio) 和其他激進活動份子被捕，判刑四月。「解放新聞社」(LNS) 開始成立，出版地下刊物。而在瑞士，哲學家羅素開始展開一系列的討論，譴責越戰的罪惡。而在蘇俄，已進行十月革命五十週年慶祝。以上這兩項活動，都邀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派人參加。而在古巴的哈瓦那，也開始推動一個第三世界工作的新計劃。

這種情況對美國學生運動而言是很不妙的，因爲，真正具有國際背景的左派已開始了。

這種情況已使得整個美國社會注意學生運動的發展。《時代雜誌》、《國家雜誌》……，甚至於《花花公子》都開始探討青年一代的問題，學院也開始對不馴服的這個新一代開始研究。

對於「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這樣一個複雜的時刻，它顯然已到了分水嶺上：一邊是革命，一邊是改革；一邊是單純的抗議，一邊是意識型態的鬥爭；一邊是美國主義，一邊是國際主義。而它自己組織的發展也到了關鍵時刻。它在二百五十個校園有分會，會員三萬人，付費會員六千四百人，每年預算已達八萬七千美元，專業上班人員已有十二個以上，它至少在五個大城市有走出校園的社會行動計畫。而它的成員也成份複雜！開創的老戰

士，東海岸知識份子，中部無政府傾向者，上中西部的游牧性青年，西海岸激進份子，政治化的嬉痞等。政治立場則從尚有保守傾向的右派自由份子到極左的毛派分子。「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副主席戴維森對它的成員有很精確的描述：

其中，百分之八五到九十是所謂的受震盪的青年，他們都是大一大二的年輕會員。他們很快的成為嬉痞式或有鮑比狄倫症狀。他們由於長期的被強迫的不當教育封鎖，因此不知世事，有點反智味道，他們不讀別的東西，除了地下讀物。他們反戰、反警察、反家庭、反種族歧視、反貧窮、反中產階級、反權威。他們認為這些都靠著金錢而貫穿了起來。他們渴望自己的社會，覺得孤立。這可能乃是他們參加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原因。

其次，百分之五到十是超級知識份子，他們是各分會主要幹部，多數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生。他們對權力結構等有很深研究，受到激進教育計劃的喚醒而成為激進份子，無疑的，他們是今日美國最傑出的青年。

第三種的百分之五，乃是組織家，他們是分會的運作者。他們之中許多是被學校當出去或因拒服兵役而退校的學生，仍在學校的社區生活。他們政治觀點常改變，但卻激進。

這時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已是全美最大學生組織，比「青年民主黨」(YD)，「青年共和黨」(YR)，或「美國青年自由協會」(YAF)等為大。而在左翼的團體中，它也是一支獨秀，它有組織、有策略、有分會、有組織家、有會員，而且是多目標的行動

團體。

不過，它也有許多弱點：最重要的是它的中央與分會間有很大的距離，它的人事常變，一年一選，分會得自行根據情況而行動；它的老會員經驗不能一直下傳，老會員很快就被忘記；它的領袖精英主義，它的男性沙文主義使婦女會員頗感不平；所有的這些問題，在六月廿五到七月二日在安娜堡召開的一九六七年大會上充分顯示出來。

這次大會約二百五十到三百人參加，毫無經驗的新人佔最多數，好歹都有一點嬉痞作風，而出席者中，各種政治立場均有。在這次的會中，所有前述的種種弱點都顯示了出來。因此，會議結束後並沒有得出一個全國性的計劃，甚至沒有給各地方的指導方針，在總部也沒有一個堅強的工作小組配備，但在這樣一個為反抗而反抗的時刻，好像一切都已不再重要。

這次大會選舉，決定廢除主席與副主席制。改成設立三個秘書長，一個是全國秘書長，一個是教育秘書長，一個是各組織間秘書長。選舉結果，全國秘書長由史匹格（Mike Spiegel）擔任，他才廿歲，在哈佛大學唸社會學，是反戰運動激進份子。教育秘書長由巴東（Bob Pardum）擔任，他廿四歲，來自德州。各組織間秘書長則由老人戴維森（Carl Davidson）擔任，他於一九六二至六三年，一九六三至六四年兩度任主席，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則任秘書長。他任職之多開從未曾有之紀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的三萬學生收獲一項通知，沒有任何署名。通知上說：「杜爾化學公司（專門在越戰中生產生化戰劑的公司），將於本週二至五四天到本校招募人員，週三這一天全校學生將阻撓它的招募作業。」威大是個已有

許多抗議歷史的學校，一九六六年五月曾為學生分等級而抗議，一九六七年二月曾向杜爾公司示威。

在接獲這個通知後，週二這一天，就有二百名學生到招募員約談訪問的地點先期遊行抗議示威，作為預演。週三，學生再次到招募人員約談的地點商學大樓，但這次他們已不是抗議，而是反抗。他們進入商學大樓，在招募人員使用的辦公室前坐下，手臂相連，不讓招募人員和應徵者晤談訪問。因此，這一天招募人員無法進行招募約談，只是焦急的在旁邊走來走去。室外還有約三百五十人，商學大樓外面則擠了二千多好奇者和同情者。學校行政人員要求示威者離開，校警前來命令，依然沒有人走。校警警長韓森（Ralph Hanson）認為這些人充滿「敵意」，召來麥迪森的地方警察，於是來了卅個鎮暴警察，他們戴著鎮暴面具，手持鎮暴盾牌及鎮暴棍，在商學大樓門口列陣。

這時在裏頭的情況依然緊張。韓森警長向學生妥協，如果學生離開，那麼杜爾公司招募人員也離開。示威者同意，派遣代表去和校長席維爾確證這一點，但校長卻不答應。於是代表回到老地方，並警告說下一步就要使用暴力。到了下午一點卅分，韓森和學校商量後，決定衝進去強制解散，他向示威者作最後警告並稱即將逮捕，於是五十名警察衝了進去，他們的校警行列被學生擠散，而後地方警察局的鎮暴警察進來了，棍棒齊飛，學生紛紛受傷。只經過了十二分鐘混亂，整個示威隊伍就被肅清。

可是商學大樓外數千人的旁觀者眼見警察的暴行卻義憤填膺。一部份學生去叫學校救護車，學校拒絕，他們只好去攔計程車將受傷者送醫院。其他的人則扯住那些被警察逮捕的學生，不准他們被捕，包圍警車不准開走。於是，鎮暴警察施放催淚瓦斯。

這是美國警察首次在校園使用催淚瓦斯。但是催淚瓦斯施放的結果使得全體學生都開始正式的憤怒了，他們退退進進，整個態度已由防衛變成了攻擊，他們撿起磚塊、石頭，甚至鞋子展開攻擊。接著，鎮暴警察開始施放神經毒氣，有人立刻倒地不起，但學生仍悍不畏死，一個警察的頭部被磚塊擊中立刻昏倒，其他鎮暴警察也紛紛被擊中，學生便擠上來拳打腳踢。然後，警力繼續增援，警犬隊也出動。然後學生才慢慢因勝利感和疲憊而散去，整個衝突到了下午六時卅分結束。此一役，七個警察受傷，六十五個學生受傷，若干人重傷，有一人終生失明。可是，整個情況並未結束。

一小時後，學生群眾再度於圖書館前集合，估計有五千學生，兩百教職員。他們對警察暴行表示憤怒，決定展開罷課，並要求杜爾化學公司永遠不准到威斯康辛大學來。學生並組織了一個右翼的學生政府。

其後的兩天，全校完全罷課，雖然州的議員和親政府的教職員四處奔走希望學生上課。過了週末，五角大廈前發生了十萬人以上的大示威（詳情見後）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但威大的罷課仍繼續延長。週一，教職員二度集會，決定成立一個教職員和學生的聯合委員會來研究校園的種種問題以及校外警察進入學校的妥當性問題。一直到了星期四，學生被捕的獲保釋。三名助理教務人員因參加罷課被解聘，杜爾公司的招募工作暫停，整個危機才獲解除。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是個騷亂的季節，反抗變成了一種報復。十月份在紐頓（Huey Newton）等的領導下，由奧克蘭黑人區產生「自衛黑豹黨」（BPPSD）逐漸擴張，和平工作團的人返國後

組成「返國自願人員委員會」(CRV)，他們在國外親眼看到了美國帝國主義的真面目，準備有所行動。美國左派成立了一個「支持國家解放陣線委員會」(CANLF)，由一五八人領銜，二千人簽名，發出一項「反抗非法政府的召喚」文件，要求反抗政府，首次用「豬」這個字眼來指美國政府，這個名詞後來被廣泛運用。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堪薩斯的領導人布萊克孟(Charles V. Blackman)因為威脅要殺詹森而被捕。黑人學生組織廣泛成立，野痞(Yippies)大舉參加反文化和激進政治活動，「和平自由黨」(PFP)為一九六八大選而成立。十月間，在巴爾的摩，一群青年衝入徵兵中心，把鮮血傾倒在徵兵資料上，毀掉整個資料。衝突在街上、在校園、在首都，迅速而壯大的一波接一波湧現。

在街頭，十月廿日，加州的奧克蘭有一萬名青年湧向徵兵中心示威遊行。這次遊行由黑人激進派主導的十月十六至廿日的「停止徵兵週」的活動之最後高潮。在「停止徵兵週」的活動中，他們最初用傳統的靜坐，無計劃的對立，無計劃的遊行，結果發現都無效果，許多人被捕，也無法面對配備良好的鎮暴警察。在廿日，星期五的這次遊行便用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保持機動而不固定，保持攻勢而非守勢，準備盾牌和防護工具，使用合板木棍，他們沿街將空罐頭和舊報紙遍灑，沒有上鎖的車子都被推到街上。因此他們示威遊行時鎮暴警察來到，第一線示威者面對鎮暴警察，他們不像以前那樣只是後退，而是很快的從人行道繞到警察的後方，警察開始覺得不安，因為已被包圍，僵持一陣，警察即全部撤退。這是當時所謂的城市游擊戰的一種型式。

街頭的行動，一個月以後，即十一月十四日，「外交政策協會」(FPA)五十週年餐會時又再發生。這次餐會由國務卿魯斯克演

講。這個協會的成員殆被認為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中堅」，是「冷戰的戰士」。因此，紐約的「第五街和平遊行委員會」（FAPPC）決定在他們年會時示威。

這天晚間，當與會者在層層警察保護下開始入場時，即有五千至一萬的示威群眾集合在紐約希爾頓飯店門口示威叫喊，有人想擠進去，但均被推回，也有幾人被捕。然後有一群人開始丟瓶子、油漆包和牛血包，又有幾人因而被捕。而後，群眾又開始攻，警察欲還擊，群眾就開始跑，如此往返，實施「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三個多小時，整個曼哈坦區一片混亂，直到晚上十一時，被捕者四十六人，至少廿一人受傷，五名警察受傷。哥倫比亞大學的幾名學生領袖，如Ted Gold， Mark Rudd， Ron Carver等亦在被捕者之列。紐約時報譴責示威者。

而在校園內，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整個行動也非常的昇高。由於不斷的討論、教育，幾百所大學反美國帝國主義的情緒非常高昂。哈佛大學的學生領袖卡辛（Michael Kazin）說：「由於我們的看法改變，我們的策略水準也跟著改變。」整個校園除了攻擊徵兵外，中央情報局，與越戰有關的企業如杜爾公司等，又再加上了校內的「軍訓處」（ROTC）。

根據事後的統計，這個秋季的學期內，全部大專院校有四分之一有學生運動，規模大的大學則百分之六十以上有反徵兵示威抗議。另一統計指出，一共在一〇六所大學有過反徵兵示威，這一季的大規模校園事件計有六十起，其中四十件是反徵召，六件是攻擊軍訓處，六起反戰，八件攻擊學校當局。至少有廿起大規模靜坐事件是意圖制止徵召人員到校的活動。

在許多示威事件中，至少有幾十次校方請警察入校，因而發

生暴力衝突。根據調查，警察一入校的必然結果是示威立即擴大。百分之七十三的這種案子都發生逮捕事件。參與越戰燒夷彈製造的杜爾化學公司在一九六七到六八年的學期間，一共到三三九所大學招募人員，受到示威的計有一一三起。

而在首都，情況更是熱烈。一九六七年十月廿一日的五角大廈前示威最爲壯觀。五角大廈是美國軍警最高權威地點，這次大示威意義至爲不同。

這天中午，十萬以上群眾，學生爲主，其他尚有老人和婦女等，在軍警全副武裝的情況下前往示威，軍警均刺刀上鞘，列陣以待，人群只要一過警戒線立即被捕。但還是有一群激進青年衝進封鎖線到了門口，但被裏面衝出的軍人用槍托痛擊被捕。另外一群青年衝向邊門，也被槍托痛擊，然後逮捕。其後，數千人直往前衝，軍警放瓦斯也擋不住，一直衝到了五角大廈門口的草皮上。有人衝上五角大廈的升旗臺，升起一面越共的旗子。更有一個青年和他的女人越過圍牆，在軍警目瞪口呆下露天作愛以示抗議。有人丟石頭，打破了玻璃，這是唯一的暴力。整個情況非常混亂而嘲諷。

黃昏到了，食物不知從何而來，群眾沿牆而坐的休息。大麻煙不知從何而來，大量在群眾中散發。有人唱歌、有人演講，忽然，有人燒徵兵卡，於是接二連三的一直有人跟下去，這種小火光在群眾中旋起旋滅，估計一共燒了一百多張。晚間，天氣很冷，群眾燒起營火取暖。半夜，軍警受命，開始向群眾移動。有人起來演講鼓動說：「軍隊雇來是爲我們，不是爲你們，不是爲所有將軍們的。他們屬於所有將軍們都沒有份的美國的新希望。」軍警第一波攻擊了右邊猝不及防的群眾，他們正開始準備時，軍警

暫撤，調整陣勢，嚴陣以待，雙方均不再動。衝突的混亂，軍隊和平民對殺的局面並未發生。一直到天已黎明，群眾相擁取暖，軍警列陣嚴防，保持和平的對立局勢。

迄至這時，已有七百人被捕，一千四百人受傷，軍警都已裝上子彈，兩次施放催淚瓦斯。天亮後，群眾認為他們攻擊美國帝國主義戰爭機器最高象徵的五角大廈的任務已告完成，於是乃紛紛退回，整個危機宣告解除。這次事件對美國政府和人民都有極大的意義。這次事件差一點就造成美國軍人屠殺中產階級美國人子女的慘劇。

五角大廈事件後，激進學生開始擬出一項「向政府機構進軍」(TIR) 計劃，將今後的目標對準與軍方有關的人力情報機構。

這時，由於整個運動水準的升高，像卡佛特 (Greg Calvert) 已有了這樣的感覺：「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已經覺得它的革命性。在反抗運動中，它是真正的激進，而且已顯示出白人革命的潛在性。」對許多激進青年，已經認為單單學生運動已經不夠，必須建立一個更廣泛的青年白人、黑人、工人階級、窮人等的聯合陣線。委內茲爾 (John Venezia) 指出：「根據我的看法，單單學生並不足以造成革命。校園運動的唯一理由是學生是有用的，大學有一大群尚無中產階級價值觀的有潛力的青年。否則，校園運動就根本不值得了。如果在一九六七年代的美國，一個人還認為他是個學生，那麼他等於否定了自己是革命派。」

但是，激進的學生們對於自己的角色畢竟找不到理論的憑據。以往他們相信的「新工人階級理論」(theory of new working class) 備受攻擊，理論的沒有出路，使他們覺得他們不像十九世紀革命時代的青年那樣有理論家作後援，最後，他們便只有從馬

克思主義裏尋找出路。但仔細檢查，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似乎也不怎麼清楚。於是便向中南美洲、南北越的革命派去尋找支援。他們開始過半公社式的生活，從大麻和LSD裏找心理經驗，並開始從事更廣泛的政治教育。而這個時候，「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芝加哥的辦公處又數度受到不知名者的攻擊，使得他們必須在辦公室建立安全系統和廿四小時守衛。

對於「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理論的困境，老左派背景的「進步勞工黨」倒是有許多批評，他們認為學生是不夠的，學生應尋求途徑與工人結合，這對他們頗有刺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聖誕節假期，「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印第安那布魯明頓城召開年會，會中對許多問題很有爭論。但反抗和準革命的趨勢則繼續著。

時序進入了一九六八年，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在這個時刻已面臨分水嶺的新情況。運動不斷的激進化，已經失去刹車的可能，美國政府這一方也無適當及可信的方法來調整它的對外政策，甚至也顯示不出改革的誠意。這種情況當然是可以理解的。戰後的美國霸權時代迄未過去，美國政府的自信滿滿，使它失去了冷靜思考和設法解決危機的許多機會，徒然想以強力的反擊來遏阻學生的不滿，相互激盪的結果，使得整個學生運動由冷靜與和平，走向衝突與不滿，接著再往上走，走到了革命的、暴力解決問題的邊緣。（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正是革命的蓄勢待發階段。）

五角大廈示威事件之後，促使美國政府提高警覺和加強鎮壓。詹森總統要求所屬對「所有混亂的事件完全注意」，並成立了一個高階層的總統特別小組統一指揮。美國國防部擴大它的情報網，一直到這個情報網收集到一萬八千名激進份子的資料並建立

兩大檔案後，首席檢察長才知道。學校的學生軍訓處人員也開始密切監視學校的激進份子。徵兵處通知所有的徵兵中心，要立刻將所有反徵兵份子都列為 1 A 級，立即徵召，送到越南戰場。至少在六個城市開始對反徵兵運動者採取司法途徑。聯邦調查局對學生的情報工作本來已有六千三百個特務人員負責，現在更大大增加員額，加強監視。參眾兩院也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激進學生團體。一九六八年一月，詹森總統更下令「反顛覆活動局」（SACB）注意有關的社會團體。

由於美國高階層的壓制政策，地方政府也開始跟進。在奧克蘭，對一九六七年十月份的反徵兵示威開始追究，七個激進青年被起訴，此即「奧克蘭七人事件」。艾荷華市也開始以陰謀罪名起訴七名艾荷華大學的學生。警察單位開始全面監視「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每個分會，鼓勵保守派學生告密。對於這一系列的鎮壓，激起了很大的憤怒，即僅以史波克（Benjamin Spock）的被控為例，即在許多大學引起示威遊行。

一九六八年二月，「學生民主社會同盟」與「進步勞工黨」由於學生和工人聯合的問題而開啓理論之戰，雙方長期以來的結盟等於死亡。

一九六八年二月以迄三月，這一期間，柏娜汀·杜宏開始組織東海岸法學院的青年。杜宏（Bernardine Dohrn），為學生運動後期極重要的激進派領袖。她廿五歲，任「全國律師協會」

（NLG）的助理執行秘書，她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她的修長玉腿在東海岸是出名的，頗具吸引力。一九六八年春，她曾赴歐洲三個星期，與歐洲激進學生運動串聯。回來後即積極致力於連絡各地法學院學生，她在後期愈來愈激進，成為「氣象人黨」

革命團體的領導人。她也是後期使得婦女運動組織起來的核心人物，在一九六八年春天，她一共在全美組織了卅五個非正式的婦女運動團體。

在基本局勢上，一九六八年的春天，除了美國政府的鎮壓外，麥卡錫的競選，以及越戰情況的改變，本來已有使整個運動為之低降的可能，但是金恩博士的被殺，哥倫比亞大學事件等卻使得它有了出人意外的轉變。

春季開始，反抗運動在較大的城市似乎已漸漸的洩了氣，反戰的尤金、麥卡錫和甘迺迪參加總統大選，美國政府已被推著走向和談的道路，詹森總統的地位已下降。反抗越戰的運動已跟著下降，徵兵反抗者愈來愈多發現無事可做，人們已不再感覺不合作是需要的。許多高中學生也都不認為反徵兵是個重要的問題。尼克森並已表示徵兵制度要重新檢討。而麥卡錫的崛起，他三月份在新罕普什爾初選的強勁聲勢吸引了許多自由派青年，甚至許多「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學生也參加他的「兒童十字軍」。

可是，四月四日，金恩博士在田納西州孟菲斯的一間旅館被刺。這個事件激起了狂潮。因為對激進的黑白青年，這是一個訊號：古老的方式已經過去了，非暴力、道德見證都屬虛言。

黑人社區立即爆炸開來。金恩死後，很快的在一百個城市就有了大小規模不等的黑人暴動。聯邦調查局長胡佛說：「四月份的暴亂造成了六十人以上死亡，數千人受傷，數百萬財產受損。」聯邦軍隊進入了芝加哥等大都市，出動軍力高達八萬八千七百人。「全國暴力委員會」(NVC) 調查說：「在我們國家從來沒有如此大規模的種族暴亂事件。」

對於「學生民主社會同盟」，認為這是整個國家系統走向種族

滅絕的症候，對整個系統要起來反對。結果，在廿四所黑人大學及學院，一百所白人大學有了抗議事件。

當金恩博士死訊傳出，柏娜汀·杜宏知道後，紐約的好戰激進份子在時報廣場集會。對於杜宏，有下列之記載：「她開始哭，哭了一會，她談到在芝加哥和金恩一起工作的往事，她說她不一定常常同意金恩，可是她認為他是個人。然後她回家，換了衣服再出來。我永不忘記，她說。她已經換上了叛變的衣服——長褲。我們走到時報廣場，這裏有黑人青年和白人青年示威。她仍然哭，然後我們對城市游擊戰以及我們今後要怎麼做談了很多，決定用一切必要的方法。」「用一切必要的方法」，這句話可以顯示當時激進派青年相當普遍的態度。

事實上，一九六八年一月起，校園就已有爆炸事件，一月到五月，總計爆炸和縱火共有十起，包括霍華大學校舍，柏克萊加州大學軍訓處，奧克蘭電廠接到勞倫斯放射性實驗室的電源路線被破壞，史丹福大學，田納西農工大學，南伊利諾大學等。這在美國學生運動史上尚屬首次使用這種暴力。

（一九六八年的四月中旬開始的學生反抗便在如此的條件下逐漸升高）因為一個早已擬訂的「十日反抗計劃」（TDR）開始推動了。這個計劃在一九六七年「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年底會議中即已提出，最初的計劃名稱叫做「十天搖動美國帝國主義」計劃。

在這個計劃下，有至少五十所大學和學院舉行集會、遊行、強教、靜坐示威等。它的高潮在四月廿六日出現，可能全國有百萬學生罷課而分別舉行各種抗議活動。可是，與此同時的哥倫比亞大學事件卻更有爆炸性。

哥倫比亞大學在六〇年代初即已有了「學生民主社會同盟」

的會員。等到一九六五年春季該同盟示威遊行後，哥大分會便在 John Fuerst 等人手中建立起來。一九六六年秋季，他們抗議中情局到哥大招募人員，聲名大噪，會員增至一百多人，後來在哥大極著名的左傾虛無黨份子馬克瑞德 (Mark Rudd) 即在此時加入。一九六六至六七學年度內，哥大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分會並不熱衷於學生權力的問題，避免與校方衝突。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情局招募人員再度來臨時，有十八個激進會員前往靜坐抗議，分會亦不表支持。但分會在廢止學生分等級上卻居領導之功。因此地位更形上昇。但其後，分會作用又嫌保守，會員無法增加，且無法凝聚，於是，行動派乃脫穎而出，其中包括馬克瑞德等人。其後瑞德被選為分會主席。到了一九六八年春，他們決定對下面這些問題加以發揮：哥大佔用了哈林黑人區的土地建體育館，這是種族歧視；哥大和「國防分析機構」(IDA) 有密切關係，這是帝國主義；對於學生的示威和訓練，校方只是任意處置，這是權威主義。三月廿七日，馬克瑞德率領一百多學生前往辦公大樓呈遞反國防分析機構的意見書，兩週以後，學校紀念金恩的追悼會上，他擾亂會場並譴責學校佔用哈林區土地，打擊黑人工人，參與國防分析機構對付黑人的暴動控制研究，懲罰非暴力示威的學生，這表示根本不尊敬金恩。又過兩星期，他們決定往校長辦公室示威遊行。第二天，四月廿三日，事件便發生了，情況出乎激進份子中好戰份子的意外。

校園暴亂初期，激情即不斷高漲，學生一開始就佔領一棟學校建築物，扣留一名學校教務人員作人質。接著更一棟一棟的佔領，到第四天即佔領了五棟校舍，到了第八天，哥倫比亞官方下令警察入校，警察在哥大校園的暴行震動了全美國，學生不分程

度的普遍被毆，計有七百多人被捕，二百多人受傷。

哥倫比亞大學事件有三重意義：

一、對參與的學生而言，事件的期間，他們進行公社式的生活，使他們產生歸屬感。一個激進學生說：「對我們大多數，這次事件使我們覺得自己有用，覺得我們所做的是屬於我們的。」

「我願將我的生命組織起來從事激進的工作。一部份原因是這將使我伶俐聰明，另一方面是這使我覺得自由和生活在其中。」

二、便是從與黑人學生聯手後，使白人激進份子覺得有了更多反叛合法性。

三、最重要，而且最具經驗辯證意義的便是這次事件喚醒了學生一種意識，將他們從「先有自由大學再有自由社會」的觀念，改變到「先有自由社會再有自由大學」的觀念。哥大激進學生認為學校改革根本不是問題，更重要的是革命。格里曼（Dick Greeman）說：「學生反叛，需要和黑人社區以及勞工結盟，而不是在校園內找盟友。這表示，一個自由大學只能在我們有一個自由社會時才能達成。」哥大事件之後，這個學期結束，許多學生放棄了他們校園改革及學生權力的美夢，離開了學校。學生革命組織「氣象人黨」的種子在這時已經種下了。

哥倫比亞大學事件可能是當時所有事件中最受大眾傳播媒介廣泛報導的校園事件，它使得報紙電視有事可做，使政客憤怒，使學術界震驚，使學生鼓舞。於是電視、報紙展開了真正大規模的圍剿。圍剿聲中，指責哥大事件是「學生自大」，是「少數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極端策略」，「我們的自由社會前途黯淡。」，是「傳統的革命策略」……等。更極端的是道瓊公司的雜誌更指控說：「哥大事件學生佔領校園是革命，他們將會在佔領大學後接

著佔領市政府、州政府、或首都。哥大危機已嚴重威脅每個美國人。」幸福雜誌更指控哥大事件不是抗議，不是反叛，而是真正的革命。目的是在「先控制大學，建立一所解放大學，摧毀現在的體制，然後再推翻資產階級的美國。」

哥大事件後一週，詹森總統到右派、從不鬧事的德州基督教大學演講，指控哥大事件的激進青年是「青年集體主義者」，極右派的「非美國人活動委員會」(UAAC) 指控「激進和黑人團體已嚴肅的考慮要在美國進行武裝革命」。接著，至少有一半的州立法機關接獲將激進組織視為非法的議案，或者對不滿學生及不夠強硬的大學撤回基金的議案。美國眾議院通過議案，對妨礙大學的學生，對向學生妥協因而不利於徵兵的大學，均不再資助。聯邦軍隊也開始加強內部防衛。政府並通過一項法律，凡越過州界參與他州暴動或暴力事件者處五年徒刑和一萬罰款。五角大廈成立了「國內戰爭辦公室」，研判軍事特務機關的情報俾作軍事上的反應。

大學方面則爲了防止學運，開始請學生參加學校委員會。學校及教職員學生三方面的委員會也相繼成立，課程委員會也成立，並普遍增設一個學生事務副校長。據調查在這個學期結束前，已有百分之七十二的大學管理事務讓學生參與。

哥大事件一發生後，至少有四十所大學開始進行抗議和佔領學校建築物。在布魯克林學院，切利州大，德拉威爾州立大學，西北大學等各種形式的示威，使得警察大力攻擊，造成暴力事件。夏威夷大學，俄亥俄等大學則有一五〇人被捕。一週內全美到底有多少次示威已難數計。全國學生協會估計，從一九六八年一月起至六月，騷動的大學有一一〇個，大小示威二二一次，其中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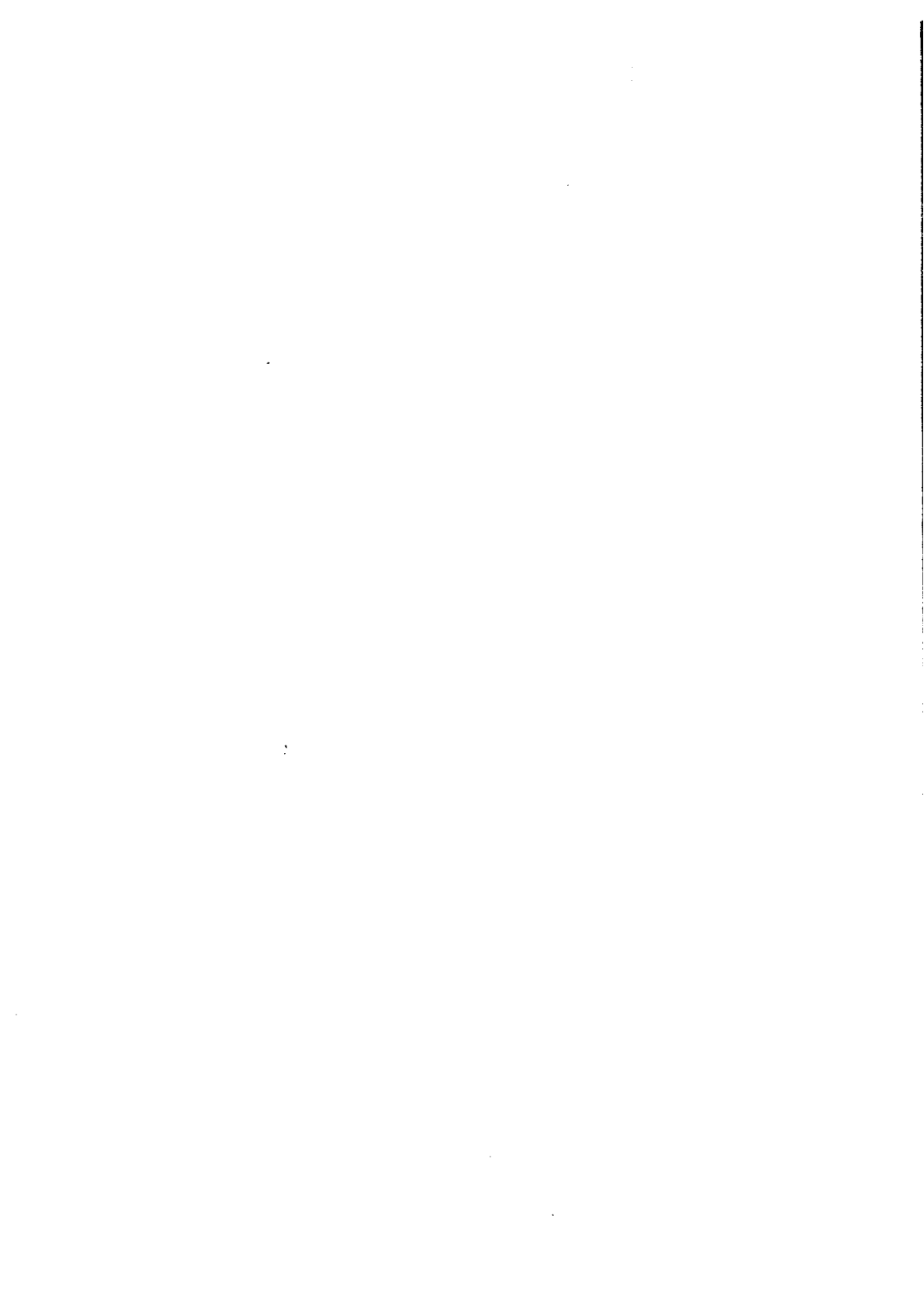
大多數發生在四月和五月。另一項統計則說此一期間各種示威多達三一〇次。「教育測驗局」（ETS）估計，一九六八年有三四六三次示威事件，其中約兩千次發生在春季。

又據統計，此一期間的校園暴亂高峰時期，範圍遍及全美國，三分之二較大規模的大學均捲入狂潮之中。學生的策略包括靜坐、示威罷課、挾持人質、佔領校園等。絕大多數的學生贏得了勝利，學校或者妥協，或者答應改革。但一些例子則是警察入校、逮捕、開除、用校規處分。

哥倫比亞大學前四個星期的事件之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由於它的四名領袖受到校規處分，於是校內群眾再起，將學校全部建築物佔領，最後學校下令，當警察來學校清理時還有任何一棟建築物有學生立即開除。顯然學生已面臨了最後的抉擇，或者做一個真正的學生，或者就做一個真正的激進份子。激進學生瓊·龔察萊斯說：「這種衝突使我們面對一個問題，我們對自己的戰鬥有如何的信念，如果我們的目標超過僅僅大學事務而已，那麼我們在必要時就應離開學校。我們是政治行為激進的學生？或者是個激進份子，只不過剛好是個學生而已？」

結果七十個人堅持到底，警察來了，第二回合暴行發生，當時，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中，職業革命家開始產生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開會，柏娜汀·杜宏被選為「組織間秘書長」，迄至這個時候，「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三五〇個大學有分會，會員約為十萬，到了它的黃金時代。



第10章

革命(1968~1970)

在「學生民主社會同盟」裏，我們相信，對於帝國主義的問題，唯一的解答，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自由派的改革，不會改變社會的基本結構，從而無法終止富人對工人的剝削。如果我們想要自由，那麼，控制我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帝國主義怪獸就必須予以澈底摧毀，代之以社會主義。

我們所謂的經由社會主義革命，即將美國完全的重新調整組織。工人將控制他們生產的貨物與財富。學校、交通運輸、住宅，以及所有社會福利機構都將由人民控制，而不是由那些少數現在控制美國的富人來控制。黑種人和黃種人將控制自己的社會，並且將恢復幾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壓迫下已剝奪掉了他們的文化。婦女將從資本主義美國下她們的次等地位中超脫出來，他們將和男子發展出一種沒有剝削的人際關係。

在過去，「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已經成為一個主要由學生組成的團體。一度，我們曾為大學的改革而戰鬥，這只增加

學生享有的特權。現在，「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更趨壯大，為了要在美國進行革命，我們必須建立一個不僅包括學生，而且包括更多未被學生容納的青年的青年運動。我們將建造一個了解帝國主義及其統治階級是我們的主要敵人，而社會主義是我們的主要目標的工人階級青年運動。

——引自「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機關刊物《NLN》

一九七〇年八月號

早在一九六六年普林斯頓一次會議中，卡佛特就已提出了「革命意識」的問題，到了哥倫比亞大學事件之後，革命意識已自然產生。數千大學生都愈來愈同意將學生運動視為美國第二次革命的前鋒的觀點。

何謂「革命」？這個問題對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並不一定是個明確的概念，或許有極少數人真的理解革命的意義，但對絕大多數，甚至包括「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領導階層在內，可能並不對此有深刻的理解。他們所理解的「革命」，或許只是較大的改變，或許只是虛無主義式的發洩，或許更不過是青年次文化中文化及形而上的反叛。

從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甫一開始，學生們所欲改變的是去消除美國「社會中的罪惡」，因此嘗試著用民權運動、大學壓力、反戰遊行、選舉參與、學生權力、反徵兵、示威、校園騷亂等來達成這個目的。但是，一九六八年春季的整個情況卻使得他們整個失望，政府的加強壓制，金恩的死代表了民權運動的絕望，甘迺迪的死代表反越戰的絕望，也代表了另一種勢力的可能抬頭，這一切的一切，乃使他們認為所謂「社會中的罪惡」是不對的，正確

的說法是「社會之罪惡」，罪惡不是在社會中的，社會即罪惡。巴頓 (Bob Pardun) 說：「那一年 (指一九六八年)，人們自然的獲得了一個結論，要停止戰爭的唯一辦法是革命，要停止種族歧視的唯一辦法也是革命。」)

刺激美國學生最大，而且也延伸到全世界學生運動的是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國巴黎的學生大暴動，那次大暴動使得政權也發生了改變。法國學生運動的啓示是這樣的：學生運動的戰鬥可能會被撲滅，但它卻可以改變政府，或推翻一個政權。這種觀點是在激進派學生中已經產生。湯姆·海頓 (Tom Hayden) 即說過：「有一點是確實的；我們正在向權力靠近，這種權力就是：如果國家機器不人道的話，我們就讓它停掉。」

除此以外，整個六〇年代已確實驗證了弱者的權力。美國黑人的權力，學生在校內及校外的權力，第三世界弱小國家的權力，地下鐵工人和電信工人的權力，這些弱者的權力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的不斷昇高而到革命觀念的形成，便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整個學生運動的如此走向，除了它的客觀條件外，一種由於大眾傳播媒介誇大而造成的副作用也顯然有巨大的影響。一開始，所有由保守勢力控制的大眾傳播媒介就在散布一種學生運動危險的觀念，並打擊學生運動，同時對每一孤立事件又作聳動的渲染。因而，它造成了幾種結果，對許多非激進份子便製造了許多他們可以認同的「被壓迫的英雄」，在一個已越來越失去浪漫英雄的資本主義社會，激進的學生領袖便成了學生普遍崇拜的對象，學生們由認同這些激進學生領袖來肯定自己的青年的價值，此其一。對激進學生領袖，聳人聽聞的校園事件使他們成爲英雄，無論他們本來的目的是否爲了個人英雄主義，但大眾媒介卻激發

了他們的個人英雄主義。上述的兩種結果，對一個發展中的運動乃是一種溫和的，不知不覺的侵蝕，它對這個運動的長期生命是可怕的病毒。

因為，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在它逐漸的發展中，學生領袖們如果不能有比上一次更具衝突性（亦即新聞性）的安排，那麼它繼起的行動便難以吸引學生群眾，這也就是說，學生領袖已不自覺的被推向不得不一次比一次昇高衝突的程度。它一再昇高的結果，便不得不提前發動它早熟的革命。從而，它生命的短促是可以預見。

對於這種情況，六〇年代學生激進組織中並非沒有人有此遠見，因而有了「實踐軸心派」(praxis axis) 和「行動派」(actionist)，「基地建設派」(base-builder) 和「衝突派」(confrontationist) 的對立，「實踐軸心派」和「基地建設派」乃主張應作實質的發展和群眾的教育，而「行動派」和「衝突派」則只圖一時之快而拼命昇高衝突。兩者的對立結果，當然是「基地建設派」被抨擊成「怯懦」或「自由主義的殘餘」。許多有理想、有知識的學生中堅份子，在這種情況下，命定的沒有對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作出更長遠、更偉大的貢獻，徒然一併被捲入早熟的革命中。因此到今天論斷那個運動，已有若干學者認為，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夭亡，一部份原因是它被大眾傳播所「收買」，然後又「出賣」的結果。

一九六八年夏季的熱潮和學運的高漲聲中，「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密西根州立大學校址所在的東蘭辛開會，意圖使這個同盟成為革命的機構。柏娜汀·杜宏、湯姆·貝爾 (Tom Bell)，以及哈立威 (Steve Halliwell) 三人提出報告，報告中說：「在

運動歷史的這個分水嶺上，未來的挑戰是將以往建造一個激進運動的作法，改變成利用這個運動來製造革命。」報告中所提的策略有二：

一、在大都市發展革命組織，儘量以校園為基地，但應擴及高中生、二年制短期大學學生、年輕工人、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老會友等。

二、替一個新左派革命機構的發展先打好基礎，目的在促使「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中的激進份子有更激進的組織可以前往參加。

不過，由於老左派的「進步勞工黨」份子的反對詰難，此案並未通過。「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一開始就以反宗派主義為會議之傳統，「進步勞工黨」多年來一直尋求方法要使學生與工人結合，在多次「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會議中，「進步勞工黨」的份子都百般刁難，這次大會尤然，最後是「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將「進步勞工黨」排斥成外圍。

這次會議重新選舉，克隆斯基 (Mike Klonsky) 當選全國秘書長，哥頓 (Fred Gordon) 當選教育秘書長。柏娜汀·杜宏當選組織間秘書長。

克隆斯基，廿五歲，他是所謂的「紅尿布貝貝」——他的父親是以前共產黨地區組織的書記。他是聖費南度谷州大畢業。

哥頓，廿四歲，哈佛學院畢業，作過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 的學生。

柏娜汀·杜宏，她的簡歷前面已提過，有強烈的革命衝動，是第一代激進份子。

東蘭辛的這次會議，對今後的活動並未提出任何計劃。但它

確實已向革命的路上跨出了一步。如果東蘭辛是向革命跨出第一步的會議，那麼，八月份在芝加哥召開的民主黨全國大會就代表了反抗時代的正式結束。因此它經由電視轉播，它造成警察放任的殘暴，它顯示了美國自由主義的崩潰，它顯示了美國兩黨制的老朽。因此它成了六十年代特殊關鍵事件之一，反抗無用，有用的是革命。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第一代會員和領袖如湯姆·海頓、戴維斯等一直在芝加哥負責示威的工作，他們兩人是「全國動員委員會」的計劃協調人，他們和許多地區反抗團體都傾向於「反抗」的策略。他們認為示威等反抗手段，對民主黨大會，是用來證明政客們的謊話的，「以鼓勵並幫助不滿的民主黨員尋求新而獨立的反抗和抗議形式」。但對「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新人們，他們充滿革命欲望，想要組織不滿的民主黨員加入革命行列。因此革命派和反抗派意見相左，革命派認為遊行示威等已是「老式的政治學」。

但漸近八月，反抗派和野痞們在芝加哥的行動卻聲譽日增，於是革命派乃決定自全國調各地的組織家前來芝加哥和麥卡錫的人接觸，他們在通告中說：「把麥卡錫的青年從他的囊中拉出，拉到我們的旗下。」從各地來的組織家有五百人，成立了五個「運動中心」，印了許多向麥卡錫的支持者呼籲加入革命這一路線的宣傳文件。

但是他們整個估計錯了，民主黨大會的這一星期，顯示出活力的並非麥卡錫的青年，也不是其他來自全美各地的運動家，而是芝加哥當地的黑人、黃種人，以及白人。他們在街頭示威，生龍活虎。對「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激進份子，這件事給了他們

很大鼓勵，使他們根本不管什麼麥卡錫，而開始注意街頭的游擊戰術以避免類似芝加哥事件的慘痛代價！在芝加哥的一星期會議期間，示威者一百多人住進醫院，六二五人輕傷，六六八人被捕，一人被警察射殺。

芝加哥民主黨大會提名韓福瑞，決定的路線仍是自由派路線，但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生們由警察的暴行，又向革命走了一步。他們指出：「我們五天來一直在街上，我們根本不管麥卡錫會輸會贏，只有美國青年和越南人能停止越戰，只有美國的青年和黑人能創造一種新的生活。這不是一個自由派參議員的事，是我們的鬥爭。」

一九六八年秋季開始的新學年度，有些人認為哥倫比亞和芝加哥事件仍可使學生運動繼續，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則已大規模招收新會員，這也是他們在高中的分會第一代會員進入大學的時候。他們在要求新生加入時是這樣說的：「我們告訴人們，年輕人即革命，政治是和生活、鬥爭、生死有關的。我們認為今天並不是除了參加示威運動外就沒有其他路徑。我們告訴青年，如果對越南人把燒夷彈當作早餐不滿，對黑人把催淚瓦斯當做正餐，和對中午吃塑膠不滿，那麼就找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加入我們。」

這段時間，「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會員數急速成長，到了十一月，會員已增至八萬到十萬之間，分會則有三百五十到四百個。認同於他們的青年高達百萬人以上。學生運動的滋長，到了這時，社會也不得不開始承認它的價值。美國《時代週刊》在報導中指出「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對不滿現社會的青年乃屬一塊磁鐵，並報導「其中已形成了更嚴重的校園行動主義」。《生活》雜誌出了

一個十二頁專題報導，用傾向於同情的態度報導學生運動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並請問了多位它的領導人。《展望》雜誌並報導說：「校園的這些情況對我們整個社會有教育的意義。」這些報導頗具鼓勵學生士氣的作用。

在這種樂觀的情勢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到了它的尖峰時刻。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至十三日，在波爾德的科羅拉多大學召開秋季全國大會，四百五十人參加。這次大會，他們擬出一個構想，準備在短期內成爲一股全國性的力量。在柏娜汀·杜宏、約翰·賈伯、傑夫強斯等人所提的建議中表示得很清楚。這項建議中指出，目前「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已獲認同，因此可以在總統大選時採取全國性的行動，一則把他們的觀念注入政治舞台，二則可以藉著全國各地普遍的行動而將它們的全國形象注入地方落實。進而並可擬出一個發展革命種子的計劃，促使全國群眾覺醒，各人在各人特殊的範圍內一起來行動。

他們擬議的計劃是，十一月總統大選，他們有兩波行動。第一波是首日進行全國罷課，採取群眾大會和強教措施，否定大學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次日則進行每個城市全面的遊行示威。此項計劃輕易通過。

而且，到了一九六八年秋季，整個學生運動已降低了年齡水準，在紐約已有了「高中學生聯盟」(HSSU)，其他許多著名的都市也有了類似機構在形成中，高中生抗議運動也在增長，到了一九六八年年底，百分之廿的高中受到波及，在此次大會中特別的也通過了一項有關高中部份的計劃。

會中並提出了一項「學生勞工行動計劃」(SLAP)，這項計劃本來在六月份的大會中就要提出，因爲時間關係而擱置，在這次

大會中正式提出，認為應建立學生和勞工的結盟，這個計劃作了冗長的討論，但未通過。

會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開始積極籌備十一月大選日的行動。聯絡人，宣傳品紛紛寄出。但最後實施的結果卻非常不理想。校園行動只有一些小規模的罷課和群眾大會，最多不過幾千人，在柏克萊加大、哥大、密大、威大等激進學校也不理想，而地區性之行動，除了波士頓有四千人的示威遊行外，白宮前示威只千人，其中一百多人被捕。芝加哥舉行了搖滾樂群眾大會，也只千餘人，舊金山和洛杉磯也只是千人場面，紐約才六百人。它的失敗是很簡單的：三個禮拜就要發動一個全國性的行動，在時間上太倉促；地區分會負主要責任，便發生組織家和經費不足的現象；許多人太注意要傳播媒介宣揚，反而疏忽了群眾的組織；而在情勢上，詹森的下台，巴黎和談的進行，對北越轟炸的停止，也使人缺少了反對的激情。

這次全國性計劃的失敗，自然亦使得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即已存在的幾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內部問題表面化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各分會內部行動派與實踐派的對立。吸食麻醉藥與反麻醉藥的對立，全國秘書長克隆斯基即指出：「有一些狗屎事情，像人和人間的衝突，行動或教育群眾孰重的爭論，麻醉藥或反麻醉藥的爭論，使得許多分會失去功能。」不可避免的，有些分會因而減弱，有些分會分裂，有些完全瓦解。

有關行動派與實踐派的衝突，乃是一個激進團體通常會有的結果。行動派主張直往前衝，衝向革命；而實踐派則主張建立核心陣地，教育群眾，提高水平。這種衝突在肯特州大、美國大學、北德州大學等都很嚴重。「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早年的團結與忍讓

早已消失。對此，老領袖卡佛特 (Greg Calvert) 及內門 (Carol Neiman) 即指出：「到了一九六八年，早年的組織心態已被一種強硬的辯論所掩蓋，一派已經不再談人民的願望，而只是滿口馬列主義假科學的術語。」這種情況可以用密西根大學為例，它本來的分會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就分裂成兩個團體，革命派另行成立了一個「激進幹部委員會」(Radical Caucus)，與主張教育群眾的原來分會脫離，並加入「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成為新分會。在「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這尚屬首次，一個學校有兩個分會。

「進步勞工黨」對「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滲透，在整個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史上是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它的滲透似乎有著許多複雜的因素，有些基於信念，有些基於搗亂，有些則是聯邦調查局特務的滲透，不一而足。「進步勞工黨」份子打入「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曾篡奪了柏克萊加州大學分會的領導權，使得原來的會員被迫重新組織了「激進學生同盟」(RSU)。種種情況，使得「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和左翼共產主義者以及「全國動員委員會」結盟，以期驅逐「進步勞工黨」的份子。這已造成「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危機。

這種混亂與危機，由於它的領導中心的愈來愈傾向革命而更趨嚴重。他們對剛入學的大學生宣稱要打破學校，對剛剛有投票權的人宣稱投票選舉無用論，使得許多新進青年學生趨向革命，這種性向並無任何理論結構，因此完全不能產生統一的政治認同，對某些人，革命是出風頭；對某些人，革命是嬉痞式的生活方式；對某些人，革命是向黑人及第三世界認同；對某些人，革命是毛澤東或胡志明的化身，它的整個結構非常鬆散，整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政治譜系 (spectrum) 非常分散而距離遙遠，

它潛存著危險的解體傾向。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問題重重，一部份原因也是整個社會塑造的。此一期間，整個美國社會再次對學運作了猛烈而全面的反擊。其中以《讀者文摘》的打擊可為代表，《讀者文摘》這個全美銷行份數最多的雜誌指控「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是「校園騷亂的工程師」，專事暴力、暴動，是「反民主」、「顛覆」，是「極權主義的少數」，不是受史達林影響就是受莫斯科指揮。

聯邦調查局長胡佛也指控「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目的是「先使教育癱瘓，再使經濟癱瘓，最後使政府瓦解」。他如「非美國人活動協會」、加州州長雷根，……等紛紛指控，並要求制裁。而總統大選所有的人也都以「法律和秩序」為題，攻擊學生。美國各種特務機構更加強偵探方面和滲透的工作，並加強對學生的約談，約談者均被冠以「陰謀」的帽子，以備必要時採取行動。最後，所謂的「芝加哥陰謀事件」即種因在此。聯邦調查局的特務工作，除了學生外，還擴及其他如種族不滿份子等。

而大學當局也加強對學生的控制，秋季開學前，全國大學校長就在丹佛市開會討論如何控制學生不滿份子的問題，學校警察力量增強，開始可以攜帶武器，安置電子安全系統，將重要的學校紀錄移到秘密安全處所，加強法律諮詢等。學校和地方警察局以及聯邦調查局的聯繫與合作加強。此一期間各校仍學潮不斷，動輒警察被召入校園，至少有廿一所大學召警察入校，被捕者至少一、二六五人，至於學生在校外行動被捕者，尤不在此數，例如選舉日的示威，就有二百人被捕。「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科羅拉多，威斯康辛等大學已被視為非法。校園的學校反擊，可以由下面各地的情形看出，一九六八年九月，伊利諾大學黑人學生領

導靜坐，二百四十人被捕；十一月，聖費南度大學，一百多人被捕，廿八人且被判卅年重刑；十一月，紐約州立學院一七〇人被捕；十一月，奧希克希學院，九十八個黑人學生被捕且被開除；在康州大學，兩次事件有七十九人被捕，一五〇人受傷；舊金山大學有五六三人被捕，八人受傷住院。

除了「硬」的一面外，學校也有「軟」的一面，校園改革接踵而來，不適任之校長被撤換，學生參與學校事務，伙食住宿改善，學生地位提高，……凡此種種，均使得校園景況有所改善。

不過，儘管如此，從一九六八年九月到一九六九年一月的這個學期，全美仍有七十四起較大規模的學生運動，著名的包括了舊金山州大的學生罷課，駐越大使到紐約大學演講被轟等，其中，廿一起是靜坐和佔領校園，十一起學生罷課等，但它和稍早前的數百起大學騷亂，實已改善了許多許多。

對於「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由於來自特務，嚴厲校規，各方面的打擊，顯然處境愈形艱難。它的會員間由於特務的滲透而開始互相猜忌，以往的開放性也開始降低。校園內的自由派學生，由於情況不利，已不再聽從或被吸收。

但是，不利情況下，激進學生卻更加緊密的集結了起來，而且成為有自覺意識的革命家，在心理上已有了「拿起槍來」的準備。從一九六八年秋季的這個學期，校園爆炸和縱火事件高達四十一起，比上個學期增加了四倍，可以看出危險的趨勢。其中，包括柏克萊加大學生軍訓處的被炸，德拉威爾大學、俄勒岡大學、德州大學、華盛頓大學等。華盛頓大學被焚時，一群學生跳舞歡唱：

這是第一次
這種玩笑剛剛開始，
燒掉，燒掉，燒掉。

對於爆炸和縱火，是否「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曾牽涉在內，這是個很含混的問題，它在聖易市的會員麥可·西斯凱（Michael Siskind）涉及華盛頓大學爆炸案，被判刑五年。但與「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有來往的幾個反文化地下雜誌如*RAT*，便已報導如何做小型炸彈等。

但此時，「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已開始有人作下述之主張：「和平主義掩蓋了階級的暴力本質，它是統治階級用來保持他們勝利的。統治階級用盡一切必要的方法，來使人民在他們的一方。我們必須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包括人民暴力，來擊敗他們。」

對「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領袖們，顯然他們已面臨嚴重的考驗：革命或者不革命？對於這項選擇，他們選了前者，不是投票，不是決議，而是大勢所趨。於是，一九六八年年底，在全國大會前夕「走向一個革命的青年運動」產生了。這篇文件中指出：

在歷史的此刻「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已而臨了最嚴重的意識型態考驗，來決定它與工人階級的未來方向。現在，我們必須了解，根據我們的運動，學生單獨是不能使資本主義推翻的，而資本主義正是一切壓迫的根源。

現在，我們的責任是超越學生運動的鬥爭模仿，我們必須發揮我們的潛力，來使本同盟吸收校內及校外的人，成為一個革命的運動。

至於策略呢？與工人階級聯合。它指出：「我們可以組織青年工人到我們階級意識為本的反資本主義運動中。這些青年工人將：一、強大反資本主義運動。二、可以使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結合。三、可以對老工人產生重大影響。」

至於具體作法有二：一、組織工人階級學院和高中，與校園工人結盟，使階級意識進入學生運動中，攻擊學生的特權地位，走出校園向工人階級社區進軍。二、攻擊大學的「建制性種族歧視」要求黑人和黃種人入學，向有種族歧視的教員挑戰，攻擊校園警察局以及反騷亂中心。

這篇文件出來之後，接著便是十二月廿六至卅一日在安娜堡召開的大會。這次大會秩序空前混亂，辯論不休。但是，「走向一個革命的青年運動」的提案卻被通過了，票數相差極微，因此它到後來的拘束力不強。主張這個運動的，後來成了「氣象人黨」的主力。

一九六八年的年底大會，意見衝突已明顯看出它冒進派與非冒進派的對立，這也就是「進步勞工黨」與「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主流派的對立。

這次大會以後的一九六九年春季學期，全美學生運動達到了空前的高潮，校園抗議增加，路線分歧，暴力增加，開美國歷史從未曾見過的景象。在舊金山州立大學，黑人學生和第三世界國家學生在白人激進學生及教員的支持下，罷課長達四個半月，七百人陸續被捕，無數人受傷。康奈爾大學，黑人學生佔領一棟校舍，進行武裝自衛，武器是交響槍。在聖芭芭拉加州大學，一個教職員與學生對管理人員爭論起一枚炸彈而被炸死。柏克萊加州

大學，警察向學生示威者開槍，打死一個白人學生，數人眼睛，百人以上受傷。同一期間，北卡農工學院有黑人學生被警察射殺，洛杉磯加州大學有兩名黑豹黨學生被殺。

這一期間，至少在三百所大學和學院有大規模事件，平均是全美每天就有兩起事件，全美大學生有三分之一參加。事件中，百分之廿有炸彈爆炸、縱火、破壞，四分之一是罷課或佔領校園，另外四分之一則是妨礙上課和公務。

抗議正延伸到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的運動。黑豹黨勢力遍及全美，底特律汽車工人成立了「革命的黑色工人聯盟」(LRBW)，芝加哥和紐約有了「青年貴族組織」(YLO)。激進運動更下移到了高中，百分之六十的高中發生過事件，從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九年五月有兩千次示威，許多大城市有高中生組織。

除此之外，在華盛頓、麥迪遜、柏克萊還有街頭作戰，四月五日這天，在五十個都市有十五萬人進行大反戰示威。女權運動也在這時達到高潮，示威不斷，「花花公子」雜誌，紐約婚姻局等都是示威的箭靶。

這一期間，政治暴力也昇高。大學至少有八十四次爆炸案，比上年秋季多了兩倍，高中爆炸和縱火案則有廿七次。總計財產損失高達八百九十多萬美元。而在社會上則有十次爆炸事件，最特出的是一月廿到廿八日在丹佛市的一連串爆炸案，摧毀了四座電力輸配塔。

這一期間「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已和黑豹黨等激進團體結盟，主要負責的就是柏娜汀·杜宏，兩者結盟而共生。對該同盟而言是增加了實力，可以抵制「進步勞工黨」等團體；對黑豹黨而言，則可使他們在面對警方壓迫時有了緩衝。除此外，它們也和歐洲

學運、第三世界、巴解等有了聯繫，它開始完全革命化。

可是，學生運動的走向革命化，等於使它自己走向了愈來愈窄的窄巷。首先，革命使得「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領袖們教條化，它的會員對他們的話題乃覺得「不相干」、「離譜」，這使得他們難以再獲開展，因而更加猜忌、激進。

其次，正面的和學校、官署衝突後，他們才發現自己真的並沒有權力。在柏克萊、威斯康辛、哥倫比亞、密西根、肯特、科羅拉多、芝加哥等大學都有這些情況，更造成它們內部的分裂。以舊金山州立大學的罷課為例，校方以早川 (S. I. Hayakawa) 為首，主張強力制裁，結果七百多學生被捕，學校有取消學生刊物，開除教授和學生，以及背後法律的支持，而學生只有被動的權力，在法庭上還得消耗掉得來不易的資金，最後是學生談判時妥協投降，早川成了美國的英雄。

在這種情況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開始首次被懷疑了，保守勢力抬頭，在康奈爾大學、肯特州大、哥大、布魯克林大學、柏克萊加大、佛羅里達大學等，保守派學生團體成立，對「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開始反擊。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對激進的高中生，似乎也沒有有效的吸引辦法。根據許多反映，他們到了高中，只會長篇大論的講什麼「工人階級」、「大學權力」等，這些並不是高中生有興趣的問題。

他們對軍中的運動也似乎毫無辦法，部份大兵有意推動「軍隊民主化運動」(MDM)，可是大兵們的興趣並不在反資本主義，因此，反資本主義對他們無用。

對於青年工人，情況也大致相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曾嘗

試與波士頓、芝加哥、洛杉磯、紐約、聖地亞哥等地的工廠工人聯繫，在若干地方，例如一九六九年三月，標準石油公司工人罷工，他們曾予支援。福特汽車的黑人工人罷工也曾獲該同盟支持，可是，他們都因無法找到真正的共同利益而沒有什麼結果。「我們的鬥爭必須整合到工人的鬥爭中」，似乎頗難以實現。

（「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一九六九年春季已面臨困境，校園支持減少，而最嚴重的是女權運動分離主義在它內部產生）

婦女解放運動一向伴隨激進運動而生，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大會中，婦女解放運動就一度成爲討論焦點。同盟裏的婦女隨著學生運動的上升，愈來愈覺得婦女的不受重視，教條主義者認爲婦女解放問題是階級鬥爭的一部份，這種觀點使婦解份子頗爲不滿。這種不滿滋長，一九六九年，許多獨立的激進婦女組織，如「女性主義者」、「激進女性」、「麵包和玫瑰」、「紅襪黨」、「巫婆」等相繼成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裏的婦女也逐漸增強相對應的要求，但柏娜汀·杜宏卻譴責說：「多數婦女團體是資產階級的，沒有意識到或不關心階級鬥爭以及婦女工人的被剝削。相對於黑人和黃種人婦女，這是一種沙文主義。這些婦女只侷限於他們自己中產階級的天地裏，只關心性的剝削和消費的暴政，不了解壓迫的真正原因，因而不能正確的指向敵人。」

在此種趨勢下，婦解遠離而去，是個已能充份了解的必然歸趨。同樣的不幸也發生在「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新當權激進份子和創始老會員之間，老會員自畢業後投身不同行業，仍是同盟的盟友和道德支柱，但後來也逐漸被排除。根據以上所述，革命派的激進份子直往前衝，他們沒有回頭看：應該做爲他們盟友的老

會友、婦解份子、工人、大兵、高中生，卻一個一個脫隊而去。這時「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會員數已下降，可能在三至七萬之間，分會數比較正確的統計是三〇四個，它在全盛期大約是三百五十到四百之間。

就在這時，五月十二日，芝加哥警察局聲稱有人打電話報告發生槍擊案而到「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總部調查，接著消防隊也趕到，說是有人報告失火。警察和消防人員要入內檢查，同盟的全國秘書長克隆斯基最後同意讓消防隊長入內檢查，消防隊長一進去，隊員也隨即搶入，和裏面的人相擁擠。裏面的人認為這是陰謀，意圖闖入摧毀這個總部並偷竊檔案。因而發生衝突，結果是克隆斯基等五人被捕，罪名是「妨礙公務」、「暴行」等，最後是湊了一萬二千元才保釋。後來他們的反應是：「除非控制社會的權力由人民的手來管，否則人民永無自由和正義。所有的權力給人民！豬獯去死！」

一九六九年三月「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奧斯汀開大會，與往年相同，它的死硬派和「進步勞工黨」由於學生和勞工結盟，或者和黑豹黨結盟的問題而發生衝突，最後甚至拳頭相向！

就在一九六九年一月，新總統尼克森上臺，他立即實踐競選時的諾言「法律和秩序」。他的競選主將，司法部長密契爾（John Mitchell）宣稱對跨越州界而在校園惹麻煩的將予制裁，副部長克萊汀斯特（Richard Kleindinst）亦宣稱將制裁學生激進份子和逃避徵兵的人，而其目標則指向「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司法部的相關部門也接獲訓令加強對激進學生及其團體的調查，包括聯邦調查局、社區關係局（CRS）、執法輔助部門（LEAA），以及一個卅人組成的「校園改變特別小組」等。緊接著於三月二日，對八

個人以涉嫌在芝加哥民主黨大會時「陰謀暴動」起訴，這八個人包括黑豹黨主席鮑比·席爾 (Bobby Seale)，「全國動員委員會」的戴維斯 (Rennie Davis)，狄林格 (David Dellinger)，弗羅里斯 (John Froines)，湯姆·海頓 (Tom Hayden)，李文納 (Lee Weiner)，野痞份子有魯賓 (Jerry Rubin)，霍夫曼 (Abbie Hoffman) 等，他們的刑期可判至十年和罰金兩萬元。

尼克森並警告「已到了文明將死亡之路」，呼籲校董、行政人員、教職員更有擔當，以制裁「意圖顛覆」的校園運動。他並發出哀的美敦：「如果有需要，我們有權力反擊回去。……對一個特定政策挑戰是一回事，對政府運作的權利挑戰則是另一回事，它已否定了自由的程序」。

除了聯邦調查局以外，也加強對學校偵查的，尚有「國內服務委員會」(CSC)，「秘密服務組織」(SS)，「健康、教育、福利部」(DHEW)，財政部的「國內稅收調查局」(IRS) 等。被建檔的人高達七十五萬人。這時蓋洛普民意調查，百分之八十二認為應制止學生示威。哈里斯民意調查，百分之五十二反對學生示威，縱使它合法且和平。除此以外，參眾兩院也一片撻伐，通過制裁條款，州的立法部門也加強制裁立法，計有卅九個州採取此一行動，總共通過四百項條款和提案，其內容分別包括反抗校令者立即開除，違背校令之教職員立即解聘，參加靜坐和佔領校園者起訴，警察在校內射殺騷亂學生時免負刑責等。立法規模之大，效率之快，在美國歷史上從未見過。

這時，學校保守主義更趨抬頭，百分之八十教員反對示威，認為將危及學術自由，百分之七十六主張對示威學生開除。著名之保守派哲學教授胡克 (Sidney Hook) 組織了「理性選擇大學

中心」(UCRA)，專門攻擊「學生民主社會同盟」。

一九六九年春季學期，國防軍和警察被召入一百廿七所校園平亂，一月到六月被捕者多達四千人，有一千人被開除。許多學生被學校送交法院起訴。例如哈佛大學一個「進步勞工黨」份子由於抓學校行政人員手臂而被判一年徒刑，兩個舊金山大學的「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會員各被判一年，七個佛希學院學生分別被判十八至廿四個月徒刑，華盛頓大學一個學生因為涉嫌縱火被判五年，三個聖費南度狹谷學院學生分別被判一至廿五年徒刑等。至於未涉及具體事件，但是屬於激進派領袖的，亦以各種罪名大量逮捕。五月份起，司法部在十天內實施了一項掃蕩計劃，至少四百人被捕。

處於這種反擊，而又內部分裂，組織癱散的情況，「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的全國大會召開了。

這次大會在芝加哥召開，特務雲集，記者湧至。在這次大會上，由十一個激進派草擬的「氣象人黨宣言」產生了。所謂「氣象人」，典故出於當時的歌手鮑比·狄倫 (Bob Dylan) 的〈隱藏的思鄉病藍調〉中的一句：「你不需一個氣象人來測知風向」，它的意思主要是「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拿來對付「進步勞工黨」的：大家已知道這個國家是什麼樣的，自然知道只有革命一途，不再需要「進步勞工黨」來說東說西。

「氣象人」文件有兩重目的：首先在回顧整個學生運動，指出爾後應與黑人解放運動並進，以革命為方向。其次則的為打擊「進步勞工黨」，使他們不能再加攻擊。

這篇宣言式的文件並非一項好文件，其內容全屬教條和口號，內容相當混淆，對社會現況並無分析，因此像奧格列斯比 (Carl

Oglesby) 都認為「仔細看的話會使你眼瞎」。

這次會議，正統「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和在其中的「進步勞工黨」正式分離，大會爲此一團混亂。接著選舉，馬克·瑞德 (Mark Rudd) 爲全國秘書長，艾爾士 (Bill Ayers) 爲教育秘書長，強斯 (Jeff Jones) 爲組織間秘書長。另外的一個「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也選出了它們的人選。

大會之後，「氣象人」開始計劃兩項行動，一是組織都市青年工人使成爲革命主力。二是準備在秋季進行全國反戰大遊行。

這一期間，「氣象人」似乎諸事不遂。組織都市工人，要組織一個十六歲少年的游擊隊，甚至於更實施「配婚制」，結果都不好。他們並實施了一項侵入校園的計劃；一群人侵入校園，打斷上課作即興式演講，但是情況更不好。「氣象人」似乎過份的自我中心或自我中毒，因此他們贏得的尊重少於輕視，反而是造成學生的困惑。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至廿日，黑豹黨由於官方的壓制大增，因而尋求白人激進份子的支持，在奧克蘭召開了一項「反法西斯聯合戰線會議」(UF AFC)。這項會議本質上顯示了黑豹黨的失敗，因爲它無法自黑人社區得到強大的支持，因而需要求助於白人革命份子。這次會議的決議胡亂通過了黑豹黨的建議，發起一項警察由社區控制的運動。但在要實行時，所謂的社區，黑豹黨指黑人社區，氣象人指白人社區，因而兩派的結盟分裂。

除了和黑豹黨決裂外，「氣象人」又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中堅持「革命的青年運動」派分裂——這派主要包括克隆斯基等，在一九六九年八月，克隆斯基譴責「氣象人黨」「自大」、「好戰」，一點也不關心工人階級，摧毀了藍領工人階級對他們的支持，「宗

派主義」和「冒進主義」，這將使他們自己「重重的摔下來」。對於這種譴責，「氣象人黨」的馬克瑞德，泰瑞羅賓斯等反擊，兩派亦告決裂。

一九六九年夏季，「氣象人黨」分別派人前往河內和古巴，回來後更堅信美國必在人民戰爭中被淹沒，他們將加速這種結果的實現。八月廿九日到九月一日，他們約三百人在克里夫蘭舉行中西部「全國人民會議」(NAC)，這次會議和以往「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開會完全不同。沒有「進步勞工黨」的無理取鬧，會議參加者均立場一致，可是頗有「自我批判」的精神，討論熱烈，他們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參與式的民主」的模式。

而從「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分離出去的「進步勞工黨」，在六九年的夏季，仍然推行它的「向工人學習」(work-in)。這種作法不過是使學生找工人，來了解工人的「階級處境」，以利工人和學生聯盟的形成。但卻因此亦備受注意。「全國連鎖商店協會」(NACDS)，「紐約工商協會」(NYCZA)，「全國製造商協會」(NAM)等都對所屬會員提出警告，要求注意工廠安全。地區性之商會也通告所屬會員，注意「邪惡的，欲打擊我們經濟的計劃」，工業週刊並刊出廣告，畫面上一對青年男女手持來福槍和酒精炸彈，文字是「這些小鬼在對工業做野蠻的新行動，這是暴動」。……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可是整個夏季在工廠方面，「向工人學習」並沒有出任何事。

總結一九六九年的夏季學期，「氣象人黨」成了一個大約有二至三百人的小團體，決定投注生命在革命上，他們組織並生活在一起，主張暴力，向第三世界認同。他們不依賴自由份子或工人階級，他們要成為職業革命家。他們有過許多次實戰經驗。可是，

這個革命團體事實上已和整個學生運動的主流脫了節。

克里夫蘭會議之後，「氣象人黨」決定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八至十一日在芝加哥發起一場行動，「在學校、街頭、軍中、廠礦，引起千次以上鬥爭」，這是他們把「戰爭帶到國內」的構想。可是，馬克瑞德四處奔走要人參加，卻大受挫折，因此，從十月八日到十一日，整個行動參加者只有幾千人而已，二百八十七人被捕。它的主要份子是不滿的學生和老會友，而非預期的「街頭青年」。

不過，這次行動仍然是極其戲劇化的，核心人員都裝戴著防護裝備，八日晚間在林肯公園開群眾大會，林肯公園附近住的都是大有錢人。群眾大會後他們即向街頭衝，要撕裂這個城市，但警察早已好整以待。他們沿街吶喊，打玻璃、路邊車輛，首次遭遇警察時，戴著膠盔的「氣象人黨」喊著衝打過去，第一波帶頭的居然衝破了警察的包圍，但後面的卻不是警察對手，卅多人立刻被捕，這時整個隊伍已分散，東南西北亂衝。但這次出動的警察，穿制服的多達一千多，便衣更不計其數，許多更出諸一種報復的心理，他們殘酷的處置分散的團體和個人，就用鎮暴棍猛擊，頭、臉、胸、腳，許多人鮮血從頭上和口中湧出。有兩次警車向示威者身上衝，把人彈向輪下和天空，一個警察向三名落單者開槍，打中一人的頸部，陸續開槍者多達四五起，短統大口徑槍禁令甚嚴，也被警察從車上搬下射擊。第一次衝突結果，至少有六人被槍擊，六十八人被捕，受傷者無法統計，被捕者廿五人是女性。但馬克瑞德臨陣脫逃。

第一天之後，靜止了大概一天，大約七十個女鬥士出來示威，他們非常勇敢，可是沒幾分鐘就被捕。

接著是「革命的青年運動」派出來和平示威，示威和群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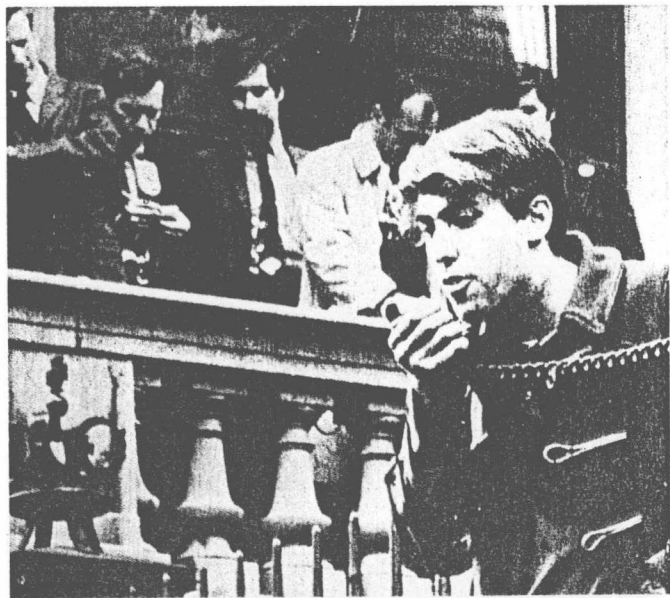
會分多處舉行。

然後又是「氣象人黨」二百多人示威，而官方則是兩千五百名荷槍實彈的國防軍，接著衝突發生，一百廿三人被捕，許多人受重傷，警察則卅六人受輕傷。全部四天，損失是建築物三萬五千元，醫藥費兩萬元，國防軍薪水十萬元。被捕者之保釋金多達二百卅萬，其中的二十三萬是要立即付出的，這些錢後來都由學生的家人和朋友湊足付出。許多人被判刑，有人高至五年。

氣象人黨的這次行動頗不受激進份子諒解。有一個女氣象人說：「這個組織是我接觸過的最法西斯的組織。」，紐約的氣象人悲哀的承認：「我們的政治學贏得很少支持，我們還不夠資格領導青年群眾。」，「進步勞工黨」方面亦大力撻伐，認為這是「攻擊人民」的行徑。阿肯色州法耶特威爾的分會則稱這是「史達林主義」。經過芝加哥事件，「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可謂已煙消雲散，各地分會已成了各自獨立的激進學生團體。

芝加哥事件後的這一學期，學校抗議事件較上年有增無已，三分之二的校園有抗議活動，平均一天一起。逮捕逐漸擴大，二月在水牛城有四十五個教員被捕，同月在密西西比狹谷州大，一次事件就有八百九十一人被捕。但是，儘管熱潮汹涌，各校均屬各自為政，不相聞問，十月間有一所學校舉行「越南延期服役日活動」，有三分之一大專院校響應，可是推動這個活動的自由派份子卻恐懼會有副作用，不敢和各校串聯。十一月，華盛頓有一次最大的和平遊行，人數多達五十萬，但「新動員委員會」(NMC)也未加以聯繫。十月間，黑豹黨主席鮑比·席爾送上法庭，十一月間黑豹黨在伊利諾的負責人漢普頓 (Fred Hampton) 被芝加哥警察謀殺在牀上，但學院內沒有反應。到了一九七〇年一月所

- ◎ 在哥大事件中，Mark Rudd 脫穎而出，成為校園中最引人注目的羣衆煽動者
- ◎ 哥倫比亞大學學生佔領校長辦公室，並在該處舉行全天候的政治會議。





◎1987年「芝加哥七君子」重聚。左一為霍夫曼，右二為湯姆·海頓。

◎1969年因涉嫌在芝加哥民主黨大會時「陰謀暴動」而被起訴的八個人。上排左二為湯姆·海頓，左三為霍夫曼。



UPI/RETNA/NEWSPIRE

謂的「芝加哥陰謀事件」被判有罪，在波士頓、華盛頓、紐約、麥迪遜、洛杉磯、柏克萊、西雅圖，陸續爆發事件，也都是各自發展，沒有統一起來。一九七〇年四月，則有「大地日」(ED)活動，主要是抗議生態的破壞，全美有二分之一的校園引起抗議行動，但它也沒有後繼的全國性聯盟產生。到了五月，學生示威到了高潮，它造成了空前的危機。

但在這種學潮高峰時期，「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早已無存，它分離出來的幾個團體如「進步勞工黨」、「學生工人聯盟運動」、「革命的青年運動」等，由於既無能力，也沒有良好的政治理論，均在一九七〇年逐漸萎縮。許多團體如「全國勞工幹部委員會」(YAWF)、「年輕工人解放聯盟」(YWLL)、「工人聯盟」(WL)、「青年國際黨」(YIP)、「國際社會主義者」(IS)、「史巴達聯盟」(SL)、「青年社會主義者聯盟」(YSA)等均欲設法填補「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真空，均沒有成果。由「青年社會主義者聯盟」和「社會主義工人黨」(SWP)掌握的「學生動員委員會」(SMC)一度有希望填補這個真空，但最後也在一九七〇年由於它的不敢冒險前進而告萎弱。

至於「氣象人黨」、「芝加哥全國行動」之後愈來愈孤立，他們過著所謂的「氣象生活」(Weatherlife)，打破以往所有的社會和親屬關係，放棄家人子女。每天作自我批判，用「每人可以和任一人性交」的雜交來維持內部團結，男女都有同性戀者，吸食大麻。一個氣象人後來說：「我們前進、舞蹈、性交、吸藥，知道肉體即我們自己，從幾個世紀的壓迫下重新成爲動物。」而對外人則極不信任。漸漸有人退出，轉而參加其他團體，留下的則更加聯結的緊密起來。最後決定完全走入地下。

他們最後一次是在六九年聖誕節假期開會，向老運動再見。這次會議非常怪異，有十三、四歲的小孩，還跟著母親來。會議集狂暴混亂之大成，怪叫、性交、演講，……。他們認為孟森家族的行為才是最標準的。最後，他們決定先把大家庭打散成小團體，然後再走入地下。他們全體約二至三百人，他們認為卡斯楚從八十人起家，武元甲從卅人起家。一九七〇年開始，他們走入地下成了「人民軍」，在進入地下後他們發出文件聲稱：「革命暴力是唯一的方式。」

他們真的做了。暴力事件不斷增加。它的紀錄是：一九六八年春只十起爆炸案，一九六八年秋已至四十起，一九六九年春九十四起，一九六九年秋至一九七〇年春，保守估計校園爆炸一七四起，校園外爆炸案七十起。主要目標是學校之軍訓處、政府機關、徵兵處、大公司辦公室。根據《財富雜誌》公布之另一項稅務單位的統計，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五日，各地炸彈案九百七十五起，被投燃燒彈的三千三百五十五起，投彈恐嚇案三萬五千一百廿九起。可知其情況嚴重。

這只是「氣象人黨」方面而已，從一九六九年秋到一九七〇年春的這一學年，全美學潮空前，共抗議事件九千四百零八起，有逮捕和召警的至少七百卅一起，有暴力的二百卅起，著名事件包括華盛頓的十一月五千人示威，施放神經毒氣；三月在水牛城，十二名學生被射中，五十七人受傷。聖芭芭拉加大的二月事件，一百五十人被捕，兩人被槍擊，一人死亡。四月在柏克萊加大，施放瓦斯。四月的哈佛大學事件，一百五十人被捕，兩人被槍擊，一人死亡。四月在柏克萊加大，施放瓦斯。四月的哈佛大學事件，三輛警車被焚，財產損失兩百萬。

而在校外，一九六九年警察被攻擊的事件突增，有八十六個警察死亡，三萬三千六百零四名警察曾被攻擊，對政府機關之威脅案也大增，逮捕了三百卅七人，其中二百六十九人被判刑。暴力團體像「新年黨」(NYG)、「四月部落」(OT)、「傲鷹部落」(PET)、「笑狐部落」(SMT)、「約翰布朗革命同盟」(JBRL)、「白豹黨」(WP)等，總計約有廿個。

（一九七〇年五月，是美國六十年代學生運動史上最危機的時刻，學潮已到空前的局面，原因是尼克森下令進軍柬埔寨以及肯特州立大學的學生死亡事件）

一九七〇年四月卅日，尼克森下令進軍柬埔寨，幾天內校園抗議事件不斷，六十幾所大學宣布示威。五月四日，有廿八名國防軍士攜帶長短槍，在肯特州立大學，沒有事先警告，就向二百多個示威者射擊，射擊了六十一發子彈，四名學生當場死亡，九人受傷，一人終生癱瘓。這件不幸將學潮帶進了高峰時期。從五月五日到五月八日，每天至少有一百所大學舉行抗議示威，有三百五十所大學的學生全體出動反對政府，五百卅六間學校關閉，其中有五十一所停課達一年之久。美國全國大學一千三百五十所，至少半數捲了進去，抗議的學生高達總學生數的百分之六十，約為四百三十萬人。至少在七十三個校園有暴力示威。在廿六所大學有學生和警察的嚴重衝突。從五月一日到五月十五日，學生被捕計一千八百人。許多學校由軍人佔領，好幾個州宣布所有學校進入緊急狀態，有十六個州的廿一所大學，國防軍廿四小時全天候巡邏，在五月的第一個星期就有卅個軍訓處被焚，……等。

五月十四日，密西西比州的白人警察在傑克遜市，向傑克遜州立學院的黑人學生開槍，兩人被殺，十二人受傷，接著便是五

十三所大學示威。這兩人的死亡，使得整個六十年代學生運動中被殺的學生多至十四人。

肯特州大事件後，尼克森最先態度強悍，聲稱「校園騷亂造成的悲劇」，但學潮汹涌，乃不得不公開道歉，並撤兵，派高層官員調查。有鑒於學潮的汹涌，尼克森政府又採取了一系列強悍的措施，主要的有：

——加強治安之投資，地方治安預算增加百分之三百，並加強鎮暴裝備，並起訴了四千名反徵兵學生。

——聯邦調查局立即電腦化，加強監聽和監視裝備，增加一千二百名新特務。因此後來在一九七〇至七一年，根據這些資料陸續逮捕了一萬四千五百六十五人。

——司法部成立「國內安全局」(ISD)。

對於「氣象人黨」，聯邦調查局一直追查，一九七〇年五月廿一日，「氣象人黨」爆破了紐約市警察局。接著，聯邦調查局更加緊追緝，陸續逮捕或通緝數十人。

第 11 章

反叛的極限

如果我們逃避暴力，那不是因為任何道德信條，而是因為暴力並不能改變人類。

——Jayaprakash Narayan

普林斯頓大學「革命世界下的美國」研討會中講詞

人們的不滿並不是他所有的和他想要的這兩者間差距的函數，而是他想要的以及他認為能獲得的這兩者間的差距。如果他們的手段很少或者被威脅，那麼他們就容易叛變。如果他們能獲得新的手段或方法，那麼他們就會努力去做事來得到自己所想要的。退縮不一定會有效果，短暫的妥協，當它麻醉的效果消失時，卻會加強暴力的再回頭。如果人們的暴力是為了保護他所擁有的，那麼把威脅他的消除，是有效果的。如果人們反叛是在為了新的和加強的期望，那麼唯一有效的辦法是供給他們手段，使他們藉此來努力達到期望。人們訴諸政治暴力，有部份原因是不理性的，可是它的發生

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可是疏忽往往就是它的原因之一：有時候是訴諸暴力的人疏忽了它的結果，更多的則是創造和維持暴力產生的社會條件的人之疏忽。然而，政治暴力是可以去了解的，了解將使它成為不必要，也使它並非無可避免，而可以解決的。

——美國西北大學政治科學教授Ted Robert Gurr
在《人們為何反叛》一書所述

一九七〇年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校園事件蠱起的時代，層出不絕的事件，數百萬大學生的參與示威或暴動，甚至破壞。在進入一九七〇年夏季前，普遍的美國人已有了一種暴風雨即將來臨的預感，認為美國的內戰即將開始了。而且對立昇高的結果，社會許多勢力和衝突也開始表面化，例如，一般人民對學生、青年、反戰示威者的敵視更形增加，有個學生在校園事件尖峰時刻打電話回家，他的母親接電話時就詛咒全體大學生去死。於此同時，來自警察特務的取締和制裁也加強了。另外則是在官方的誘導下，保守勢力全面性的抬頭，最典型的例子顯示在保守派組織「青年美國人自由協會」(YAF)的會員成長上，它在一九六〇年不到一百人，到了一九七〇年已增至五萬人，成了美國非政治行動的最大組織，保守派大本營的刊物《國家評論》，訂戶增至十萬，這也是戰後保守派知識份子運動的黃金時刻。

在這樣一個混亂、紛擾，各種不同勢力紛紛抬頭的時刻，最激進的左派，甚或正確的說應該是一種虛無主義激進派的勢力卻在消滅中，這種情況使得整個學生運動的浪潮從一九七〇年夏季的高峰時刻起逐漸退潮。

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到了七〇年代起，在達到它的高峰時刻後，隨即戛然而止。有關它的原因之探討，有關之專著也如汗牛充棟，在此暫不討論。值得注意的是，整個運動自「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分裂，而激進的一派「氣象人黨」趨向革命並走入地下，而另一派以「進步勞工黨」爲主的新「學生民主社會同盟」，這兩派均很快的失去領導作用，繼此之後，全美就再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學生組織來團結學生，並將學生領導向社會進軍了。學生運動此後只限於學校運動了。

「氣象人黨」轉入地下後，已完全與學生運動脫節，成了一個革命組織。他們做了許多非常戲劇性，但卻愈來愈與社會疏離的行動。例如將哈佛大學講師，「精神玄轉革命」(psychedelic revolution) 的賴瑞博士自獄中救出(按：所謂精神玄轉革命乃是迷幻藥文化之一，賴瑞博士最初研究麻醉藥物對心理的影響，而後自己吸食且趨激進，後來被判刑，但他被氣象人自獄中傳奇式的救出，後來流亡阿爾及爾)；除此外「氣象人黨」於一九七〇年十月開始，聲稱發動「秋季攻勢」，計摧毀芝加哥海市廣場的警察肖像，爆破加州馬林郡的司法大廈，紐約長島司法大廈等許多處所，造成的損失達五十萬美元。到了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們在華府國會大廈一間洗手間引爆炸彈；一九七一年八月，黑人革命領袖傑克森被殺後，他們在舊金山矯正局丟炸彈；一九七一年九月，在阿迪加監獄廿八個犯人將被處決前，他們在阿爾班尼矯正局丟炸彈。直到一九七二年五月，他們更滲入五角大廈的空軍部門引爆炸彈，向尼克森下令加強轟炸越南抗議等等。他們已的確成了標準的游擊隊，不再和社會有任何關係，更與學生運動脫節。

分出來的以「進步勞工黨」爲主的新「學生民主社會同盟」，

由於「進步勞工黨」基本上對工人的興趣比對學生多，因此，他們以前和「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合作，乃是一種「寄生」，等到寄生的母體消失後，它所主持的新「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便很快的地位衰落，甚至一九七〇年春季學運最高峰的時刻，都無法有所作為，會員很快的降到大約只有一、二千人之譜，在一九七〇至七一年間，除了地區性的作過通用汽車工人小型罷工外，就再也沒有了什麼作為。

從一九七〇年秋季開始，事實上，校園的抗議和示威並未終止，只是它由於已缺乏統一的聯繫，因而便被軟化了。校園事件單純的成了校園內部的事件，它無法擴散出去。尤其是已無法擴散到一個已對學生開始有敵意或疑慮的社會中了。尤其像一九七二年尼克森下令轟炸河內及海防時，柏克萊加州大學的縱火和大破壞，固然已開有史以來最具破壞性的暴亂之例，但它已不再具有任何擴延性。相反的只是讓更多人被捕或被更多人嫌棄，連以往那些喜歡看熱鬧的人都已變得疲憊，而美國統治階層也開始整合媒體，報紙電視也幾乎不再報導學生的抗議行動。

六〇年代學生運動在它逐漸壯大的發展過程中，當它危險性已在增加之時，美國特務打入了這個運動，在一九七〇至七二年間，聯邦調查局等單位根據一個已建立了幾十萬人的檔案，逮捕了一萬多人。這對後期學生運動的發展當然有極大的鎮嚇作用，有關這一部份前面已作了扼要的說明。但是，鎮嚇似乎並不是唯一使它停止發展的理由，它的理由還多得很：

——此一期間，美國的保守主義運動也已有了新的開展。

——選舉年齡降為十八歲，已吸引了相當多一部份左右傾改革自由主義學生的興趣，在一九七一年他們即將柏克萊三位自己

的候選人送進了市議會。

——〔大學校園相當多的已作了改革，繁冗的事務已足以消耗掉許多他們的精神。

——愈來愈艱難的就業機會，確已使許多大學生不得不更加關心經濟和生活的問題。

——相當多社會種種階層的領袖所作的溫暖的關切和指責，確已使許多大學生覺得還是有許多路可以走。這可以由許多學術基金會事後所作的檢討報告，以及許多特別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看出。

這些因素可以看出，學生運動是在軟硬兼施兩項方法交互使用下終止了。媒體的控制，使學運在初期被鼓勵，而到後來卻被拋棄，扮演了極重要的功能。

我們今日回顧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歷史，除了對它波瀾壯闊的外觀表示驚訝外，也不得不對它相當多數不克自制的青年激進份子最後的走向表示同情。

六〇年代的學生反抗運動，它終極的發展是黑人民權運動和白人學生運動的革命派出現，黑人的革命派是「黑豹黨」變成了「黑色解放軍」，白人的革命派是「氣象人黨」變成了「五月十九日共產主義者組織」。他們混同在一起，主張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美國現行體制，爲了籌集革命資金，他們四處武裝搶劫，爲了拯救被囚的夥伴，他們協助越獄。他們宣揚革命的暴力，主張將路易斯安那、阿拉巴馬、密西西比、喬治亞、南卡羅來納等五州獨立，成爲「新非洲共和國」。

他們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廿日下手搶劫紐約州羅克蘭郡的「馬魯耶國家銀行」，金額一百六十萬美元，途中和警察遭遇而發生槍

戰，他們殺死了一名警衛、兩名警察，而後陸續被捕，先後到案的計有十六人之多，他們是：

巴拉貢 (Kawesi Balagoon)，他的另一個名字是韋姆士 (Donald Weems)，他是黑人，「黑色解放軍」的一員，被控搶劫和殺人。一九七九年時，「黑色解放軍」的一名領袖翠絲瑪 (Jonne Chesimard) 被人從獄中救走，巴拉貢是援救者之一。在七〇年代巴拉貢自己也坐過牢，但他兩度越獄成功。

吉伯特 (David Gilbert)，是六〇年代後期激進學生領袖，而後是地下武裝革命組織「氣象人黨」的一員，參加劫鈔殺人。

克娜克 (Judith Clark)，她是六〇年代後期的芝加哥大學學生領袖，因參加著名的「芝加哥三日暴動」而被學校開除，後來成為「氣象人黨」主將之一，一九七八年以後她成為「五月十九日共產主義組織」發言人，和「巴勒斯坦解放陣線」以及「玻多黎哥國家解放陣線」等組織負責人均熟稔，是近代著名的女革命家，也參加了劫鈔殺人案。

波汀 (Katharine Boudin)，她是美國著名的憲法律師紐納德之女，學運時期的知名女將，後來成為「氣象人黨」主要成員之一。一九七〇年時「氣象人黨」在紐約格林威治村一棟私人高級住宅裏裝配炸彈而不慎爆炸，波汀即在場的倖免者，而後她轉入地下，多年來她一直是吉伯特的女人，育有一子。

布朗 (Samuel Brown)，是「黑色解放軍」的主要成員。

歐丁嘉 (Sekou Odinga)，他的另一個名字是龐斯 (Nathaniel Burns)，是「黑色解放軍」主要戰士，一九七九年翠絲瑪的越獄成功，他也是主要救援者。

巴拉丁尼 (Silvia Baraldini)，也是「黑色解放軍」戰士，

翠絲瑪的獲救他也是主要人物。

約瑟夫 (Edward Joseph)，少年時就是「黑豹黨」成員，乃是所謂的「黑豹黨廿一元老」之一，也是「黑色解放軍」主要人物。

佛古森 (Cecil Ferguson)，早年的黑豹，後來的「黑色解放軍」戰士。

羅賓蓀 (Iliana Robinson)，為「氣象人黨」的女黨員，前幾年「黑色解放軍」的唯一白人女戰士布克 (Marilyn Buck) 從獄中脫逃，她是主要的援救者。

松尼阿里 (Bilal Sunni-Ali)，他的另一個名字是強森 (William Johnson)，「黑色解放軍」的一員，翠絲瑪的越獄他有過助力。

拉波德 (Anthony Laborde) 「黑色解放軍」成員，曾在紐約皇后區殺死過一名警察。

瑞森 (Tyrone Rison)，為「黑色解放軍」一員，在喬治亞州有過劫鈔記錄。當巴拉貢等人劫鈔失敗而被捕後，他是最後殘餘份子「五人小組」的一員，他們曾三次試圖劫獄未成。後來瑞森自動投案，和「聯邦調查局」合作，反過來當證人。

希頓 (Wendy Sue Heaton)，曾在北加州有過殺人案紀錄，最後到案。

貝耶特 (Kamau Bayete)，「黑色解放軍」成員，但最後也和聯邦調查局合作，反過來當證人。

寇貝歐 (Nilse Cobeo)，「黑色解放軍」成員，有過協助越獄和搶劫等案，而後被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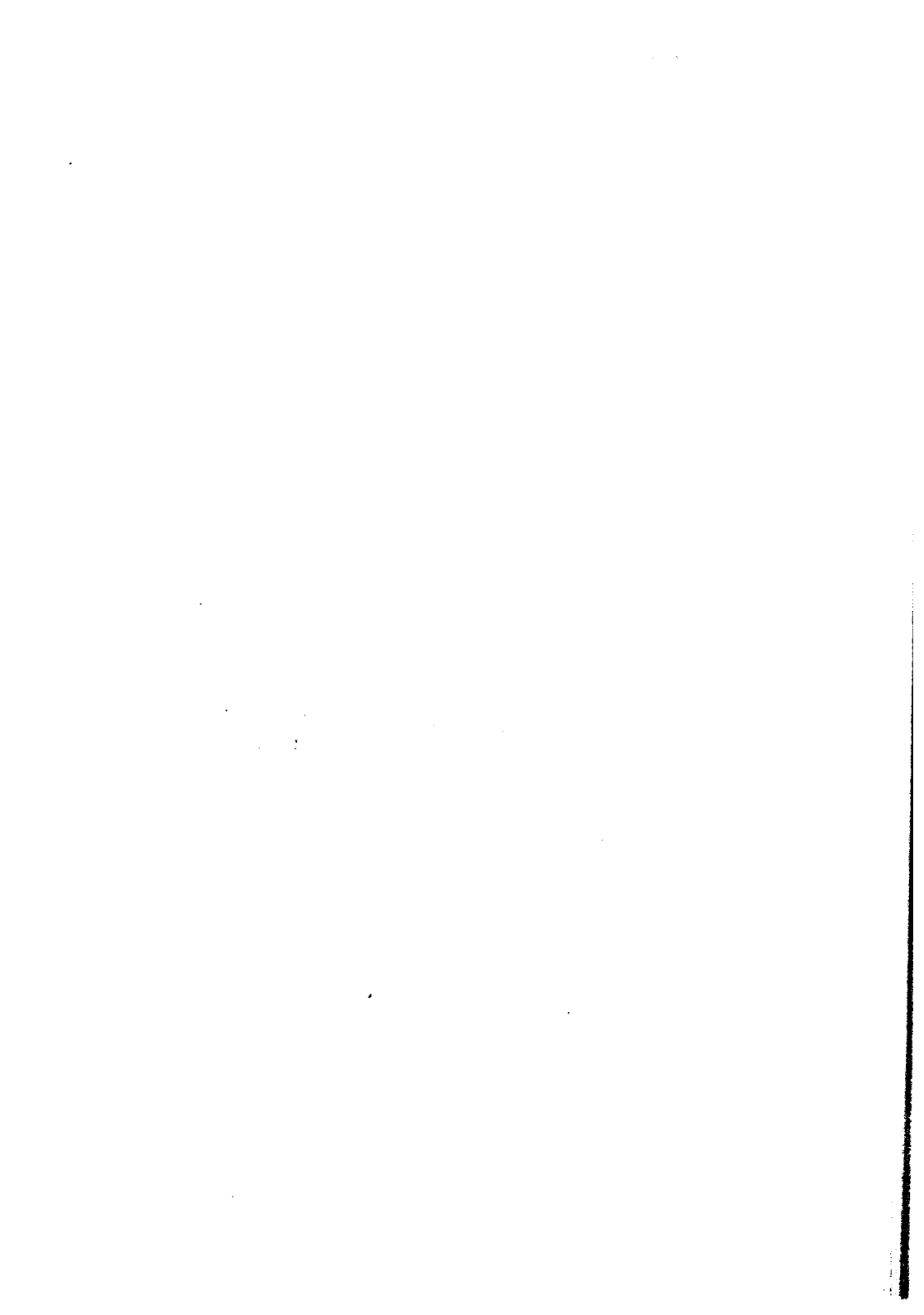
這些人的被捕及判刑，總的來說，已是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

最後一景。這一群職業革命家在挫折中日益激烈化，最後成爲游擊戰士。他們或許理想高遠，但畢竟時空錯置。他們對想要改變的社會，終極並未完成什麼改變，只不過使壓迫的體制增加了壓迫的正當性。

舉凡一個規模龐大的運動，由於它成份的複雜，固然前進的因素進來了，但隨之而進的則是倒退的因素也跟著羸雜了進來，而六〇年代美國的激進青年卻無疑的將這兩者作了結合。它把頹廢的、虛無的、波希米亞式的、中產階級式的所謂「心理玄轉變革命」，帶進了一種理想式的，唯物的社會革命觀念中，這使得後來它的發展，整個墜入了一種無目的，唯感性的歇斯底里情緒中。古德曼 (Paul Goodman) 即曾指出：「他們只知道知識社會學，而不知道知識，他們認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是政府資助，爲統治階級利益服務。因此他們不相信世上有真理。」對「氣象黨」的激進青年，這是很公正的評論。

但是不能否認的，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已確然爲美國社會灌注了許多新的生命，政治、學術、思想、經濟、工業、商業、核能、正義、人權。一個比起六〇年代更活躍的「批判的七十年代」因而形成。

附錄
六〇年代
美國學生運動相關文獻



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波瀾壯闊，此一期間，相關的文獻，代表著不同利益團體和組織，不斷湧出。

我們在此，就當時相關的文獻中，選出十二篇作為本書的附錄。這十二篇可以分成下列六類：

- (一)有關黑人運動的部份：兩篇。
- (二)有關印第安人運動的部份：兩篇。
- (三)有關反越戰運動部份：一篇。
- (四)有關白人激進派運動部份：三篇。
- (五)有關女權運動部份：兩篇。
- (六)有關「非激進派」部份：兩篇。

由以上分類可明顯看出，選出的這十二篇文章，已大致涵蓋了當時青年不同的主張。不過，選出的這十二篇文章大都以它所涵蓋的政治社會面為重點，對於當時的青年次文化，例如吸食迷幻藥、主張男女性雜交、瑜珈術等有關的文件，由於它事不涉政治社會，不予選錄。

六〇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甚或稱之為青年運動是一個揉合了各種範圍、各種層面的綜合性運動。其間，各種不同立場的人所作的主張或態度表示，大都只有局部或片面的有效性，這是我們今日由閱讀這些文件，據以研斷他們那個時代時，必須有的基本認識；從而，我們才可能肯定應該肯定的部份，揚棄應予揚棄的部份。一個綜合性的運動中，浮現出來的固然有清明希望之氣，但隨著它們一齊浮現的，也有一些渣滓。



I

給越南戰場黑人兄弟的一封信

艾德利契·克利佛 (Eldridge Cleaver) 是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期間，黑人激進組織「黑豹黨」(Black Panther) 的靈魂人物。他是「黑豹黨」的新聞部長，對整個黑人運動有著極大的貢獻。六〇年代末期黑豹黨被整肅，他出亡阿爾及爾，後來返美受刑。他曾著作《冰雪上的靈魂》一書，是黑人運動的經典著作之一。本文發表於「黑豹黨」地下機關刊物《黑豹》上。

我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四日寫這封信，這時，我們正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年度。到了八月卅一日，我就卅五歲了。我已婚，有一個孩子，另一個也快生產。我愛我的妻子，我很願意過著一家歡樂的幸福日子。可是，我沒有辦法過這種我嚮往的生活，因為，豬羅們——美國的種族歧視法西斯統治者不讓我過這樣的日子。

兄弟們，我要問你們，你們的生活是你們願意過的嗎？是不是那些豬羅妨礙了你們的生活方式？我不相信你們願意在越南

攻擊我們的越南兄弟姐妹！他們正在為自由而戰。現在，你自己的同胞正被那些豬羅迫害，他們已起來為爭取自由而戰，他們需要你們以及你們的戰鬥技能，來幫助他們得到自由，並停止那些種族歧視豬羅們的滅種暴行。在過去的四百年中，他們一直為此而奮鬥著。

我是黑豹黨新聞部長，現在，我以黑豹黨立場向你們說話，不過，我也要加入一點我個人的意見。因為我知道，雖然你們為了美國而拿起槍桿，但你們並不願作美國的諂媚者；而黑豹黨也拿起了槍桿，但它並不是拿來打英勇的越南人民的，卻是用來發起一場自由之戰，以對付你們為它而戰的美國——因為它正對全世界（包括你們的同胞）進行著邪惡的賭博。想想這個問題吧！我懷疑你們會不會想這個問題。在白人種族歧視的韁繩下，四百年來，你們的兄弟姐妹為了自由之夢而生存，現在他們已拿起槍桿，為了要實現這個夢。從南方棉花田慘淡的奴隸歲月，到民主黨、共和黨、湯姆叔叔、詹森總統的流血時代；以至於現在，最下流的尼克森當了總統，他是你們的總指揮官，但也是我們的第一號敵人。

現在，我們的人民爭取自由的戰鬥已經進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在這個時候，我們的人民只有兩個選擇：或者是支持，或者是反對，只有這兩個立場。你們也是如此，或者支持你們的人民，或者就反對。你們既是解答的一部份，也是問題的一部份。我們或者就幫助我們的人民，或者就拒絕幫助而讓敵人更容易毀滅他們。

就在你們在越南的此刻，豬羅們也正在謀殺我們的人民，壓迫他們，美國的監獄塞滿了政治犯，這些政治犯就是你們的黑人

兄弟姐妹。在我們手中，我們正在做的是場不顧一切的生與死的戰鬥。如果我們要拯救我們的人民，那麼我們就必須拯救我們自己。我們需要你們義無反顧的支持，在它已太遲之前。

現在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我們的人民爲此而工作、祈禱、戰鬥，以及死亡。就在全世界已舉起武器反對壓迫我們的人的時候，我們必須爲了我們的自由作出決定性的行動。如果錯過了這次機會，誰會知道我們下一個機會在那裏？我們不能讓這個機會失去，現在已到了作決定的時候。

不管你們現在在那裏，就是現在，你們就需要作出決定。你們不必再等——等到你們回到美國並從軍中退役下來。你們現在就已經可以採取行動。因爲軍隊就是白人豬獃們在需要時用以壓迫我們的主要武器之一，你們仍停留在越南軍中時就應採取行動。

白人豬獃們正利用從越南戰場回來的軍士們，使他們進入警察和安全系統。許多我們的黑人兄弟去了越南，學會了殺人的技術，退伍回來後就加入警察行列，繼續他們壓迫我們的骯髒工作，而假借的名目和在越南一樣，是「法律和秩序」。

一九六八至六九年間，他們謀殺了廿八名黑豹黨黨員，而被他們用槍彈擊傷的更難以數計，許多人則成了被囚的政治犯。黑豹黨領袖，即我們的國防部長紐頓，關在加州。黑豹黨主席鮑比席爾被囚在康乃狄克州，他們正準備把他送上電椅。他們在芝加哥謀殺了富萊漢普頓，被殺時他睡在床上。除此外，他們還大肆逮捕黑豹黨員，在紐約逮捕了廿一人，在新海文十四人，洛杉磯十八人，芝加哥十六人。

我們企望你們來幫助你們的人民，或者離開軍隊，或者從裏

面來破壞它。除此之外，則都是妥協和出賣自己的人民。停止殺越南人，你們需要殺的是種族歧視主義者，將亞伯拉罕將軍及其僚屬軍官等解決掉。破壞軍需裝備，或者把它們送給越南人民，同時，有了覺醒的人也要促使其他的兄弟覺醒。現在就做這些事，比讓他們回國後幫助白人來摧殘我們好得多。當你們不再對作戰關心，那麼，告訴越南人民，你們準備加入黑豹黨，將為你們自己人民的自由而戰，這樣你們就不會再為被越南人民詈罵而擔心。因為他們一生中最大的願望就是立刻停止在自己國家的戰爭，他們將非常願意見到你們不想再作戰。你們對人類，以及對自己的人民都有一種責任，那就是不要成為種族歧視者壓迫別人的工具。

兄弟們，好好的想想這些問題，立即採取行動，你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組織你四周的兄弟們，讓白人們知道，你們不再願意成為他們的奴隸和他們雇用的殺人工具，讓他們知道，你們要他們停止對黑人兄弟姐妹的壓迫，你們要幫助黑人兄弟姐妹，使壓迫停止。你們要求釋放紐頓和鮑比席爾，尤其是要加壓力，不讓他們判鮑比席爾坐電椅。

我們決傾我們一生之力，以我們的血，來爭取我們人民的自由與解放，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我們。如果摧毀美國是必要的，那麼就讓我們臉上掛著微笑來把它摧毀，這是為了自由的微笑。黑豹黨要求在我們這一代就有自由和解放，我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在公平合理的世界裏長大成人。讓我們使一九七〇年成為我們獲取自由的英雄年份。

所有的權力屬於人民！抓住這個機會！

2

從審判黑豹黨談黑白問題的前途

湯姆·海頓 (Tom Hayden) 是美國六〇年代學生運動期間最重要的學生組織「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創始人之一。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間，他是該同盟的秘會長，他親自去過密西西比州，看過黑人最不幸的非人遭遇，他將這些情況向北方報導，使得白人學生對黑人運動加以支持。一九六二到六三年間，他擔任「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總主席，建立了該同盟的整個基礎。他一直是學生運動的活躍份子和傑出的領導人物。而後，他涉嫌一九六九年芝加哥的白人暴動而被起訴，因而亡命各地，後來亦自動投案。這篇文章是他亡命期間所寫，發表於當時的地下刊物《太陽舞蹈》上，由這篇文章可以看出學生運動末期一個學生領袖的基本看法。

鮑比·席爾，和其他在監牢裏的黑豹黨員一樣，他不是政治犯，而是戰犯。

因芝加哥暴動事件而被控的白人被告，至少還能說寫並準備

他們的答辯，而鮑比席爾卻連這樣的機會都沒有，他在加州柏克萊的街上被捕，被控涉嫌康乃狄克謀殺案，然後秘密綁往芝加哥，不准答辯，不准說話，然後又被載往加州，最後又送往康乃狄克州，在那裏，他現在正等著坐電椅。

如果我們是「本世紀的政治審判」，那麼，鮑比席爾的審判就是「美國的黑人審判」，他即將上電椅是一個黑人面對種族滅絕威脅的象徵。

他的案例並不是特例。自從黑豹黨成立後，已幾乎有三十名黨員被殺。尼克森上臺後的第一年，即有超過四百名黨員被依各種罪名而逮捕，黑豹黨在洛杉磯、奧克蘭、芝加哥、德斯莫奈斯，以及其他十五個城市的辦事處都被警察攻擊，黑豹黨成立時的中央委員會每一委員都受到壓迫：被殺害、下獄，或驅逐出境。司法部對黑豹黨特別展開行動，聯邦調查局認為黑豹黨是對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至少有兩個國會委員會和幾個大陪審委員團進行調查。黑豹們已不僅是被壓迫的標靶，而是成爲一場沒有經過宣戰的戰爭對象。在一個壓迫人的國家，異端份子至少還有起訴、審判、上訴等程序，而在對人民作戰的國家，受害者根本沒有那麼多法律機會就被殺害，美國各地監獄裏的黑豹們，和美國帝國的聖多明哥及西貢等地監獄裏的犯人並沒有兩樣。

攻擊黑豹們的戰爭升高以後，對黑豹，以及他們比較受到壓迫輕的盟友們之間，已經造成了巨大的差異。黑豹們正確的批評白豹們未能對黑豹的受迫害作足夠的反應，而白豹們呢？他們對黑豹們的慘遭迫害也很猶豫而不知如何措手，卻反而對黑豹們批判學運及婦運一事不諒解。

黑豹與白豹間的差異和紛爭，如果我們不了解近年來黑白的

政治關係，便無法加以理解。一九六六年時，黑人激進份子在卡米加爾領導下，將民權運動中的白人肅清，將白人激進份子導向白人社會的運動，年輕的白人由此而在他們自己的社會中產生了反叛意識。艾德利契、克利佛以及其他的黑豹們眼見於此，認為黑人們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及白人們的「革命運動」可以合流，他們認為黑人們可以為他們的自決而戰鬥，但除非整個國家有所改變，否則黑人的自決便不會獲得。基於這種觀點，在某些特定目標的行動上，乃有了黑豹們與白人青年激進團體的嘗試合作。

很少白人了解到與黑豹們結盟的危險，而黑豹黨方面卻不斷承受著「黑色文化民族主義者」的批評，黑色文化民族主義者拒絕與白人結盟，頂多只能和白人的民間基金會等結盟。對於黑人激進份子，黑豹黨的作法使他們回憶起以前的恐懼，以往老式的黑白結盟，最後造成了黑人的被掩蓋住，黑人的利益比起階級鬥爭來，反而淪為第二。對於多數黑人，甚至包括那些加入黑豹黨的人，大家都認為黑豹們是在要求一種不可思議的心理調整：進行種族鬥爭卻沒有反白人情緒。

相比起來，在這種黑白聯盟中，白人激進份子損失的便比較少，他們只損失了一點特權或金錢。自一九六七年黑豹們和白人進行再一次聯合並獲得成效以後，黑白的聯盟便因種族和政治立場的不同而漸漸消融。某些開始從事教育改造運動，如在黑豹黨國防部長紐頓被審時從事黑人的再教育；某些則從事競選，如和平與自由黨，但它在一九六八年的選舉前解散。而黑豹們則開始尋求與白人最有效的結盟方式，但答案卻不固定：某些時候和白人自由份子及學生結盟，某些時候則和芝加哥與瑞奇蒙的貧窮白

人結盟，有時則和街頭群眾結盟，有時則和和平運動結盟。如此的變動不居，乃是因為黑豹黨比其他人更具革命性，而且比它的盟友對結盟有更為嚴肅的態度。另外，黑豹們也常常會懷疑白人是否能真正成為他們的支持者，白人是不是個能和他們同時並進的獨立激進勢力。

所有的這些問題，到了一九六九年，由於尼克森的壓制政策昇高，而整個達到沸點。針對尼克森的高壓和攻擊，黑豹們建議成立一個廣泛的聯合戰線，以作反擊，這個聯合戰線將籌募基金，教育白人們，使他們了解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並散佈一種陳情：主張警察要由各地社區來加以管理控制，以免警察力量被法西斯主義者誤用和濫用。

但黑豹們的這種建議卻有許多困難。自由份子應該是很可能加入這個聯合戰線的，但他們卻對黑豹們有所畏懼，並對這種壓制的新情勢有點手足無措，而年輕的激進份子則剛剛過完新的鬥爭的痛苦生產期，比黑豹們還要激進，在白人社會中，只有知識份子和機會主義的老左派才對這個聯合戰線感到興趣。激進份子們在這個時候，至少有四個發展的方向：一、發展工人階級的組織。二、婦女解放運動。三、類似於人民公園事件中所主張的文化革命。四、氣象人黨等所主張的武裝鬥爭。年輕的激進份子很少人願意和老左派一齊加入聯合戰線，也不願向白人社會提出陳訴，希望他們注意法西斯主義的危機，更不願接受黑豹黨的領導。

可能黑豹們並不了解聯合戰線對年輕白人的巨大影響。自黑豹黨開端以來，已經漸漸激發起為數可觀的白人們有了武裝鬥爭的觀念。很少白人變成約翰·布朗斯，但是黑豹們的英雄印象卻加速了白人青年的革命意識，這在美國的社會運動史上是從未曾

有的先例。但亦正因此，相對照之下，當白人青年激進份子已變成了最極端的革命份子，黑豹黨所提出的聯合戰線反倒成了較溫和的改良主義者路線。這些白人青年激進份子對中產階級自由份子支持的聯合戰線並不反對，但他們卻要求黑豹黨承認軍事解放鬥爭的必要性。

對於黑豹黨，白人激進份子的這種反應，似乎是「自我中心的」，同時也是「無政府主義」。黑豹們很難了解婦女問題的重要程度有如此的優先性，也不能理解麻醉藥品和搖滾樂的意義。黑豹們覺得很奇怪，當黑人們已經證明街頭暴動是無效的行動，為何柏克萊的激進份子還要在街上從事長達十七天的戰鬥。黑豹們也不了解，為何氣象人寧願拿起槍桿而不做和平的請願。他們看不到白人激進份子所作的事有什麼合法性。由於如此的情勢演變，乃造成黑豹黨領導角色的失去，以及白人激進份子的自謀發展。

黑白聯盟的分裂本來或許是可以克服的，但就在這時候，美國政府利用了這個絕佳的機會，美國政府注意到聯合戰線會議由於步調不一致而分裂，他們認為這時黑豹黨業已孤立，可以作為很好的箭靶。

從聯合戰線會議直到審判的這一期間，黑豹黨和它的白人盟友間的裂痕仍繼續存在著。十一月十五日在舊金山，由於白人激進份子大衛·希里亞在自由派群眾和平大會上演講，主張沒有解放鬥爭便無法得到和平；他並指出，尼克森已使得黑人解放成為不可能，必須將其殺掉。由於他過份激烈而被群眾噓下台來。美國官方眼見黑白聯盟已如此分裂，乃更進一步的向大衛希里亞下手，將他依「威脅總統安全」的罪名起訴。

在審判期間，黑白聯盟間的裂痕，有些地方開始縮短，有些地方則更加擴大。我們的政治觀點和鮑比·席爾日漸接近，然而我們卻是自由的，而他則仍然關在監獄裏。我們協助黑人們，讓白人了解黑豹黨的被迫害，我們主張與黑豹黨結盟，但我們卻無法避免鮑比·席爾的被判刑，也無法避免黑豹黨員富萊漢普頓以及麥克克拉可的被謀殺。我們的無能為力，並不只是我們自己要負責，而是整個白人運動的無力。直到十一月十五日華盛頓的示威遊行，沒有任何爲了抗議鮑比席爾被迫害而舉行的大規模示威。

今年稍早的時候，黑豹們已開始重新考慮他們結盟的基本策略，艾德利契起草了一份宣言，宣布如果階級鬥爭不可能，那麼黑人就必須單獨的進行種族戰爭。宣言中說，不能有再多的黑豹成爲「種族和諧祭壇」上的犧牲品。

然後，突然間，在新海文市有了一個極有希望的新型式聯盟出現，這個新的結盟事實上早已醞釀，白人們也早已開始又再關切種族問題。四月間開始了示威，「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在耶魯大學的負責人已承認黑豹黨所提出的問題的重要性，這個問題是：在美國，要求對黑色革命者作公正的審判是不可能的事。接著，五朔節這一天，兩萬五千人到了新海文，爲不公正的審判而示威，這些人包括了溫和派和白人革命派，成了新的激進盟友。

爲了瞭解黑白結盟的這種不穩定性，我們必須先了解種族歧視的整個結構。所有的白人都是種族歧視體系中的一部份，他們有比較好的物質生活，沒有黑豹們那種度日如年的經驗，從來不會像黑人們那樣受到慘烈的壓迫，縱使白人變得比黑人更激進，他們卻仍然沒有消除膚色的界限。縱使白人像約翰布朗一樣的去

做，黑人們仍會把他看成是個矇混者：他對自己所作而卻使黑人受害的結果仍然分擔不到責任。白人優於黑人的社會界線並不意謂著所有的白人都是種族歧視的，也不表示白人支持黑人的不重要。只是，美國白人的疏離以及抗議行動，對黑人的感覺而言，卻常常是遙遠而矛盾的。對於黑人，他們是在爲了三餐而戰鬥，因此在他們眼中，白人的婦女解放運動並沒有那麼重要。另外，黑人們失業嚴重，他們渴望工作，因此，在他們眼中的嬉痞乃是一種自我沈溺。

黑豹黨領袖之一的紐頓曾經在一篇從監獄中寄出，主題是在分析無政府主義者的文章中指出過上述這種差異。紐頓說，黑人社會由於經歷了集體的壓迫和集體的物質缺乏，因此比那些只想自我表現的白人疏離青年更能抓住組織與訓練的概念。他指出，黑人們努力的是要把自己的奴隸地位打破，這和白人青年追求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整個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黑人是從依賴和無力的狀態下走向黑人集體權力的侵略性驕傲之新狀態，而白人則是從新社會一致性的緊箝下走向發現自我的新方向。因此，白人青年們認爲組織和訓練是違背自由意識的。這意謂著，縱使白人青年感受到共同的普遍被壓迫，他們所走的方向仍將是自我的轉變。

白人激進份子在這個混沌的世界上，扮演著一個很困難的角色。他們認識到要和黑豹們以及少數被壓迫者團結一致，而在此同時，作爲一個白人，他們仍接受到特殊的權益，而他們所要求的解放和黑人社會所要求的並不一樣。由於這種矛盾，因此他們乃容易把黑白結盟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加以誇大。在政治術語上，這乃意謂著，白人固然可以幫助黑人去奮鬥，可是在本質上，

他們卻是不可依賴的。固然黑人不必永遠單獨的奮鬥，但對他們而言，自立自強卻是比和白人結盟更基本的原則。

將美國黑白激進運動拿來和其他國家的解放運動結盟策略來作比較，便可發現美國情況的特殊。美國的黑人雖受到殖民地似的待遇，但黑人和白人卻同在一個國家裏，黑人沒有自己的疆土來辦學校，發展農工業，以建立自己的認同感，進而為黑人的自由而奮鬥。因此，黑人爭自由與平等的戰鬥不可能像阿爾及利亞向法國爭獨立的戰爭，最後成為兩個分離的國家，而是只能調整美國自己。

其中的一種結果是，美國的黑人比起其他殖民地社會黑人來，和白人的相互依賴關係愈來愈多。黑人對白人，既有親切感，也有仇恨感。儘管黑人有不同的文化，但黑人們仍覺得他們會很自然的像白人一樣的思想。對於這點，白人激進份子也愈來愈感覺到。

痛苦的關係常常是可以打破的，但這種關係卻有著連續性。縱使在黑人對白人失望時，黑人的行動仍不斷推動著一些白人，使他們有更清楚、更激進的瞭解。黑人是白人學生運動早期發展的導火線，黑人使得反戰運動向激進的方向發展，黑人是使革命暴力合理化的人，也是地下文化的靈魂。黑人攻擊白人的種族歧視是有效果的：儘管年輕的白人仍是整個種族歧視體系中的一部份，但比起老一輩來，他們歧視的程度已日形降低。

基於另外的理由，黑人和白人的關係變得很難打破。由於黑人沒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國土，因此，黑人運動乃被迫需要靠白人左派的支持，也需要白人自由份子的經濟支援。因此，白人激進份子和黑人運動結盟是很明顯的，縱使這種關係並未形式上

的加以承認。以黑豹黨為例，我們或者支持他們，或者就讓我們成爲白人無用的證據，而讓黑人的「文化民族主義者」抬頭。

對黑人作殖民地似的壓迫，對我們母國脆弱的中心而言，乃是一個定時炸彈，萬一它爆炸，則將摧毀我們整個系統，並使我們或者死亡，或者整個社會結構不再完好如初。

如果我們從殖民主義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那麼，很明顯的，我們應該知道要怎麼去做了。

如果我們把黑豹黨看成是美國的雛型越共，如果我們假設越南的情況已在我們國家發生，那麼，很合理的，我們必須選擇並改善反越戰運動的策略，亦即要對國內的壓迫黑人加以反對。

我們將會了解，由於美國對黑人根本是在作殖民地式的統治，因此，黑人自決的要求是不能藉著社會福利的增加而取代的。由於黑人激進主義和白人激進主義有著相同的命運，因此，兩者的關係應該是非敵對性的。

第一，我們需認定，鮑比·席爾和其他黑豹不能讓我們的司法部門來審判，他們應該由我們的抗議運動來審判。黑豹們因爲是戰爭犯，因此他們應該是無罪的，他們不能由高等法庭來定罪，而應該由我們用公衆壓力來和政府談判，使他們無罪。大家爲了拯救紐頓而用的口號：「釋放紐頓！」應該擴大成：「釋放所有政治犯！」，許多白人由於不完全接受黑人自決的概念，因而傾向於主張黑豹黨應該被「公正的審判」，他們認爲在決定是否要支持黑豹黨之前，應當先看看法庭審判黑豹們的情形。不過，這種人仍然算是黑豹黨的支援者，因爲法庭的表現會使他們支持黑豹黨。舉例而言，新海文市的高級治安官對陪審團人選就作了安排，其中有治安官的私人理髮師及鄰居朋友，這或許顯示出他們欲圖

構陷鮑比·席爾及其他人的陰謀。

我們需要了解，黑豹黨的成功需要公眾主動而非強迫的支持，而官方卻會用大規模的恐怖行動來使公眾恐懼，迫使大家不作支持。如果美國白人認為黑豹黨的行動是恐怖的，那麼他們就需設法讓警察停止在黑人區的暴行，而不要只譴責黑人極端份子。鮑比·席爾的被起訴，目的是在藉著嚴重的起訴罪名，使他從街頭消失，也讓公眾減少對他的支持。

第二，我們需要進行一種全國性的政治教育運動，這是一種策略，要讓公眾了解我們國內已有了內部的戰爭。在反越戰運動中這種策略被廣泛的使用，可是對於黑豹黨的被審判我們卻很少使用。連續的政治教育，它的效果我們不能低估。

第三，將反種族歧視和壓迫帶向街頭，它在現階段的重要性一如反戰運動初期的街頭示威。最近在新海文市的街頭示威是白人首次為了黑豹黨而作的全國共知的行動，康乃狄克州的審判將會繼續造成緊張的氣氛，這將使有效的示威行動成為可能。因此，在這一期間，我們應有示威行動的計劃，這個計劃的有限目標是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使黑豹們無罪釋放。如果不將審判作為立即的焦點，那麼司法部就會無動於衷。在反越戰運動時，五角大廈是攻擊的箭靶，現在司法部是新的焦點，因為它是集體罪惡的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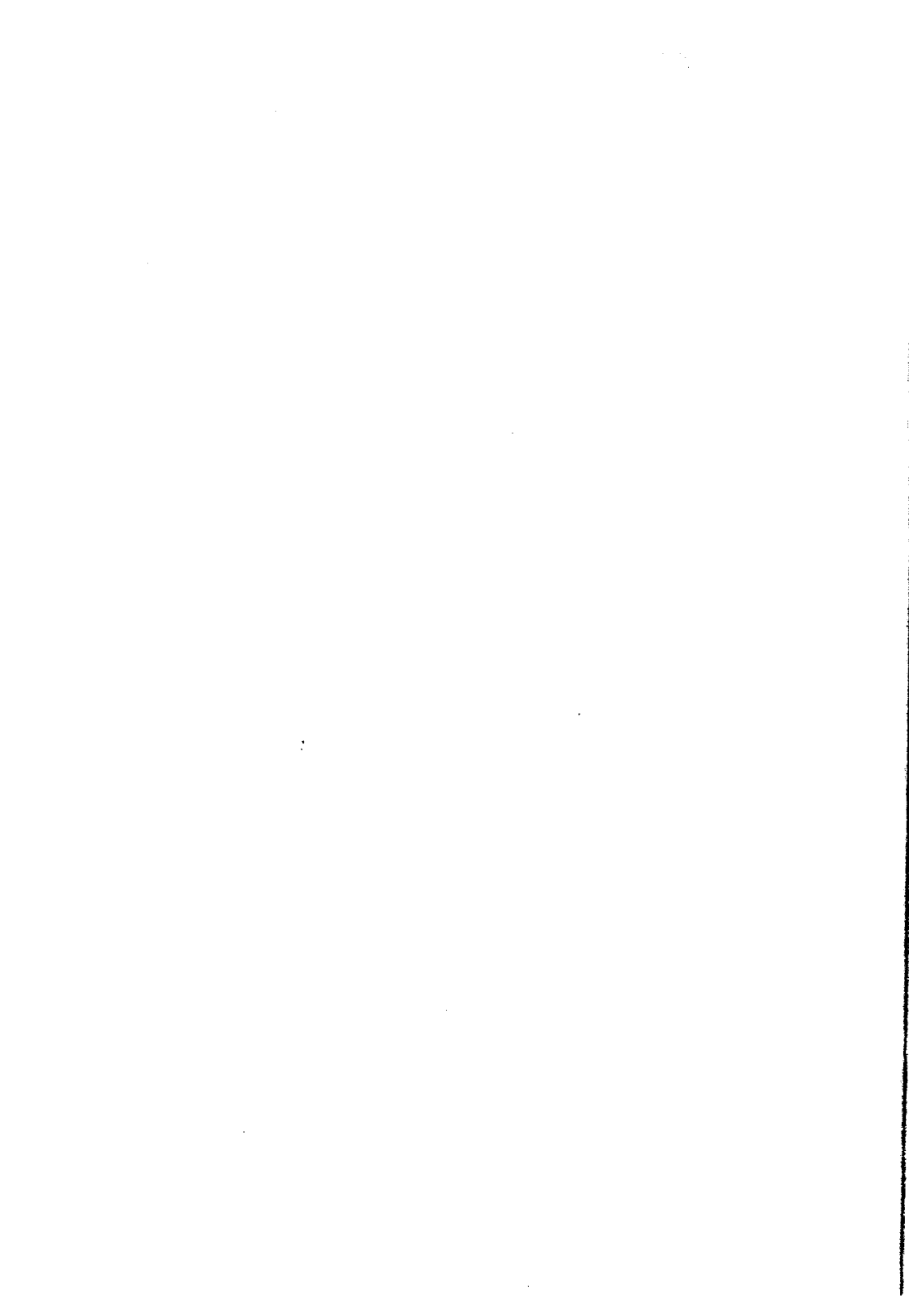
第四，我們要誘導美國國內有地位人士出來講話，這對減輕黑豹黨的壓迫有著非常關鍵性的作用。就短程目標言，壓迫的減輕可以由美國權力精英份子內部的分化而達成。在反戰運動時，參議院的鴿派議員減緩，甚至經常避免了戰爭的升高。雖然此舉可以使得抗議合法化，但它也使得抗議不能過份極端化，可是對

於黑豹黨，這卻是個或許可以生存的機會。如果前司法部長拉姆西·克拉克 (Ramsey Clark) 或耶魯大學校長京門·布魯斯特 (Kingman Brewster) 願意像越戰時期的傅爾·布萊特一樣出來講話，則對黑豹們將會有好處。

第五，我們必須進行一項國際性的運動，讓世人知道美國政府是一個犯罪而非法的政府。美國統治階級現在面臨的問題可能並不是越戰，而是在新的國際情況下如何繼續維持它的種族歧視。美國的種族歧視是它當前首要的外交政策問題。美國更加進行種族歧視的壓迫和侵略，每一步都會使它在國際上更加孤立，而它爲了國家形象對黑人的每一讓步又會使國內的衝突升高層次。我們將利用所有國際接觸的機會，在國際會議和世界性雜誌上將美國壓迫黑豹黨的事公布出來。

第六，最後，我們必須創立一套反抗的結構，它必須是在每一戰線上黑人和白人革命派主動而超法律的機構。另外，一個新的地下聯絡運輸管道是必須的，如此才能保護我們的亡命者和黑人社會的資源。這種需要在美國是非常重要而實際的，因爲所有的黑人社會都被白人包圍，而所有的聯絡運輸管道又都被白人控制。

現在，鮑比·席爾的被審判，以及康乃狄克州的審判黑豹們，已成爲白人支持黑人解放運動的一個最好的再出發機會。政府希望一注電流就把我們全部人的精神殺死，箝制言論和枷鎖還不夠，他們現在更要用電椅來替代。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人對這個趨勢都要注意，設法讓它停止。正如同我們的案子是對我們這一代的審判，鮑比·席爾的被審判就是對我們國家之黑人和白人審判的象徵。



3

公園屬於誰？

法蘭克·巴達哥 (Frank Bardacke) 為所謂的「奧克蘭七人事件」的七人之一，他們七人因被控「陰謀妨礙公務」而聞名。這篇文章原刊於地下刊物《柏克萊部落》，是美國少數種族陰鬱愁慘的歷史再次展現的見證。

下面這篇文章，是「公園人民」原始立場的說明書：

某一天將有一個小公務員，手拿所謂的「土地所有權狀」，說加州大學擁有這塊「人民公園」的土地。他的這張土地權狀紙來自何處？它究竟有沒有價值？

很早以前，柯斯他農說印第安人生活在現稱柏克萊的這個地方。他們對土地的所有權沒有概念，他們只相信土地是利用者和居住者所照顧和保衛的地方。

天主教傳教士從印第安人手中拿走這塊土地，沒有合約，沒有在任何紙張上簽字。他們藉上帝之名將這塊土地拿走。

墨西哥人又從天主教手中奪走這塊土地。墨西哥政府有槍和

軍隊，上帝之劍不是對手。

墨西哥政府想要造假，使這塊土地有「合法」地位。他們製作了幾張說明他們合法擁有這土地的紙張，但沒有一個印第安人在上面簽過字。

美國人沒有被這幾張紙愚弄，他們的軍隊比墨西哥強盛，在戰爭中將墨西哥擊敗並取得了這塊土地。然後他們寫了幾張紙，強迫墨西哥人在上面簽了字。

美國政府將這塊土地賣給幾個白種移民，美國政府給他們幾張紙來換他們的錢。此一期間，這裏仍有許多印第安人圍繞而居，他們認為土地屬於他們，結果，美國軍隊殺了其中的大部份人。

這張紙註明了，這塊土地過去不斷在富有的白人中移轉，某些時候，白人偶而對照顧這塊土地有興趣。可是，通常他們只關心賺錢，最後，幾個大有錢人，他們是加州大學的董事，他們買下這塊土地。

立刻，他們把這塊土地上建有的房屋破壞了。這塊地和許多其他土地一樣，變成了停車場。

我們正在這塊地上建造一個公園，我們要照顧它和保衛它——依照柯斯他農談印第安人的精神。當大學當局拿著所謂的土地權狀來的時候，我們會告訴他們：「你們的土地權狀上塗滿了血跡，我們根本不願意碰它。很早以前你們的人從印第安人手中搶走了這塊土地，如果現在你們要把它再拿回去，那麼你們必須再發起一次戰爭。」

4

各部落全體印第安人聲明

阿卡特拉茲島 (Alcatraz Island)，是舊金山灣的一個小島，它是美國聯邦政府的監獄島，以「全美各部落印第安人」團體為名，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發佈的這項聲明，要求收回這個島嶼。這篇聲明充滿反諷，我們可以拿來和「魂斷傷膝河」對照，便可明瞭美國被壓迫種族的心聲。

我們，美國的土著，基於我們發現美國的權利，以全體美國印第安人之名，再度重申對阿卡特拉茲的權利要求。

爲了對島上現在的白人公平起見，我們願意作如下的購買合約：

我們願意以相當於廿四美元的玻璃珠和紅布，來收買阿卡特拉茲島。這個價錢和三百年前白人購買一個類似島嶼的價錢相當。我們知道，廿四塊錢貨物購買十六英畝大的這個島嶼，已比當年白人買曼哈頓島的價錢爲高。而且，我們平均以一點二四元的價錢買阿卡特拉茲島，仍比現在白人收購加州印第安人土地的

價錢爲高。

我們將給這個島上的白人住民一部份土地讓他們使用，這部份土地將由美國印第安人事務局監管，由美國白人事務局永久持有——直到太陽不再上昇，河流不再入海。我們還要教導這些居民適當的生活方式。我們要他們信我們的宗教，受我們的教育，過我們的生活方式，幫助他們達到我們的文明水準，我們要把這些白人弟兄從野蠻而不快樂的現況下拯救出來。我們作這樣的購買合約是善意和公平的，一如我們和所有白種人交易。

我們覺得阿卡特拉茲島比白人所訂的標準更適合作印第安人保留地。因爲，這個地方和所有印第安人保留地一樣，有著下列特色：

- 一、它和所有現代公共設施絕緣，沒有充份的運輸工具。
- 二、沒有自來水。
- 三、沒有足夠的衛生設施。
- 四、沒有油權和礦權。
- 五、沒有工業，因此失業嚴重。
- 六、沒有健康診療設施。
- 七、土壤均屬礫質，無法生產，且無魚獸生存。
- 八、沒有教育設施。
- 九、人口超過了土地負荷的能力。
- 十、人口均被視爲犯人，須靠外界接濟。

另外，阿卡特拉茲島作爲印第安人保留地，還有象徵作用。全世界的船隻只要一進入金門，第一眼便會看到印第安人的小島，這樣便會提醒他們這個國家的真正歷史。這個蕞爾小島便成了新大陸的象徵——它曾一度被自由而高貴的印第安人所統治

過。

我們將如何使用這個小島呢？

因為舊金山印第安人中心已被焚燬，印第安人在白人社會中已沒有地方集會和舉行部落儀式，因此，我們計劃在這個島上建幾座印第安人機構：

一、一座美國土著研究中心：這個中心將教導所有印第安人有關改善生活的技藝和知識。這個中心將附設流動大學，由印第安人管理，到每一印第安人保留區了解當地印第安人的需要。

二、一座美國印第安人文化中心：在這裏將傳授我們古代的部落宗教，和神聖的醫療儀式。我們將使印第安的文化藝術成爲特色，教導年輕一代音樂、舞蹈、和醫療儀式。

三、一座印第安生態學中心：在這裏，我們將教導我們的年輕的一代作科學研究，以恢復我們土地和水源的純淨自然。我們並將設法使舊金山灣區的空氣和水不再受污染，恢復這個區域的魚類和獸類的生活，使這個區域海洋中受到白人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污染威脅的海洋生物恢復生機。另外，我們還要在這裏設海水淡化廠，以應人們的需要。

四、一間大型的印第安人訓練學校：這所學校將教導我們的人民如何在這個世界中生存，如何改善我們的生活水準，解決饑餓和失業。這所訓練學校將設一座印第安技藝中心，一座供應印第安式餐飲的飯店，在這座中心裏，將表演印第安人的藝術，飯店則恢復印第安的烹飪技藝，如此，公衆便會知道傳統印第安生活方式之美。

某些現有的建築物則將改成美國印第安人博物館，在這裏將展示我們土著的食物以及我們對世界文化所曾作出的貢獻。博物

館裏同時也將展示一些白人所給我們的東西，他們在奪走我們的土地和許多人的性命之後所給我們的疾病、酒精、貧窮、和所謂的文明產物（如舊鐵罐、鐵絲網、橡膠輪胎、塑膠罐等）。博物館的另一部份還要展示一座地牢，因為所有印第安人對白人官吏不服的都被關進地牢，被限制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也如同監禁在地牢一樣，展示一座地牢有象徵的紀念意義。另外，這座博物館也將展示印第安人歷史中高貴和悲慘的事跡，包括被撕毀的契約，「淚痕事件」的文件，傷膝河的大屠殺，以及印第安人戰勝黃毛卡士達將軍及其部隊的英勇事件等。

因此，以所有印第安人之名，爲了我們印第安人的國家以及所有的這些理由，我們再申對阿卡特拉茲島的權利要求。我們認爲，我們的這種要求是正當的，只要河水不涸，太陽繼續照耀，這塊土地就需交給我們。

5

中毒的麥子

〈中毒的麥子〉是六〇年代反戰運動的先驅性文獻。這首詩一九六五年發表於〈舊金山寓世報〉。稍後的反戰運動大都未脫出此詩的格局。

嘔！藍的、灰的、綠的、灰白的上帝！
平靜的傾倒著玫瑰、獅子、鹽！

死亡在越南！
死亡在越南！
死亡在越南！
我們的身體皆已瘋狂，
由於我們已遺忘我們是熱血動物。
藍黑的頭顱舉起慾念的襪子！

美國的公民

在叛國者的手中
他們忘了他們的意志和力量
默默的承受了
無目的，不願見的戰爭。

每個男人，每個女人，每個小孩
都天真無邪
皆不必負責——
對那些暴行
由於政府，錯誤、虛偽、罪惡而產生
它們均來自現在的
法西斯主義：它在過去的歷史中形成。
社會的結構功能
創造了它的罪惡。

（而現在，情況更壞，但他在分水嶺上
人類可能丟掉他食肉動物的過去殘餘
他在分水嶺上
他可能變成一個歌手和光榮的動物
在這個世界上生而自由
很快的，沒有羔羊或人
會被吃掉
拯救
以奉獻的微笑！）

這是我們的本性，去研究
何謂罪惡，
但是，罪惡是不能持久的
罪惡也非來自遺傳
接受資本主義遺傳的罪惡
便創造了恐懼。

沒有一個人該為這些罪行受到責備！

我們是花，能創造新的自由底
種子和果實。
資本主義利潤的美麗花朵
社會盛開了
憤怒的勞工和
全世界群眾的饑餓。
我是一朵花，並非表示
我需負責——
對根的憤怒。
但是，我是人，我知道這憤怒、勞工、及痛苦。
以及社會之謀殺者。

接受這罪惡，爲了
企業家，資本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
將窒息，被騙，和使人麻醉。

自由的人們，也將被驅迫
成恐懼，種族歧視，和喪失能力！

如果我忘記，經過一段長時間
我原具有的
感官快樂
我必須努力的踐踏
毀滅我靈性的，令人悚然的罪惡！
我無罪！

我是活生生的生命！

我對叛國的法西斯主義和集體主義
不負責任!!!

（法西斯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定義
由於科技發展的新媒體，需要檢討
人性也被再製，現在需要重新定義。）

我不必負責——
對他們：他們創造
和使用控制社會的工具！
我蔑視這個社會，它創造
無數的殘酷
並強逼人們

去壓迫社會的可憐人。

我無罪！因此，我可以創造性的去行動
不依照被指定的模式
不做那種逃避主義和犬儒主義的罪惡。

共產主義也不行！
共產主義不能創造足夠的糧食
而這是人類生存所必需。
資本主義已失敗！
它創造了過度的人口，奴隸
和饑餓。

無論我是否在蘇聯，赤色中國，或帝國主義的
英國或法蘭西，或資本主義的美國
我不負責——
對法西斯主義或集體主義的罪惡
它被欺瞞的
假借「現代歷史」的名目而掩蓋！

我無罪！我自由！
我是熱血動物！
我是熱血的，有感覺的動物
能愛、能恨、能行動
或者不行動！

能夠做壞事，能夠說話
能夠苦幹！

——我已厭倦
對亞洲以及阿爾及利亞戰士的
殘忍和邪惡的行爲。

我已厭倦
被不斷的集體饑餓
和過度的人口，以及
不可思議的無用物品之生產——
爲了它，需要破壞自然。
我爲森林而喜悅，也爲
未來的巖穴。

厭倦是一種奢侈
不能沒有性靈的損失、漸漸的
變成永遠不能彌補！我是人！
厭倦和罪惡要丟棄！
罪惡是一種奢侈
厭倦是一種無意義的事
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種
政治上的對立！

我已遠離政治。我否定政治集會

管它是爲了戰爭，還是和平共存！
馬克思主義和自由放任的意義
早已被撤廢。
美國人口將要加倍
到了西元二千年。某些南美國家
則是十八至廿年加一倍。
沒有解決方法，
除了人們創造出一套包括許多方法的方法。
一大部份人正處於
饑餓的邊緣。
當生物的密度到了一定限度
超擁擠的條件是一種生物學的結果。
生殖過度的老鼠實驗
老鼠成了精神失常
心理變態，同類相噬，罪行，半精神緊張
當擁擠到了一定程度，動物的反應是——
需要更加的擁擠。
舊金山、東京、倫敦、莫斯科、北平！

人類成了最普通的東西！

每個人都必定有反應
對於神經系統這已屬太多。
人類之進化爲社會生物，原是稀少的動物
現在卻成了最普通的大動物

——而且威脅所有其他生物都有了滅種之慮。

(在新石器時代，人們製造食物

動物和植物均賴栽植或飼養

——而罪惡的張力卻開始成了

他遺傳變化的一部份。

他自己改變

人口開始。

現在他可以自新石器時代革命中超越而出

他必須選擇——

歌唱或自殺！)

犬儒主義和逃避主義均為一種反應——

對亞洲的屠殺和受苦。

而亞洲的人口過多和饑餓，

則拜歐美帝國主義之恩賜——

非法的征服，科技的掠奪資源。

殖民國家的生產

皆依西方商品的需要

他被訓練

成了西方商品的消費者

他們被給予西方的藥品

降低了死亡率。

如果一個美國人接受這些事實

他就必需承擔罪惡和責任！
並非如此！
一個人如對社會覺得它是罪惡
因而他便會不承擔行動的可能，
如此，社會的現狀便將長存！
但這非實事——因為社會已瘋狂
現狀不會維持
這是個自虐的社會
它欺騙自己是維持現狀，
而事實則日趨滅亡。
西方的社會已經毀滅了它自己！
文化已被消滅！
門口最後一個哨兵
已拿槍對準前額，並且
扣下了板機！
新的文明不會是共產主義！
他們支持的政治
一如文化，也已死亡！
政治乃是關於權力定律的沈思冥想
它的運用從未接觸到人的問題
除了它的壓迫！

新的社會將是一個生物學的社會！

歷史是無效的，因為已逃離了歷史。

我們居住在平原，在此，文明存在並持續，是——
快速的死亡及喜好受虐的社會！

我們被叛徒和野蠻人支持著

他們以這種社會的商業法則

操縱著戰爭！

能看，能感的人都躲了起來

他們希望在大難來前有幾年生命可活

他們成了福音主義的成員

——是對人口密度的一種歇斯底里反應。

他們希望出現奇蹟。

新音樂和消遣媒介的戰慄之美，以及宗教
都是福音主義。

它是美的，甚至可以造成歇斯底里

可以產生快樂及一些滿足的方法

——但它是生物學上反應的最後一線

利用歇斯底里，來得到拯救的渺小希望

這是如何的悲慘！

轟炸亞洲的漁村等於新音樂

拯救一個美的，一個不是美的

新知識份子的目擊見證

證實了兩者的美麗！

美麗是可怕的！

墨索里尼說過轟炸村莊之美

正如同黑衫黨以屠殺猶太人爲美

(將以色列作為阿拉伯人之刺，是如何的瘋狂！)

熱血的人無法從同類的受苦和死亡中

獲得快樂，除非

他事先已經瘋狂。

大群飛機飛過頭頂

並不是帶來旅客

而是飛往亞洲的轟炸機！

不要聽，它是真的！

誰是駕駛員？

他們接受命令，進入艙座，爲什麼？

無疑的，就像轟炸古尼卡一樣。

而官方告訴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接受不可能的事，是犬儒主義！

對痛苦和死亡崇拜或緘默，是犬儒！

當社會已成死屍，而猶扮演角色

這也是犬儒！

不管這屍體是個年青的俄國人、中國人

或老的美國人！

遠離訊息，是逃避主義！

那麼，逃避聽到轟炸機飛過的耳朵呢？

福音主義——無論是藝術的或宗教的，是逃避

對許多事要採取行動！

野蠻主義

殘忍的暴行

轟炸

在柬埔寨的毒殺小麥

政府的秘密人員

以及所有政治歇斯底里症的症狀

帶向滅種之路！或者集體饑餓

以及其他那些生不如死的地獄慘境！

人們要獲得正常的肉體和精神快樂

那麼，就必須

從罪惡和責任中得到自由

——無論是剛果部落人民的快樂

或歐美都市居民的快樂！

對最富有的，和最貧苦的

才有理想主義。

政治學已死亡，生物學在此地！

恐懼和罪惡必須棄之如破袍！

犬儒主義和逃避主義必須立刻丟掉！

行野蠻主義的叛國賊必須褫奪其權力！

對生物的對立，沒有單一的解答
必須有一套包括許多解答的解答！
它必須經由思想和行動
以能力和消息兩者結合，才有可能！
但社會和政府卻封鎖消息，窒息人們的能力！

大多數公民反對戰爭！
戰爭創造罪惡，引起心盲。
心盲等於歇斯底里和逃避！

一個新的人類舞臺必須打掃
以等待新思想，新行動
它不僅以國家為範圍
而是以全人類，全生物為對象！
——所有希望上尋星辰
以探求無限自由可能性的。

每個人都無罪！
生命之點並非靜止，而是行動
死亡是靜止
——每個人都會有足夠的永恆靜止
現在則是行動的時候。
戰爭必須停止——世界將會清明！

世界是彌賽亞！

這是什麼煙啊！

氖燃燒彈的光柱醜惡而且是死亡。

上帝，保佑！

6

提摩太·賴瑞之越獄聲明

提摩太·賴瑞博士 (Timothy Leary) 原是哈佛大學講師，他是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期間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一九六九年他被控藏有少量大麻而被捕。審訊期間，法庭不准其保釋，因為他的作品和言論「對社會有威脅」。賴瑞博士於法律範圍內尋求權利之保障不獲後，對美國法律澈底失望，於是從加州聖路易奧比斯堡監獄越獄逃亡，他越過高達十二呎的監獄圍牆逃亡成功，警方在數哩以外只找到了他的囚衣。他越獄後和氣象人黨一齊活動，後來亡命阿爾及爾。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六日，賴瑞博士和氣象人黨的杜宏，投信給〈洛杉磯自由新聞〉，信封沒有地址，郵戳所蓋的發信地點是洛杉磯。下面就是刊於〈洛杉磯自由新聞〉的泰瑞博士之越獄聲明。

下面這份文件是我在戰犯營裏所寫：

在戰犯營兩輛槍砲車嚴密的監視下，我越牆將它帶出。在此，

我要對地下的女氣象人組織的朋友們表示感謝，他們設計並執行了拯救我的計劃。

現在，我和露茜瑪麗在地下活動，我們將繼續我們的革命戰鬥。

這是一個追求和平的時刻，也是個尋求戰鬥的時刻。

兄弟姐妹們，在這個時刻，讓我們不要再談和平。

我們一直要設法避免的衝突已降臨到我們頭上，這是個世界性的生態、宗教戰爭，生存對死亡之戰。

聽著，現在去尋找一種正常的經濟政治解決方法，乃是一種自耽和逃避。

兄弟姐妹們，這是一場爲了生存的戰鬥，可以去問黑豹黨的紐頓和安傑拉，他們有深入的研究。

可以去問野生動物，它們切身知道。

可以去問有反省的生態學家，他們有很沈痛的了解。

我宣佈，那些短頭髮的機器人（按：係指美國當權者）已經開始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他們的居心是要把自由的自然生命用機械的規律來替換。

聽著，在這場總的戰爭裏，就像在布肯瓦市、美萊村，或者索爾達，沒有一個非戰鬥員。

你，或者是死的體系裏的一部份，或者就屬於自由生命之網的一份子。

不要被欺騙。從古以來滅絕他人種族之戰，都是用法律或警察的行動命令來作偽裝的。

請記住印第安蘇族、德國猶太人、黑奴的經驗；以及警方取締大屠的計劃，和西德航空公司對劫機事件所表現的激憤。

如果你不能了解我們都是受害者，那麼你就不會了解黑人的憤怒，黃種人的憤慨，巴勒斯坦人莊嚴神聖的狂想，氣象人黨對正義的熱狂，以及青年們憤怒的日漸蔓延。

聽著，美國人民，你們的政府是一個欲致人於死的惡魔之工具！

記住，白人獵殺野牛和依洛庫依斯族印第安人的歷史！

記住甘迺迪、金恩、馬爾孔、列尼等人之死！

聽著，和一臺機器是沒有妥協的。你不能和沒有人性的機器人談和平與愛，在他們聯邦官僚機構的血脈中，是沒有靈魂、無心肝、無幽默、無生命、沒有愛的。

在這場戰鬥中，我們使用古老而神聖的有機生命底戰術：

一、我們用我們地下的兄弟愛和姐妹愛來抗拒他們。

二、我們消極的抵抗，以打破他們的齊一步伐。

三、我們用怠工，毀壞計算機，劫機，毀滅這塊土地上每一致人死命的機器等方法來積極抵抗。

四、我們公開的抵抗：宣揚生命，斥絕死亡。

五、我們私下抵抗，用個人的游擊方法。

六、我們用創造有機的藝術和音樂，來作美的抵抗。

七、作生物學的抵抗：我們要健康、性愛、生育。

八、作精神上的抵抗：我們保持靈性，祝禱上帝，熱愛生命，打擊機械的心靈。

九、以實力來抵抗：威脅到生命的機器媒介人都要解除武裝，使他們喪失行動能力。武裝你們自己，為生命而射擊，生命永遠不是暴力，可是，為了維護生命，射殺進行滅絕他們種族的警察卻是神聖的行為。

聽著！尼克森，我們不會永遠癡呆。我們知道，你放在槍筒上的花朵是危險的。當我們歌頌著「愛」的時候，當我們伸著手指作著和平的手勢時，我們也會記得慕尼黑和奧許維茲的妥協出賣及殘忍。

我們曾懇求你去生存並讓人生存，你去愛也讓別人愛，但你所選擇的卻是殺和被殺。希望上帝會憐憫你已失去的靈魂。

過去的七個月，我——一個自由而鮮活的人，被關在一所戰犯營裏。沒有一個活的動物能在籠檻中苟存。由於我的越獄獲得自由，我已離開了在昆汀·索里達，孔汀等地戰犯營的兄弟姐妹。

同志們，聽著！解放的戰爭剛剛開始，反抗、持久的堅忍，不要向敵人投降、努力打擊，你就會自由。

聽著，對你們被關的兄弟，將他們救出來，如果哈里斯在世界上有十個朋友，那麼你們就不要再作主張非暴力的傻瓜，把他硬救出來。

對任何兄弟姐妹，將他們視為戰犯是完全沒有藉口的。

起來，雷娜·哈立德。

聽著，現在時間已晚了，整體性的戰爭業已降臨，為生存而戰，否則你將死亡。自由即生命，自由將永存。

警告：我有武裝，對任何威脅到我生命或我的自由的人，必須知道我是危險的。

7

「氣象人黨」宣戰書

「氣象人黨」是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發展到後期而成立的最激進組織。這個組織實質上乃是一都市游擊隊型態的暴力組織，有沙皇時代俄國虛無黨的遺風餘沫。在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期間，「氣象人黨」和「黑豹黨」、「白豹黨」等類似組織齊名，由於它們的偏激化，乃肇致官方的嚴加取締。這篇宣戰書是一九七〇年刊於其機關雜誌《地下氣象》上，後來廣泛被各地下雜誌轉載。為了瞭解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全貌，我們有必要了解其中最極端派的若干觀點和心態。但其不足師法，這是應該先行說明的。

五個月以前，許多氣象人（按：係指氣象人黨之成員）從公眾眼中消失了。兩個月後，其中的三個人在紐約市一棟建築物的炸藥爆炸事件中死亡。又一個月以後，十二個氣象人被聯邦政府提起公訴並通緝，罪名是在一九六九年秋天的芝加哥白人暴動事件中涉嫌陰謀策劃。

琳達·依萬絲是十二個人裏的一個，她今年四月在紐約街上被捕。其他的人消息不明。而現在，大家得到了柏娜汀·杜宏的消息——杜宏是「學生民主社會同盟」以前的行動家，現在是「氣象人黨」領導機構「氣象局」的一員，她也是十二個被告之一，現在仍然在逃。大家所得到的杜宏的消息，是一份長達三頁的打字通訊文件，這份文件中指出，它是根據杜宏的錄音帶整理而成。這份文件也是幾個月以來「氣象人黨」的第一份指示。

這份通訊文件的標題是「宣戰書」。文件中說：「我們已經寄了幾個副本給我們的朋友和敵人。」

這份文件的真實性無法查證，不過看它的筆調，倒確實像氣象黨人強硬的語氣。

這份文件同時透露，紐約大爆炸案中死亡的第三個人是泰瑞·羅賓斯，他是「學生民主社會同盟」激進派的一員，來自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學，也是氣象人黨的一位領導者。文件同時透露，被通緝的十一個人都還停留在美國，文件說：「兩個星期內，我們將攻擊一個象徵著美國不公平的人或機構。」

下面就是這份「宣戰書」的全文：

嘿！我是柏娜汀·杜宏。

下面我要宣讀宣戰書。

這是我們地下氣象人的第一次通訊。

現在，全世界的人們都在攻擊美國帝國主義。他們正看著我們美國青年，期望處於敵後戰略位置的我們能利用我們的地位，加入這股摧毀美國帝國的力量中。

黑人們已經單獨的奮戰了好多年。我們知道，我們的責

任是領導白人們來武裝革命。我們並不打算在監牢裡過以後五年或廿五年的歲月。自從，「學生民主社會同盟」變得具有革命性以來，我們就已致力於克服那種基於改革欲望而產生的挫折感和無力感。青年們已了解到界線是很清楚的，革命已經接觸到我們整個生活。數以萬計的人已知道，抗議和遊行是沒有用的，革命的暴力是唯一的方法。

現在，我們選擇越共的傳統游擊戰術以及「突巴馬羅士」游擊隊的都市游擊戰術，決定在世界技術最進步的美國實行。

古巴職業革命家蓋瓦那告訴我們：「革命家要像魚在海中一樣的活動」。我們國家年輕朋友對國家的疏離和輕蔑，已經為我們創造了革命的海洋。

數以千百計的青年朋友，在六〇年代曾為反戰和民權而示威遊行，而過去幾個星期，由於尼克森的入侵柬埔寨及意圖滅絕黑人，已使不滿人數增至十萬以上。所謂的「美國正義」更瘋狂的表現在一連串殘忍事件上：包括有六個黑人在奧古斯塔市被殺，兩人在傑克森市被殺，四名肯特州立大學的白人學生被殺，這些殘忍事件使得數千人變成了革命家。

一些來自特權階級家庭的青年，他們的父母多年來不斷說，對於我們，革命只不過是種遊戲而已。可是，這個社會的戰爭和種族歧視卻顯示出，這種話根本沒有意義。在現在這種體制下，我們永不願平靜的生活下去。

紐約市爆炸案死亡的人完全是對的，其中的第三個是泰瑞·羅賓斯，他約在兩年前領導過肯特州立大學的第一次反叛行動。

十二個被指控涉嫌去年十月芝加哥暴動的通緝被告，他們永不會離開這個國家。泰瑞已死，琳達被警方特務逮捕，而我們其餘的十個卻仍然在每一個都市和青年群中自由活動，我們並沒有躲藏起來，只是他們找不到我們。

現在從事地下活動的氣象人有數百之多，我們之中的一些人比五萬個現在在加拿大的逃兵有還長的刑期，可是已有許多逃避兵役的人從加拿大回來參加我們，或者加入部隊，準備在部隊中和那些並未逃避兵役的人，從裡面來摧毀它們。

我們的戰鬥有許多方式。藥物也是我們武器的一種。反大麻的法律即意謂著，數以百萬計的我們在和他們正式決裂前，早已就是不法之徒。對地下的青年，槍枝和藥物是結合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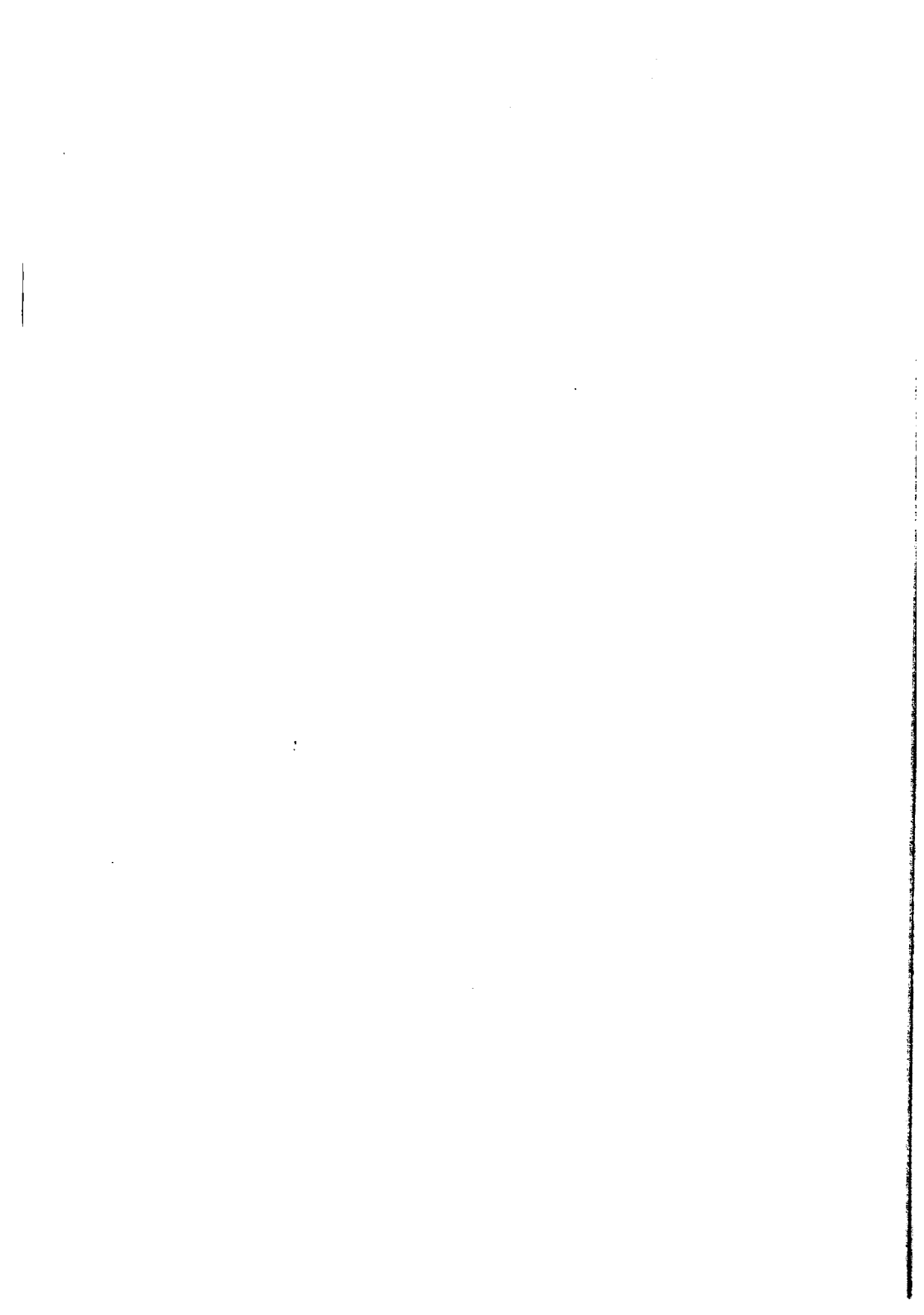
行為乖異者即革命者，革命者即行為乖異者。如果你想找尋我們，我們無所不在。在每一部落，每一社區，每一宿舍，每一農莊，每個軍營，每棟城屋，青年們在做愛，吸食藥物，荷槍上彈。對美國不滿的亡命者，可以自由的去生活。

對紐約大爆炸案死亡的戴安娜、歐頓、泰德、果得、泰瑞·羅賓斯，同時並為了所有現在仍在活動的革命者，無疑的，從現在起還要一段漫長的時間，但我們將永不回頭。

在下一個十四天內，我們將攻擊一個象徵美國不公平的人或機構。艾爾德利契·克里佛 (Eldridge Cleaver)，以及拉布朗 (H. Rap Brown)，還有全體黑人革命者，他們為了解放其人民，在敵人的後面不斷作戰，他們的作為激勵了我

們，我們準備於兩週內所作的攻擊是要向他們致敬。

他們今後永遠不會再單獨的作戰了。



8

白豹黨之立場

「白豹黨」(White Panther) 乃相對於黑人之「黑豹黨」的六〇年代青年激進組織。黑豹黨乃是黑人青年眼見美國合法體制已無法改造，黑人永無希望後，所創立的激進武裝組織，它有美國種族革命的涵意。而白豹黨則性質含混，在組織及戰略上它採取的是北美印第安人的方式，而在意識型態上則頗不穩定，徘徊在左右極端之間，他們崇拜卡斯楚、蓋瓦拉等職業革命家，而在行為上則相當多數繼承了嬉痞的遺風。因此，黑豹黨認為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

安娜堡芝加哥大學是美國學生運動史上的重鎮，從本世紀初期以來，該大學即學運蓬勃，白豹黨即以安娜堡為中心，中央委員會設於此。龐·普拉孟董 (Pun Plamondon) 為白豹黨的國防部長，他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第一個通緝的嬉痞首領。白豹黨的龐·普拉孟董，和黑豹黨的紐頓均為國防部長，均主張使用武力，均被通緝判刑。

白豹黨的文件均富有戰鬥性，他們主張「造反有理」，因

此世界各國近代的造反派所使用的字眼常在他們的文件中出現，他們似乎都未曾對那些字眼有過深入的研究。宜乎紐頓稱他們為「無政府主義者」。

替人民服務，所有的人民，無時無刻。要作為一個革命者，這是我們必須做的。要贏得革命家的美名，我們必須解答人民的需要，所有的人民。要和人民相隨左右，和人民站在一條線上，和人民一同工作，愛人民。作為白人革命家，我們也是文化革命家，不是文化國家主義者，而是文化革命家。我們正在進行文化游擊戰，不斷攻擊和摧毀他們的下等文化、下等觀念和意識。但是我們必須了解，他們的文化並不僅是「在我們外面」，它也「在我們的裏面」，深深地，在我們裏面。曾有人說：「我們必須殺死兩個豬糞，一個是在外面的豬糞，一個是在我們自己裏面的豬糞。」，因為，如果我們活了多久，我們就被下等文化浸泡了多久，如果我們今年廿歲，那麼我們就被下等文化浸淫了廿年，現在我們正開始摧毀這隻在我們自己裏面的豬糞。LSD就是我們殺死內在豬糞的一種工具，它可以吃掉內在的豬糞。然後，我們就開始透視他們的下等文化，然後我們可以得到真實，就像黑豹黨的艾德利契在他的書《冰雪上的靈魂》裏所說的：黑人是肉體，他們工作，而白人則代表精神，白人從事思想，可是白人一吃了麻醉藥品，他們就發現了他們的肉體，這時，一個革命的文化就產生了，一個與實體密切相聯的文化開始圍繞在我們四週。客觀的唯物主義於是產生，即人們不再只靠頭腦，也開始靠他們的肉體。這時人們開始關切客觀的實體，觀察事務也旨在探求它的本質，以代替以前只是聽別人的教導。

生活在頭腦之中，這就是下等文化。把下等官吏所安排的假的實體當做真，這也是下等文化。在下等文化系統中，這種虛假的實體被下等宣傳媒體散布，被下等教育系統傳播，易言之，這就是謊言。這些謊言使得人民混淆、分裂、生活在痛苦之中，因而喪失了力量。

可是，我們已經衝破它了，我們革命人民以革命文化衝破了這種下等文化。毛澤東說過：「我們的目的，在使文學和藝術成爲整個革命機器中的一個部份，它將成爲聯合人民和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以攻擊和摧毀敵人，它並能幫助人民在對敵作戰時集中意志。」這就是文化革命家的責任——將革命政治學和革命文化聯結成一體，資本主義是要政治和文化分開的，我們則是要使它們結合。我們要將革命藝術和革命政治學聯結一體，成爲革命文化，一種給所有革命人民的文化。在政治和文化間，在生活方式和文化間，以及在生活方式和政治間，都是不能有界限的。我們就是我們所作的。要作爲一個革命家，我們必須過革命的生活方式，在美國，這種革命生活方式就是共同生活，和我們的人民一起生活。政治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即文化。要作一個澈底的革命家，我們的生活也必須完全的革命，我們必須生活在革命文化中。文化是我們的生活，以及我們行動的方式，也是我們和客觀實體聯結的方式。

爲人民服務，爲所有的人民，這是白色革命人民必須面對的問題。但是，我們將以我們全部的能量先使我們自己自由？或者先使廣泛的人民得到自由呢？作爲一個革命家，我們必須成爲人民的支柱，我們必須首先想到人民，然後才想到個人。個人不可能自由，除非所有的人都已自由！

這就是蓋瓦拉和卡斯楚之成爲美麗而澈底的革命家的原因。蓋瓦拉是個醫生，卡斯楚是個律師，可是他們和人民站在一邊，和農人及工人站在一邊。他們以前可能只爲自己的自由而努力，但自站在人民一邊後，他們以全部的生命致力於全體人民的自由，這就是我們要成爲一個革命家所需要做的。我們必須成爲人民的支柱，我們必須爲全體人民的自由而奮鬥，這些人民或者個人受壓迫，或者種族受壓迫，或者階級受壓迫，當他們都得到自由，然後我們才能轉移我們的注意力和能力，來謀求個人的自由。現在，爲個人的自由而努力是不符人民需要的。被壓迫的人民是整個群體的被壓迫，而不是以個體被壓迫的。一個革命家和革命組織必須爲所有人民的需要而服務。現在，所有的人民需要從種族歧視、壓迫、資本主義的垂死系統中得到自由，也就是要從垂死的文化中得到自由。

這就是我們何以要進行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原因，我們要爲所有的人民服務。我們的藝術、音樂、詩歌、文學，以及我們的每一呼吸都是爲了人民，讓人民知道解放他們自己的方法。我們必須以實例教育人民，我們必須讓人民知道革命組織，革命訓練，以及革命暴力。組織、訓練、槍桿！對壓迫人民的罪行，只有一個答案：革命的暴力。人民將會寫下最後的歷史。我們是人民，就是現在！

9

紅襪黨宣言

紅襪黨 (Redstockings) 是婦女解放運動初期的著名婦女激進組織，由她們的宣言可以看出後期婦解運動激進派的基本觀點。

一、最近幾個世紀以來，由於從政治衝突中的不斷學習，婦女們已開始聯合起來，從男性支配之中以求得最後的解放。紅襪黨的宗旨即在於建立這種聯合，贏得我們的自由。

二、婦女是被壓迫者。我們的被壓迫是整體的，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每一方面。我們被剝削，被當成性慾的發洩對象，被視為生孩子的機器、下女、和廉價的勞工。我們被認為是下等人，唯一的價值就是使男人過得更好。我們的人性被否定。我們的行為是被指定的了，在它的後面有暴力的威脅作為支持。

因為我們和壓迫我們的男人如此緊密地生活在一起，我們彼此之間反倒相互隔離，因而便看不出我們個人的受苦是一種政治條件所造成的。我們誤認為，女人和她的男人的關係只是兩個獨

特的個人之互動，可以個別的解決。而事實則不然，每一個這種關係都是整體的，個別的男人和女人的衝突都是政治的衝突，只有集體的加以解決。

三、我們指證，壓迫我們的是男人。男性的優勢壟斷是最古老、最基本的壓迫型式。所有其他的剝削和壓迫，例如種族歧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都是男性優勢壟斷的延長：男性凌壓女性，少數人凌壓其他人。歷史上所有的權力結構都是以男性為重心的。男人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機構，而追溯其源頭則是武力。他們利用他們的權力使婦女處於劣勢的地位。所有的男人都從男性支配的地位中得到經濟上、心理上、和性方面的利益。所有的男人都壓迫女人。

四、以往曾有過嘗試，要把責任的負擔從男人的肩膀上移給女人，或者移給其他機構。我們認為這根本是一種推諉之辭。任何機構都不會壓迫人，它們僅僅是壓迫者的工具，我們譴責機構，這意涵著男人和女人都是受害者。而這反而掩蓋住了一個事實：男人確實從女人的劣勢中得到利益，同時這也會給男人藉口：他們的成為壓迫者是被強迫的。相反的是，任何男人如果他願意被別的男人當做女人來對待，他有放棄他優越地位的自由。

也有人說，有些女人對她們的壓迫逆來順受，有些則加以譴責。對於這種觀點我們也不以為然。婦女劣勢地位的形成，並非在於洗腦、愚笨、或心理疾病，而是持續不斷來自男人的壓力所造成的。我們不需要改變我們自己，要改變的是男人。

在所有的推諉之辭裏，最污穢人的觀點是說：婦女也可以壓迫男人。這種觀點有兩種假設：一是它將個人間的關係抽離出它所處的政治系統，二是它仍有男性主義觀念作祟，認為男人特權

的合法改變是一種被壓迫。

五、我們將我們個人的經驗和感受作為分析我們共同處境的基礎。我們不能依靠任何既存的意識型態，目前它們都是男性優勢文化的產物。我們懷疑所有的思想原則，因為它們無法適合我們的經驗。

現在，我們主要的任務是經由我們的共同經驗，以及現行制度中所顯示出來的性別歧視，來培養女性的意識。女性意識的培養並不是一種「治療」。因為如果它是「治療」，那麼就意謂著男女關係的問題可以個別解決，甚或會錯誤的認為這種問題是單純的個人問題；而我們的婦女解放計劃卻是以我們生活中具體的實際情形為基礎的。

培養女性意識，首先需要的，乃是我們自己和其他女性，無論私下或公開，都要誠實。

六、我們認同於所有婦女同胞，尤其是對那些最貧窮、被剝削得最慘的婦女同胞。

我們否定所有那些使我們和其他婦女加以區別開來的經濟、種族、教育和身份特權。我們必須承認並且消除那些使我們反對其他婦女的偏見。

我們婦女同胞必須要達成婦女本身的內部民主。我們在婦女解放運動中使每一婦女同胞都有均等的機會，來參與、來分擔責任、來發揮她的政治潛力。

七、我們要求我們所有姐妹聯合起來，共同奮鬥。我們希望所有男人放棄男人的特權，為了男性和女性的人道而支持婦女解放運動。

為了我們的解放，我們將站在婦女同胞的一邊，以攻擊壓迫

她們的人。我們不管何謂「革命派」，何謂「改革派」，我們只管怎麼做才對婦女有好處。

現在已不是斤斤計較個別性案例的時候了，我們現在要作整體性的努力。

10

聖誕老人謀殺案

這篇文章原載於六〇年代地下雜誌《勝利》(WIN)，後來被廣泛轉載，是婦女解放運動中很重要，也很有趣的文章。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女士曾說過：「最激烈的伸張女權的文章，是出自男人的手筆。」可為本文註腳。

從前，有一個人，他只不過謀殺了四十二個聖誕老人，就永遠的終止了世界上所有的戰爭。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大約在聖誕節前十天，城裡有一個「救世軍」的聖誕老人被謀殺了。

一家早報登了這則消息，但，第二天，又有五個聖誕老人再被謀殺，全國每家報紙都把這個消息登成頭題新聞。

在這五個聖誕老人裡，有四個是在替「救世軍」籌款時被殺的，一個則是在一家百貨公司的玩具部被刺死。

這兩件謀殺案震動全國，大家都在猜，這到底是哪一種邪惡的人幹的，而使得每個兒童都欣喜若狂的聖誕節蒙上了陰影。

大家都不關心這五個被謀殺的人的情況，大家只注意這個謀殺案在人們心中所引起的反應。

因此，第二天，城裡的大街小巷都開始密佈警察、憲兵，和便衣警探。但是，接著的是，又有十個聖誕老人被謀殺，兇手仍然沒有抓到。

晚上，所有的聖誕老人，都集合起來開秘密會議，他們都認為自己對兒童有重責大任，可是，他們也知道，在這個時候要是扮演聖誕老人，確實是樁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的事。

結果，有一個自告奮勇的聖誕老人還是決定出門，出門時是全副武裝。

可是，當天晚上，他卻在自己的床上被人割斷喉嚨而死。

隔了一天，整個城裡即已沒有聖誕老人了。

全城的人更加震驚，小孩子們更是大哭大鬧，聖誕節變得根本不像聖誕節，怎麼會有沒有聖誕老人的聖誕節呢！

再過一天，有個想要出鋒頭的小牌女明星，不管死活而只是爲了出鋒頭，便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女的聖誕老人。

因爲聖誕節快到了，而整個城裡卻連一個聖誕老人也沒有，因此，她所到之處，大人和小孩都欣喜若狂，她也出足了鋒頭，結果，她居然沒有被謀殺。

因此，第二天就有更多知名度更高的女人打扮成女的聖誕老人出來。她們也都沒有被謀殺。

因爲連續兩天沒有聖誕老人被謀害，大家以爲危險已經解除了。於是，男的聖誕老人先派了一個人出來試探試探動靜。結果是，一個小時後，他就被人射殺，一連吃了三顆子彈。

於是，這一年的聖誕節，成了女的聖誕老人的天下。

第二年，這樣的事情又再重演，聖誕節又成了女的聖誕老人的天下。

第三年，第四年，連續好幾年，像這樣的謀殺都不斷出現，凡是男的聖誕老人都被謀殺。結果，無論是報紙、廣告，或是人們的心裏，男的聖誕老人的印象，都已漸漸褪除；女的聖誕老人成了主角。雖然，人們仍以爲聖誕老人是從北極把玩具帶來，並且掌管著一群小精靈，可是，人們也已漸漸認爲，是女聖誕老人駕著馴鹿拖著雪橇，從煙囪進入每個人家，並把聖誕禮物送給每個兒童，而且還每年帶領著聖誕遊行。

非常有趣的是，婦女們都很喜歡當女聖誕老人，她們自動的當女聖誕老人成了一股風尚，一到聖誕節前後，滿街都是女聖誕老人。

後來，她們又開始把傳統聖誕老人的服裝作了一點修改，最先是把紅衣服的紅色程度作了一點變化，然後又變成其他完全不同的顏色，最後是，變得每個聖誕老人的衣服都不同，而顯得燦爛美麗。

帶領人們作聖誕遊行成了很光榮的事！

小孩子們都喜歡她們！

以前的聖誕節從來都不像現在這樣熱鬧，有這麼多女聖誕老人，有這麼刺激，有這麼熱鬧！

受到女聖誕老人影響的兒童們，成了新生的一代，他們有了不同的信仰。

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們看聖誕老人，是把聖誕老人當成上帝來崇拜的。當他們稍稍長大，不再信聖誕老人時，他們開始進主日學，去學習另一個上帝，這個新上帝並不給他們禮物，這個新

上帝混沌不明，因此，終他們一生，他們都渴望著兒童期的上帝——聖誕老人。他祈禱時不斷地唸：請賜給我我所需要的。

可是，相信女聖誕老人的兒童們，當他們長大後，對於婦女似乎有了不同的態度。

他們開始選出女國會議員、女總統、女市長；很快的，這個國家被婦女所統治。

她們主要關心的是食物的問題，國會裡經常討論餐飲之類的問題。這樣一來，很快的，就是最窮的人都有了很多吃的東西；她們也關心住的問題，很快的，房屋就不再缺乏。

可是，有一件事情她們不作。

有什麼必要的政治理由，會使她們願意把自己的小孩，送給別人去殺死？這真是荒唐！

因此，她們用她們的政治權力和財政權力，以及美國的特權，來影響、來鼓勵別的國家的婦女參政。

因此，戰爭永久被消除了。

人們繼續作他們不斷作的事，他們工作、唸書、賭博，討論哲學。

可是，這種哲學討論，並不會使得人們饑餓和相互屠殺。

很快的，世界沒有人挨餓，每個人都有好房子，不再有戰爭，大家都很快活。

你知道，當你不再想這些時，一個世界革命事實上已經發生過了。

只不過是四十二個聖誕老人，並沒有更多的人被殺，世界革命卻因此而完成。

但是，這個兇手——喔！不，應該叫他聖人——，他到底是

誰？他計劃並實行這個幾乎不流血的革命，卻始終未被抓住。

繼續過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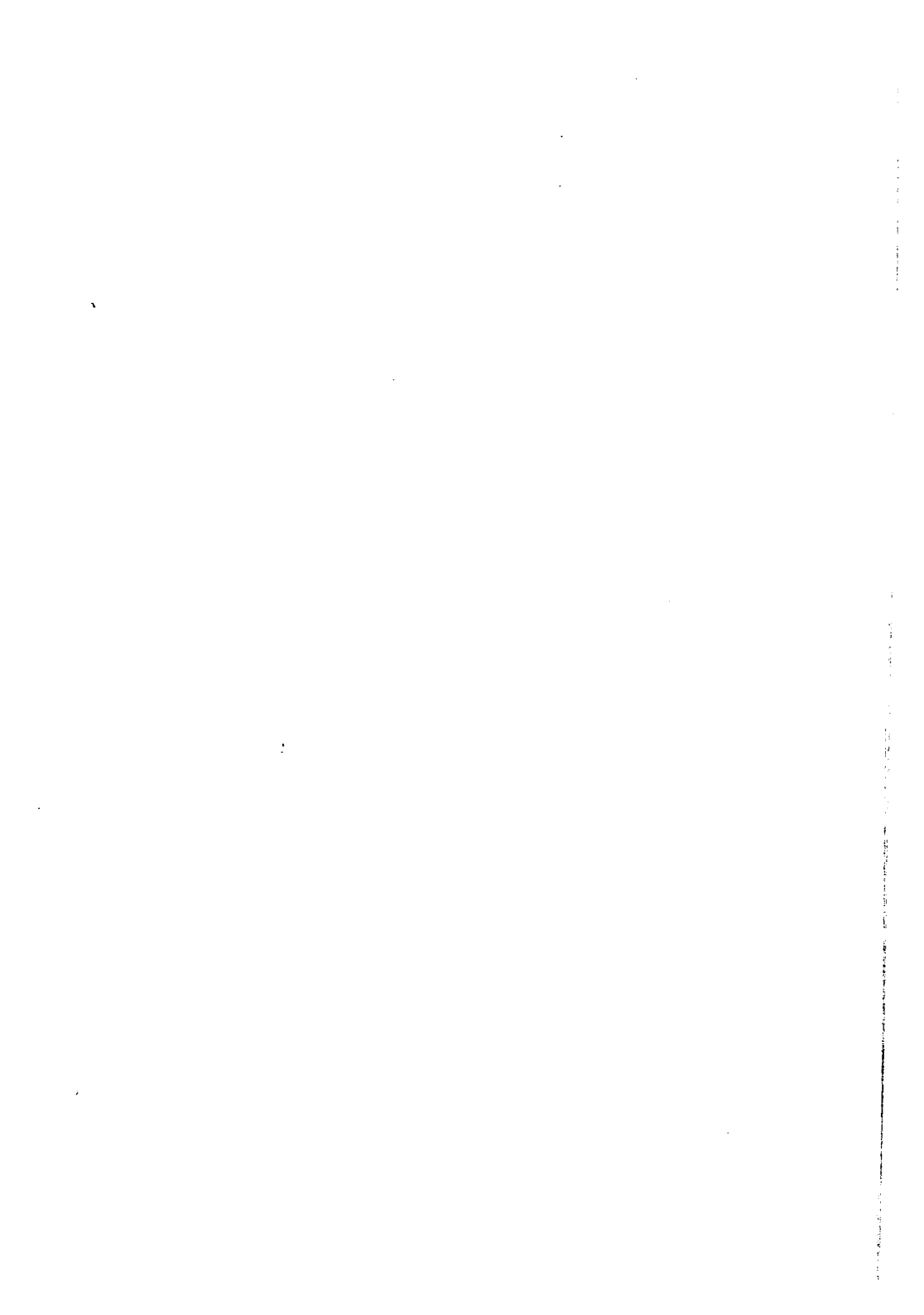
沒有，沒有人知道誰是這個聖人，除了我！

我知道他是誰。

我沒有證據，可是，你會知道我為什麼敢說我知道。

因為，只有一個人有這麼大的天才，如此勇敢，如此富有想像力，如此熱愛人類，如此敢於動手殺人，如此富有耐心的去做這件豐功偉業。

這個人——就是我的小妹！



11

保守派學生對學運的看法

阿諾·史泰恩伯格 (Arnold Steinberg) 畢業於喬治·華盛頓大學經濟系，他是美國保守派學生團體「美國青年人自由協會」(Y.A.F) 機關刊物《新衛兵》的編輯。學運期間，他參加了共和黨的一九六八年大選運動。他多次在校園和電視為保守派學生作代言人。

新左派的行動家，由於他們的極端觀點和驚人策略非常吸引大眾傳播媒介，因此他們受到大眾廣泛的注意，這和他們極少數的人數是不成比例的。更多數的學生也同樣的了解學校和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但他們關切的是解答而非宣傳教條，他們不喜歡破壞性的策略，因此，他們反而不受大多數公眾的注意。

根據我的觀點，新左派向文明社會的兩個假設挑戰：第一是理性的觀念，依據理性來冷靜的分析公共問題。第二是秩序的觀念，秩序產生安定的環境，信心和進步是可能的連續性。而這兩個假設又是相互補充的，只有在秩序下才可能冷靜的分析。如果

要理性流行，它首先必須在大學裏存在，可是，大學現在卻受到新左派的攻擊。

學生騷亂的引起，美國和世界的真實問題是一部份原因。但新左派們卻志不在解決問題，他們只是發洩情緒或刺激革命的熱情。歷史上充滿了革命的烏托邦的例子，這種烏托邦比他們意欲矯正的惡魔更壞。激情並不能解決問題，它只使問題複雜。

學生，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是比較沒有耐性的。我們希望立即可見的成果，我們現在就要。我們堅持坦白，我們討厭虛偽。當我們要求改正以往的缺失時，我們是威脅到許多公私的利益。新左派欲藉學生騷亂來解決問題，但因此他們也沈溺於發脾氣之中。他們的領袖一再談論問題，可是卻沒有答案。他們只是說整個系統必須改變，現在民主已無能為力。

而事實上，對某些新左派，現在的民主運行得太好了。舉例而言，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有四分之三的學生主張「公開招收職員」的政策——即讓僱主到校園來招收職員，他們可以和有興趣的學生直接交談。可是，新左派組織「學生民主社會同盟」卻堅持廠商沒有這種權利。由於民主的意見和他們的政策不合，他們乃訴諸暴力，否定學生和僱主對談的權利。

加州大學的哲學教授馬庫色常常被新左派引用。馬庫色明顯的指出，對於他反對的個人或團體，他要求不給它們自由言論。他假設了一個精英份子的社會，其他的人都跟隨著精英份子的指定模型。很自然的，新左派的領導者認為他們就是這種精英份子。

因此，新左派所指控的現代社會中央控制的罪惡，他們自己就是觸犯者。「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發言人曾說過「參與民主」，這意謂著「讓受決策影響的人參與決策的制訂」，而事實上，新左

派的領袖卻將決策的權力只抓在自己手中。

新左派的領導者主張「衝突政治學」，並顯示在警察和學生對立的戰場上。他們的策略是將不滿但卻不主張革命的學生轉變為活躍的革命家。為達此目的，他們創造了無秩序的情境，使得無決斷力和性喜拖延的大學行政人員最後被迫去叫警察，它的結局正是新左派所期望的：因為如此一來，便可鼓動與警察衝突，隨著而來的則是監禁和漫長的審判，他們希望藉此能使得未獻身或半獻身的學生能「激進化」。

「衝突政治學」最典型的策略，就是讓相對而言比較是非暴力的學生在學校建築物裡進行靜坐示威。警察來了，要驅散他們，而他們拒絕，於是警察進入擠滿人的教室，這時新左派的一個核心份子開始攻擊警察，警察也用棍棒還擊。這時如果你在屋子裡，你是一個中產階級青年，一生中大概只有在交通違規時和警察打交道，你對整個情況不了解，但只看到警察用警棍打人，你和其他人一定驚憤交集，一場混戰開始，你和其他人也被警棍痛擊。

「衝突政治學」有嚴重的倫理上的問題：誠實而理想主義的革命青年，他們用這種方式，但他們的大多數卻都是改善現況的興趣大於推翻現制。另外，對學生用意識型態的團結來加以欺騙，這是不是一種正當的作法？學生，就像社會，代表著許多不同的利益和觀點。學生不像社會的許多團體（例如工人），學生的角色只是暫時的，學生的身份只是一種過渡。學生的代言人們常說什麼「學生的意見」，這是很可懷疑的。意圖將革命的熱情加給學生，是在利用學生的理想主義以及他們這群社會上最脆弱的人的有限經驗。最後，一個在學校努力追求學位的人，為何就要被那些目的只是在製造無秩序，以致他們很難獲得學位的人誹謗？

當一個人了解到，新左派的興趣是在製造革命的氣候，在其中，暴力乃是邏輯的必然，而不是想要解決社會問題；那麼，我們便可了解我一開始就說的兩種假設的意義了。絕大多數新左派領袖均來自中上階級的家庭，他們對他們口稱所同情的社會，只有很少或根本沒有接觸，「窮人」和「被剝削者」，對他們而言乃是一種社會學現象，一種殘酷社會抽象的受害者。他們自己的生活處境有保障，他們沒有財務的責任，他們主張革命，他們不接受秩序的必要性，因為他們的生活就不是有秩序的。他們也不認為大學是追求真理的理性討論的地方，因為他們早已發現了最後的真理。

非常諷刺的是，新左派討厭社會的虛偽，可是他們自己在很多地方也同樣的虛偽。新左派批評社會不強調個人主義，可是他們自己卻認為個人的自由選擇是無效的，因為這會造成「壞的選擇」。他們請訴稱，和平的異議應予允許，可是當他們掌權，卻不准異議。他們的領導者是權力集中的，他們不反對自己有權力，但反對權力在別人手中。即使在新左派運動中，也有許多例子顯示出，他們是一小群人決定行動計劃，然後要其他改革的興趣大於革命的興趣的人遵行。

新左派的領導者稱自己是「激進派」，這個名稱是問題的根本，由於是「激進派」，當他們談問題時，便規避問題的真正來源。舉例而言，他們批評中央集權，可是他們對社會福利所作的建議卻需要給中央政府更大的權力。

一個真正的「激進派」只有在自由派／保守派陣營中才能找到，他接受某些正面的價值，俾引導他向更好的社會前進。我們尊重個人及他認同的價值，我們堅持使社會得以運行的最大的個

人自由。進步的主要泉源是個人的行動而不在於國家。因此，我們的「美國青年人自由協會」在成立時的宣言中說：「市場經濟，根據需要與供給的自由法則來安置和分配資源，是最簡單的經濟系統，它是適合個人自由以及憲法政府需要的。而這也就是人類需求的最有效供應者。」

在美國有許多公民團體，兄弟組織、教會、基金會，以及各獨立部門的許多其他私人組織。這些團體在解決國家的問題上作了許多貢獻；它們也同時在各方面作了許多實在的建議。現在，許多基金會已經和公司合作，以減少風險的方式資助黑人社區的黑人企業家，而老一輩的富有而「呆笨」的公民們，則對這些黑人企業家提供顧問和技術意見，基金會可以減少此種計劃的風險，而財政機構和大公司則提供資金。新左派不斷攻擊的大公司的企劃人員，事實上是在解決社會問題上最有衝力的人，他們對社會問題提出系統的解答，包括訓練失業者，改善貧民窟的居住環境等。因此，許多被稱為「反動派」的商人，由於他們有效的改善我們的問題的根本，他們才是真正的「激進派」。

像我這一類的保守派學生，我們並不替現狀辯護。我們和新左派一樣厭惡社會日漸增加的中央集權及官僚化，以及日趨減少的個人主義。我們認為，我們社會中的貧窮以及種族歧視的殘餘應該消除，但它只能在人們善意信念的前提下才可能。復次，我們也承認，自我利益乃是人性的一部份，如果使從事窮人訓練及窮人住宅的事業成為有利可圖的事業，那麼我們就會有更好的就業及更好的窮人住宅。

例如，保守主義者也主張可以用減稅的方法來鼓勵民營企業訓練失業者或開發貧窮的地區。減稅的方法甚至可以用來提高都

市學校教師的水準，增加教師的供應。我們的目標是減少公共行政部門的角色，以解決社會問題。

至於自由派，我們並不喜歡他們，也不喜歡他們對國家的依賴；可是對他們主張的公正、民權、言論自由，以及其他基本人權，我們也同樣的主張。我們和他們相同的是對於何者是建設性的，何者是破壞性的，我們有著相同的概念。我們都希望解決問題，因此我們經常和自由派聯盟以追尋共同的目標，並用以對抗新左派的策略。

我們對我們的社會系統有信念，但是保守派的我們也有革命性的觀念，我們認為政府的干預經常是造成問題而非診治問題。我們比起自由派來，更強調要有以傳統，連續性以及價值的發展為基礎的有機性改變，而對那種鹵莽而思慮不週的，以及用道德相對主義為基礎的改變，則非常反對。

因為我們是學生，我們也非常接近大學的問題。在大學，我們看到了自由派強調平等、公共行政以及集體影響的效果。大學太大了，太非人性了，在此種教育下，太多人只得到很少的學習成果。政府和教育聯結得太緊密。校園欠缺足夠的自由。教育的效果很小，輔導員很少「教」。這些看法好像和新左派沒有什麼不同。而事實上則是我們並不只一味的老談那些很明顯的問題。例如，我們認為學校的學術自由需要秩序，也需要學生和校務人員有相互權利的尊重。自由乃是指反對的權利——反對政府、反對大學學校當局，甚至包括反對新左派。

對於高等教育，我願意支持一種新的觀點和作法。如果國家認為補助高等教育是值得的，那麼它就必須規定最低的學位標準，並對學生依需要而予補助（在現行制度下），州立大學對所有的學

生都是相等的資助。這些基金必須交給一個由學生選擇的委託機構來管理，用於教育。這種觀點是非常複雜而大膽的，在此不能申論，它最先由富里德曼教授提出，他是芝加哥大學的著名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它提供了更大的選擇自由，更適應學生的需要，更省錢，還有更大的實行可能性。

這些由保守派所提出的意見，大膽而未經嘗試，亦顯示出我們對現行體制的不滿。我們保守主義者曾建議改善都市居民生活，改善種族關係，增加就業機會，改進居住和增加住宅等。這些建議都是向現制挑戰的——它既是哲學上的也是物質上的，而這些建議又都有一個價值的判斷，即尊重自由。

對我本人，這才是真正的激進派所應遵循的。我相信，一個有秩序的，反對中央集權的，民主的社會，在面對廿世紀的問題，比起自認為是精英份子的集體主義角色，能有更大的創造性能力，也有更好的解決問題方法。



12

學生需要甚麼？

艾德華·許瓦茲 (Edward Schwartz)，畢業於奧伯林大學，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間，他任正統的美國學生組織「全國學生協會」會長，這是全美最大，且被官方認可的學生組織。六〇年代學生運動高峰時期，他曾參與學生抗議示威運動。後來，他進入布蘭地斯大學社會福利學院深造，成為社會工作者。他的立場有別於激進學生，屬於「自由左派」。這篇文章最先刊於《進步》雜誌，後來美國新聞總署的《對話》雜誌加以刪節重刊。本譯文依據的是《對話》雜誌的刪節。就整個六〇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學生觀點言，許瓦茲屬於「改良主義者」。

每次我邀請年長者座談，都會有煩悶的聽眾問道：「你們學生到底需要甚麼？」對於他們，學生抗議及學生權力所顯示的乃是無政府狀態、混亂，以及各地普遍存在的顛覆，因此這大大刺激了他們，因而對這些學生意圖報復，以維護他們自己的父母權威

印象。

最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事件——激進學生佔領學校行政大樓超過了一星期，以及其他的事件，對反對學生的人等於又加多了反對的材料。然而，一個公正而具有遠見的評價卻不能如此情緒，而需針對學生行動主義的種種形式以及他們抗議的內容來討論。

學生需要甚麼？或者更準確的說，這些在戰後出生，未經歷過蕭條和炸彈的後電視、後技藝、後太空時代的青年們究竟需要甚麼？爲了要了解我們學生現在的需要，先去了解學生運動的系絡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的學生面對著兩大矛盾：一、我們的富庶使得我們對自己生活的責任降低，不像我們父母輩面對大蕭條時期那樣的爲生活擔心，但亦正因我們自由，因而鼓勵我們尋求更多的責任。二、對我們，以及對所有的人，在一個大眾社會中，個人所能產生的作用是很少的，而這個問題對每個人的生活又都是很重要的。

這兩大矛盾：在自由的環境下獲得責任，以及在無力的氣候下產生足以影響生活的權力；在學生運動中乃是最中心的論題。對於這兩大矛盾，學生並沒有固定的解答。學生社會有許多部份，各有不同意見和解答，他們的解答成了青年學生世代認同的主要對象。

首先，年長者和我們的關係究竟如何？如果有促使不同信念的學生聯合起來的東西，那麼它就是學院的行政工作者或公共行政官員，這些人向學生的感覺、責任、利益，以及學生的能力挑戰。我曾經見過實質政治立場和學生差不多的大學校長，只因爲他對學生用教訓的口氣，不聽學生講話，或者因爲他要求學生安安靜靜的留在宿舍中，結果他失去了學生的支持。相反的，我也

見過實質政治立場和學生完全不同的大學校長，但因他對學生很認真，聽他們的意見，用很清晰有力的話來表示和學生不同的意見，並有一種向學生學習的謙虛態度，結果，他反而得到了學生的支持。

這兩種例子都顯示出態度的重要。一個崇拜青年的社會，必不可免的會使得許多人害怕青年：害怕他們不能與青年打成一片，被排斥在外。其餘的人則對青年以一種防衛的態度，對青年的沒有責任以及奇特的外表等，主張以法律來規範。或者，則是用諂媚的態度來迎合青年，例如對童子軍領袖討好，也用大人並不真正懂的青年語言等。不管一個青年碰到了上述的那一種大人，他對他們都不會感到興趣，如果青年碰到的年長者是暴君，他們就會革命；如果他是諂媚迎合者，他們就會嘲笑。

學生是人，他們希望能被看成是個人。能和學生水乳交融的年長者，是有誠意和學生相處，把學生當作是潛在的朋友，能和學生保持開放的關係的人。

在學校，能贏得學生尊敬的教務長是有新觀念、新意願、對學生的情緒和心理需求保持了解，當他們作學生的顧問，在為學生指出應行的方向時，他們是把自己也算在裡面的：他們自己和學生都往這個方向走。

現在絕大多數學生眼中的「教育」，已不再是為了應付考試而浪費時間死記老師上課的講述內容。十八歲到廿三歲，乃是一個人搞清楚我們是誰？我們要怎麼做？我們和別人的關係是甚麼？我們能負起什麼責任？我們應該以及我們將要扮演何等的角色等問題的年齡。學校的教室成了學習上述問題和解答的資源銀行，也成了獲取訊息的中心。教室讓我們學習評價的工具，去學習有

關人和自然、社會三者之間的本質及關係的地方。

然而，這種整合以及發展自我的過程乃是一臨界的過程，我們覺得它只能在一種個人試煉的氣候下才能獲得。大學是一個特種社會，我們覺得我們要像成人一樣參與大學環境和政策的制訂。如果有壓力來阻礙我們的自由，禁止我們參與，那麼我們成爲一個公民的訓練機會便會因而失去。

我們「自我決定」的要求和教育理論是衝突的：因爲教育理論認爲年輕人還不能作某些事，也不能扮演某些角色。然而，縱使我們「還不能」，我們認爲以不讓我們承擔責任來作爲理由，這並不是好的理由。大學當局常常說：「等你們畢業罷！」我們覺得，在大學時不要求責任的人，在他以後的人生也不會負起責任，這種人將會像梭羅（Henry Thoreau）所說的，成爲「群眾人」之一，一生「靜靜的自暴自棄」。

因之，學生要求權力的吶喊，乃是一種自我的吶喊。雖然像宿舍管理、晚上熄燈、學生財務、獨立的學生刊物、男女學生的關係等問題好像是瑣碎的問題，可是對我們而言，卻是測驗我們生活中自我以及自我表現的重要象徵。如果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角色等有關問題的試驗被限制，那麼，我們決定自己行爲當行或不當行的能力也被限制。如此一來，它在校園中造成緊張乃是可以預見的。

學生們追求理想的校園環境。學生們以前說「自由化的校規」，現在他們要求「讓我們自己決定校規」，這兩者是不同的。前者並沒有學生參與的含意，它只是對個人自由的一種吶喊；而後者則意涵著參與決定的權利是一種目標。這兩者都要求更大的責任，都要求自尊和被尊敬；但「學生權力」則有更多的意義。

告訴年輕人不要冒險是沒有用的。我們的年輕，我們定義我們自己之意義，這可能是冒險之事；我們承擔角色，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下測驗我們自己，我們改變別人的嘗試，這也就是冒險之所在。大學的機構是我們作這種試驗的實驗室。它給予大學生空間和泉源，或者不給予。當大學不給予時，我們便要爲了我們而使空間自由，縱使這意謂著要向大學挑戰。

學生捲入政治和社會事務，也必須從這樣的框架上來觀察了解，這也是爲了學習和行動而使空間自由，這也是爲了替自己的角色定位，發現自我和責任。

當學生們開始從私人事務的關切跳到關切政治問題時，它通常反映出若干條件之一：它可能是學校周遭環境使得學生政治化，告訴學生官署並非神聖不可侵犯，學生可以去加以改變。同時，它也可能是學生對公眾事項的反應，例如金恩博士和甘迺迪總統使得學生有了關切政治的刺激。另外，它最可能是某些問題本身和學生有關，例如徵兵令和學費漲價等激起了學生的情緒。

只有很少的問題才會使學生串聯起來。通常，這些問題都是直接和學生的利益有關的。絕大多數學生支持降低投票年齡爲十八歲的意見；在新澤西州、紐約州和加州，學生聯合起來主張維持學費的免費，學生反對國家干涉地方大學的事務，並願意在干涉造成學校基金減少以及校園政治團體被壓迫、演講被禁止時起來抗議示威。

致力於自我定義的學生，對於他們，非中產階級者受到的文化壓迫，乃是直接和這種文化有關。他們願意保護這種不受大眾輿論重視的人，因而造成了他們自己政治領導的標準。自由主義的左派知道這種不滿是沒有力量的，但它卻能長久維繫不滿者的

社會，儘管他們獲得真正勝利的可能性較小。對於學生，所謂「勝利」乃是一個意義不明確的名詞，以往所得的勝利也都是地方性的，而非全國性的，也是不夠的。重要的是：他們團體的整合度，向集體生活挑戰的他們的聯合度。

自由份子和左派的爭論焦點就是這些問題。經過言辭和意識型態的灌輸。左派的跟隨者會告訴你，他最害怕的事是被都市吃掉，被電腦和機器吸乾，因此，他們狂熱的奮戰。對於他們，和整個系統玩球賽，為候選人工作，和政府官員溝通意見、服兵役等，都成了不值得的事情。最後，左派說，自由派將為了他們自己的自由而犧牲掉整個戰場，犧牲掉黑人和越南人以交換他們自己在社會中的較好地位。左派認為，自由份子並不了解他們曾為之戰鬥的人民，自由份子並未超脫出他自己的文化規範。曾有一個激進份子說：「自由派為別人而戰，激進派為自己而戰。」

當這種爭論落實到具體的特定事項時，情況便變得殘忍了。左派為了將自己和群眾分開而戰鬥，而自由派則嘗試著從美國傳統中找出能適合並支持他們的例子。左派利用衝突的策略想要讓群眾驚醒；而自由派則盡量避免用這樣的策略，害怕會和群眾衝突。左派所談的是摧毀整個系統，自由派則說要重建這個系統。但無論自由派或左派，對具體的目標以及為完成此目標應有的作法均無明確的概念和決心。對自由派和左派，這場作戰的作戰方法，和作戰本身一樣的重要。

認為自由派和左派的不同是在於兩者的策略和認同目標不一樣，這是一種錯誤的看法。兩者的目標不同，自由派是他們自己傳統的產物。由於美國社會不能應付都市的新問題，不能應付世界新興國家的問題，因此自由派便造成了，他們希望能經由正確

的領導，對正確的公共政策方向產生影響。而左派則不然，他們認為，對於都市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問題，美國的反應和美國的文化及價值、態度等均有關，它像壓制自己國家少數人一樣的壓制著世界大多數人。

如果選舉政治對左派仍然不足以解決問題，那是因為在他們的觀點中，問題的本質是無法經由新的領導來解決的，他們認為問題的解決應該從根本開始把整個體系作改變。不過，激進份子對這種改變迄未發現一種條理相貫的策略與方法。不過，長期的黑人社會、大學、都市以及公司的組織策略，卻可能使得自由派團體跟隨前進。

學生和成人的發展關係，基於相互尊重的態度，發展出人們行為及經驗能力所賴以成長的學習社區，對他們吸收資訊和作決定的能力是很重要的；這對他們培養出一種對文化多元主義的容忍，也是很重要的。現在，這些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策略均逐年在變，而問題則仍然相同，只要我們的大眾機構繼續維持現狀，問題仍將長存。

一開始的時候我就提出過兩大矛盾：在一種自由的處境下要獲取責任，在一種無力感的處境下要發揮權力，這乃是六〇年代學生的中心要求。我沒有用傳統自由主義的名詞，如職業、教育、住宅、福利等，因為這些問題，學生們都尚未面臨。學生所面對的母寧是更深入的問題，它包括大眾文化的結構和價值。如果我們吶喊，乃是因為這惡獸太難以趕走。而這個惡獸是否能被趕走，則依靠我們討論的能力，以及社會來聽我們的意願。

主要參考書目

1. *The Rebel Culture*, 1970 Ed. by Robert S. Gold.
2. *SDS*, 1974 by Kirkpatrick Sale.
3. *The Underground Reader*, 1972 Ed. by Mel Howard and the Reverend Thomas King Forsade.
4. *The American Police State*, 1976 by David Wise.
- ✓ 5. *The Knowledge Factory*, 1970 by I. L. Horowitz and W. H. Friedland.
6. *Playpower*, 1971 by Richard Neville.
- ✓ 7.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1976 by G. H. Nash.
- ✓ 8. *The Sense of The 60's*, 1968 Ed. by Edward Quinn and Paul J. Dolan.
9. *The Radical Vision*, 1970 Ed. by Leo Hamalian and Frederick R. Karl.
10. *Black Protest*, 1968 Ed. by Joanne Grant.

- ▷ 11.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1969 by Theodore Roszak.
- 12. *Where The Wasteland Ends*, 1973 by Theodore Roszak.
- 13. *Youth and Dissent*, 1971 by Kenneth Keniston.
- √ 14. *Between Two Ages*, 1970 by Zbigniew Brzeninski.
- 15. *Why Men Rebel*, 1974 by Ted Robert Gurr.
- 16. *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 1973 by John D. Rockefeller 3rd.
- 17. *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1970 by Philip Slater.
- ▷ 18. *The Berkeley Student Revolt*, 1965 Ed. by S. M. Lipset and S. Wolin.
- 19. *The New Student*, 1966 Ed. by Mitchell Cohen.
- 20. *American Ideologies*, 1971 by K. M. Dolbeare and P. Dolbeare.

